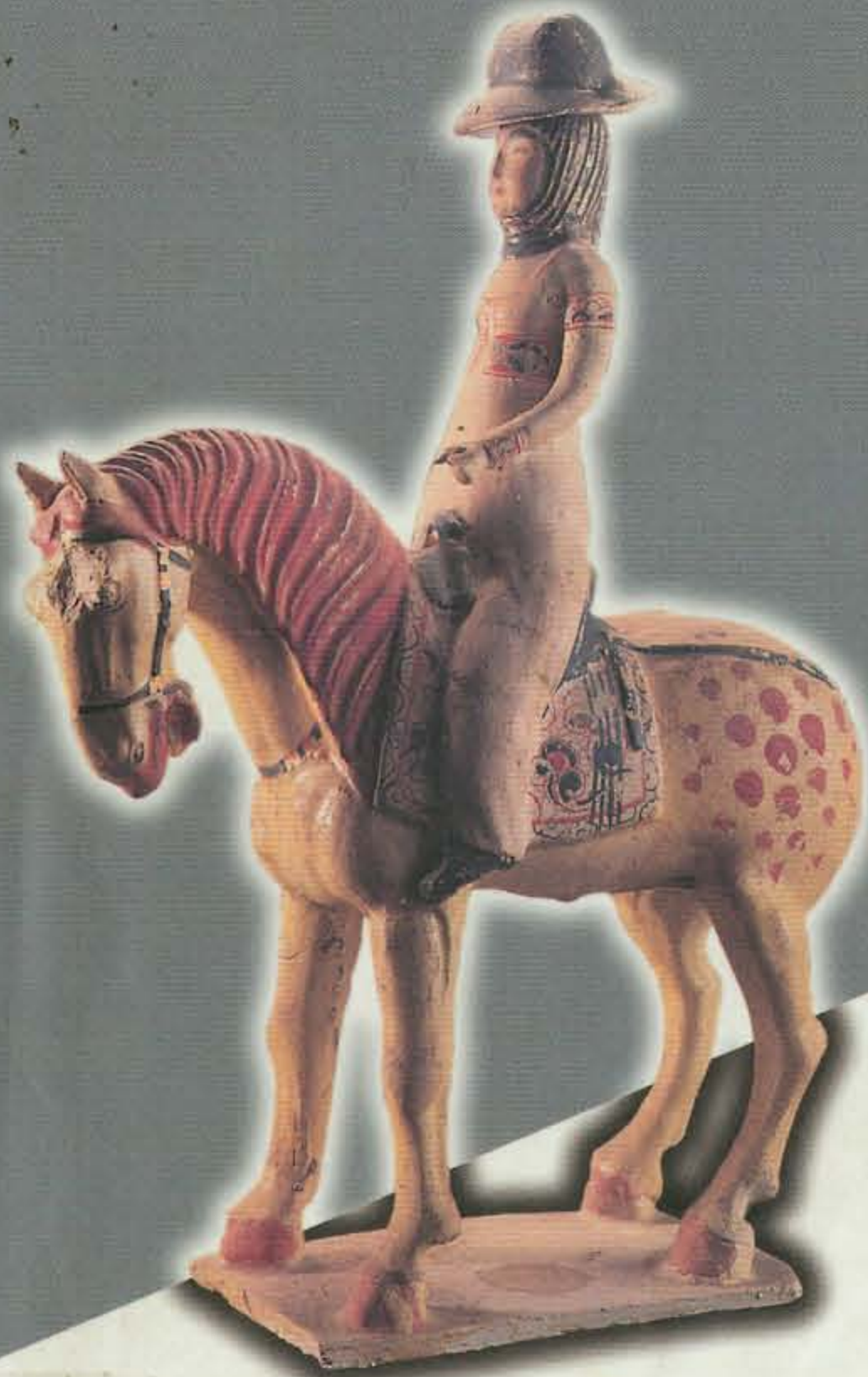


20 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

# 隋唐考古

齐东方 著



20 世纪是中国文物与考古界开始科学探索的时代。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翻开这套书，重温那些重大发现不断、研究成果迭出的激动人心的岁月，也许就能看到奋斗的足迹，也许就能触动智慧的火花，也许就可以在学术前沿开始一轮新的接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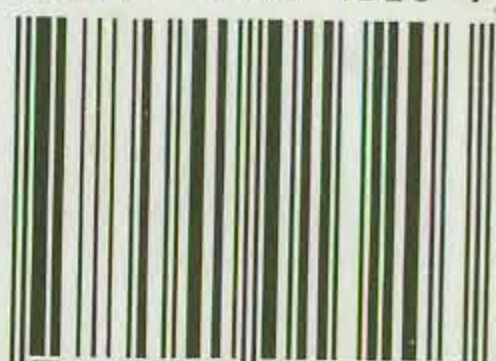


齐东方，一九五六年三月生于辽宁昌图，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获学士学位，一九八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获硕士学位，一九九二年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主要从事汉唐时期的历史、考古、文物、美术的教学与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唐代金银器研究》等三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涉及吐谷浑余部历史、三国至隋唐时期墓葬制度、中国古代金银器、丝绸之路考古等方面的研究。

版社



ISBN 7-5010-1320-9



9 787501 013203 >

ISBN 7-5010-1320-9/K · 570 定价：28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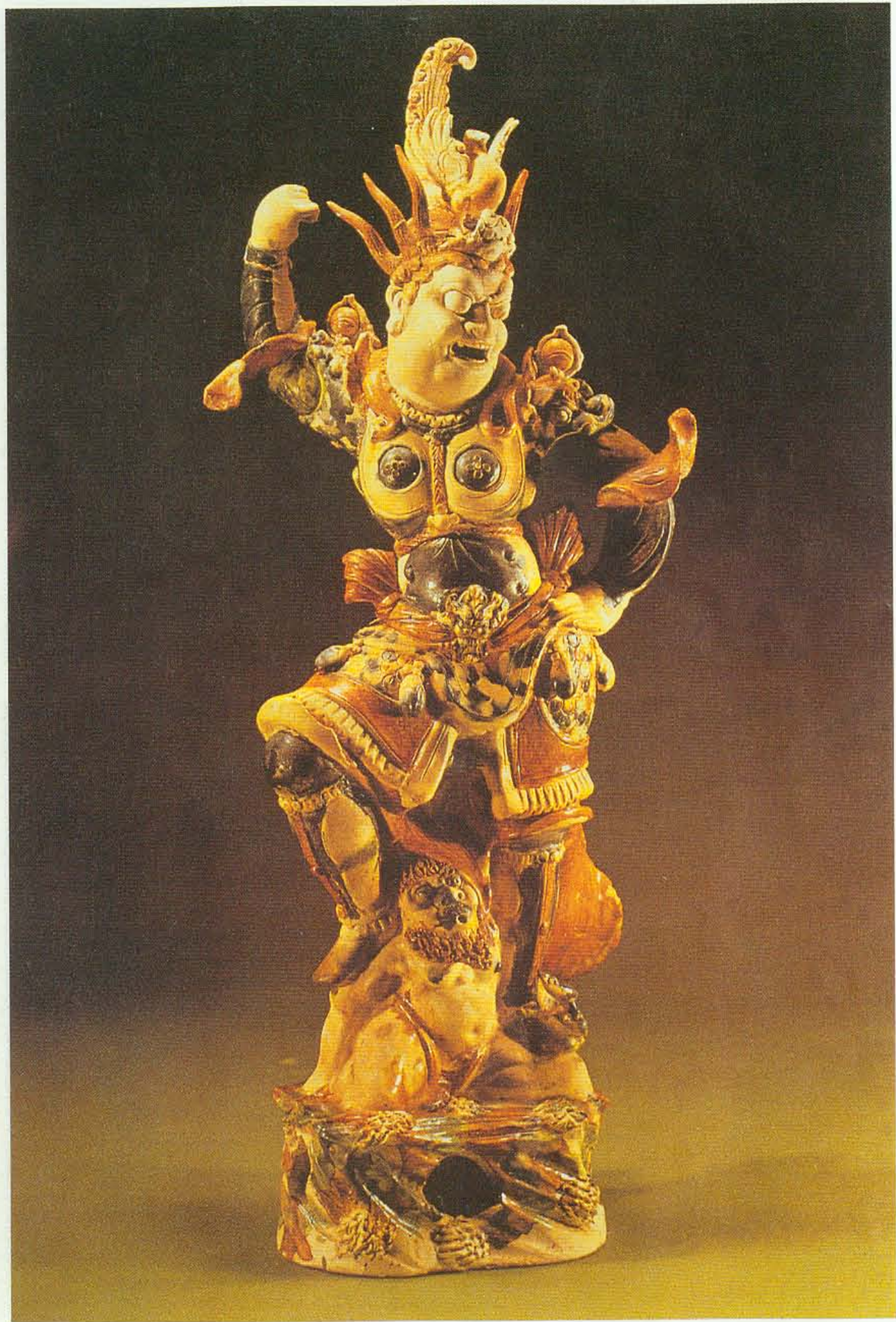
《20 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是一套学科发展史和学术研究史丛书。其内容包括对 20 世纪考古与文物工作概况的综合阐述；对一些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和古代区域文化研究情况的叙述；对文物考古的专题研究；对重要的文物考古发现、发掘及研究的个例纪实。

本书简要回顾了 20 世纪隋唐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成果，涉及城址、陵墓、瓷器、丝绸印染、金属工艺和中外文化交流诸方面，展示了隋唐盛世文明的辉煌成就。配有彩图 7 幅、插图 33 幅，图文并茂，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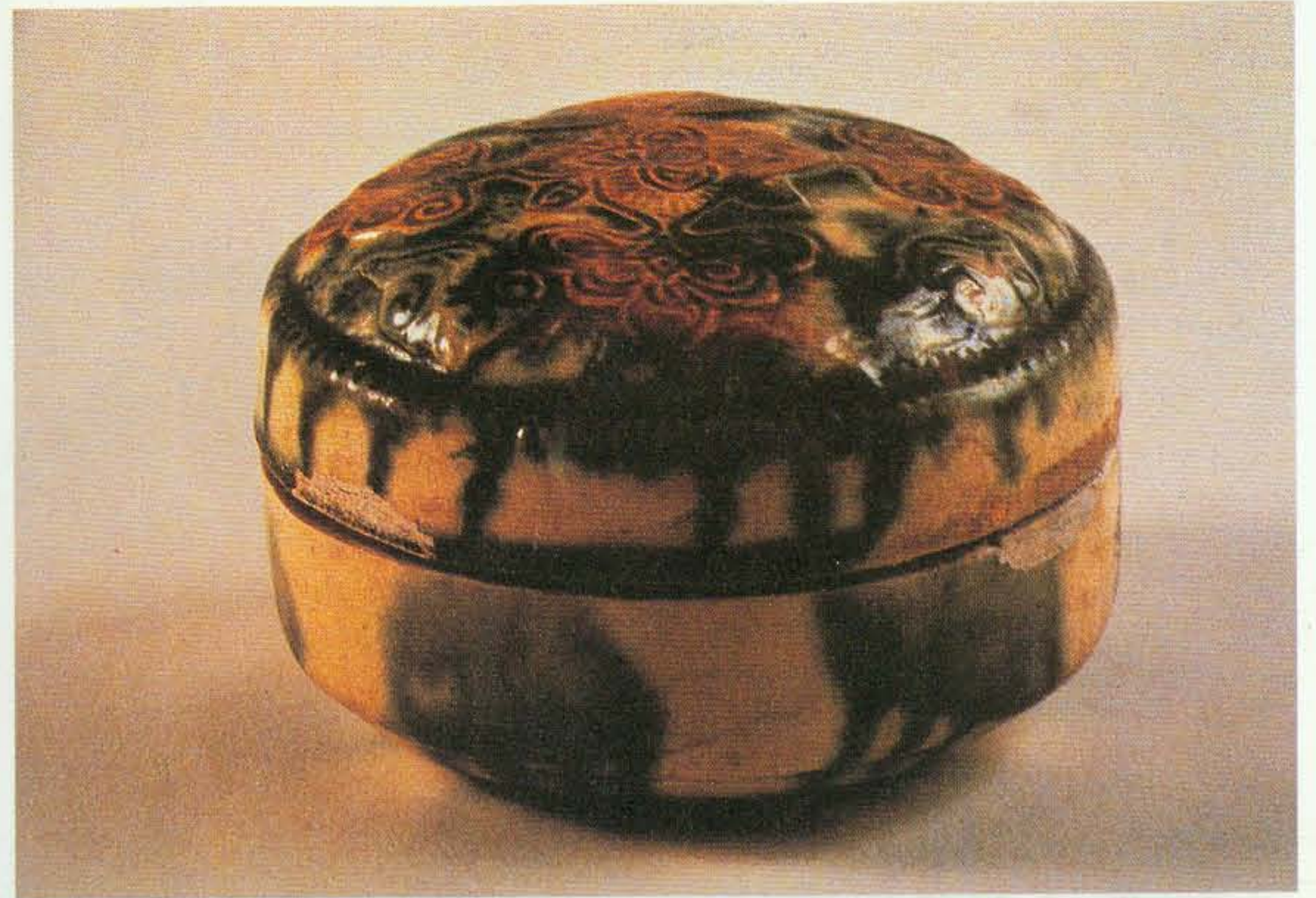
一 隋清禅寺遗址出土的  
萨珊玻璃香料瓶

二 唐法门寺遗址出土的  
秘色瓷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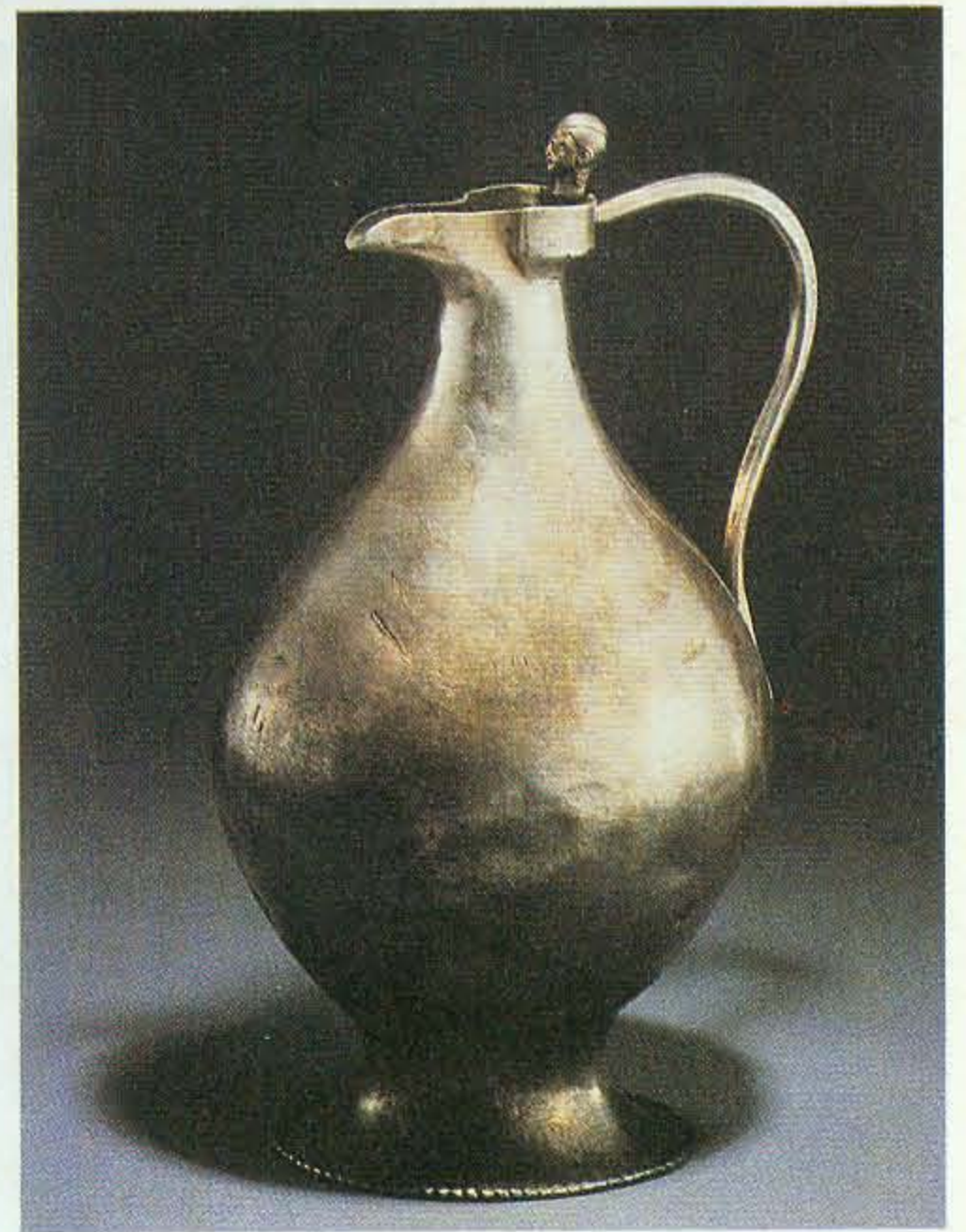


三 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武士俑



四 西安韩森寨唐墓出土的  
三彩盒

五 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  
出土的粟特银壶



20 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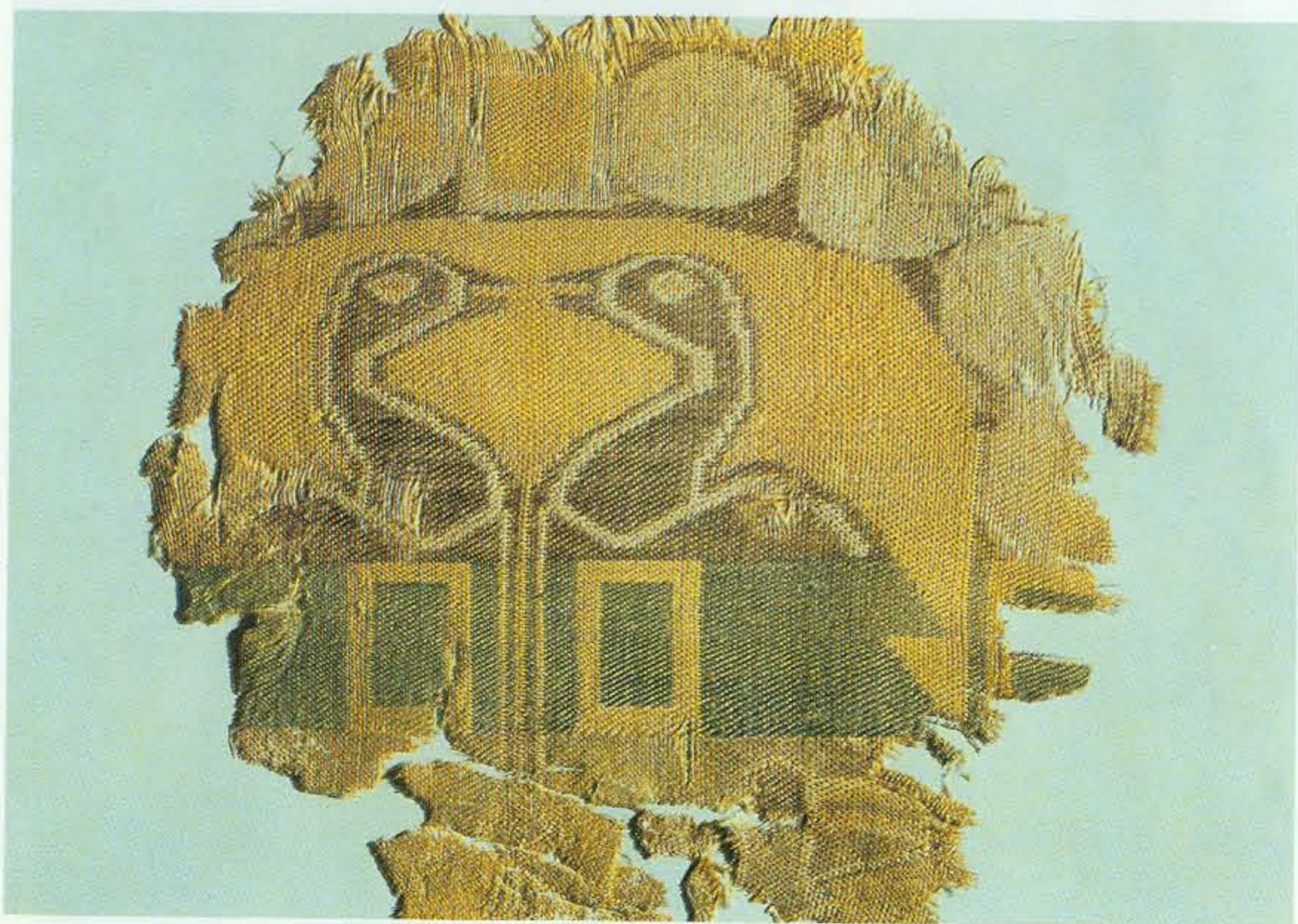
## 序 / 张文彬

俗称“锄头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学的诞生以及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完善，由此而引起的古物鉴玩观赏著录向科学的文物学的转变，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与文化界的大事。它从材料与方法两个方面彻底刷新了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研究天地，也为一切关心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人们不断地提供了可贵的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

仰古、述古、探古，进而考古，向来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明显的学术特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发其端，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北魏郦道元作注《水经》。他们对相关的遗迹遗物，尽可能地做到亲自考察和调查，既能辨史又可补史。这种寻根追源的治学态度，为后世学术上的探古、考古树立了榜样。此后，山河间的访古和书斋式的究古相继开展，特别是对古器物的研究，成了唐、宋时期的文化时尚。不少学者热衷于青铜铭文、碑刻、陶文、印章等古文字的考释，进而有了对器



六 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碗



七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对鸟纹锦

物的辨伪鉴定、时代判断、分类命名等，逐渐兴起了一门新的学问——金石学，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古器物鉴赏家和收藏家。只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金石学家们无法了解所见文物的出土地点和情况，也难以涉及史前时代漫长的演进历程，因而长期以来始终脱离不了考证文字和证经补史的窠臼。即使如此，他们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还是为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且在事实上也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文物学的起步铺设了最早的一段道路。

20世纪初，近代考古学由西方传入。中国学者继承金石学的研究成果，学习并运用西方考古学方法，开始从事田野考古，通过历史物质文化遗存，探寻和认识古代社会，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早在1926年，中国学者就自行主持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调查和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随后，我国学者同美国研究机构合作，有计划地发掘周口店遗址，发现了北京猿人。从1928年起至1937年，连续十五次发掘安阳殷墟遗址，取得了较大收获，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田野考古勘探、调查和科学发掘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蓬勃有序地开展，许多重要的典型遗址和墓地被揭露出来，重大发现举世瞩目。它们脉络清晰，层位分明，文化相连，不仅弥补了某些地域上的空白，而且衔接了年代上的缺环，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文化史、科学史以及其他学科领域，提供了珍贵、丰富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专业的研究与发展。这段时间被学术界称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逐渐形成。有关研究成果不仅极大地改变和丰富了人们对中国文明起

源、中国古史发展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扩展了中国文物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可以说，考古学的发展与进步，直接影响到文物学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影响到全社会对文化遗产重要作用的认识以及世界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重新认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物界就中国文物学的创立，逐渐取得共识，在共同探讨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学科体系。不少学者发表了有关论文，出版了专著，就文物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中如何对文物进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发表意见。这些研究成果已获得学术界的赞同。

在这世纪之交和千年更替之际，对中国考古学和中国文物事业作一次世纪性的回顾和反思，给予科学的总结，是许多学者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如果能通过梳理20世纪以来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透视学科自身成长的历程，从而展望未来发展的方向，以激励后来者继续攀登科学高峰，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为此，经过酝酿、商讨和广泛征求意见，我们约请一批学者（其中有相当多的中青年学者）就自己的专长选择一个专题，独立成篇，由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套《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并以此作为向新世纪的献礼。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是一套学科发展史和学术研究史丛书。其内容包括对20世纪考古与文物工作概况的综合阐述；对一些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和古代区域文化研究情况的叙述；对文物考古的专题研究；对重要的文物考古发现、发掘及研究的个例纪实。

此套丛书的内容面广，而且彼此关联。考虑到各选题在某些内容上难免会有重叠或复述，因此在编撰之初，我们要求各

选题之间互有侧重，彼此补充，以期为读者了解 20 世纪中国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视角。

我国的文物与考古工作，虽在 20 世纪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仍有许多重大学术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们主持编辑这套丛书，除了强调材料真实，考释有据，写作态度严谨求实外，也不回避以往在工作或研究上曾经产生的纰漏差错和不足之处，以便为今后的工作和研究提供借鉴。虽然我们尽了很大努力，但限于水平，各篇仍很难整齐划一。由于组稿和作者方面的困难和变化，一些计划之中的题目也未能成书。这些不周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丛书编印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文物、考古界的广泛支持。何东先生在出版经费上给予了热情帮助。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2000 年 6 月于北京

## 目 录

引 言 .....	1
一 博大辉煌的长安和洛阳城 .....	10
(一) 拔地而起的新都 .....	11
(二) 历代不休的追寻 .....	12
(三)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	14
(四) 城市演变与重要遗迹 .....	17
(五) 两市、里坊制度及其破坏 .....	22
(六) 坚固而繁荣的洛阳城 .....	25
(七) 长安、洛阳城布局的影响 .....	31
二 遵循等级的地方城 .....	40

(一) 异军突起的扬州 .....	41	(三) 长盛不衰的南方青瓷窑 .....	137
(二) 等级严格的州县 .....	49	1. 青瓷窑系与名窑 .....	138
<b>三 隋唐陵墓</b> .....	55	2. 别具一格的长沙窑 .....	142
(一) 规模宏大的帝陵 .....	56	(四) 唐三彩——陶瓷史上的奇葩 .....	147
(二) 承前启后的隋代墓葬 .....	62	(五) 青花、“秘色瓷”与“官”字款 .....	153
(三) 两京模式与分期、类型 .....	75	<b>五 开一代新风的丝绸印染</b> .....	159
(四) 制度滞后的北方唐墓 .....	84	(一) 制造机构、产量和产地 .....	161
(五) 地区时尚与两京模式结合的西北唐墓 .....	92	(二) 织物纹样及其演变 .....	163
(六) 旧传统与新制度渗透的南方唐墓 .....	97	(三) 新产品与新织造技术 .....	166
(七) 唐墓壁画的内容与时代变化 .....	104	(四) 织物与社会生活 .....	168
<b>四 改变社会面貌的瓷器</b> .....	118	<b>六 丰富多彩的金属工艺</b> .....	172
(一) 充满创新的隋代瓷器 .....	120	(一) 金碧辉煌的金银器 .....	173
(二) 唐代北方的名窑与窑系 .....	127	(二) 铜器制造与铜镜的谱系 .....	185
1. 邢窑的崛起和白瓷的普及 .....	128	(三) 特殊的器物——钱币 .....	195
2. 黄堡窑的兴盛 .....	133		

七 异域珍宝的输入与文化交融 ..... 206

    (一) 丝绸之路的通畅与“胡人”驼马 ..... 208

    (二) 源源涌入的外来物品 ..... 213

    (三) 仿制物品与文化的融合 ..... 225

参考书目 ..... 237

后 记 ..... 241

### 插图目录

一 唐长安城平面实测图 ..... 15

二 隋唐洛阳城平面图 ..... 26

三 洛阳含嘉仓遗址出土的铭文砖 ..... 32

四 唐扬州城平面复原图 ..... 44

五 乾陵平面图 ..... 59

六 唐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平、剖面图 ..... 61

七 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剖面图 ..... 61

八 隋李和墓平、剖面图 ..... 63

九 隋梅渊墓平、剖面图 ..... 66

一〇 武昌马房山隋墓平、剖面图 ..... 71

一一 武汉岳家嘴隋墓平、剖面图及出土器物 ..... 72

一二 唐李寿墓平、剖面图 ..... 78

一三 唐韦洞墓平、剖面图 ..... 79



一四	唐张士贵墓平、剖面图·····	80
一五	唐史思明墓平面图·····	85
一六	唐张秀墓平、剖面图·····	89
一七	吐鲁番阿斯塔那第 28 号唐墓平、剖面图 ·····	92
一八	唐梁元珍墓平、剖面图·····	96
一九	长沙咸嘉湖唐墓平、剖面图·····	99
二〇	唐张九龄墓平面图 ·····	103
二一	隋代安阳窑瓷器 ·····	122
二二	唐代邢窑白瓷 ·····	130
二三	唐代定窑白瓷 ·····	132
二四	黄堡窑第 28 号窑址平、剖面图 ·····	134
二五	黄堡窑第 25 号作坊平、剖面图 ·····	135
二六	唐代越窑瓷器 ·····	139
二七	唐代长沙窑瓷器 ·····	146
二八	唐代金银平脱铜镜 ·····	193
二九	唐墓出土的胡人俑 ·····	210
三〇	西安西郊唐墓出土的三彩骆驼与胡人俑 ·····	212
三一	唐代金银带把杯 ·····	219
三二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 ·····	226
三三	唐代银高足杯 ·····	229



考古学是一门以层出不穷的新发现引人瞩目的学科,出土遗迹、遗物具有永恒的价值,研究结论却常常改变、逐步深入,有时新发现填补了原来的空白,有时引发出对重大问题讨论的热点,也有的新发现使学者们不断地修正或推翻一个个定论。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隋唐无疑是中国考古学中极为精彩的篇章。如果大体以有无文字记载作为分界,中国考古学可分作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隋唐考古便是历史考古学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按习惯以历史王朝名称来命名的断代考古学。

以政权割据、民族杂处和融合为特色的南北朝,在末期的战乱中被隋朝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统一。新的统一局面,既需要巩固的中央集权作保证,也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来维护。作为以汉族为主吸收少数民族参加的新兴政权,隋朝建立了整套的礼仪制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且很快就出现了“四夷宾服”、国泰民安的局面。唐承隋制,并非简单抄袭,而是修正完善和调整创新,后人称赞说“盖姬周而下,文物仪章,莫备于唐”<sup>[1]</sup>。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爆发,强大的中央集权逐渐走向衰落,各地方经过历代开发和割据呈现出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

与汉代文化相比,经过南北朝的民族交融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隋唐文化出现了划时代转折。如果说汉代是将各民族及

文化统一到汉族为主的中原文化中来的话,那么隋唐则是在胡族内迁、汉族向南拓展、外来文明涌入基础上实现的空前的文化大融合。

造就隋唐辉煌的新都长安和洛阳,反映社会礼仪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墓葬,表现农工商业发展成就的陶瓷、织物、金属、玻璃、漆木等文物,与文献记载相得益彰。遗迹、遗物的丰富多彩,又使这一时期的考古具有复杂结构,对其他学科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20世纪出现的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敦煌学、石窟考古、简牍文书研究等等,都与这个时期考古发现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更深刻地反映着隋唐考古学走过的路程。

隋唐文化是对南北朝时期文化的强有力的整合,隋和唐代前期,长安、洛阳是中心,发展变化领先一步,然后辐射各地。唐代后期地方区域性文化全面发展,特别是南方地区开始繁荣。隋唐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中国“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在唐代“爱之如一”<sup>[2]</sup>，“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大为淡薄,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形成了鲜明的时代风尚,既不同于汉代,也有别于宋代。

总体上说,隋唐考古学与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出现联系在一起。但是,就以科学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发现而言,隋唐考古不仅开展较早,而且成果斐然,影响深远,在整个中国考古学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早在19世纪后半叶西方诸国的学界便注意到了塔里木盆地的古代遗址,并在新疆等地获得古代写本,很快引起欧洲诸国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探险热潮,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瑞典及日本等纷纷派出各种名目的考察队、探险队到中国新疆和河西地区,蜂拥而至的考察队调查发掘了许多

引起世界震惊的古迹。其中进行大规模考察的是 1893~1897 年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瑞典人斯文·赫定 (Sven Hedin)。斯文·赫定是探险家,但他初来中国时就得到提出“丝绸之路”之名的柏林大学教授冯·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的提示:塔里木盆地有埋藏古代城市的可能。斯文·赫定的探险证实了这一预言。1898 年,俄国克莱门兹 (D. A. Klementz) 率领考察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考察发掘了高昌古城和阿斯塔那墓地。1909~1910 年奥登堡 (S. F. Oldenburg) 又进一步发掘了这些遗迹。1900~1930 年英国斯坦因 (Sir Aurel Stein) 四次到新疆等地,发掘了丹丹乌里克、尼雅、安迪尔、楼兰、居延等遗迹。1900 年敦煌石窟藏经洞发现。1902~1910 年日本大谷光瑞、橘瑞超三次到新疆。1906 年法国伯希和 (M. Paul Pelliot) 到新疆和敦煌。1902~1914 年德国的格伦威尔德 (A. Grünwedel) 和勒考克 (A. von Le Coq) 先后四次到新疆,调查发掘了库车、焉耆和高昌附近的遗迹。

在这些考古活动中,许多调查发掘中的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含量不算很高,有些考察队是以探险甚至政治为目的。但其中有不少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考古学家、汉学家,他们用现代考古学手段进行工作,而且规模大、次数多、成果反映形式丰富,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这些考古工作多属于秦汉以后的历史时期考古,隋唐时代又占主要地位。

西域考古使大量古代文书和器物出土,至今仍属中国考古学乃至近代学术史上的重大发现。关于敦煌遗书、吐鲁番古墓、新疆佛教遗迹,后来陆续出版了一些图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的著述。以考古发掘为主的斯坦因,很快出版了《古代和田》(1907 年)、《西域考古记》

(1921 年)、《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 年)等。除了自己出版调查记录报告外,他还请各学科专家撰写详细的研究。日本发掘的有关吐鲁番的文书、绘画、泥俑等文物,后来也出版了一些图录和研究著作。这些遗迹、遗物提出的大量问题引起长时期的研究讨论,至今仍在继续。

对东北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和调查较早的是 1894~1895 年鸟居龙藏,稍晚些有八木奘三郎、滨田耕作、白鸟库吉等人。鸟居龙藏先后用法文、日文撰写了许多单篇的论文,用日文出版了《蒙古旅行记》、《蒙古史迹考》等著作。还有大正 10 年 (1921 年)日本满铁调查课编写的《满洲古迹考》、八木奘三郎的《满洲考古学》等。这些对中国东北考古调查的综合著作,主要是对地面古迹记录的汇集,时代、地点散乱,无固定目标,但却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用考古学资料和方法撰写的论著。

足立喜六于 1906~1910 年曾部分地实测了隋唐长安城,调查了唐代关中十八陵,写下《长安史迹考》<sup>[3]</sup>,成为黄河流域为数极少的与考古有关的活动和论著。此外,地下出土的遗物流入海外,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原田淑人 1911 年开始撰写关于唐代文物的研究文章,1921 年出版《支那唐代服饰》。滨田耕作收集洛阳附近的陶俑,1926 年出版《支那古明器泥像图说》。日本历史、美术、考古学者开始研究中国时,把隋唐时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因为日本在平城、奈良时代与中国隋唐往来频繁,所以日本历史学家对中国的隋唐时期抱有很大的兴趣。

清代毕沅任陕西巡抚期间,对古迹和文物进行了调查保护,著有《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关中胜迹图志》等相关著作。1932 年南京国民政府组建西京筹备委员会,1934

年国立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对西安的文物古迹做了调查、规划和保护工作，保存了城市建筑施工中出土的大量文物，较重要的工作包括确立唐长安大明宫遗址的主要建筑基址和为保护而建立公园等<sup>[4]</sup>。

早期考古活动另外一个方面，便是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的金石学研究。中国最早从事考古工作的不少人对金石学较熟悉，有的本身就是金石学家。因此，金石学与考古学之间产生了联系，并在历史时期考古中有更多的体现。金石学虽然收集古物的重点在先秦，所收古器物的内容以铜礼器为主，但汉代以后的铜镜、钱币、玉器、画像石和砖瓦等也被收到一些著作中。

中国现代考古学出现后，金石学继续发展。西北地区古物的发现和河南洛阳、东北等地挖开大批的古墓，出土遗物甚多。金银珠宝和艺术价值较高的文物大量流出海外，其中带文字的文书、简牍和较为笨重的墓志、陶俑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古物收集的对象发生了变化。罗振玉率先编撰了《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鸣沙石室遗书》（1913年）、《古明器图录》（1916年）等著作，虽然基本上仍属于金石学范畴，但超越前人之处在于著录研究的重点是地下出土文物，研究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在许多出土文物没有经过科学发掘的前提下，以个别遗物为对象的研究成果仍然对传统的历史学产生很大影响。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又开始注重那些不带文字的器物，《古明器图录》中唐代陶俑占主要部分，罗振玉引用唐代文献对它们进行说明和解释。王国维在关注出土文物的同时，翻译了斯坦因的《中亚细亚探险记》等考古著作，使他的研究接触和吸收了现代考古学的成果和方法。

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考古学作为新学科兴起，田野考古发掘的重点是史前遗址和河南安阳小屯殷墟遗址，由于所谓“古不考三代以后”的影响，隋唐考古受到冷落。安阳殷墟大规模考古发掘时，顺便清理了175座隋唐墓，其中包括隋仁寿三年（公元603年）卜仁墓。这些墓葬当时虽然没能引起重视，但毕竟是首次由考古学家发掘并做了简单记录的隋唐墓，当时还绘制了墓葬的分布图。与此同时，早已开始的西北等地的考古发掘和被掠走的大量文物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出现了如1927~1933年中国学术团体和瑞典斯文·赫定联合组建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了吐鲁番的交河墓地等重要遗址，有关考察内容，黄文弼等学者后来陆续撰写出论著。

与隋唐考古有关的正式发掘，是1939~194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发掘的南诏时期的几处遗址。1942年冯汉骥、刘复章等发掘的前蜀王建的永陵，发掘报告于1964年出版。1944~1945年中国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发掘了两座唐墓，出土陶俑，尽管没有正式发掘报告，但有关资料作了介绍<sup>[5]</sup>。

金石文物学家的研究也在新形势下发生了变化，对带有文字的文物如简牍、文书和石刻的收集达到高峰。1924年于右任收集到晋至宋代墓志三百多方，1930年编《鸳鸯七志斋藏石目录》。20世纪30年代张钫开始收集唐代墓志，仅五年时间，就获得一千多方志石，以后陆续收藏约2000方，并在河南新安私邸的花园内建造了砖券窑院，将所收墓志镶嵌在壁间，称“千唐志斋”，1935年由郭玉堂整理成《千唐志斋藏石目录》。同时，河南省博物馆收集的墓志也达千余方，国立北平图书馆和私人藏志石目录也出版。1941年郭玉堂又著《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对洛阳地区出土墓志

的地点、时间做了详细记录。虽然这些活动与现代考古学关系不大,但随着日益增多的考古发现,隋唐遗迹、遗物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隋唐考古遗迹许多仍保留在地面上,借助于文献研究这些遗迹、遗物也是当时的研究内容,不少人走向田野进行调查,虽然发掘的遗迹不多,然而逐渐开始摆脱金石学的束缚,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近代国内外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也几乎都涉足地下出土文物的研究,以这些新发现为契机衍生出了敦煌学、简牍文书等新的学科领域。

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关隋唐考古的田野工作全面展开。城址的勘察与发掘有重要突破,墓葬的发现与探索向深入发展,瓷窑瓷器、金属器、丝织品等手工业制品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中外文化交流的遗物的发现不断增多。1961年出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对隋唐考古作专篇简要综述,这一系统化总结显示出隋唐考古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80年代后,隋唐考古的新气象不仅是一些大规模发掘的专题报告、学术专著的陆续出版,分散的资料也逐渐纳入专门学术课题进行古代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年),全国考古工作者集体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1986年),其中的隋唐部分是此前隋唐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和全面的总结。90年代以后,除了新的发现,试图用新视角、新观念、新手段审视隋唐考古问题的研究论述增多了。

#### 注 释

[1]《唐律疏议·序》。

[2]《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3]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杨炼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4]罗宏才《西京筹委会与民国时期陕西的文物保护》,《文博》1998年第3期。

[5]夏鼐《敦煌考古漫记》,《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

# — 博大辉煌的长安和洛阳城



尽管隋朝国祚短促，却成功地完成了结束分裂混战的历史使命。大一统局面和文化整合的标志，是秦川大地上突兀耸立的都城大兴。唐改大兴为长安。都城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犹如王朝的心脏，由此辐射出的活力，推动着历史运行。都城也是展示王朝兴衰最大的舞台，成为当时的缩影，宏观地反映出社会变化的天地翻覆。

## （一）拔地而起的新都

果断放弃前朝的都城，重新选地建设新都，是刚刚完成改朝换代的隋朝坚决的选择。公元581年隋灭北周，南方朝廷陈仍然存在，统治者已清醒意识到统一只是迟早的事，于是酝酿创建都城。经过周密考虑，精心策划，地点选择在关中地区的龙首原。设计师是高颍、宇文恺等，先考察了前朝国都北魏洛阳和东魏、北齐邺城，然后于公元582年6月开始动工，营建次序是宫城先筑，皇城次之，最后建郭城。历经十个月，一座空前规模的城市拔地而起，面积达84平方公里，规模宏大，气势磅礴。隋文帝杨坚早年曾被封为大兴公，新都便取名“大兴城”，城内的县、门、园、池也多用其名，取其永远兴隆昌盛之意<sup>[1]</sup>。新都是大一统政权的直接产物，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唐改名为长安后，宫殿坊市和城门

建筑多有更名，但仍继承了原有的框架，城市建制、坊市、街道等格局位置无大改变。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月，“修筑京师罗城，和雇雍州四万一千人，卅日功毕，九门仍各施观，明德门至一门五观”<sup>[2]</sup>。这座东方世界最大的国都逐渐发展成最繁华的都会。

长安城的设计除了对中国传统观念和北魏以来都城布局的直接继承，设计思想又添加了《周易》中八卦学说的理论，视龙首原六条高岗的自然地势为乾之六爻，周密安排了宫、衙、府、寺<sup>[3]</sup>。全城的核心宫城和皇城最受重视，安排在全城北部正中，这是全新的设计。宫城和皇城的东南西三面围绕郭城，主要是居民所在的里坊。依照风水观念，为了避免泄掉帝王之气，政府下令宫、皇城之南的居民里坊，取消南北门而仅开东西门<sup>[4]</sup>。规划布局不完全因循守旧，被后世赞扬为“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sup>[5]</sup>。

## （二）历代不休的追寻

长安城在唐末大部分毁于战火，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怀古之情。北宋时宋敏求著《长安志》，吕大防作长安石刻图，最早考察了隋唐长安的遗迹。唐代开元时韦述撰写的《两京新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录，是追寻旧迹时的参考。清代继续着前人的探索，嘉庆年间董佑城编《咸宁县志》，王森文画长安图，徐松著《唐两京城坊考》，三人搜集了更多的文献资料，试图复原唐长安城的面貌。20世纪初又有了实地考察勘测，

参考旧说整理了一张新图<sup>[6]</sup>。

主要依靠文献记录对长安城的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标志是用现代考古学手段进行大规模勘察和发掘。经过近十年的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对隋唐长安布局框架的了解，还勘探了大明宫、兴庆宫、芙蓉园、含元殿、麟德殿和西市等主要遗址<sup>[7]</sup>。令人兴奋的是，文献中没有记录的遗迹如西市内的街道、排水明沟、房屋结构，以及许多房屋建筑的焚烧等细部现象被发现，使人们真正认识到考古发掘的重要，从此对隋唐长安城的研究开始突破依赖文献的状况，田野考古占据了主导地位。不断揭示出的处处遗迹引起的新认识，使解释性说明逐渐增多。60年代以后，在对长安城整体状况有了宏观认识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调查发掘了青龙寺、西明寺、兴庆宫、明德门、兴化坊和大明宫内的主要遗迹，极大地丰富了对长安城内部结构和个别遗迹的认识，局部报告和个案研究纷纷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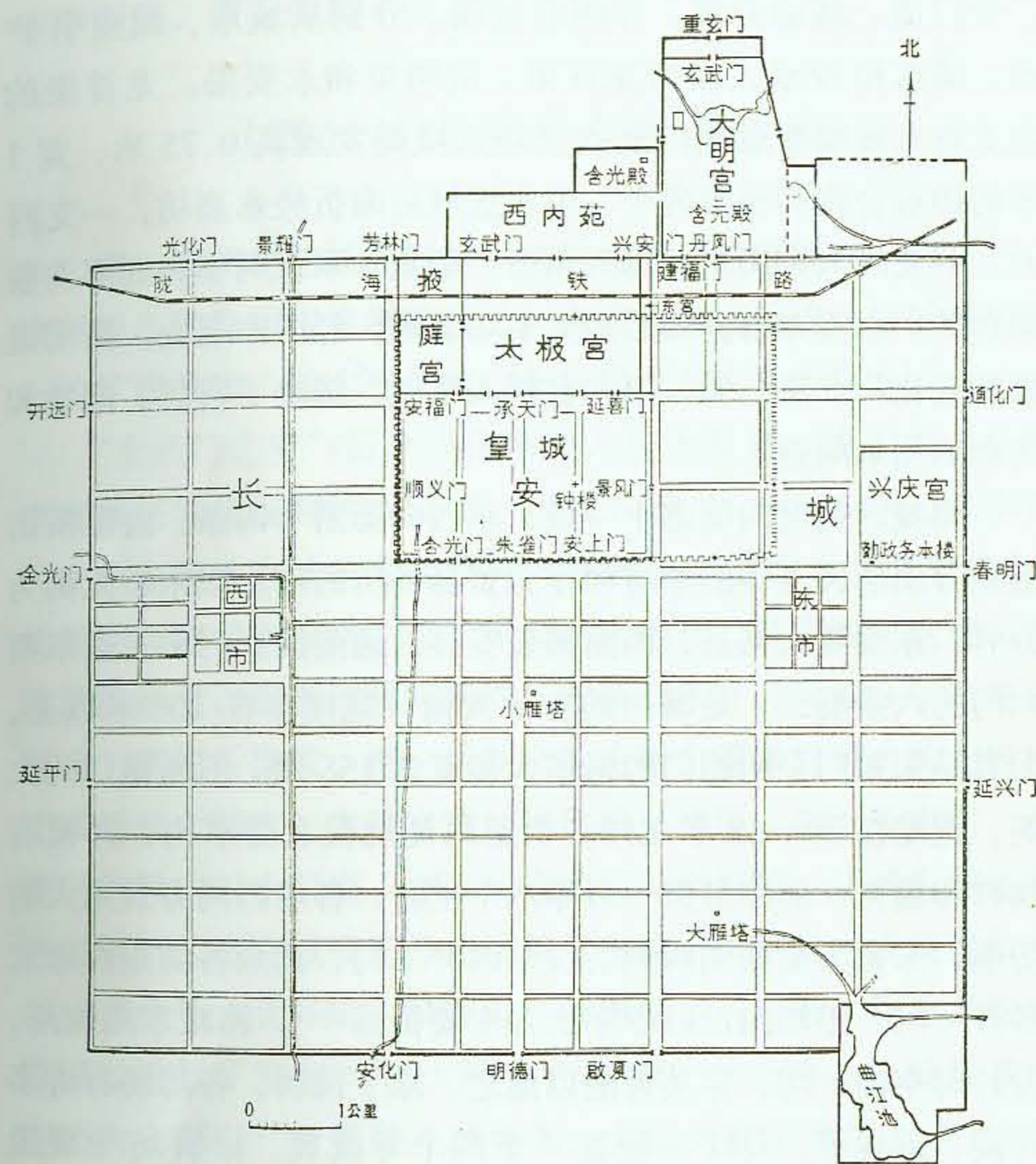
有了发掘遗迹和文献记载的互补参照，长安城的复原更加真实可靠。保持至今的西安城墙，基本面貌是明代洪武年间（公元1368~1378年）夯筑、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又加砖砌筑、清朝多次补修的遗迹。这个范围和遗址是扩建了元代的奉元城东、北两面<sup>[8]</sup>。元代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中把奉元城称为“新城”，并解释说唐末长安城已毁，重建时“去宫城，又去外郭城，重建子城，即皇城也。……即今奉元路府治也”。即不要原来唐代的宫城和外郭城，把奉元城建在唐代的皇城址上。正如《咸宁县志》所载：“今城西、南二面，俱即皇城之旧”。由此看来，元代奉元城即唐长安的皇城，明代改建元代奉元城时，西南部没变。明代修城时，同时建了明秦

王府，用了奉元城的东、北墙各一段，即建在了东北角上，这样就有了一个坐标，可了解到唐长安城的皇城的位置。当唐长安皇城位置确定后，便可依据隋唐长安的布局、规模进一步找到全城范围。

长安城框架布局的查明，只是探索的开始。隋唐长安城的建立、发展是一个过程。70年代以后，长安的隋、唐遗迹和一些遗迹的变化被加以区分，还搞清了郭城里坊内层层十字街划分出小区的设计原则，从长安城的建立、发展的阶段性中看到了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sup>[9]</sup>。以地面遗迹和建筑科学为基础，参照文献的零散记录，对青龙寺、麟德殿、含元殿等遗迹的复原研究，使城市中部分平面遗迹立体化了<sup>[10]</sup>。而对长安城人口数量，官人住地，庶民生活区、商业区域等职能区的形成和转化的探讨，将政治行为实施与城市空间构造紧密联系在一起<sup>[11]</sup>。

### （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长安城最显著的特点是整齐划一，平面图看上去犹如一个围棋盘（图一，据《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位于全城的北部正中的宫城，整体作长方形，四周围墙夯筑，南壁正中为广阳门，北壁中部偏西是玄武门。宫城内部被隔墙分为三大部分：正中为宫殿区，为皇帝正衙之所；东侧是太子居住的东宫；西侧是后宫人员居住的掖庭宫。宫城北为宫苑，是皇帝游猎娱乐的场所。皇城在宫城之南，东西宽与宫城同。皇城内东西向街道七条、南北向街道五条，其间分布着中央衙署及其附属机构。皇城正门叫朱雀门，向北和宫城正门广阳门相对，



图一 唐长安城平面实测图

又南经朱雀大街与郭城南壁明德门相通，形成了全城的中轴线。

郭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 9721 米，南北长 8651.7 米。东、西、南三面各开三门。已探出的城门中，南面中部的明德门最大，共有五个门道。其余各门除东面居中的建春门外，皆



三个门道。城墙夯筑，外侧有城壕。分别从城东、城南引泾水、潏水和浚水入城为龙首渠、清明渠和永安渠。龙首渠的南支自东城墙壁通化门北兴宁坊入城处发现高0.75米、宽1米的砖石合砌的涵洞两个，渠水进城后南折经永嘉坊，一支西去，一支南入兴庆坊，再入东市。渠宽6米，两壁和底部均敷砌青砖。永安渠自进城后经大安坊北流，经西市北去。清明渠紧靠安化门北流入城，渠水直接入皇城，解决了宫廷、园林和坊市的用水问题。

郭城内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由纵横街道划分出居民居住的里坊和作为贸易场所的市。以朱雀大街为分界，东面属大兴县，西面属长安县。通南面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宽度多在100米以上，尤其是朱雀门至明德门的朱雀大街宽达155米。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在39~68米之间。街道两侧均设有排水沟，并植有槐树和榆树。居住区共一百零八个里坊，各坊四周夯筑高大的坊墙，朱雀大街两侧四列坊仅东西开二门，其余各坊东西南北各开一门，里坊内设以十字街为主要街道<sup>[12]</sup>。郭城东南地高，设计时空出一坊，穿芙蓉池以虚之。除了民居，各坊还有许多寺院、道观等，每坊一般置一至两个寺或观，崇贤坊寺观最多，立八寺。

城内有二市，隋代称“都会市”、“利人市”，唐改称东市、西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各占两坊之地，建夯土围墙，开八门，内有井字街道和沿墙街道，街道两侧设排水沟。

如此严谨有序的城市是前所未有的，白居易诗云长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形象地概括了这座都城的格局。布局特征体现的是以帝王为中心和中央集权，突出政治

军事职能，商业性质不强。

#### (四) 城市演变与重要遗迹

隋、唐两代的长安城基本格局相同，遗迹混在一起，三百余年经历的变化很难精确区分。唐代对隋代始建的都城格局进行的扩建改建，重大变化莫过于新建大明宫和兴庆宫。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掌政入居太极宫，成了太上皇的李渊移居城北偏西的大安宫。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李世民在原来隋代宫城的东北禁苑的龙首原上建作为“清暑之所”的夏宫，定名永安宫，第二年改名大明宫。高宗时在这里又修建新的殿堂，逐渐形成宫殿群，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移来听政。武则天擅政，把一代朝会的正衙由原来宫城内的太极宫正式迁到大明宫。大明宫遗址平面略呈梯形，四面皆有门，正南的丹凤门三个门道，北面的玄武门一个门道。唐代后期还在东、西、北三面城墙的外侧增筑了夹城。大明宫内发现宫殿遗址三十余处，含元殿、麟德殿、清思殿、三清殿、朝堂及翰林院遗址进行了发掘<sup>[13]</sup>。大明宫西侧210米处的一处殿堂遗址中还出土刻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日建”的碑石一方，说明这处遗迹属于公元831年所建的含光殿。朝会正衙的转移，除因高宗患风痹病，嫌太极宫潮湿外，根本原因大概是太极宫地势低，不利防变，大明宫高踞岗阜，既适于警卫宫廷内部，又可以掌握京城全局<sup>[14]</sup>。大明宫从此成为长安城内的政治中心，一直到唐朝灭亡。

唐代国家举行大典的正殿是含元殿，始建于龙朔二年（公元662年）。20世纪50年代末和90年代进行了整体揭露<sup>[15]</sup>。

其地高出平地 15.6 米，殿基东西长 75.9 米，南北宽 42.3 米。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每间广 5 米。南面原未筑墙，其他三面为夯土壁。宫殿向南有龙尾道，殿基左右两端各有一向外延伸并转而向南的廊道，衔接“翔鸾”、“栖凤”二阁。二阁现存高 15 余米的长方形夯土台基。含元殿遗址出土石柱、螭首残片、素面方砖、莲花方砖等。遗址附近还发现早于含元殿建筑的 21 座砖瓦窑，出土砖瓦与含元殿的砖瓦大小、形状、颜色一致，显然是用于含元殿的修建，这也提供了唐代砖瓦的断代标本。高耸的正衙含元殿前列两高阁，并设有漫长的龙尾道，凸显出盛世王朝的气魄<sup>[16]</sup>。

含元殿是大朝、常朝的地方，宫内宴会、藩臣来朝、宰臣奏事和道场祭奠等在另外的殿堂。出于功能的需要，唐代于麟德年间在大明宫内龙首原北城一个突起的高地新建了一座豪华的麟德殿，可俯瞰太液池的水面风景，眺望大明宫内殿宇楼阁。此处包含了丰富历史事件的建筑于 50 年代和 80 年代进行了发掘。宫殿由三殿连建，长达 85 米。周绕回廊，两翼建以楼宇。前面的庭院宽敞，可容纳几千人<sup>[17]</sup>。遗址出土长方砖、方砖、板瓦、筒瓦、瓦当和绿釉琉璃瓦及兽头石刻等。麟德殿雄伟壮观，主殿与附属结构相结合的壮观设计不同于一般殿堂布局的做法<sup>[18]</sup>。

兴庆宫位于长安城东部的兴庆坊，原是唐玄宗封王时的藩邸，唐玄宗登基后以王宅建离宫，置朝堂，把北面的永嘉坊的一半扩入，以后移此听政，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之一。宫内北部是殿堂区，南部兴建园林。南区探出椭圆形水池，西南发掘了建筑遗址 17 处。1 号遗址靠近宫城南壁，长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可能是“勤政务本楼”的基址。17 号遗址为“花

萼相辉楼”。兴庆宫建筑遗址发现的瓦件甚多，仅莲花瓦当就有 73 种，许多带文字的瓦，年号多为玄宗时期，有的专门标明是“官瓦”，还有“十王宅”、“十王宅内作官瓦”等文字<sup>[19]</sup>。兴庆宫的特殊之处是以园林区为主体，建筑平面多样化，豪华富丽远在大明宫之上。

唐代修建了由兴庆宫到大明宫的夹城，使“人主往来两宫，人莫知之”。又外傍郭城东壁修建南通曲江芙蓉池的复道，即所谓“筑夹城至芙蓉园”<sup>[20]</sup>。曲江池在园西部，9 世纪中叶以后，不仅皇室于此新造楼亭，不少官衙也在曲江各置船舫，“进士开宴常寄其间，大中、咸通（公元 847~873 年）以来，……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儿于半空”<sup>[21]</sup>，成了唐长安侈靡游逸之所。

大明宫内的清思殿、三清殿、朝堂、翰林院及皇城的含光门遗址已进行了发掘<sup>[22]</sup>。其他遗迹也十分重要，保存于地面的有晋昌坊内的慈恩寺塔。慈恩寺是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 647 年）唐高宗做太子时为追念母亲文德皇后建立的。慈恩寺塔亦称大雁塔，高宗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高僧玄奘创建，初为五层，武则天时重建，共十层。至今犹存的是经后代修葺的方形锥状七层塔，是中国楼阁式砖塔的优秀代表。开化坊的南部为荐福寺，创建于唐睿宗文明元年（公元 684 年），安仁坊的西北部荐福寺塔院，中宗景龙年间（公元 707~709 年）创建。寺内的塔至今犹存，后称小雁塔，采用密檐式砖构建筑，初为十五级，现余十三级，正方形，底层边长约 11 米。

还有经发掘的寺院遗址。如延康坊内揭露出一个院落遗址，由主院、东南院和西南院构成。院落中的殿址、回廊、房址、井等出土了一些建筑材料，还有鎏金铜、石、陶佛教造像

以及碑刻和日常生活用陶瓷器。其中一件已残的石茶碾上刻“西明寺”、“石茶碾”等字，证明这里是唐代西明寺遗址的一部分<sup>[23]</sup>。据记载“敕建西明寺，大殿十三所，楼台廊庑四千区”<sup>[24]</sup>，该院落应为其中之一。西明寺占延康坊西南1/4，唐显庆元年（公元656年）为孝敬太子病愈所立，武宗灭佛时长安仅保留四座寺院，其中包括西明寺，一直存在到晚唐。井中出土150多件鎏金铜佛像，是有意识沉入水中，可能与当时武宗灭佛有关。青龙寺位于长安城新昌坊的东南隅，原为隋灵感寺，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改名青龙寺。发掘遗址两处<sup>[25]</sup>，一处为塔址，塔基平面呈方形，并有一方坑居于正中，当是地宫部分。另一处是殿址，在塔址东部，台基呈长方形，现存东西五排、南北六排的夯土墩，其上有承柱础石，可知是一座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建筑。台基四周仅存部分包砖，东西对称部位各有夯土遗址，应为与殿堂相接的廊址。北部有踏道，南面有伸出的小月台。出土遗物主要为砖瓦，还有小鎏金铜佛、小银佛、石刻、经幢残片和许多壁画残片。

不少城门遗址进行过发掘和调查，其中最重要的是处在全城中轴线最南端的正门明德门。明德门北对皇城的朱雀门和宫城的承天门，为长安城最大的城门。其东为启夏门，西为安化门，与明德门相距都是1400米。明德门有五个木结构的门道，五门道同高同宽，间距相等，门道宽5米，各由十五对义柱和五道木梁构成梯形城门道顶门，各门间距约为9.1米，门墩顶面积为795平方米。五个门道，四个隔墙，加上两端墩台，门楼应为东西十一间，门楼下的永定柱都落在门过梁两端支点的内侧。登城的马道应正对门楼的山面的中间一间，用砖铺的马道先通到城墙顶上，留出一块平台，上设木构的踏步通到门楼

上。在城门外有一处房址，应是门外廊，上用悬山瓦顶。城门口放置水缸，这些缸可能是用以盛水洒扫城门之用，或用来防火<sup>[26]</sup>。

与长安城关系密切的城外遗迹，先后发掘了礼仪建筑、离宫寺院和水陆交通的遗迹。长安郭城南墙正门明德门以外的唐代圜丘遗址，为四层圆坛，十二陛分布于圆坛四周。圜丘初建于隋代，在唐代沿用，十七位皇帝曾亲自到此进行过祭天活动。这一发现提供了唐代祀天礼仪的证据<sup>[27]</sup>。

由于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海拔400米左右，夏季受高气压控制天气溽热，故隋唐帝王在长安城外选择风景秀美、凉爽宜人的地方建造了多处离宫别殿。隋仁寿宫即唐九成宫建于陕西麟游，凭山面水营造殿台亭榭数十座，是皇室的避暑之地，遗址保存比较完整。离宫平面呈长方形，居中有主殿。发掘的37号殿隋唐两代使用，遗址东西长42.62米，南北宽31.72米，是一座面阔九间、进深六间的大殿。殿基为黄土夯筑，四壁用石材包砌，南壁有三个踏道。大部分石构件雕刻精美的纹样，为隋代杰作<sup>[28]</sup>。玉华宫和翠微宫是唐初的离宫。玉华宫位于铜川，建于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原名“仁智宫”。唐太宗时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建，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改名为玉华宫，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废宫为寺<sup>[29]</sup>。翠微宫遗址位于长安城南55公里的终南山北坡，贞观二十一年修建，唐太宗病逝于此，唐宪宗时废宫为寺<sup>[30]</sup>。两处遗址都发现宫殿石柱础、各类砖瓦等建筑材料和构件。玉华宫改为玉华寺，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十月玄奘由慈恩寺移居于此翻译佛经。附近的悬崖峭壁间还开凿有石窟佛龕，石窟内的佛像座上刻有“大唐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三藏法

师玄奘敬造释迦佛像供养”文字。华清宫位于今陕西临潼县城西南<sup>[31]</sup>，遗址发掘总面积约 6000 平方米，清理出汤池、砖砌水道、陶质水管道、水井等。各汤池供排水系统设计合理，自成体系，互不干扰，其中有唐玄宗李隆基和宠妃杨玉环沐浴的汤池。

隋唐长安城的桥梁建筑也相当壮观。西安灞桥镇柳巷村发掘一座大型多孔石拱桥，建于隋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是中国已知最早、规模最宏伟、桥面跨度最长的多孔石拱桥。高陵县发掘的东渭桥则是大型木制桥<sup>[32]</sup>。

### （五）两市、里坊制度及其破坏

长安城民间交易和皇室官府供给仰仗于市场的设立。郭城东部和西部对称设置有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四周有夯土围墙，其内设井字形主街道。

西市井字形主街中心部位探出铺地砖和残砖墙，应是市场管理机构市署或平准署所在地。发掘出的街道及车辙痕迹、砖砌水沟，表明街道两侧修建有相互沟通的排水沟，组成完整的排水系统。沿街毗连的房址，规模都不大，最长的不到 10 米，最短的仅 4 米，进深只有 3 米多，显然是各种店铺。它们大多在市内临街布置，多位于两侧排水沟内 2 米，鳞次栉比。南大街东端路南遗址发掘出陶盆、陶罐、三彩器残片及大量瓷片，房址内发现石杵、石臼，临街处清理出小圆坑数处，并埋有坛罐，推测为饮食业的所在地。北大街中部街南，有铁器店铺和石刻店铺的遗址。南大街中部街南出土大量骨制装饰品、珍珠、玛瑙、水晶装饰品及金饰品，似为珠宝商行遗址，推测并

附有加工作坊。东大街南部，有陶器店铺的遗址。西市西大街中部有“凶肆”的遗址<sup>[33]</sup>。

西市自贞观以来即为聚钱之所，有“金市”之称，唐后期达到了极盛。西市的繁荣得益于道路运输的通畅，永安渠、漕渠流经西市，有运输货物的功能<sup>[34]</sup>。市内出土陶器上捺印的“刑（邢）娘”字样，可能具有商品标志的意义。

东市探出了西北隅的“俗号海池”的放生池和该池引水渠道<sup>[35]</sup>，池水有可能引自兴庆池。渠池既用于运输，也提供市场用水，显然这是当时商业日趋繁荣的迹象。“（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sup>[36]</sup>，有笔行、铁行、胡饼肆、酒肆、肉行、凶肆等，还有赁驴人、杂戏、琵琶名手、卖胡琴者、货锦绣彩帛者。交易物品来自各地流向八方，连远在西北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也发现了长安东市雕版印刷物。两市考古发掘和调查的店铺远比文献记录为少。

隋唐长安的里坊约占全城面积 1/8，由纵横街道划分出来，主要是居民区，也有王宅、寺院等，坊内的宅地有等级区分。长安城东高西低，官员多住在东部<sup>[37]</sup>。居住区里坊的四周有夯筑的高大坊墙，各坊以十字街为主街，划分出四个区域，每区再设小十字街划分，形成十六个区块，里面再设“巷”、“曲”相隔。双重十字街加“巷”、“曲”相隔，便构成了长安里坊的最基本格局<sup>[38]</sup>。里坊之间的道路在平康坊和宣阳坊有发现，宽在 29 米左右，路两边有土挡和排水沟，沟外是坊墙。道路的路面铺施石子瓦砾，其上为路土。道路上还发现密集的车辙，轨距在 1.35~1.40 米之间。城北安化门（光化门）和景耀门之间的安定坊进行了部分发掘，发现四个区域内的小十字街，路面宽 6 米，有轨距为 1.23 米的车辙迹多条。

东西道路两边有版筑土墙将南北街切断，但墙底路基仍与南北相连，说明隋和唐初已形成十字街，盛唐时可能是富豪之家兼并，扩大宅院时筑墙将南北街隔断。由小十字街向南钻探，发现了大十字街的东西街道，实测街宽为20米。长安城中部偏东的永宁坊、西城的怀德坊也发现过小十字街<sup>[39]</sup>。

长安的里坊之间由左右金吾卫大将军负责昼夜巡警，“坊角有武侯铺”，里坊内置里正，坊门早晚启闭以鼓声为号<sup>[40]</sup>。每晚街鼓鸣后，大街即空空荡荡。严格的里坊制度，构成了大道笔直、坊墙耸立的景观，设计意图明显是为便于对居民的管理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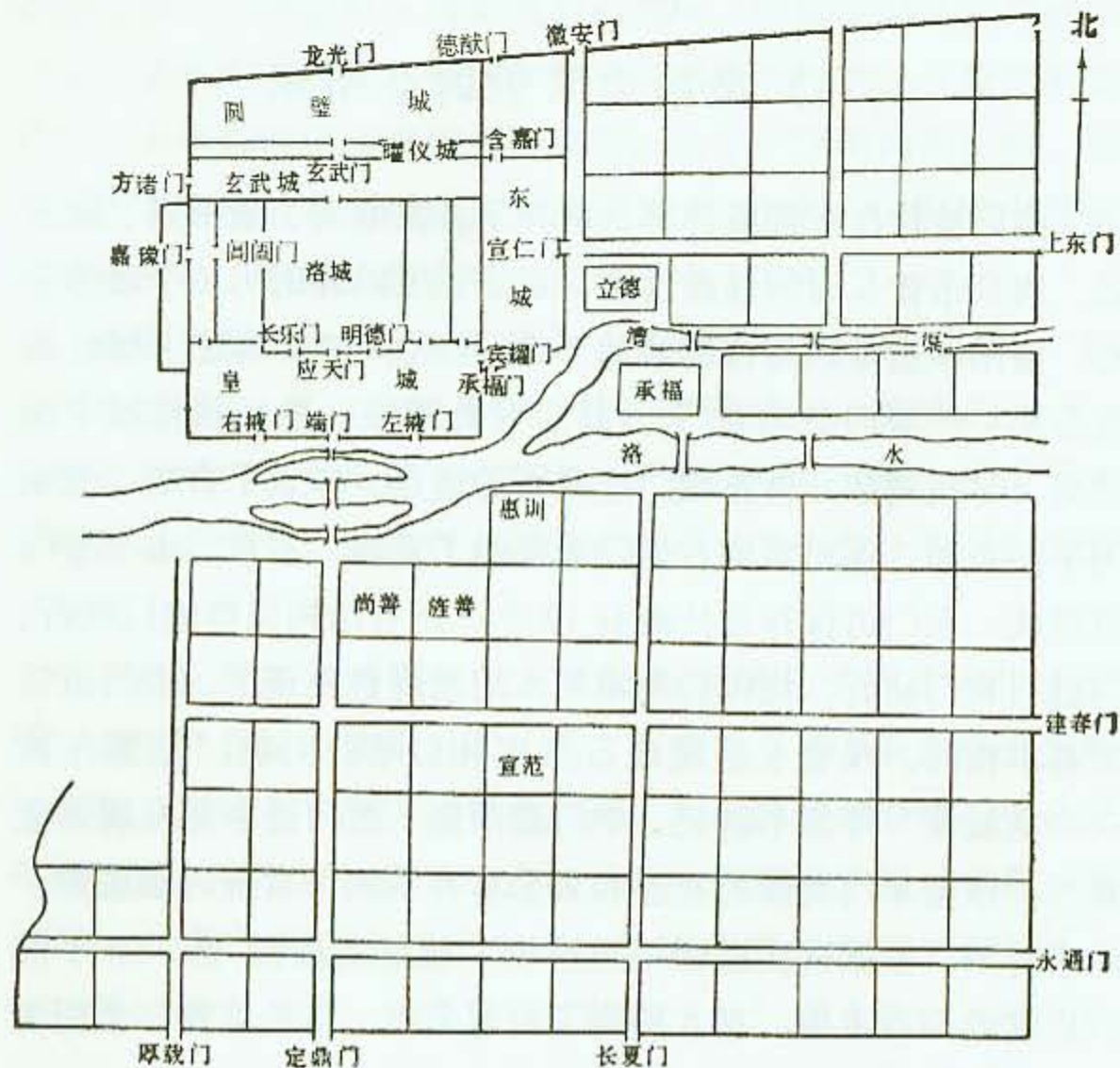
大约从唐高宗时期开始，里坊与市场几乎同步发生了变化。由于社会稳定繁荣，东、西二市满足不了工商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容纳不下的店铺开始向两市附近的坊和春明门至金光门的街道两旁蔓延，以至于有的坊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东、西市<sup>[41]</sup>。一些坊内还出现了夜市，并逐渐得到政府的默许<sup>[42]</sup>。坊内住户临街开门，原来只有“坊内三绝”即无法出入的住户和地位很高的人才被允许，天宝以后制度放宽，但仍明令三品以上的才可以。但到8世纪晚期已有不少“坊市街曲，侵于大墙，接檐造舍”的情况<sup>[43]</sup>。9世纪中期，原来封闭式的里坊已经很难起到限制作用了<sup>[44]</sup>。

里坊规划和贸易市场因工商业实力上升而被突破，标志着城市机能的转变。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封闭式城市格局发生了动摇，工商业逐渐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违背了设计的初衷，却为宋代长巷式布局的城市兴起奠定了基础。

## （六）坚固而繁荣的洛阳城

洛阳被称作东都或神都，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玄宗、唐哀帝曾长时间住在这里，是唐长安以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洛阳城遗址的考古勘察始于50年代，初步确定了城址的范围和一些城门的位置<sup>[45]</sup>。其后对外郭城、皇城和宫城全面勘测，寻找到部分外郭城门址确切的地点，探索了宫城、皇城的平面布局，还对宫城右掖门遗址做了发掘。右掖门由三个门道组成。东门道保存着柱础石13个，还有结构完整的门框石、门础石和门砧石，烧毁后倒塌的木门遗迹也发现了。西门道情况基本相同，残壁上还发现石灰皮和红彩，并有“使兼左衙……皇城使”等墨书题记。中门道两侧、西门道中都发现宋金墓葬，根据木门焚毁的遗迹和宋金墓葬推测，右掖门彻底毁于南宋时期。根据这次勘察结果绘出了城址实测图<sup>[46]</sup>。60年代以后陆续调查发掘，基本搞清了街道分布、市场位置、个别里坊的情况，洛阳宫城东北还发掘了含嘉仓。

70年代发掘与研究同步进行，主要研究成果是参照文献记录对洛阳城布局及里坊进行探讨，归纳出隋代洛阳与大兴城设计上的不同有：宫城、皇城位于全城西北隅，占据高地便于防御；宫城南为皇城，北建重城，东隔东城，西面连苑，戒备坚固而严密；缩小了里坊面积，对居民区的控制更加强化；比大兴城多出一个市，更多地考虑了繁荣商业的问题。70年代还作出了新的实测图和里坊复原图<sup>[47]</sup>（图二，据徐莘芳《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论丛》）。80年代以后，对城市布局的一些细部和关键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如明堂、九州池、应天



图二 隋唐洛阳城平面图

门、上阳宫园林、履道坊白居易故居等<sup>[48]</sup>。

洛阳城的兴建是在隋代。隋炀帝即位后，为进一步控制关东和江南地区，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营建洛阳，一年后完成<sup>[49]</sup>。东都建成后，即“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又“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sup>[50]</sup>。其后的几次大规模营建是：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平定王世充时洛阳城遭到破坏，唐太宗时重修；显庆元年（公元656年）重修，到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完成；武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又进行修

缮，“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sup>[51]</sup>。以后只是小规模修补。

宫城平面近方形，东西长约1270米，南北长约1400米。城墙夯筑，内外包砖。与长安的突出区别是宫城、皇城不在全城北正中，而是在西北隅，皇城围绕宫城的东、西、南三面，也是夯筑并内外包砖的城墙，内设有五省、三台、五监、九寺、十二卫、十六府等官署，还有接待四方来宾的馆舍。宫城东北、西北两角各有一隔城，北面建曜仪、圆壁二城。曜仪城为狭长方形，圆壁城平面呈梯形。东城紧接皇城之东，东城之北是含嘉仓。

宫城内主要宫殿区的二号台基于1986年进行了发掘，当属武则天时期的明堂遗址。是一座八角形的夯土台基，东西最长85米，南北残长72米，台基中心有一个圆形大柱坑，坑口直径9.8米，坑底有四块大青石构成的巨型石柱础，中心有一方形柱槽，西北、东南、西南三块石板上分别凿有圆形柱孔。在明堂遗址西北部发现的石砌圆形建筑基址，亦为重要的皇家建筑遗址<sup>[52]</sup>。唐高宗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在东都苑东部修建了上阳宫，成为东都的主要宫殿，是高宗、武则天听政之所<sup>[53]</sup>，发掘表明是傍皇城南墙而建。1989~1993年在这里发现了唐代皇家园林<sup>[54]</sup>，其中水池东西长33米以上，南北宽3~5米不等，廊房修在水池南北两岸，水榭跨水池将南北两岸的廊房连为一体。还有六处假山和两条五彩卵石铺成的石子路，出土大量琉璃瓦、一件螭首。园林中有许多从江南地区运来的太湖石。

皇城应天门西阙、东阙应是唐高宗重建后的门阙，原来规模宏大，气势壮观。发掘揭露出三出阙及连接城墙的廊道，明

确了门阙建筑形制<sup>[55]</sup>。应天门内右侧的房基中，还出土了哀帝即位的玉册文十枚<sup>[56]</sup>。九州池位于宫城内的西北隅，全面钻探得知东西长约 205 米，南北宽约 130 米，池北有进水口，池南有出水口。池内探出五座小岛，三座岛上有殿亭遗址，保存较好的一处东西长 11.4 米，南北宽 8.58 米，基址夯筑，四周包砖，南面建踏步两处，北面踏步一处。这座殿亭与其他建筑都属于隋或唐初。九州池的南岸发掘两处廊坊建筑<sup>[57]</sup>。洛阳城宫城还不同程度地调查发掘了乾元门、天堂、徽猷殿、宣政殿、流杯殿、弘徽殿、宫城西隔城南墙和宫城、东城的一些门址<sup>[58]</sup>。

东城内发掘了唐代的两座砖瓦窑，出土遗物有建筑构件、窑具和陶瓷器。建筑构件中的板瓦、筒瓦、花边瓦、莲花瓦当、兽面梯形砖、绳纹砖、莲花座等在隋唐洛阳城宫殿遗址中屡见不鲜，显然是修造宫殿之用。故这一窑址当属官窑，时代为唐太宗至玄宗时期<sup>[59]</sup>。

郭城平面近方形，东墙长 7312 米，南墙长 7290 米，北墙长 6138 米，西墙曲折，长 6776 米。南、北、东三面共开八门。门址皆三个门道。南面正门是定鼎门，宽 28 米。建春门、永通门的门址进行了发掘<sup>[60]</sup>。城内洛河以南有南北向街十二条，东西向街六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向街四条，东西向街三条。通城门的各街较宽，一般在 41~59 米，其中郭城定鼎门通皇城正门的定鼎街宽达 121 米。郭城“南广北狭，凡一百三坊，三市居其中焉”<sup>[61]</sup>，坊布局整齐，呈方形，边长一里，内有十字街道，周围筑坊墙。对定鼎门东第一坊（明教坊）进行勘探，得知十字街宽约 14 米。长夏门西第一坊归德坊、建春门南第三坊永通坊也有十字街残迹。

外郭城东南部履道坊西北隅白居易故居 1992~1993 年进行了发掘，宅院有门庭、廊庑、水道和沟渠，八个唐代灰坑中出土瓷片、陶片、骨器和铜器，重要器物有茶碾、碾槽和茶托等茶具以及瓷砚、陶砚、瓷水盂、石砚等文房用具。发掘区西南端出土一件已遭破坏的六面体石经幢，上面还残留着刻有 230 多个楷书汉字的陀罗尼经文，其中有“开国男白居易造此佛顶尊胜大悲”、“唐大和九年”的文字<sup>[62]</sup>。

郭城北部履顺坊发掘了砖瓦窑群，占地东西长 170 米，南北宽 60 米，分布有 39 座窑。如果包括以前在该窑址区北部发掘的 7 座，共有 46 座，窑址的面积更大<sup>[63]</sup>。各窑多两个一组与操作坑连在一起，分大型和小型两类，大型窑主要分布在南半部，叠压打破小型窑。出土遗物莲花方砖最多，还有绳纹或方格纹方砖、绳纹长条砖、手引纹长条砖、梯形砖、莲花纹瓦当、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窑具和陶瓷器也有少量出土。建筑构件与明堂、含元殿出土遗物完全相同，为唐早期风格。履顺坊离宫城很近，这些建筑构件是为营建洛阳城和宫殿而造，当属官营作坊的产品。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六月敕，京洛两都，是惟帝宅，街衢坊市，固需修筑，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sup>[64]</sup>。窑址有的保存完好，残者大部分是人为破坏，可能与开元十九年（公元 731 年）的禁令有关。

洛阳的商业虽未必比得上长安，但在城市设计意图上，更加关注了城市的商业手工业功能。洛河可方便运输，故直接规划在城内，以发挥水系运输的作用。此外还开掘了沟渠。通远市南沿洛河，北傍漕渠；丰都市通运渠；大同市通通济、通津两渠。市场都是依靠可以行船的河渠而设，比长安城更为合理

巧妙。洛阳城的另一个特征是，面积虽然“周回五十二里”，比长安“周回六十七里”要小<sup>[65]</sup>，却设三市，比长安多出一个。

隋代丰都市占二坊之地，唐代沿用缩小半坊，称南市，而且四面各开三门以方便人们<sup>[66]</sup>。“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sup>[67]</sup>。隋通远市唐代迁临德坊，改称北市。洛阳的繁荣在隋代就已奠定了基础，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敕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sup>[68]</sup>。唐代工商业更为兴旺，龙门西山南部的一处中型石窟，窟前室后壁门上方刻有“北市彩帛行净土堂”八个大字，旁边还刻有“北市香行”等小字两行，是北市彩帛行、香行的商人修凿的。开凿的石窟工程较大，非财力雄厚者不能为。大同市唐代迁于固本坊，改称西市。此外，南市的西南邻修善坊内多车坊、酒肆，还有卖书肆、卖麸家。北市附近更是繁盛，旅馆、酒家大部集中在这里。

洛阳有不少经营工商业的中亚人，经营进口的各种香料的北市香行，龙门石窟题记中可见其社官安僧道和录事史立策、康惠澄三人，应是来自中亚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北市西南的立德坊建有“胡袄祠”，南市西南有“波斯胡寺”，南市东南的会节坊“有袄祠”<sup>[69]</sup>。可见洛阳外来人口的状况。

唐长安的物资供给多依赖各地，最重要的粮食也经常从东南地区漕运。那些直接关系到首都生计的食盐和粮食靠运河输送到长安，洛阳是中转站。洛阳皇城右掖门内西侧曾发现隋代用以储藏盐和粮的子罗仓<sup>[70]</sup>，但规模更大的是圆壁城东门外发掘的地下粮窖，洛阳“（东城）北即含嘉仓，仓有城，号含嘉城”<sup>[71]</sup>，位置正合，为唐初设置的常平仓遗址。含嘉仓是国

家的大型粮食仓库，仓城有四门，北门已经考古发掘，门址为单门洞土木结构，门洞内的柱础、门墩尚存，东西并行的车辙也历历在目。仓城南部和东北部已探出排列整齐、东西成行的仓窖287座。各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圆罐形，口径最大的18米左右，深12米左右。最小的口径8米左右，深6米左右。已发掘的粮窖结构是：底部夯打、火烧，又铺烧土块、木炭和碎石子混合而成的防潮层，然后铺木板或草，再铺谷糠和席。窖壁砌木板，窖顶是木架结构的草顶，上涂很厚的混合泥。160号窖内还存有大半窖已变质炭化的谷子，估计约25万公斤。195号窖口部有一周柱洞共9个，证明此窖可能使用了木骨泥墙一类的地面建筑。含嘉仓的粮窖内出土了铭文砖（图三，据余扶危《隋唐东都含嘉仓》），主要为方形砖，文字记载着粮窖的位置、粮食种类、来源、数量、入仓时间及负责运输、入仓的职官姓名<sup>[72]</sup>。各时期仓砖铭文格式和用语是此仓管理变化的真实记录，砖铭上所刻职官署名表明租粮入仓执行严格的收验和勘验制度<sup>[73]</sup>。含嘉仓存储租粮最多的时期，是在武则天 and 玄宗时期，窖粮多从江淮运来。唐王朝经济来源逐渐依赖江淮，这也是武则天掌权之后长期在洛阳听政的原因之一。

### （七）长安、洛阳城布局的影响

隋唐长安与洛阳城尽管规模巨大，但设计布局的结果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长安宫城居北部正中，其南另筑皇城以置中央衙署，防卫严密。其他府、衙占据城中坡头高地，这些森严的机构和住宅，只有少数人才能涉足。居民区里坊也筑坊墙严格控制，具有浓厚的军管性质。全城总体设计上又以宫城、皇





图三 洛阳含嘉仓遗址出土的铭文砖

城、郭城的正南门构成南北中轴线，形成“畦分棋布，间巷皆中绳墨”的景象。洛阳全城没有对称的格局，似乎是长安的一半，在等级分明的隋唐社会，也许是西京与东都的差异的体现，但设计意图基本一致。

长安城和洛阳城自身的矛盾之处在于规划上的封闭与社会时尚的开放。当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后，必然逐渐导致原有设计的崩溃。然而市场以外交易场所的扩大、居民里坊墙渐趋虚设等内在机能的转变，对外表的格局影响不大。两座城的布局是人为规定的样式，当强盛的隋唐以开放的心态吸引了许多国家

和地区的人到来时，两座城所体现的宏大的帝王气概和方正严谨的城市布局，令人耳目一新。城市设计和布局不仅作为一种推而广之的制度，以不同等级的方式出现在地方城市规划中，对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影 响也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现象。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渤海政权，其上京龙泉府城、中京显德府城、东京龙原府城的宫城都在城北部正中，城内都有方整的里坊，设计大体摹自长安。日本吸取隋唐文化，模拟中国制度，从7世纪后半到8世纪后半，陆续兴建了许多处宫和京，其中藤原、难波、平城、长冈、平安五座京城，也是仿效隋唐时代长安和洛阳城<sup>[74]</sup>。甚至连城内里坊中的双重十字街的区划也是对隋唐城市的效法。以长安为首的中国城市建制布局也影响了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如中亚托克马克西的阿克彼兴古城（碎叶镇城）、塔拉斯城（怛逻斯城）等一些城市，采用的大体方形平面，“面三门”或“四面十二门”的做法，也渊源于隋唐<sup>[75]</sup>。

中国历代王朝的崩溃总是伴随城市的焚毁，长安城作为权力的象征，战乱来临时也成为首要打击的目标。五代以后中国首都出现再无逆转的历史性东移，长安从此失去了军事上的制内御外作用，尽管城市犹存，却失去了中心作用，而后来的都城从设计到功能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 注 释

[1] 《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西京记》，中华书局1960年版。

[2] 据《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中华书局1999年版。

[3] 《癸辛杂识》别集下咸阳六冈条：“咸阳有六冈，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阳。唐

- 时宫殿皆在九冈上，而作太清宫于九五冈上，百官府皆在九四冈上。”《丛书集成初编》第2778册第520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 [4] 《长安志》卷七：“在宫城直南，（隋文帝）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丛书集成初编》第3209册第84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 [5] 北宋吕大防《隋都城图》题记。
- [6] 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杨炼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1939年东亚考古学会编著《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址的发掘报告》，书中发表了吕大防的长安城残石刻图的清末邵氏拓本。另据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1991年版。
- [7]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马得志《唐兴庆宫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0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1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第5期；郭湖生《麟德殿遗址的意义和初步分析》，《考古》1961年第11期。
- [8] 《洪武实录》记载修建明代城时“南接旧城”，“再拓北大城”。
- [9]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 [10] 杨鸿勋《唐长安青龙寺密宗殿堂（遗址4）复原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杨鸿勋《唐大明宫麟德殿复原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傅熹年《对含元殿遗址及复原的再探讨》，《文物》1998年第4期。
- [11] 妹尾达彦《唐长安人口论》，《崛敏一光古稀纪念论集》，汲古书院1995年版；《唐长安城的官人居住地》，《东洋史研究》1996年；《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辑。
- [12] 《长安志》卷七：“每坊皆开四门，有十字街，四出趣门”，《丛书集成初编》第3209册第84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 [13] 马得志《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考古》1987年第4期。
- [14]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京兆府一大明宫条注：“高宗尝染风痹，以大内湫湿，置宫于斯”。《太平御览》卷一七三引《两京新记》：“命司农少卿梁孝仁充使

- 制造此宫，北据高岗，南望爽垲、终南如指掌，坊市俯而可窥。”
- [15] 马得志《1959~1960年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
- [16] 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年第7期。
- [17] 《类说》卷七引《教坊记》：“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宴剑南、陈、郑神策军将士三千五百人于三殿”，又见《册府元龟》卷一一〇。
- [1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杨鸿勋《唐大明宫麟德殿复原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 [19] 马得志《唐长安兴庆宫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马得志《再论唐兴庆宫勤政务本楼的位置》，《考古》1994年第6期。
- [20] 《唐会要》卷三十兴庆宫条。
- [21] 《唐摭言》卷三。
- [22] 马得志《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考古》1987年第4期。
-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 [24] 《佛祖统记》。
-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5期。
- [2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傅熹年《唐长安明德门原状的探讨》，《考古》1977年第6期。
- [27] 《光明日报》1999年4月24日。
-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工作队《隋仁寿宫、唐九成宫37号殿址的发掘》，《考古》1995年第12期。
- [29] 卢建国《陕西铜川市唐玉华宫遗址调查》，《考古》1978年第6期。
- [30]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八：“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魏光等《唐翠微宫遗址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
- [31] 唐华清宫考古队《唐华清宫汤池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5

- 期；唐华清宫考古队《唐华清宫汤池遗址第二期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9期。
- [32] 陕西省博物馆《隋唐文化》，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
-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第5期。
- [34] 《长安志》卷十：“（西）市西北有池，长安中（公元701—705年）沙门法成所穿，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池。”《丛书集成初编》第3210册第135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唐会要》卷八十七记漕渠云：“入自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之西街，以贮林木”。
- [35] 《太平御览》卷六二引《两京记》：“西京东市平准署东隅有放生池，分泮水渠自道政坊”。
- [36] 《长安志》卷八，《丛书集成初编》第3210册第108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 [37] 陈忠凯、杨希义《唐长安城坊里宅第变迁原因初探》，《文博》1991年第4期；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38]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安定坊发掘记》，《考古》1989年第4期；赵强等《唐长安城发现坊里道路遗迹》，《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6期。
- [40] 《唐六典》卷二十五：“左右金武卫大将军之职，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中郎将掌领府属，以督京城内左右六街，昼夜巡警之事。”《朱子语类》：“每坊各有围墙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门，出入六街。凡城门街角有武侯铺，士兵分守，日暮门闭。”《通典》卷三食货三引《大唐令》：“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先是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
- [41] 《长安志》卷八崇仁坊条：“一街辐凑，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丛书集成初编》第3210册第97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 [42] 《唐语林》卷二记载，武宗时期的王式“初为京兆少尹……性放率，不拘小节。长安坊中有夜栏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式过之，驻马寓目。巫者喜，奉主人杯，跪献于马前，……式取而饮之。”
- [43] 《唐会要》卷八十六街巷条载，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六月“右巡使奏，义成军节度使韦让，前任宫苑使日，故违勒文，于怀贞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房九间，勒旨，韦让侵街造舍，颇越旧章，宜令拆毁”。
- [44] 《唐会要》卷八十六街巷条记载，大和五年（公元831年）七月，左右街巡使奏“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及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
- [45] 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 [4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察和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
- [47]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察和发掘续记》，《考古》1961年第3期。
-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隋唐东都城1982—1986年考古工作纪要》，《考古》1989年第3期；王岩《隋唐洛阳城近年考古新收获》，《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 [49]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记载，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
- [50]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 [51] 《唐会要》卷八十四移户条。
- [5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3期。
- [53] 《元河南志》卷四：“大帝（高宗）末年，常居此宫（上阳宫）听政”。《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两京新记》：“武太后遂定都于此，日已营构而官府备矣。”
-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唐东都上阳宫园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2期。
- [5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隋唐东都应天门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3期；《中国文物报》1991年1月20日。
- [5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唐洛阳宫城出土哀帝玉册》，《考古》1990年第12期。

- [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1987年隋唐东都城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
- [58] 杨焕新《略谈唐东都洛阳宫的几座主要殿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乾元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期；《洛阳唐东都圆壁城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河南洛阳隋唐城宣仁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11期。
-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隋唐洛阳城东城内唐代砖瓦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2期。
- [6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文物工作队《隋唐洛阳城永通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2期。
- [61] 《唐六典》卷七。由于洛河水患和里坊改名变化等原因，文献记录数量、名称略有不同。
- [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8期。
- [6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隋唐东都洛阳城外廓城砖瓦窑址1992年清理简报》，《考古》1999年第3期。
- [64] 《唐会要》卷八十六街巷条。
- [65] 《长安志》卷七，《丛书集成初编》第3209册第83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 [66] 《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两京记》：“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
- [67] 《元河南志》卷一。
- [68] 《大业杂记》。
- [69] 《元河南志》卷一。《太平广记》卷二八五引《朝野僉载》“南市西坊……有胡袄神庙”。
- [70] 洛阳博物馆《洛阳隋唐东都皇城内的仓窖遗址》，《考古》1981年第4期。
- [71] 《元河南志》卷三。
- [72] 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

- [73] 段鹏琦《隋唐洛阳含嘉仓出土铭文砖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7年第11期。
- [74] 王维坤《日本平城京模仿隋唐长安城原型初探》，《文博》1992年第3期。
- [75] 中亚碎叶城为调露元年（公元679年）都护王方翼筑，《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载：“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参见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 二 遵循等级的地方城



隋代的地方行政机构最初沿袭北齐、北周时的州、郡、县三级制，后罢郡而为州、县两级，炀帝改州为郡。唐代恢复为州、县两级制，同时分天下为十道，唐玄宗以后诸道演变为州之上的行政机构。州、县治所作为地方统治中心均建有城池，规模大小不等，不仅体现了等级制度，也遵循着当时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

### （一）异军突起的扬州

当封闭式的长安城逐渐发生着变化，沿街开店和繁华的夜市突破原有城市格局时，扬州作为商业为主的城市悄然兴起，以后竟然被誉为“扬一益二”，成为天下名城。这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城市，改变了中国古代城市以政治军事职能为主，缺少商业性质的状况，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直接、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城市发展。

扬州地处长江入海之冲，面向海洋，这一优越的地理环境从隋代开始为它带来了飞速发展的契机。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文帝为出兵灭陈，在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北上争霸时首开的邗沟故道上凿通山阳渎，南起江都（扬州），北至山阳（淮安），沟通了长江与淮河水系。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又调集百万人开通济渠，连洛、黄、汴、泗诸水通淮

河。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再征发百万人开挖永济渠，南通黄河，北到涿郡（北京郊外）。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还疏通了东吴时期的运河江南河，连接了京口到余杭。至此，运河水系交通全长约四千里，连接了中国南北。扬州得天独厚的位置与历史机遇的恩赐使它的崛起成为必然。

被认为是残暴、昏庸君主的隋炀帝，在奇迹般地修建大运河时，于公元605、610、616年三下江南，他看中了江北运河终点和江南运河起点的蜀冈丘陵，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建造了江都宫，从此拉开了扬州城兴起的序幕。隋炀帝对城市建设格外重视，理由在建立东都洛阳已经说过“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sup>[1]</sup>。对江都的重视则表现在“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sup>[2]</sup>，提高了江都的地位。虽然炀帝未来得及尽享辉煌便在隋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南下扬州时被叛将绞杀在江都宫，但是扬州并未因此而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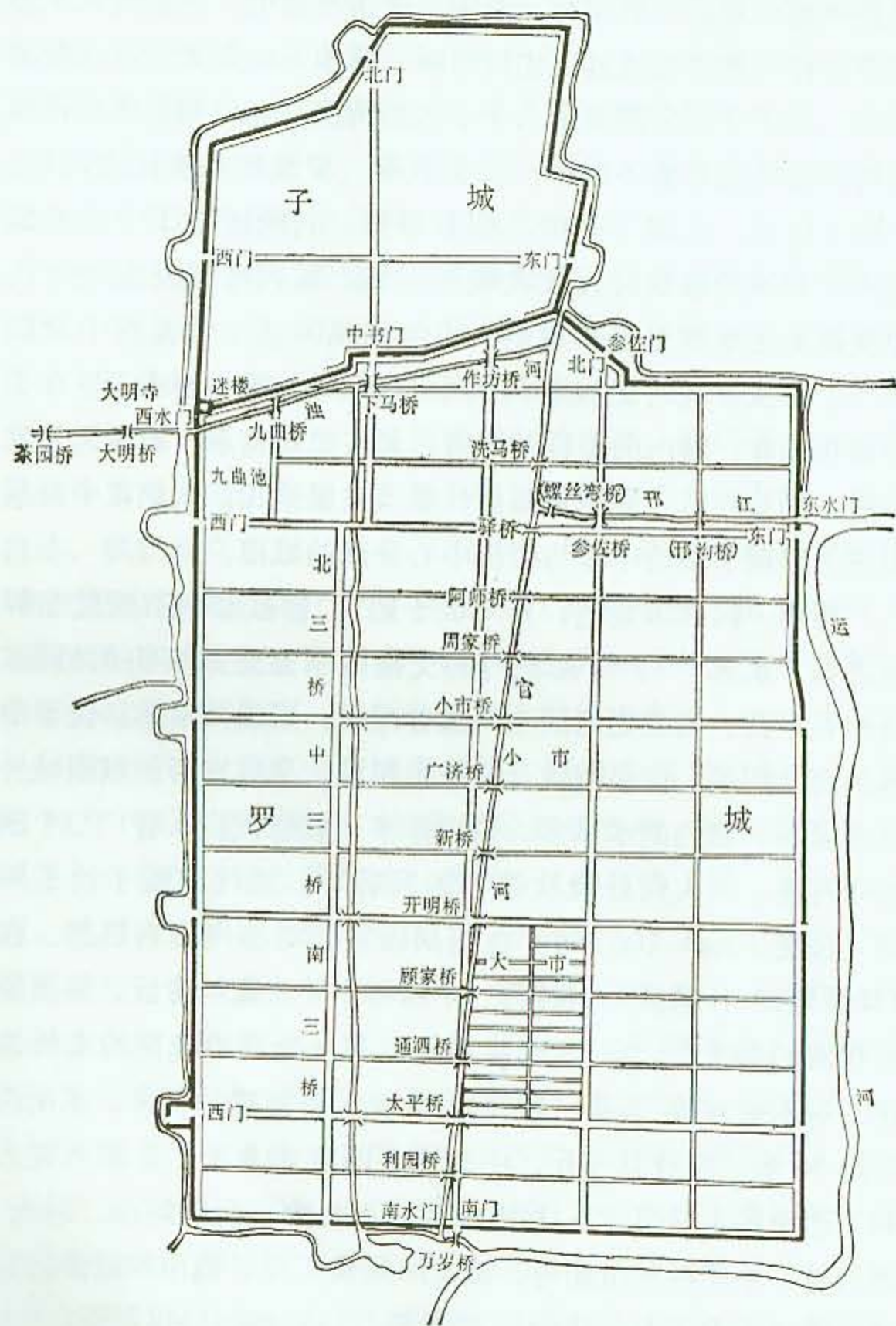
扬州城被史学家关注研究很早，但考古调查发掘在20世纪70年代后才逐渐展开。目前已经初步查明，隋江都宫在蜀冈之上，蜀冈下是江滨滩地，唐代以江都宫为子城，置大都督府，然后向北扩展，逐渐形成了一个面积仅次于当时长安与洛阳的城市，全城南北长6030米，东西宽3120米。子城在全城的西北角上，四面有城墙，城内有南北、东西道路位于城中间，十字相交。西城牆和西北角进行了探沟发掘，发现有汉、六朝、隋、唐、五代、宋的地层，表明子城的营建年代久远。

罗城南北长4200米，东西长3120米。四面也有城墙，还有七座城门。罗城为安置工商市场和百姓居住的里坊区，有南北街六条，东西街十四条，纵横交叉成六十多个区域，每区东西长约500米，南北长约300米<sup>[3]</sup>（图四，据蒋忠义《隋唐宋

明扬州城的复原与研究》）。明朝所建扬州城中，边长约0.5公里方形排列的坊的遗迹还比较清晰，其中一坊今天还可以看出以大、小十字街分割成十六个小区的情况，可以知道唐扬州城的坊的布局也是整齐的<sup>[4]</sup>。发掘表明，罗城墙基叠压唐代早、中期文化层，北墙下有唐早期墓葬群，判断始建于中唐或偏晚<sup>[5]</sup>。罗城的修筑时代大大晚于子城。城内考古发掘中唐代中晚期文化堆积是最丰厚的，说明扬州兴盛主要是在中唐以后<sup>[6]</sup>。唐筑罗城时是以运河为中心围筑城墙，当时已经有了桥梁和商业，城内的桥位与街道布局有密切关系，即城区开发在前，围城在后，这正是商业性城市发展模式，从此在中国城市史上出现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城市。

扬州“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曾被淮南节度使李绅称之为“水郭”<sup>[7]</sup>，可见城内的交错的水系是最突出的特征。扬州有东西、南北走向的主河道各两条，形成井字形。位于中部的南北河道，应是隋代开凿的山阳渚，又称官河。东南城外也有运河。城内的水系多，桥梁亦多，故唐代诗人有“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形容<sup>[8]</sup>。宋代沈括于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在扬州做官，对扬州相当熟悉，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对唐二十四桥作了认真的考证，是复原扬州城的参考<sup>[9]</sup>。在1978年城内发现一处唐中晚期的木桥遗迹，有木桩6排33根，桥长约34米，桥面宽约7米，水面跨度近30米。桥身共5孔，中孔最大跨度达8米，是相当宽大的河道中的主航道<sup>[10]</sup>。对古漕河的调查中也发现河床、码头、固河桩、系船桩和沉船等，出土一些铁工具、钱币和较多的瓷器，多属于南宋至元代<sup>[11]</sup>，说明唐代以后扬州仍很繁荣。

唐代漕运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唐高宗以后日趋明显，扬



图四 唐扬州城平面复原图

州的地位也日趋重要，给这座城市带来发展契机。唐玄宗时期漕运规模扩大，宫廷奢侈生活更加仰仗南方，而这些物品都要先集中在扬州然后装船北运。“扬、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sup>[12]</sup>。“天下之赋，盐利居半”<sup>[13]</sup>的盐业产销、集散中心也在扬州。“安史之乱”以后，一些北方南下的工商业者涌入扬州，对城市格局产生直接影响，那就是当原有的商品交易的市容纳不下时，出现了“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的现象<sup>[14]</sup>。

扬州城内今文化宫处发现了唐代建筑遗址<sup>[15]</sup>，所处位置是河旁的主干大道。遗址地下叠压唐代早、中、晚期遗迹。早期建筑残存着南北四列、东西三列砖墙基，平面长方形，东西长11.8米，南北宽8.3米，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中期是在原来基础上的改建，加筑了向北扩大的台基，增建了后廊建筑。晚期又在中期的基础上重建，扩大台基，增建前廊，新辟西门。发现的七排四列共21个础墩，表明这是一个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前后出廊的建筑格局。

整个建筑遗址中除出土建筑材料外，还发现宜兴窑、长沙窑、越窑、洪州窑、寿州窑、巩县窑、邢窑、定窑等诸多窑的产品。早期建筑出土青釉和黄釉瓷，是宜兴窑和寿州窑隋到初唐时期的器物。中期的种类增加。晚期最为丰富，增加长沙窑、越窑、巩县窑、邢窑、定窑的产品，器物多具唐代中晚期特征。遗物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三期建筑遗址的年代关系。晚期瓷器来自更多的地区，改变了原来比较单一的南方青瓷的格局。

不仅如此，早期建筑房基北面发现陶缸6口，周围散布牛角、牛骨和加工后的骨料及梳篦、骨笄废品，像是一个兼有家

庭手工业作坊的民居。晚期重建的建筑基址内出土许多玻璃瓶、碗、杯类器物的碎片，分蓝色、白色两种，多光素无纹，也有少量饰乳钉纹，显然来自西方。波斯陶片也有相当数量的出土。还有 50 余枚钱币和 3 块黄金。黄金呈不规则的扁方块形，每块均有切割痕迹，像是市场流通时切割所致。这个基址唐代或为波斯邸胡店，至少当与胡商有直接的往来。晚期建筑最引人注意的不是规模的扩大，而是新辟的西门，属于“侵衢造宅”，门址正好面向扬州最繁华的南北大街，暗示出这所唐代后期的建筑并非是普通民宅，可能已变为商业用房，具有邸店的性质，临街的西门便于货物买卖。

转运贸易要批发大宗货物，需要相应的货栈，原有的市及其位置布局无法满足，沿运输的河道设店成了新的和最佳的选择。长安、洛阳商业发展的结果是“市”周围的里坊繁荣，但仍与市有密切联系，属于市的附庸，散落在坊中的工商行业也不成规模，各自封闭的属性依然存在。扬州跳入市和里坊的封闭体系在临街沿河岸设店，集中贯穿坊区，不仅少有居民住宅的阻隔，更重要的是有水陆交通相连，即所谓“十里长街市井连”<sup>[16]</sup>。商业经营者也十分复杂，店铺之外的河边还有移动兜售的商贩<sup>[17]</sup>，诸道节度观察使也在扬州“别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sup>[18]</sup>。临街沿河岸店、工商侵衢造宅的繁荣，使得扬州出现“官河填淤，漕挽堙塞”、“行旅拥弊”时，淮南节度观察使采用的只是“开拓疏启，公私悦赖，而盛为奢侈”<sup>[19]</sup>的办法，即光疏通，而不禁止。

扬州的手工业遗址也不断发现。子城南的一处遗迹，出土铜锭、坩埚、烧砖窑址和带“官”字的砖井一座<sup>[20]</sup>。1975 年在位于唐代罗城西缘的师范学院和江苏农学院工地发掘了唐代

遗址<sup>[21]</sup>，江苏农学院农场唐代遗址出土了一批砖砌炉灶和陶制坩埚。这些圆形的炉灶，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口大底小或口小底大的，共 5 座，其中最大的一座灶内，清理出铁片、铁块；另一类是筒形的，共 4 座，炉的附近有大块铁渣。较完整的熔铸坩埚有 5 件，其中圆筒状的 3 件，壁内有铜汗，壁外有釉泪；杯状的 2 件，口沿有流。一同出土的有铜矿石、炼渣、铜绿锈块等。这个遗址可能与唐代铜器、铁器的熔铸有关。在炉灶内和炉灶旁还发现铜钱。4 座筒形炉灶的第一座，底部有一陶缸，缸内有“开元通宝”53 枚，可能是销钱铸器的残余。扬州师范学院唐代遗址，发掘出灰坑、石磨残件和砺石。灰坑中满填骨料和骨制品，一个灰坑中挖出骨料竟达 650 块，绝大部分是牛骨、牛角、牛蹄。骨制品有簪、钗、针、梳、刷等。骨簪有透空雕花的，有扁平圆头的。还有平面浮雕花鸟的骨板。成品之外，还有半成品和废品。这两处遗址大约是金属熔铸作坊和雕刻制骨作坊，表现出手工业分工的细致。

唐代扬州是供铜及铜器的主要地点和集散地，不仅制造的铜镜要向皇室进献，还要为政府铸钱。天宝时全国有 99 个铸钱炉，其中扬州有 10 炉。因此《旧唐书·食货志》说“扬州租、调以钱”。尽管扬州的手工业发达，但重要的还是商业兴盛。位于长江、运河、海口的交叉点上的扬州城，将畅通的东西陆路丝绸之路和沟通南北的动脉运河连接在一起，然后又辐射四方，当然承担了国内、国际交往的前哨重任。考古发现的城内出土的瓷器主要不是产自当地，多为越窑、长沙窑、巩县窑瓷器产品，其中以湖南长沙窑青瓷为最多。与越窑器物相比，长沙窑产品多为实用性器物如壶、碗之类，物美价廉，是外贸瓷器的大宗，其中不少专门用于外销。器物的造型和纹样



有胡人三彩人面、舞蹈人物、联珠和亚热带植物纹样、阿拉伯文“真主伟大”等，显然是吸收融入了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人容易接受的内容<sup>[22]</sup>。长沙窑瓷器主要沿湘江北上，顺长江而下，抵扬州、明州、广州出港。扬州是长沙窑瓷器最大的集散地，朝鲜、日本、东南亚半岛、印度、斯里兰卡、两河流域、阿拉伯半岛及中亚等地都有出土<sup>[23]</sup>。

8世纪中叶，亚洲内陆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怛逻斯战役后唐朝势力退出中亚，阿拉伯帝国兴起，唐朝内部“安史之乱”爆发，吐蕃势力逐渐控制西北地区，唐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贸易衰落，对外交往日渐仰仗东南沿海的港口。盛唐以前，来扬州的波斯、大食人大都从波斯湾沿海经马六甲海峡和北部湾抵广州，或在福建登陆。盛唐以后，各国船只沿近海航线直至扬子江口达扬州，把扬州当作海洋航运的终点。即便是在广州等地登陆，与长安的往来也取道这里。唐朝在扬州特置市舶司，专门管理外国商人和收税等事务。扬州海运发达，造船业也随之兴盛，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广陵大风驾海潮沉江口船数千艘”<sup>[24]</sup>，足见船只之多。唐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刘晏为盐铁转运使，在扬州设十个造船厂，造船达两千余艘<sup>[25]</sup>。淮南节度使杜亚“浚渠蜀冈，疏句城湖、爱敬陂，起堤贯城，以通大舟”<sup>[26]</sup>，是希望大船直接驶入城里。考古发现的沉船，有的长达24米，可在沿海和长江中航行<sup>[27]</sup>。城内古河道中发现的两条唐代古船，一条残长7.1米，宽0.64米，一条残长6.3米，宽0.7米，它们中间有隔仓，船舱中发现漆器、瓷片，可能是短途运输船<sup>[28]</sup>。

扬州城出土的年代当属唐代中晚期的伊斯兰翠绿釉大陶壶和数以百计的这类绿釉陶片以及大量的外来玻璃残片，说明对

外贸易的发达和外来人口增多。唐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因刘展反叛，邓景山引田神功助讨，“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sup>[29]</sup>。外来人口影响了唐朝人的生活，甚至出现了把波斯用作人名的现象<sup>[30]</sup>。

## （二）等级严格的州县

都城长安、洛阳规划中的里坊，是城市内部的基层建制。《通典》卷三《食货》引《大唐令》：“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旧唐书·职官志》记载：“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sup>[31]</sup>清楚表明适用于城市的坊的设置不依户口多少，而按居住范围决定。这一基层建制与管理，也成为隋唐各级城市设计规划时居民布局的依据。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城内里坊的一致性说明了这一制度的普遍性，特别是里坊中的十字区划法也扩展到地方州、县城的规划中。

今山西太原在隋唐时代不同于一般地方行政建置，隋初为河北道行台尚书省、并州总管，大业年间为太原郡。由于是唐代王业兴起之地，故受到特别的重视，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改为大都督府，天授元年（公元690年）置北都，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又改并州为太原府，天宝年间甚至称北京<sup>[32]</sup>。太原城在60年代调查时遗址西壁的一部分和西南城角还保留在地面上。还有东城角、罗城等如今沿用的地名存在。

西北角的金胜村，根据附近唐墓所出墓志，知唐时名金城村。金城村大概是由于地近郭城（罗城）而得名的。北都城“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三千一百二十二步”<sup>[33]</sup>，即长约6公里，宽约4.33公里。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营建的晋阳宫，在“都之西北”，应在北都西北隅的东部，是一片低洼积水区和遍布乱砖碎石的地带。宫城西部是属于宫城内的仓城所在。宫城区之南有一条废河道，从西穿城东入汾水，河道把宫城和一般居民区隔开。河之南还保存一些街道痕迹，这些道路有的是坊与坊之间的大街痕迹，有的是坊内十字街的痕迹。根据这些残存的街道痕迹，知道北都的坊是0.5平方公里左右，它的整体布局大约是东西六坊、南北九坊之制<sup>[34]</sup>。

四川成都旧城是在五代成都羊马城的基础上扩建，其内部还保存着唐城遗迹。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蜀郡为益州，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置大都督府于此。至德二年（公元757年）置南京，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罢京，置成都府。唐玄宗曾居成都（公元756~757年），后来僖宗又居成都四年（公元881~885年），他们皆以府署为宫，其位置在府城西北隅的高地上。唐城东半部八个坊的痕迹尚可分辨，坊由大、小十字街划分成十六个小区。西半部的北部唐时是宫和地方衙署所在地；南部被明建藩王城和清设八旗驻区所破坏。成都旧城内的唐城遗迹，说明即使到了盛唐时期，在地方城中设置宫，其方位还沿袭旧制选在所在城的西北隅，或是地方衙署所在地，因此可推知西北隅设置衙署应是地方城制。成都府是大都督府所在地，府城面积相当于十六个坊，这应是唐州府城中最大的一种<sup>[35]</sup>。

唐代大型州府城平面呈方形，有十六个坊，除上述成都府

外，北京西南郊的幽州城址也是一例。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于幽州置大都督府，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改都督府，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又改为大都督府。公元936年幽州入辽版图，公元938年辽在此建立南京，因袭唐幽州城未改变。公元1150年金扩展其东、西、南三面建中都。金中都遗址已勘探清楚。在金中都范围内，可以看到两种街道布局，即坊里式和长巷式，后者分布在前者的东、西、南三面，清楚地表明它是后来扩展的。唐幽州为十六个坊的面积。法源寺（唐悯忠寺）所在的坊，由大、小十字街分割的十六个小区还大体存在。西南一隅是州治所在，也即是辽南京宫城所在。十六坊周长近10公里，应属于当时大型的州府城制度<sup>[36]</sup>。

占四个坊的是一般的州城，这种州城址有大、小之别，大的周长6.5公里，小的周长4.5公里余，都是方形平面，四面各开一门，内以十字街分割成四个坊。周长6.5公里的城址，坊的面积大于0.5平方公里；周长4.5公里余的城址，坊的面积大约是0.5平方公里。

今山西大同北魏曾建都称平城，北魏迁都洛阳后仍为北方重镇，六镇起义时严重破坏，其后因战乱多有置废，直到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唐重建云州，置下都督府。云州城在辽金设西京因而未改，明初就土城砌砖石，实际范围也没有大的变动，至今仍为大同市区内的旧城部分。实测大同旧城东西长1750米，南北宽1810米。平面基本为方形，旧城主街是十字街，划分出的四个区块比唐代0.5平方公里的标准坊大。横街北面西部的区块在明清时是府衙、总镇署所在地，应是沿用了前代衙署的旧城。明初在横街北面东部的区块内兴建了藩王府。横街以南的二个区块内各置十字街的情况非常清楚，其中

东南部又由小十字街分割成四个小区，还可以进一步在个别小区中看到又设有更小的十字街的情况。整个大同旧城发现了四层十字街，因此可以推测这是唐代旧址的延续，即云州城遗留下的街区痕迹。这个现象很重要，它明确地反映了唐代地方城市的规划布局也是一套大小十字街的区域法。最小的十字街分割成的小方块，可能是当时城内的最小居住单位<sup>[37]</sup>。

小型州城和县城城址大约是一个坊的面积。今北京市属下的顺义县旧城，是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建置的顺州城，城址范围一直沿用到明清。顺州只有一个属县怀柔，所以顺州城实际也是唐怀柔县城。该城原周长2公里，方形，四门十字街。一坊面积的城也是唐县城的制度，河北吴桥县旧城是唐安陵县城址，山西虞乡镇旧城是唐虞乡县城址，这些沿袭唐代县城旧址的城后世虽有变动，但都还保存了方形周长2公里多，开四门，内置十字街的布局<sup>[38]</sup>。

中央集权下的城市里坊制度，作为一种普遍的城市规划原则，反映在各种类型的地方城市中，城内规划布局基本相同，里坊都是以十字街分成四区后，每区又设小十字街，被小十字街分割的四小区内，又设更小一级的十字街。因此，层层十字街的区域法是隋唐城市布局的特点。宋以后，街道作长巷式布局的城制兴起后，在中原和北方地区，一些唐代旧城仍被沿用到明清乃至更晚。

#### 注 释

[1]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2] 同 [1]。

- [3] 蒋忠义《隋唐宋明扬州城的复原与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40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 [4] 蒋忠义、王勤金《近年扬州城址的考古收获与研究》，《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俞永炳《试谈丝绸之路上的扬州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 [6] 俞永炳《试谈丝绸之路上的扬州城》，《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 [7] 姚合《扬州春词》；李绅《宿扬州》：“水郭帆樯近斗牛”。
- [8] 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 [9] 蒋忠义《唐代扬州河道与二十四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 [10] 扬州博物馆《扬州唐代木桥遗址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第3期。
- [11] 扬州博物馆《江苏扬州市毛纺厂古漕河遗迹调查》，《考古》1992年第1期。
- [12] 《旧唐书》卷五十一杨贵妃传。史载宝历元年（公元825年）皇室令浙西造金银进献，见《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传。玄宗时扬州等南方精美的物品大量输入长安，见《旧唐书》卷一百五韦坚传。
- [13] 《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四。
- [14]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六杜亚传：“扬州官河填淤，漕挽堙塞，又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亚乃开拓疏启，公私悦赖，而盛为奢侈。”
- [15] 王勤金《江苏扬州市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5期。
- [16] 张祜《纵游淮南》。
- [17] 《太平广记》卷七第三百三十四韦粟条：“泊河次，女将一婢持钱市镜。行人见其色甚艳，状如贵人家子，争欲求卖”。
- [18] 《册府元龟》卷五〇四邦计部官市条。
- [19]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六杜亚传。
- [20] 南京博物院《扬州唐城手工业作坊遗址第二、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3期；扬州博物馆：《扬州教育学院内发现唐代遗迹和遗物》，《考

- 古》1990年第4期。
- [21] 南京博物院、扬州博物馆、扬州师范学院发掘工作组《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文物》1977年第9期。
- [22] 朱江《扬州出土的唐代阿拉伯文背水瓷壶》，《文物》1983年第2期。
- [23] 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李锡经译，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 [24] 《新唐书》卷三十六五行志三。
- [25] 《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置十场造船，每船给钱千缗”。
- [26] 《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三。
- [27] 陆觉《扬州施桥发现了唐代木船》，《南京博物院集刊》第3集，1981年。
- [28] 罗宗真《扬州唐代古河道等的发现和有关问题的探讨》，《文物》1980年第3期。
- [29]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田神功传。
- [30] 扬州出土的唐代卫氏墓志云：“育子五人，二男三女，长曰延玉，次曰波斯”。见《唐渤海吴公夫人卫氏墓志铭》，《南京博物院集刊》第3集，1981年。
- [31]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
- [32]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河东道二。
- [33] 《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三。
- [34] 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 [35] 同[34]。
- [36] 同[34]。
- [37] 同[34]；丁晓雷《大同旧城的性质布局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 [38] 同[34]。

### 三 隋唐陵墓



隋唐两代建立了强盛的亚洲大帝国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地下王国——隋唐陵墓，这个地下世界同样富丽无与伦比。极力装饰陵墓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习尚，丧葬活动形成的种种规定和一套完整程序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因而也是社会内在精神秩序的反映。隋唐的丧葬制度和习俗，正是那个时代礼仪规范的缩影。

### （一）规模宏大的帝陵

隋唐帝陵多数仍历历在目，主要坐落在关中渭北地区。早在北宋时期就开始了唐代个别陵园的调查和对唐代帝陵的平面布局进行复原尝试，金石图志方面的著作也作了记录考证，至清代对帝陵还加以保护管理<sup>[1]</sup>。20世纪初对唐陵实地踏察，记录了一些后来被破坏的遗迹<sup>[2]</sup>。50~60年代重点勘察了乾陵、建陵、桥陵、杨氏顺陵，并对关中唐陵考古做了初步总结。80年代以后，对隋文帝泰陵、唐恭陵、贞陵、兴宁陵、惠陵、崇陵、永康陵、献陵等又进行了勘察，并对乾陵、桥陵埏道做了试掘，还发掘了靖陵，其中不乏新发现<sup>[3]</sup>。这些较为翔实的资料，使我们对隋唐帝陵的认识更为清晰。

陕西省扶风县隋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泰陵，还残存着高27.4米的覆斗形封土，四周围绕的夯筑城墙也依稀可

辨，大量的砖瓦堆积，显示出门庭址、角楼的位置。祠庙在陵的东南，石柱础一排七个，还有石碑一通。陵冢之南立有清毕沅书“隋文帝泰陵”石碑<sup>[4]</sup>。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扬州被乱兵所杀，史载当时萧皇后与宫人将他葬于江都宫西院的流珠堂内。唐高祖平定江南，以帝制将他葬于雷塘，即今天扬州市邗江区槐泗乡许庄。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萧后死，唐太宗派人把萧后与炀帝合葬，以后无人知晓。清代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阮元确认了炀帝陵，立“隋炀帝陵”的石碑。现存墓墩为长方形，墓冢高3米，直径10米。

唐代帝陵除昭宗李晔和哀帝李祝的陵分别在河南澠池和山东菏泽外，其他均葬于今陕西渭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和蒲城六个县，称“关中十八陵”。此外，唐高祖李渊第四代祖宣皇帝李熙的建初陵、第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的启运陵均在河北省隆尧县。李渊之父李昉兴宁陵、武则天之母杨氏顺陵在陕西咸阳。玄宗李隆基之兄让皇帝李宪惠陵在陕西蒲城。

唐陵陵园的共同特征是坐北朝南，地势多北高南低。依山为陵和积土为陵是唐陵的两大类别。前者是按自然山势开凿玄宫，有昭陵、乾陵、泰陵等十四座，分布在北山山脉之上。后者是平地起冢，有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分布在北山山脉以南的渭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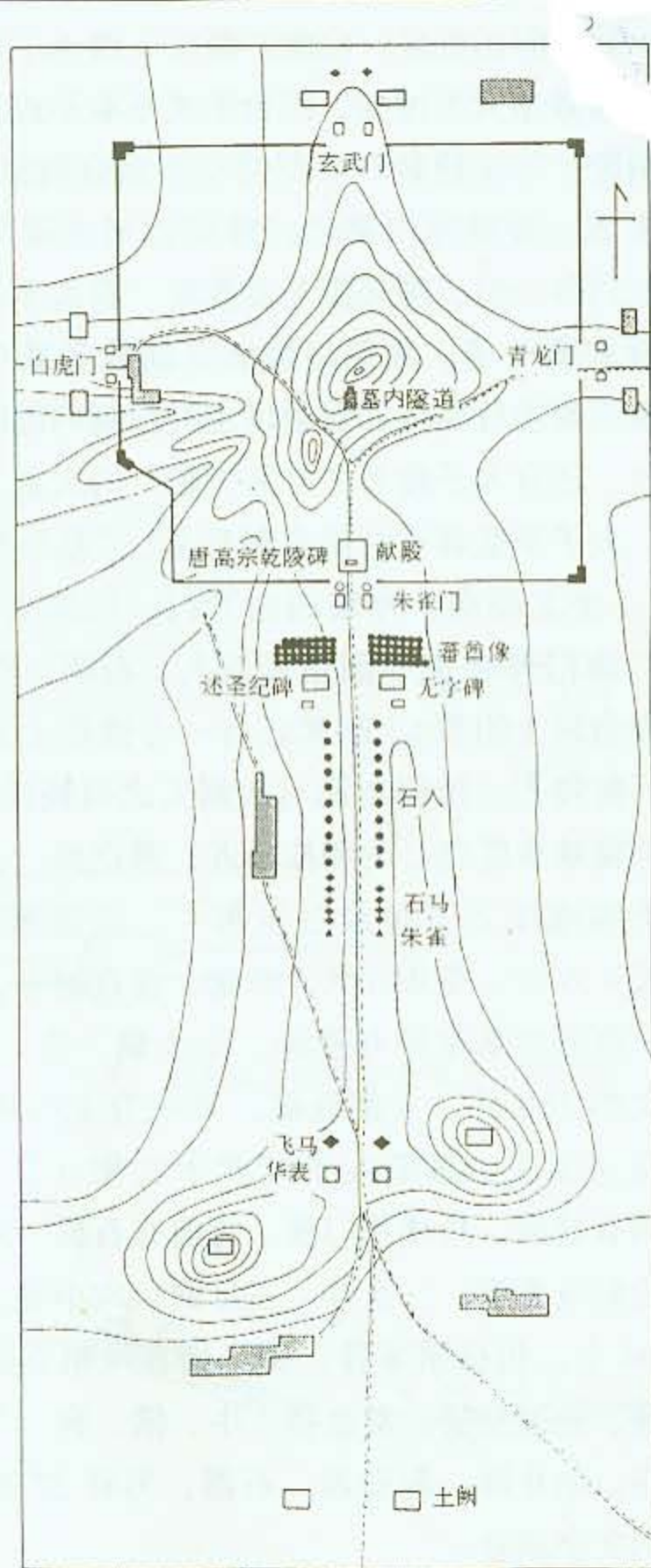
李世民的昭陵是依山为陵，利用了礼泉县巍峨的九嵕山修建。陵山北有祭坛、寝殿和司马门（或称玄武门）。司马门内置贞观时期十四位民族首领的石刻像、“昭陵六骏”石刻。祭坛遗址残留的砖瓦上可见到“官罗通”、“官匠张”、“工匠郑”

等刻字。陵山正南面有神门，门外有二阙，门内有献殿，出土的高大的鸱尾显示出当年殿堂规模十分宏大。西南面有下宫，俗称皇城。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处，选择在乾县北梁山山峰（图五）。陵园基本呈方形，东、南、西、北墙各设一门，门外有石狮、双阙。四角有角阙。南神门北为长方形献殿，东西有阁。南神门外为神道，由南向北为石望柱、翼马、鸵鸟各一对，马和控马者五对，石人十对，石碑两通，蕃酋像六十一尊。再南有鹊台和乳台。北门外还有仪仗马和控马者。乾陵墓道凿在青石的山脊上，长60多米，宽近4米，全部用石条填砌，整齐有序。石条之间用铁栓连接，再灌注以铁浆，异常坚固，许多石块上还留下当年石工的姓名。墓道的石条相互连接的一小部分稍显杂乱，而且失去了相互连接的铁栓，夯土中夹杂着石灰块、木炭灰、小砖块、碎玉片。睿宗李旦桥陵的墓道经过试掘，也是用青石条镇封，石条间以铁栓板套接，熔铅灌缝<sup>[5]</sup>。

献陵、顺陵是积土为陵。唐高祖李渊献陵位于三原县东20公里，陵园四墙各辟一神门，陵台居中。南面曾有寝宫、献殿建筑。四神门外有石虎一对，神道有石望柱、犀牛各一对<sup>[6]</sup>。陕西咸阳的顺陵，原为武则天之母杨氏墓，随着武则天权势日盛，杨氏墓的等级屡经改易，公元690年称顺陵，四角有角阙，陵园只开南门，陵前有土阙、石望柱、独角兽、石狮、石人和石羊等。陵后有石狮、石马，东西两边有石狮<sup>[7]</sup>。

布置在神道两边和四神门外的唐陵石刻，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瑰宝，石人、石兽等由将作监甄官署供给，每种石刻均左右对置。初唐的献陵和昭陵，石刻巨大，内容组合尚



图五 乾陵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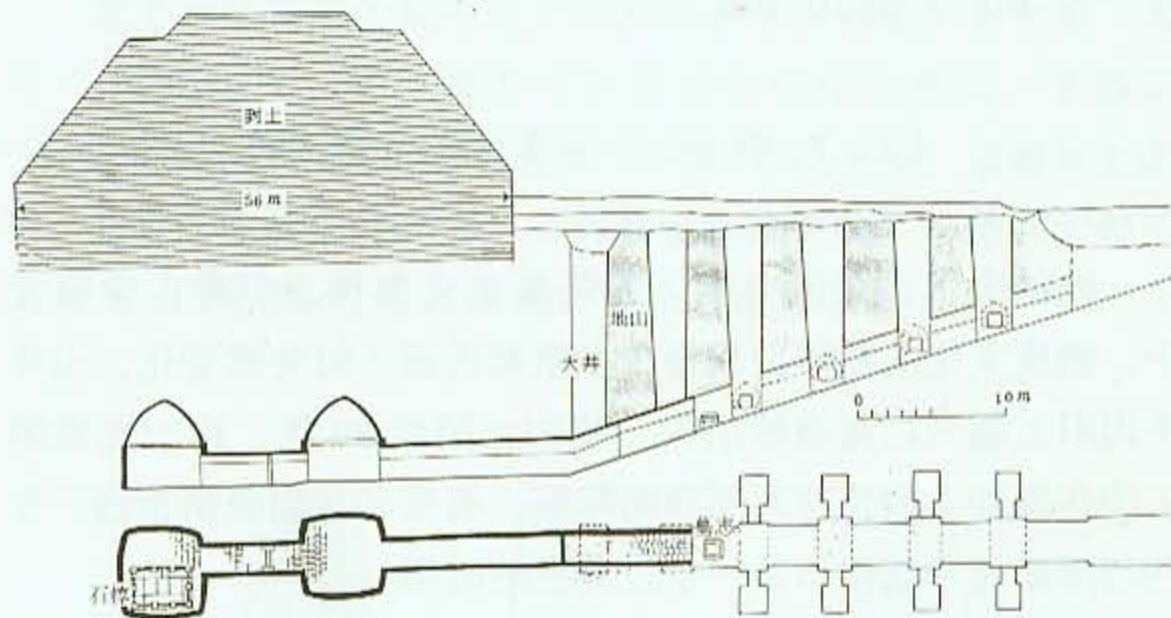
未形成定制。盛唐时的乾陵、定陵、桥陵，继承了石刻形制大的特点，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形式基本形成制度。中晚唐的泰陵至靖陵十三座唐陵，石刻变小，组合刻意追求对称，石人左右分文武。泰陵除门狮外，神道石刻由南向北为石望柱、翼马、鸵鸟各一对，马和控马者五对，石人十对，与乾陵相比缺少石碑和蕃臣像。其他诸陵的石刻数量减少，个体变小。唐代帝陵石刻比较独特，对后世也有深刻的影响。

帝陵之外，还有太子陵和“号墓为陵”的大墓。唐高宗和武则天之子、太子李弘葬于河南省偃师县，“墓号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坐北朝南，神墙四面开门，门外立石狮一对，四角有角阙。南门外神道两侧还有石人、石碑、石马、石望柱。覆斗形陵台封土的东北 50 米还有一方锥形土冢，应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sup>[8]</sup>。陵园布局与武则天之母杨氏顺陵相似，神道石刻比乾陵缺少鸵鸟、马和控马者、蕃臣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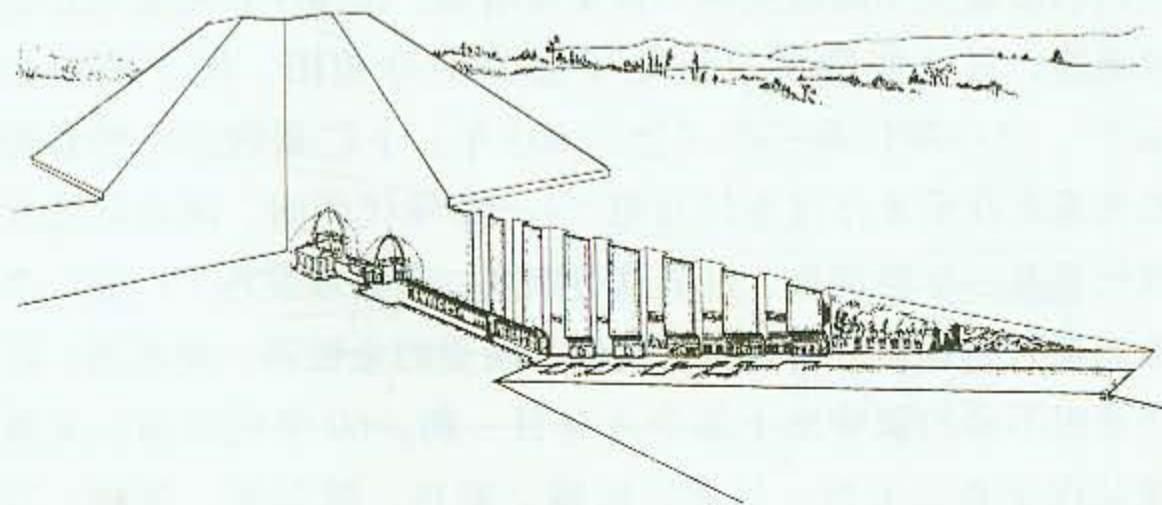
惠昭太子和惠庄太子陵经过发掘<sup>[9]</sup>。临潼惠昭太子陵，玄宫单室，长 4.8 米，宽 4.6 米，砖砌，青石铺底，墓有石墓门、石棺床。墓道和墓室原有壁画。出土铜、铁、陶、三彩、石、玉各类文物 180 件，大都残破，其中有 195 块册文和哀册，哀册残存 428 字。惠庄太子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 年）葬。封土四周有城墙、角楼和门阙，陵前有石狮一对。玄宫为单室砖砌，长斜坡墓道，三天井、三过洞、六小龕。出土俑和动物模型 1104 个，包括镇墓兽、骑马俑、风帽立俑、小冠立俑、幞头立俑、笼冠立俑、女立俑、牛、猪、狗、羊、鸡、鸚鵡。还有铜泡、铜片饰、陶瓷器、石器，另有 27 枚汉白玉哀册，其上所刻文字填金。

“号墓为陵”的墓发掘了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和永泰公主李

仙蕙墓（图六）两座，为大型双室砖墓。墓葬全长约 100 米，主室边长超过 5 米，有六七个天井、六至八个小龕，有石墓门。以石椁为葬具。随葬品 1000 多件，其中俑在 1000 件左右。李重润墓出土大理石哀册 11 片。章怀太子李贤墓（图七）虽未有“号墓为陵”之称，但是规模宏大，全长 71 米，随葬品 600 多件<sup>[10]</sup>。三墓的形制、壁画内容、陵园布局反映唐代皇室墓葬制度<sup>[11]</sup>。更引人瞩目的是，三墓都是改葬墓，墓主



图六 唐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平、剖面图



图七 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剖面图

人原是被武则天陷害致死，唐中宗复位以后昭雪。三墓在已知唐代墓葬中规模最大，它们的出现是宫廷斗争的产物。

唐代帝陵有陪葬墓制度，宗室、重要将相和功臣们都以陪葬帝陵为荣。李渊献陵和李世民昭陵的陪葬墓最多，高宗李治乾陵、中宗李显定陵、睿宗李旦桥陵次之，中晚唐的陵的陪葬墓甚少，有的没有。诸陵的陪葬墓多为见于史籍的唐代著名人物，许多在墓前立碑、列石刻。昭陵的陪葬墓考古调查有 167 座<sup>[12]</sup>，现已发掘 20 余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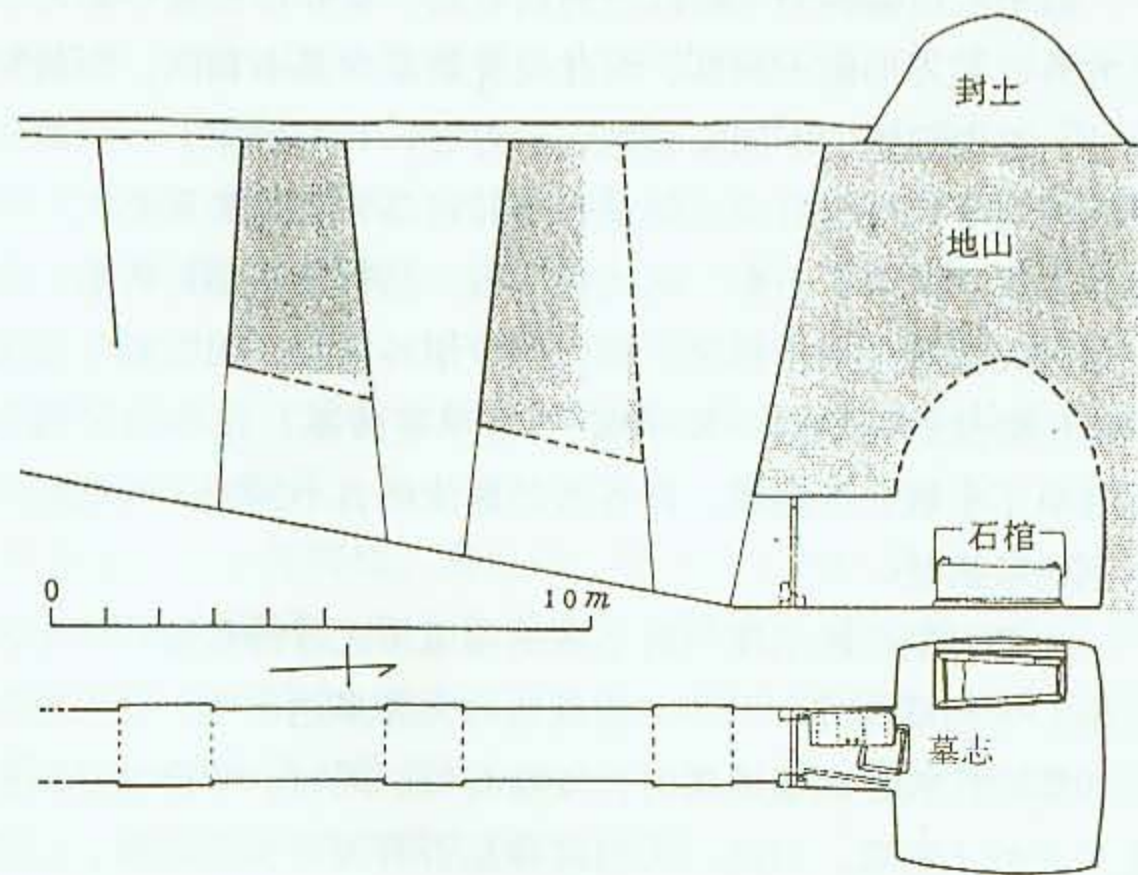
## （二）承前启后的隋代墓葬

改朝换代，在历史学上无疑是重大事件，但考古学研究中，物质文化的整体面貌很少在新朝代诞生时突然变化，也并不因旧王朝灭亡而遽然消失。隋朝立国仅 39 年，这个短暂的王朝在墓葬上似乎并无明显的特征，有些和北朝晚期相仿，有些与唐朝初年近似，是一个过渡性的时期。

最初知道隋墓大约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当时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发掘中陆续发现一百多座隋墓。由于工作的重点是殷商遗迹，对这些隋墓只绘制了墓葬的分布图，做了简单记录<sup>[13]</sup>，其中隋仁寿三年（公元 603 年）卜仁墓内出土的青瓷器和墓志在后来作过专门介绍<sup>[14]</sup>。50 年代河南、陕西陆续发现张盛墓、李静训墓、姬威墓等隋墓，张盛墓发现了白瓷，李静训墓有石椁、青白瓷器、铜器和精美的金银器、玻璃器。这些意想不到的豪华出土品令人耳目一新。60 年代以后，又陆续发现李和、宋忻、吕武、段威、罗达、独孤罗、李椿、郑平、宋循、吕武、王干、田德元等人的纪年墓，洛阳、安阳和

湖南、湖北地区还发掘许多小型墓。隋墓发现的地点虽广泛，但较多是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大体以淮河为界，显示出隋墓的南北差异。大量墓葬的发现，又可以分出不同的墓葬类型，而且隋墓的发展演变也有迹象可寻<sup>[15]</sup>。以往隋代遗物的精美程度被估计过低，其在很多手工业种类的发展中的作用尚未被认识，墓葬出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器物 and 反映的成就，逐渐引起专门的探索。

北方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隋墓是李静训墓、李和墓（图八）、段威墓<sup>[16]</sup>，三座墓都有石棺或石椁作为葬具。李静训“未登弄玉之台，便悲泽兰之夭”，死时年仅 9 岁，墓葬如此豪华，与她的家族数代高官、并有皇室血统有关。李静训的曾祖父辈有北周、隋代高官李穆、李贤，父为李敏，史书中均立



图八 隋李和墓平、剖面图



传。李静训外祖母是隋文帝长女杨丽华，周宣帝皇后。李和官职为司徒公、徐州刺史、德广郡开国公，为正一品官。他的墓室约4米见方，有石墓门、石棺。墓葬地上还有石羊一对。段威为北周开府仪同三司，相当于正一品。其次是姬威墓、独孤罗墓和李椿墓<sup>[17]</sup>。姬威是“隋使持节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右卫率备身将军司农卿龙泉敦煌二郡太守汾源良公”，职事官是正三品，散官为从二品。独孤罗是“隋使持节大将军凉州总管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赵国公”，李椿是“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河东郡开国公”，地位相似。独孤罗墓有石棺床，李椿墓有石墓门。再次是李敬族墓、宋忻墓、罗达墓<sup>[18]</sup>。李敬族职事官是正三品，但散官为正四品，比上一组墓葬的墓主人地位略低。这组墓葬没有石棺床、石门。

以上三组墓葬为三品以上的高官墓，墓葬形制基本都是平面方形、长方形的土洞墓，与北朝晚期墓葬基本相同。而墓室尺寸、墓内设施的不同安排则表示等级，有石棺床、石门而无石棺椁与等级身份有关，但是否用砖建墓与等级关系不大。砖室墓发现于河南、山东、河北和山西，品官几乎都是砖墓，西安地区无论墓主地位如何，隋代极少用砖室墓，而发现于安阳的地位略低的张盛墓、郑平墓<sup>[19]</sup>为单室砖墓。这些地区较多地继承了东魏北齐制度，因各人的地位略有不同而出现的墓葬区别比较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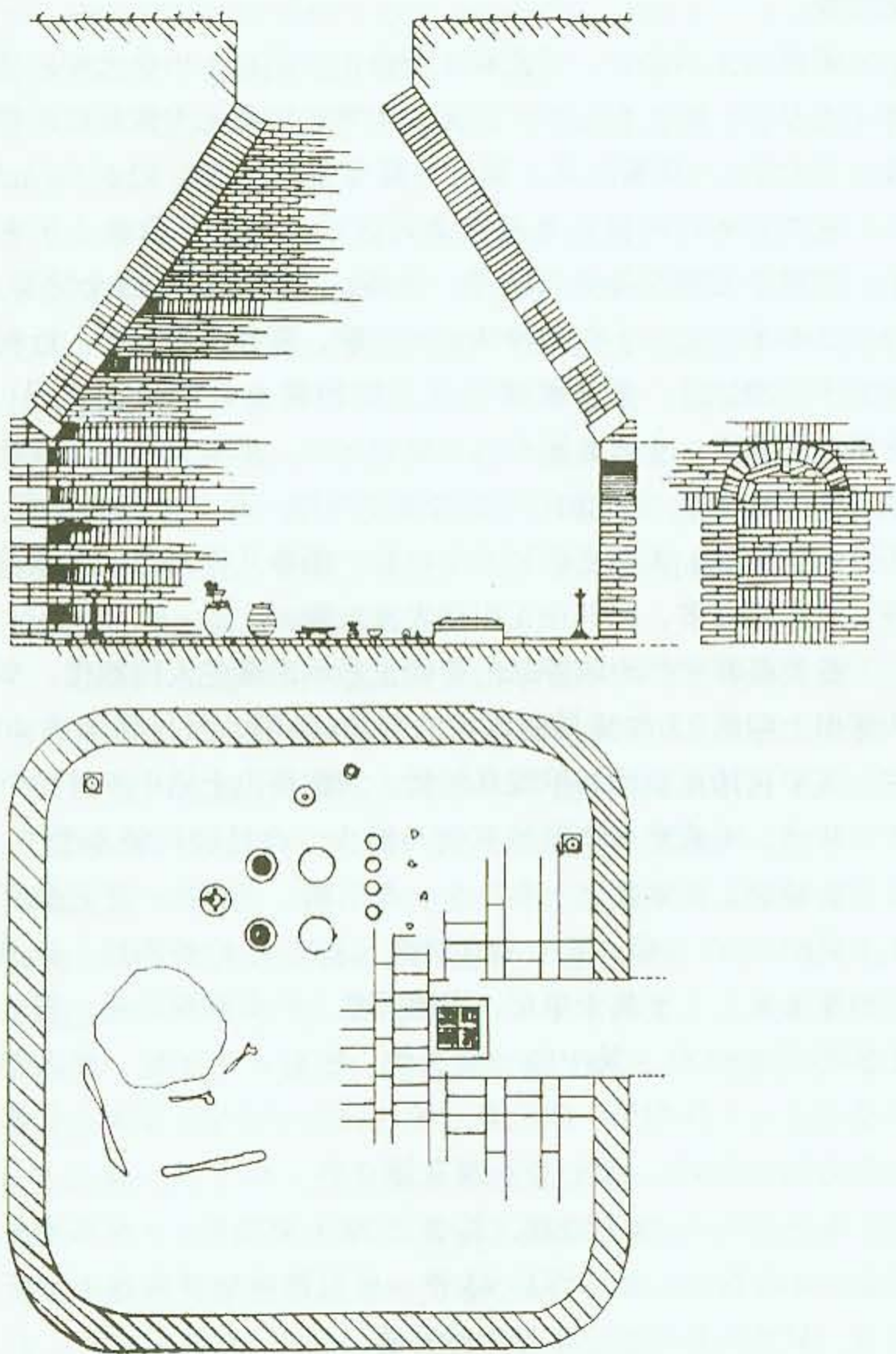
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但尚不多的墓道带天井的墓隋代开始多起来。李和墓有五个天井，姬威墓的天井多达七个，这可能与李和墓时代较早而姬威墓时代较晚有关。同时，李静训墓则是无天井的土洞墓，因此，大型墓葬是否有天井也无定制。长墓道、多天井的墓出现在北魏时期，唐代最盛，隋代正是作为过

渡时期。

宋循为正四品官，吕武和王干为正五品官，田德元和冯淹为正七品官。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田德元为豫章郡西曹掾（正七品），其墓也是土洞墓，墓室呈斜方形，边长约2.5米。这类墓的共同特征是墓室多近方形，边长一般在3米左右。刘世恭为隋左备身府骁果，无品，其墓为斜方形土洞墓，边长2.6米左右。卜仁和梅渊也无官职，墓葬为斜方形、近椭圆形<sup>[20]</sup>（图九）。安阳殷墟先后发掘的隋墓都是土洞墓<sup>[21]</sup>，有墓室和墓道，少数有短甬道，墓道向南。墓室为拱顶和穹隆顶，多数有木棺。墓道有斜坡和竖井两种。有少量陶俑随葬。还有一些简陋、无墓道的竖穴土坑墓，随葬几件陶器、五铢钱等。这类墓很多，尤其在安阳有大量发现。

各类墓葬中作为随葬品的陶俑也显示出墓主人的地位。李和墓出土包括27件骑马俑在内的约80件俑，仪仗俑多达40件，其中包括女骑俑和甲骑具装俑。宋忻墓出土俑中5件为甲骑具装俑。姬威墓和李敬族墓骑马俑少，而且骑马俑不带甲，没有女骑俑。张盛墓出土有牛车、女乐俑、侍吏俑。正五品官王干墓出土37件俑，正七品官田德元墓出土40件陶俑。从俑的种类来看，王干墓无牛车，田德元墓无牛车和骑马俑。梅元庄墓随葬俑57件，其中骑马俑3件，还有3个车轮。庶人刘世恭墓出土4件陶俑。隋仁寿三年（公元603年）安阳卜仁墓中没有俑类随葬，出土青瓷四系罐2件、杯2件、高足盘1件。安阳发现的29座隋墓，其中28座未被盗掘，9座墓不见墓志，却有陶俑，最多可达43件。可见隋墓随葬陶俑不限于品官，只是骑马俑似乎多见于品官墓。

《隋书·礼仪志》载：“其丧纪上自王公，下逮庶人，著令



图九 隋梅渊墓平、剖面图

皆为定制，无相差越。”<sup>[22]</sup>作为古代社会礼仪之一的丧葬制度，隋王朝建立之后的新规定，在墓葬形制、尺寸、墓内设施、随葬品内容和数量上有所体现，显示出与墓主人生前地位的密切关系。隋唐官制分职、散、爵、勋。散官无实职却表明地位，职事官握有实权，爵、勋因功而授，只要在外驻作镇官，一般都加使持节头衔，即赋予特权。这些头衔对其死后的埋葬规模都有影响。《隋书·礼仪志》中记载，开皇初太常卿牛弘撰仪礼百卷颁行天下，送葬时的轺车以“三品已上”、“七品已上”、“八品已下达于庶人”作为等级分界的标准。诸重则以“一品”、“五品已上”、“六品已下”为等级分界的标准。执紼以“一品”、“三品已上”、“四品”为等级分界的标准。此外还有其他规定。虽然比较细致，但大的等级的界限却较为模糊，带有初创的痕迹，并不十分规范。没有形成唐代品官中比较整齐的等级界限。但总体说来，三品以上、七品以上、八品以下达于庶人是最重要的等级的划分界限。

北方地区高级贵族墓葬有的饰以壁画，但目前发现的壁画保存较好的墓葬不在西安、洛阳地区。山东嘉祥有徐敏行墓、徐之范墓。徐敏行墓顶绘天象图，月亮中有玉兔捣药。北壁绘以山水屏风为背景的“宴饮行乐图”，墓主人夫妇正襟端坐于木榻上，手中各执一高足透明杯，饮酒观赏歌舞。西壁绘男主人骑马仪仗出行图，依次有马，携乐器、伞、扇等的仪仗者和马。东壁为“夫人出游图”，最前面是四女执宫灯前导，随后为帷屏牛车，应是女主人乘坐的安车，由四侍从护卫前行，车后为四个女侍捧巾等器物，最后为饲犬人和双犬。南壁墓门左右绘持剑武士。门洞内绘小吏和奴仆。门洞外东西壁绘守门人。徐之范墓墓门两侧有仗刀石门吏<sup>[23]</sup>。宁夏固原隋大业六

年(公元610年)史射勿墓为二天井二小龕单室土洞墓,墓道、过洞、天井两壁绘仗刀武士、执笏武士、执笏侍者的单体人像,第一过洞入口处上方绘门楼或莲花。墓室内表现家庭生活,仅西壁存一幅侍女图,是五人群像图<sup>[24]</sup>。壁画是在生土墙壁上涂白灰浆,然后作画。

徐敏行墓、徐之范墓是椭圆形砖砌单墓室,应渊源自南朝的做法。两墓墓门左右绘持剑武士有北周风格。徐敏行墓所出武士俑、镇墓兽、骑马武士俑、陶马等均承北齐样式。但徐之范墓的甬道一侧有壁龕放置相同的“石门吏”,比较特殊,不见于其他隋墓,也不见于北朝和唐代墓。

北方地区隋墓的随葬器物有特定的摆放方式,田德元墓的铜镜、瓷盂、瓷瓶、瓷砚、木剑玉珩在头骨附近,三个瓷罐在墓室东部,陶俑在西南角,墓志、镇墓兽、镇墓俑在甬道口。安阳市梅元庄隋墓,数十件陶俑集中堆放在墓室北端,排列整齐,瓷器放在墓室中央,紧靠棺床。安阳市安阳桥隋墓,四角分置瓷坛一个,瓷殿宇建筑模型置于墓主头部左侧,瓷砚、瓷围棋子置于墓主身侧,瓷靴、履各一双放于墓主脚后,两个瓷烛台分放墓室中央两侧,瓷罐、壶、瓶、豆、盒、杯、碗、盆、葫芦形器等数十件瓷器集中放在墓主左前方的墓室中央,一套厨房明器瓷碾、碓、磨、井栏等置于甬道口两侧(墓室前)的角部,镇墓兽、武士俑置于墓室前近甬道口处,骆驼、陶俑置于墓室东侧,牛车、猪、羊犬、鸡放于甬道口及墓室西南角。安阳发掘的一些小型隋墓,尸体置于墓室北半部或西侧,随葬品中的铜镜、铁剪、钱币在棺内,其他器物放在木棺外,有俑的将俑放在墓门口。

陶瓷器的种类主要有双系螭把鸡首壶、螭首双把双身壶、

罐、四系罐、双耳扁瓶、盂、瓶、碗、高足杯、盅、辟雍砚、象首壶、贴花兽环壶、围棋盘等。其中有一些精美的白瓷器是中国较早的白瓷器物群。李静训墓出土六件白瓷,史射勿、李椿、姬威、田德元、王干的墓也有发现,这些纪年墓证明了隋代白瓷的盛行。白瓷火候高,胎质白,釉色晶莹,开片均匀,制作精美。安阳张盛墓的白瓷俑和镇墓兽有高达75厘米和50厘米的。出土白瓷的墓葬墓主人均为当时地位很高的人物,安阳发掘的一些小型隋墓,较普遍地出土了瓷器,但均为青瓷。说明白瓷在隋代十分珍贵,使用者为上层社会。

与北朝时期相似,隋代甲骑具装俑仍然较多,其他陶俑的制作自由而丰富。如富有生活气息的磨粉、打水、烧火俑等在北朝和后来的唐代虽然也有,但最流行于隋代。张盛墓的僧人俑,安阳市安阳桥隋墓两手抱膝俯首于上的蹲坐睡觉俑,在唐代也未曾见到。丰宁公主与韦圆照合葬墓出土的一件女俑也较罕见,其特征是身体光秃,无臂,但在肩部有圆孔,是为插臂而用<sup>[25]</sup>。表面看来这件俑制作较简陋、粗糙,但原本应非常华丽,是在基本形态基础上,再装饰丝织类的服饰,不过如今腐朽无存了。隋代的俑类简朴严整,比例均匀,但隋初陶俑呆板,为北朝晚期风格的延续。大业年间基本摆脱了北朝的呆板遗风,出现生动之气。总体说来,隋代陶俑没来得及彻底将不同源流融合成新的样式。

都城所在地的西安地区,隋代前期俑的种类和样式多与北周相似。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李和墓的圆平顶风帽男俑、圆平顶风帽骑马男俑、甲骑具装俑等完全是北周晚期的样式,小冠侍立俑、笼冠男侍俑、袒右肩男侍俑、尖圆顶风帽男俑、圆领长袍男俑、女侍俑、甲士骑马俑、武士俑等都依北齐

样式。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吕武墓<sup>[26]</sup>的俑以北周晚期的样式为主，有的融入北齐风格。北周陶俑的部分风格在东部出现，例如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安阳张盛墓所出瓷侍吏俑，双手抬至胸前仗刀，这种俑类样式应是来自关陇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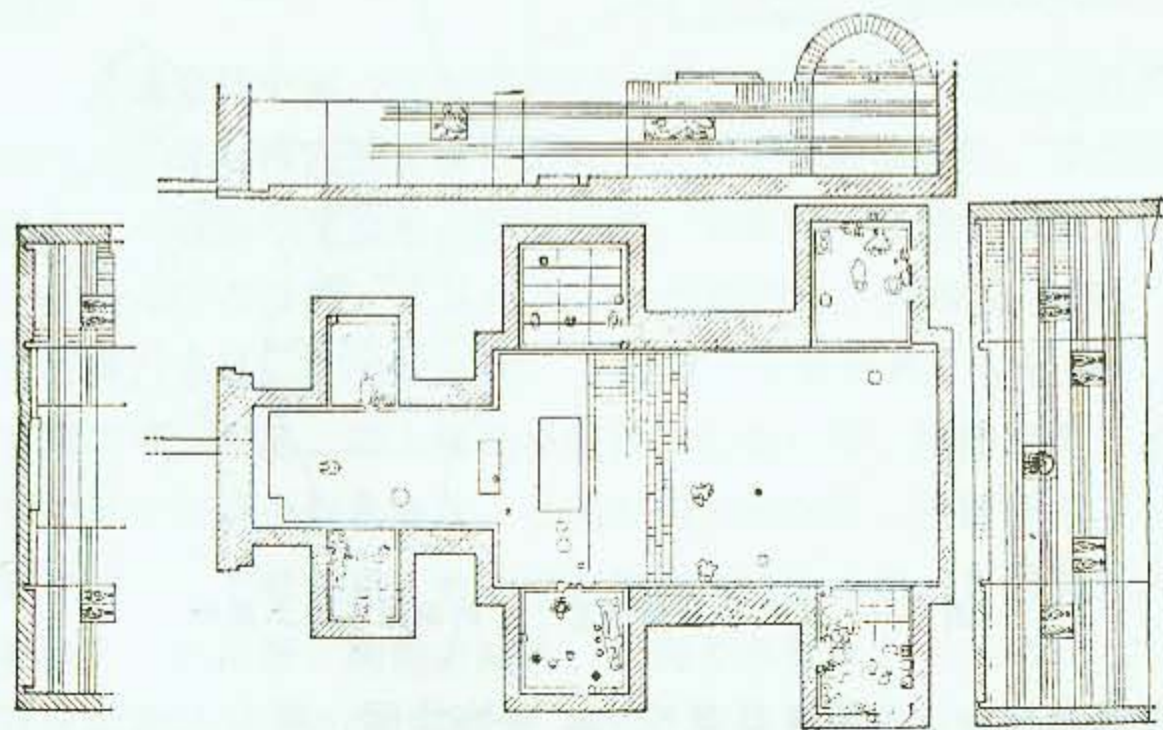
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静训墓，文官俑有些背部较扁平，是继承着北周陶俑的特点，但武士俑、镇墓兽、低髻女侍俑等前所未见。丰宁公主（大业六年卒）与驸马韦圆照（武德六年卒）在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合葬<sup>[27]</sup>，随葬的陶俑几乎没有北周陶俑的风格，只剩对北齐风格的承袭。安阳地区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宋循墓、梅元庄隋代后期墓<sup>[28]</sup>，所出各类陶俑均继承了北齐的样式。太原地区的隋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斛律彻墓<sup>[29]</sup>，陶俑与当地的北齐娄睿墓同类俑很近似。可见开皇年间，北周和北齐样式并存。到隋代后期，东魏北齐地区的陶俑样式占主流，并逐渐进入到关中地区。在西北原州地区直到隋代后期仍流行着北周样式。山东隋墓形制、壁画、俑更夹杂着北周、北齐甚至南朝遗风，正如隋人裴正称宇文政权“舆辇衣冠甚多迂怪”一样<sup>[30]</sup>。隋墓的形制、壁画、俑尽管有些杂乱，但继承北朝余绪、开创唐代新风的特点仍可看到，隋墓过渡性的特色正在于它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南北两大系统的区分在隋墓中得到体现。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陈，完成了南北政治的统一，“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sup>[31]</sup>。尽管极力倡导文化的南北融合，并采取有力的措施，但政治礼仪虽可以混同南北，地域文化对墓葬传统影响很难改变，加之地理环境不同，墓葬的整体面貌依然南北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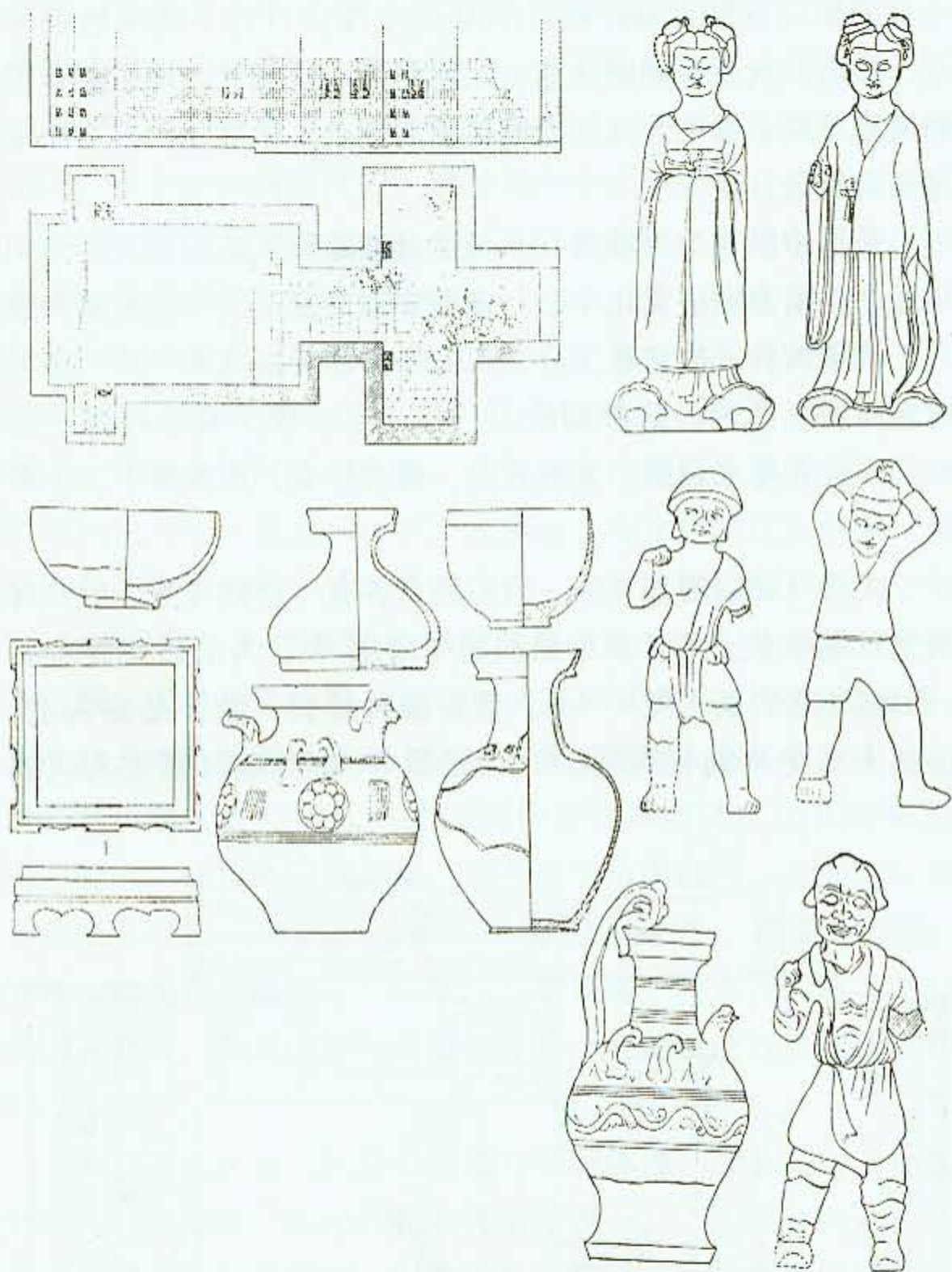
以淮河为界的南方地区隋墓是先按设计的平面从地面下挖，然后从坑底开始砌造墓室、甬道等，这与北方地区流行的洞室墓不同。在南方地区南朝传统的“凸”字形、长方形砖室墓最为流行。

长江中游与中原接壤，直接通过陆路和水路与西安、洛阳相通，是南方经济文化中心，墓葬形制最复杂。有砖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种。砖室墓又分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和“凸”字形砖室券顶墓两种。墓壁砌法为三顺一丁，极少有单砖顺平砌的。多设有排水设施。大都设龕，或为灯龕，或放置十二生肖俑。

武昌马房山隋墓（图一〇）前室各有一对称耳室，后室有两个对称耳室。武汉市东湖岳家嘴隋墓<sup>[32]</sup>，为前后室并各有一对称耳室的墓（图一一）。墓壁嵌画像砖，随葬品在前室，包括十二生肖俑和陶马、陶牛、瓷器等。南方地区墓主人明确



图一〇 武昌马房山隋墓平、剖面图



图一一 武汉岳家嘴隋墓平、剖面图及出土器物

的墓葬极少，这两座墓规模大，装饰华丽，墓主人地位应较高。长方形砖室墓还有单室和双室之分，有的设小龕<sup>[33]</sup>。

“凸”字形砖墓也分单室和双室<sup>[34]</sup>。这类墓是南朝墓葬形制的延续，有的规模较大，有的墓壁用模印花纹砖砌成，装饰讲究，随葬器物丰富。竖穴土坑墓平面呈长方形或梯形<sup>[35]</sup>。

长江中游隋墓陶瓷俑和动物雕塑的数量急剧增加，与北方使用彩绘不同，衣纹和面目的装饰采用刻画的方法。类别有镇墓兽、十二生肖俑、男俑、女俑等。马房山墓为隋初墓葬，岳家嘴墓约在大业年间，尽管两墓的俑类相同，前者出土的镇墓兽脊背有鬃毛，周身有鳞片，恰似南朝和唐代镇墓兽之间的过渡，后者出土的女俑、陶马与北方隋墓和唐代同类出土品相近。本地区还流行十二生肖俑。湖南湘阴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墓的墓壁有十二个小龕，置十二生肖俑。十二生肖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生肖的后足踏在人的肩部，前足攀在俑的帽檐上。另一种是人身生肖，身首分开烧造，生肖的颈插入俑身。还有动物类的马和骆驼及模型明器车等。陶马有的鞍辔俱全。陶牛与北方的不同。

男俑有侍吏俑，有的戴梁冠，宽衣博带，拱手侍立。有的戴高冠，穿对襟大袖长服，露长裤，双手于胸前握杖。有的戴幞头，身着圆领窄袖袍，腰间博带，尖头靴。有的头束巾，前后打结，短衣长裤，叉足而立。有的戴围巾，两端交于脑后，短衣裤，赤足。有的戴圆帽，上身裸，下着短裤，左肩搭巾，贯腰兜裆，赤足。胡人俑高鼻深目，上着长衫，袒胸束腰，足穿深筒靴，举手作牵物状。女俑有的头梳双髻，垂鬟至耳，上穿宽袖衫，下着长裙；有的穿宽袖短衣内束长裙；有的头顶发髻盘环，着裙服，胸前束博带，双脚着草鞋。

随葬器物有瓷器、陶器、铜镜、铜钱等，个别墓有少量铁器和金银玉石料器。青瓷器常见有盘口壶、唾壶、长颈瓶、高

足盘、四系壶、杯、盂、瓷砚、几、灯台、瓷炉等。模型明器有陶臼、陶磨、陶灶等。盘口壶、龙头形柄、鸡首壶、带盘三足器、带盘五足器为本地特色器物。有些器物上饰有重弦纹、团花和直方块纹，多是戳印而成。

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地区也有砖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种墓葬。砖室墓分为长方形墓、并列长方形双室墓、腰鼓形墓、“凸”字形单室墓，还有“凸”字形前、中、后三室墓<sup>[36]</sup>。有的墓南北壁各有空出半砖位置的灯龕两个，有的墓转角为圆角。竖穴土坑墓平面呈梯形。墓砖纹饰常见宝相纹、钱纹、鱼纹、几何纹等。随葬器物在砖室墓多置于甬道和棺床上，土坑墓中均置于棺头外面。种类有青瓷器、陶器、铜器、铜钱和银钗等。青瓷器主要有盘口壶、罐、碗等，其中以盘口壶和碗最为常见。双唇罐比较有特色。还有陶动物模型、模型明器以及陶俑等。

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隋墓发现不多。有长方形纵列砖室墓<sup>[37]</sup>，分为甬道、前室、棺室三部分。前室、棺室左右各有对称壁龕两个。墓砖的花纹图案为草茎纹、几何纹、花瓣纹等。随葬器物有青瓷碗、双耳灰陶罐、黑褐色小陶盏、铜器和铜钱等。

赣江地区有砖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种。砖室墓有长条形前后室砖室墓和长条形单券前、中、后三室墓<sup>[38]</sup>。砖室墓砖柱的设置较为普遍，似非单纯为加固之用，或许表现一种多院落的墓葬形制。砖室墓中出铭文砖较多，花纹砖少见，花纹砖是在砖两侧装饰鱼纹和钱纹，也有网纹、莲花纹、团花纹、羽状纹等。随葬器物均为青瓷器，有盘口壶、四系罐、唾壶、碗、钵、高足杯、砚、灶、五盅盘、两盅盘、双盘四足器等。器体

比较厚重。

岭南地区目前发现的均为砖室墓<sup>[39]</sup>，一般都设有小龕，或凸出半块砖以置灯盏。墓砖纹饰以叶脉纹最为常见，其他有水波、几案、圆弧、花草、曲折纹等。双室墓有的左右并列，有的平面呈“中”字形。

随葬品多摆放在前端或前室，后室的棺床后端也有一小部分。随葬品主要是青瓷器，或有铜钱、少量铜器、琉璃、玉器、金质指环、银质指环等。有的还有砚台、滑石猪等。青瓷器常见四系罐、六系罐、碗、钵，还有杯、盂、碟、唾壶、提梁壶等。提梁壶造型特殊，具有浓重的地方特色。

福建地区发现的隋墓极少，南安丰州的一座隋墓<sup>[40]</sup>，为平面呈刀形的砖墓，后壁设一小龕。随葬器物多排在墓室前端靠右壁的地方，均为瓷器。有双耳罐、六耳罐、钵、单管插、四管插、小瓶、虎子、博山炉、镢斗、浅圆盘各一，带盘小杯二，碗四。其中双耳罐、单管插、四管插、博山炉、虎子等为其他地区少见或不见。

### (三) 两京模式与分期、类型

魏晋以来北方地区放弃了东汉流行的多室墓，开始使用简化的方形或长方形单室墓葬，十六国时期一度混乱，北朝又有所恢复。中原和关中不同，南方与北方差别更大，但方形或长方形单室墓逐渐成为主流，而且出现一些如天井、小龕等新的结构。隋代统一为各地间的融合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没能完成彻底转变，在经过一番整合之后，为唐代墓葬形制的规范创造了条件。

唐代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和洛阳地区，最先形成新的墓葬模式，无论皇室贵戚或一般官吏及平民百姓，都使用平面看上去比较整齐划一的方形或长方形单室墓葬。基本结构是墓道、过洞、天井、小龕、墓门、甬道、墓室<sup>[41]</sup>。各类墓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规模尺寸的大小以及天井、小龕的数量和有无方面，双室和其他形制的墓葬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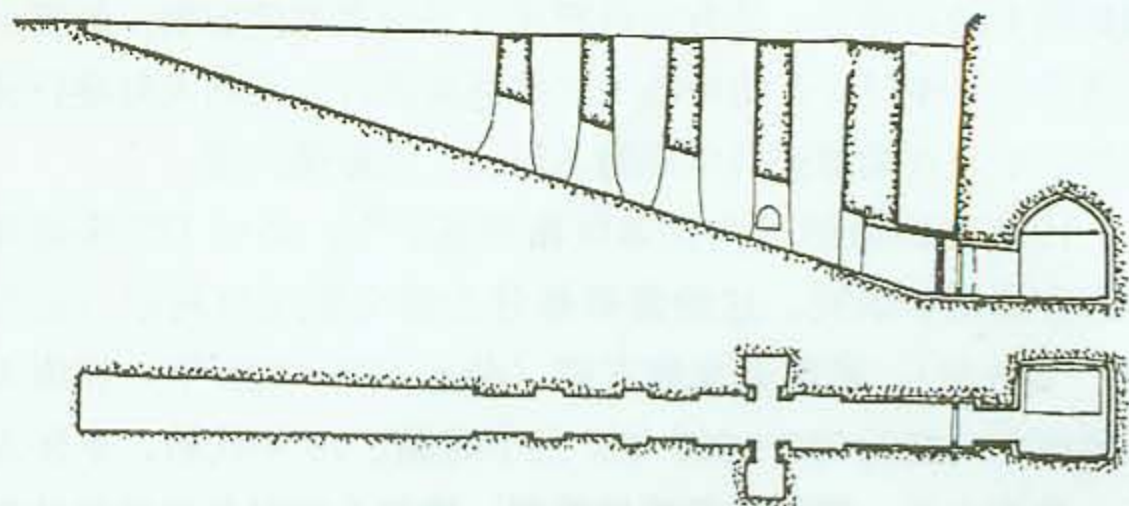
划分唐代墓葬的类型，主要以墓葬平面形状、建筑质料、尺寸、墓内设施、随葬品数量为依据，可归纳出双室砖墓、双室土洞墓、单室方形砖墓、单室方形土洞墓、单室方形或长方形土洞墓、“刀形”土洞墓等不同的类型。分类的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的墓葬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不同的埋葬时间关系密切，反映出唐代墓葬由多层阶梯构成，皇室贵戚、品官直至下层平民各有等差，墓主人的地位决定所用墓葬的类型，丧葬礼仪的核心是等级制度。

唐墓及其出土物在20世纪30年代时有发现，不过只是简单的报道见诸报端，没有详细资料<sup>[42]</sup>。1948年陕西长安县神禾原贾里村发现葬于唐大中四年（公元850年）的裴氏小娘子墓，有一方墓志，48件陶俑。裴氏小娘子之父是河中解梁县令，六世祖为威震西域的裴行俭，墓中陶俑是9世纪中叶精美的代表作。出土遗物几经转手，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sup>[43]</sup>。40年代在敦煌发掘了唐墓，出土陶俑<sup>[44]</sup>。到50年代，正式发掘的唐墓大量增加，见于报道的大型墓有不少是墓主人身份明确的纪年墓葬，西安郊区发掘的小型唐墓更多。其中韦洞、杨思勗墓有雕刻精美的石椁，独孤思贞、独孤思敬、鲜于庭海墓出土华丽的三彩俑，李爽墓有色彩浓郁的壁画，在当时都是罕见的发现。这些墓葬使人们认识到唐初墓葬的天井、小龕及个别

雕刻精美的石葬具、绘有彩色壁画等是沿袭北朝旧制，新特点则是贵族墓中以牛车为中心的仪仗俑群流行，武则天时盛行骑马俑，牛车逐渐被披饰华丽的马取代，三彩俑兴盛。

1966年出版的《西安郊区隋唐墓》<sup>[45]</sup>，是对175座墓葬的综合报道和研究，这些墓葬被分为隋文帝至唐高宗（公元581~683年）、武则天至唐玄宗（公元684~755年）和唐肃宗至唐亡（公元756~907年）三个时期。70年代初，章怀太子、懿德太子、郑仁泰等墓的发掘，使得人们对各种类型的墓葬认识得更为全面，其他一些年代清楚、墓主人身份明确的墓和大量中小唐墓，为西安地区唐墓的分类、分期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80年代初又出现了七期、四期等的分期<sup>[46]</sup>。这些分期虽然反映出研究者对隋唐墓认识不同，但没有根本区别，至少在确定年代、找出演变规律上可以达到共识。应该说，高祖、太宗时期，高宗、武则天时期，中宗至玄宗时期，肃宗至德宗时期，顺宗以后，这是几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如果从宏观上观察，“安史之乱”是唐朝前后有别的一个大的分界线。“安史之乱”使繁复的礼仪方式不再为人们重视，墓葬的建造和随葬品的选择上发生很大的变化，原有的丧葬制度大都废弃，几乎所有的遗迹遗物都出现时代性的转折。唐墓的发掘不断，分期分类还在继续，根据西安地区的几千座墓葬做出的综合研究已将主要墓葬进行了梳理<sup>[47]</sup>。

属于高祖、太宗时期的主要墓葬有李寿、贺若氏、窦皦、段元哲、独孤开远、杨恭仁、长乐公主、司马睿、苏永安、董僧利等人的墓。李寿官居司空、上柱国、淮安靖王，墓葬使用方形砖室墓（图一二），墓室边长接近4米，五个天井，两个小龕，以精美的石椁为葬具，随葬包括骑马俑在内的大量陶



图一二 唐李寿墓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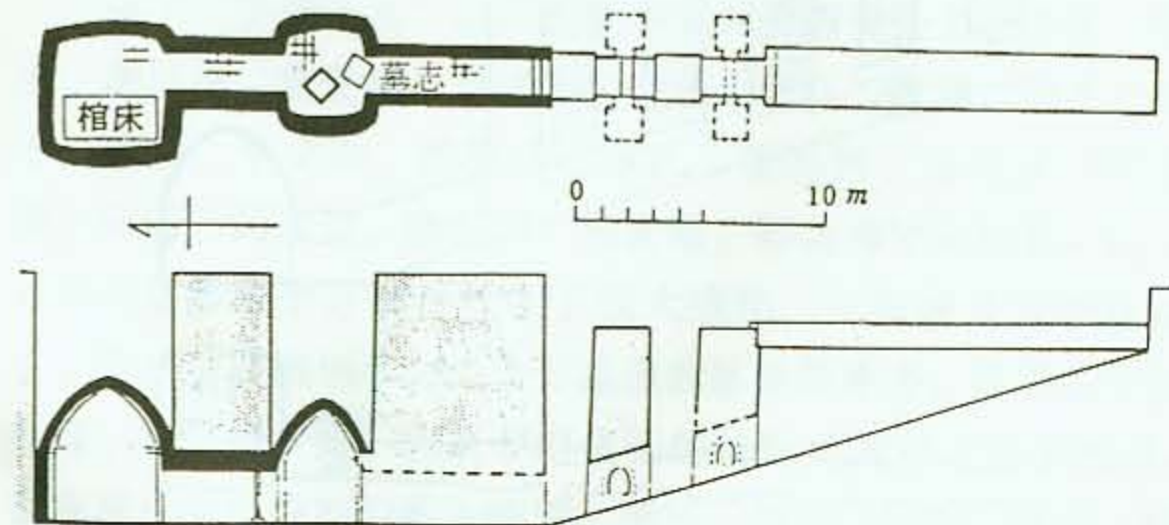
俑，其中还有彩绘贴金甲马俑。李寿既是皇室成员，又是开国元勋，死后以“特加常等”的礼仪埋葬。独孤开远墓为方形土洞墓，随葬品中有骑马俑，大约代表一至三品官吏的墓葬。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的墓均为土洞墓。保存较好的司马睿墓，随葬品中约有150件俑，其中包括约30件骑马俑。这三座墓代表了四至九品官吏的墓葬。庶人墓多是长方形土洞墓，墓室的长边在3米左右或更短一些，一般无天井、小龕。随葬品以陶瓷器为主，仅有个别墓有少量陶俑。

在李唐政权中，“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高士廉等人重修《氏族志》，唐太宗明确提出“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唐高宗又进一步修订《氏族志》，改名为《姓氏录》，强调“以仕唐官至五品皆升士流”和“各依品位高下叙之”。唐取代隋后依靠出身各异的人进行统治，新获得地位的官僚被看重，自然要求在制度上对原有的氏族和等级进行重新规范。作为礼仪制度表现形式的墓葬，必须严格遵守新的等级制度。唐初墓葬发现不多，但可

明显看出墓葬等级是以官品和功劳区分的。不过在草创时期，墓葬本身的形制还保留着一些隋墓的特点。独孤开远官为左卫将军考城公；贺若氏为隋赵国公独孤罗之妇，独孤罗是唐高祖李渊之大舅，他的七妹又是隋文帝的皇后；窦皦也贵为皇亲国戚，为李唐得天下立下战功，授勋上柱国。但三座墓都用土洞墓，与隋代同地位的人相同，而与以后的唐墓不同。

高宗至玄宗时期的墓葬主要有张士贵、尉迟敬德、郑仁泰、刘宝、苏定方、李爽、牛弘满、李凤、阿史那忠、李孟姜、李谨行、薛元超、安元寿、房陵大长公主、新城长公主、郭皓、独孤思贞、杨氏、任氏、韦洞、韦洵、韦君夫人、郭恒、独孤思敬、薛氏、金乡县主、李仁、李贞、鲜于庭海、段简璧、执失奉节、李震、程知节、韦贵妃、李勣、燕妃、元师奖、吴守忠、韦美美、杨思勰、苏思勰、宋氏、契苾夫人、薛莫、冯君衡、张去奢、张去逸、张仲晖、高元珪等人的墓以及临潼关山唐墓、中堡村唐墓、王家坟唐墓等。

尉迟敬德、郑仁泰、韦洞、韦洵、薛氏的墓是双室砖墓。尉迟敬德墓和郑仁泰墓全长50余米。韦洞墓（图一三）和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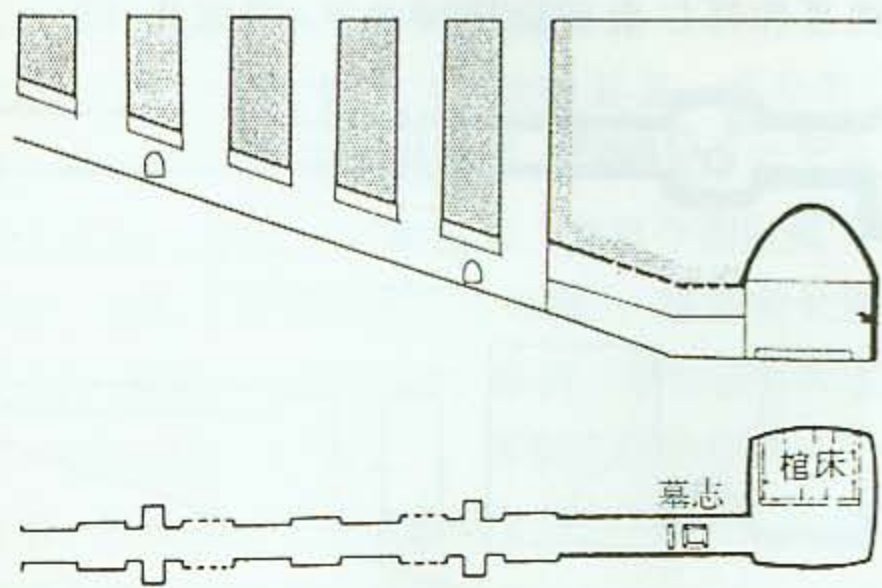
图一三 唐韦洞墓平、剖面图



氏墓全长40米左右。这类墓天井一般四个以上，小龕四至六个，有石墓门，墓具用石槨、石或砖棺床。随葬品500件左右，包括100件以上的骑马俑。墓主人为一、二品的高官或有特殊的功勋、势力的贵族。

杨思勗、李凤、张士贵、李爽、苏思勗的墓，均为单室砖墓。这类墓的墓葬总长20~70米，一般为40米。墓室边长4米以上，少数墓不足4米。天井四个左右，小龕四至六个，个别墓的小龕稍多。有石墓门，多用石、砖棺床。随葬品不超过500件，俑在300件左右，骑马俑一般不超过100件。这类墓的墓主人都是一、二、三品官吏。杨思勗墓为单室砖墓，墓室边长5.7米，葬具采用石槨，还出土两件石刻武士和一百多件高达0.5~1米的大俑。李凤墓和张士贵墓（图一四）有石棺床。李爽墓和苏思勗墓墓室尺寸较小，只用砖棺床。

独孤思贞、独孤思敬和宋氏的墓为单室方形土洞墓。墓葬总长20~30米，墓室边长不超过4米。天井一般不超过四个，小龕多为两个。石墓门、石棺床比较少。只有宋氏墓有石棺



图一四 唐张士贵墓平、剖面图

床。随葬品100件以上，俑很少超过100件，骑马俑30件以下。这类墓的墓主人四、五品官吏。

中小型墓的一种为单室方形土洞墓，边长3米左右。小龕不多见。无石墓门、石葬具。随葬品60件左右，俑40件左右，包括10件以下的骑马俑。这一等级的墓主人六至九品的官吏。还有单室长方形土洞墓，墓葬全长一般在10米左右。“刀形墓”较多，墓室尺寸长边一般不超过3米。出土器物较多的个别墓，虽然也有俑随葬，但不见骑马俑。多数墓所出器物很少，以陶质生活用品为主，没有俑随葬。这类墓是无官品的庶人墓。

唐朝三品以上的官称为“贵”，五品以上为“通贵”，凡品官皆为流内，区别十分严格。《唐会要》关于埋葬等级的记载，常以“三品以上”、“五品以上”、“九品以上”为等级界限<sup>[48]</sup>。玄宗以前严格地遵守着这些规定，无论皇室贵戚或一般官吏及平民百姓，都十分流行使用整齐划一的方形或长方形单室墓葬，但尺寸和墓内设施的区别比较鲜明。少量双室墓葬的出现多与墓主人的特殊地位或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sup>[49]</sup>。

属于“安史之乱”以后的墓葬主要有唐安公主、李氏、韩氏、瞿昙谟、曹景林、郟国大长公主、李良、董楹、张十八娘子、董岌、李文政、姚存古、董氏、梁元翰、高克从、郑德柔、何溢、阎知诚、路复源、杨玄略、张叔遵等人的墓。这一时期的墓葬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斜坡墓道的墓减少，竖井与斜坡相结合及竖井墓道的墓逐渐增多。随葬品中仪仗俑、骑马俑少见，表现家庭生活的侍俑尤其是女侍俑较多。表现享乐游玩内容的载乐骆驼、房屋、假山、水池、亭子、钱柜等出现。但总体上俑类大大减少，晚唐时期更为罕见。

肃宗到顺宗时期埋葬的唐安公主为德宗长女，用单室砖墓，边长4.4米，有石棺床。瞿昙谔是银青光禄大夫司天监，为正三品官，李氏为从二品的清源县主，两座墓使用单室砖墓，保持着以前一至三品官吏墓的基本特征，但已不见石墓门。官为从一品的顺政郡王李良、谯郡开国公曹景林都用“刀形”土洞墓，李良墓还用了竖井式墓道，是以前庶人的墓葬形制。官品为从四品下的韩氏墓，也用了低于本品的单室长方形土洞墓。墓葬中发现的随葬品大大减少，墓葬最大、出土器物最多的瞿昙谔墓，也不过50多件俑，其他墓出土的器物更少。如果套用“安史之乱”以前墓葬的情况来比较，这一时期许多墓葬的主要方面都不符合埋葬等级制度。

宪宗至唐末的墓葬又大不相同。斜坡墓道的墓很少，多是竖井与斜坡相结合或竖井墓道的墓，有的墓小龕出现在甬道或墓室，作为放置十二时俑之用。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李文政、陇郡夫人董氏、银青光禄大夫董楹都是三品以上的地位，没有使用砖室墓，墓室边长均不足4米。职事官为正三品官的李文政，用单室“刀形”土洞墓。但是高克从、闻知诚、张叔遵身份都在三品以下，却用了砖室墓。可见这一时期墓葬尺寸大小不再表明官品高低，墓葬形制、建筑质料也不能用来区分官品大小以及品官和庶人。

张叔遵墓为单室方形砖墓，墓室尺寸约4米见方，有石墓门，一个天井，斜坡墓道。还有十二个小龕，但这种小龕与以前用于放置大量随葬品的龕不同，十个在墓室内，两个在甬道里，专门用于放置十二生肖俑。闻知诚的方形砖墓边长也超过4米。晚唐时期这类长斜坡墓道的方形砖室墓很少见。张叔遵的官职为“朝请郎行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上柱国”。朝请郎

为文散官，正七品上阶。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是职事官，从九品下阶，位于唐代品官的最末，他竟使用了无异于高宗至玄宗时期一至三品官吏的墓葬。张叔遵、闻知诚、高克从这类官阶不到三品的宦官<sup>[50]</sup>，都用规模较大的砖室墓，而且目前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大墓，几乎全为官品不一定很高的宦官所有。这种情况与中晚唐时期宦官横行、权倾朝野的实际状况相符合。

洛阳是东都，也是重要的政治中心，在高宗武则天时期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长安。这一地区唐墓与西安地区接近。洛阳地区的唐墓比较集中发现在北邙山下，目前大约发掘了600多座，包括纪年墓几十座。重要的有安菩、豆卢氏、齐国太夫人、杨履庭、崔沈、李延祜、李存、李守一、宋祜、李嗣本、李景由、郑绍方、李柟、郑洵、李郁、崔凝、杨堂、张思忠、柳凯、严仁、张氏、姚懿等人的墓。安菩墓有石墓门和用雕刻花纹的石条砌筑的棺床边，出土大量制作精美的三彩俑。豆卢氏为唐睿宗贵妃，墓中壁画为宫内生活场景<sup>[51]</sup>。齐国太夫人卒于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墓中出土较多的金银器<sup>[52]</sup>。洛阳地区较多的是中小官吏墓和平民墓。偃师杏园有几十座纪年墓，大多未遭盗扰，随葬品数量完整，摆放位置清楚，墓葬均为南北向，时代越晚墓道越短，武则天时期的墓随葬成组的陶俑，还有三彩器、金银器、铜器、漆器。中晚唐随葬品数量锐减，有的墓出土成套的瓷器和用滑石制造的器物，铁猪铁牛类厌胜之物流行。洛阳地区没发现西安地区常见的双室砖墓、双室土洞墓，单室砖墓也较少。墓葬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sup>[5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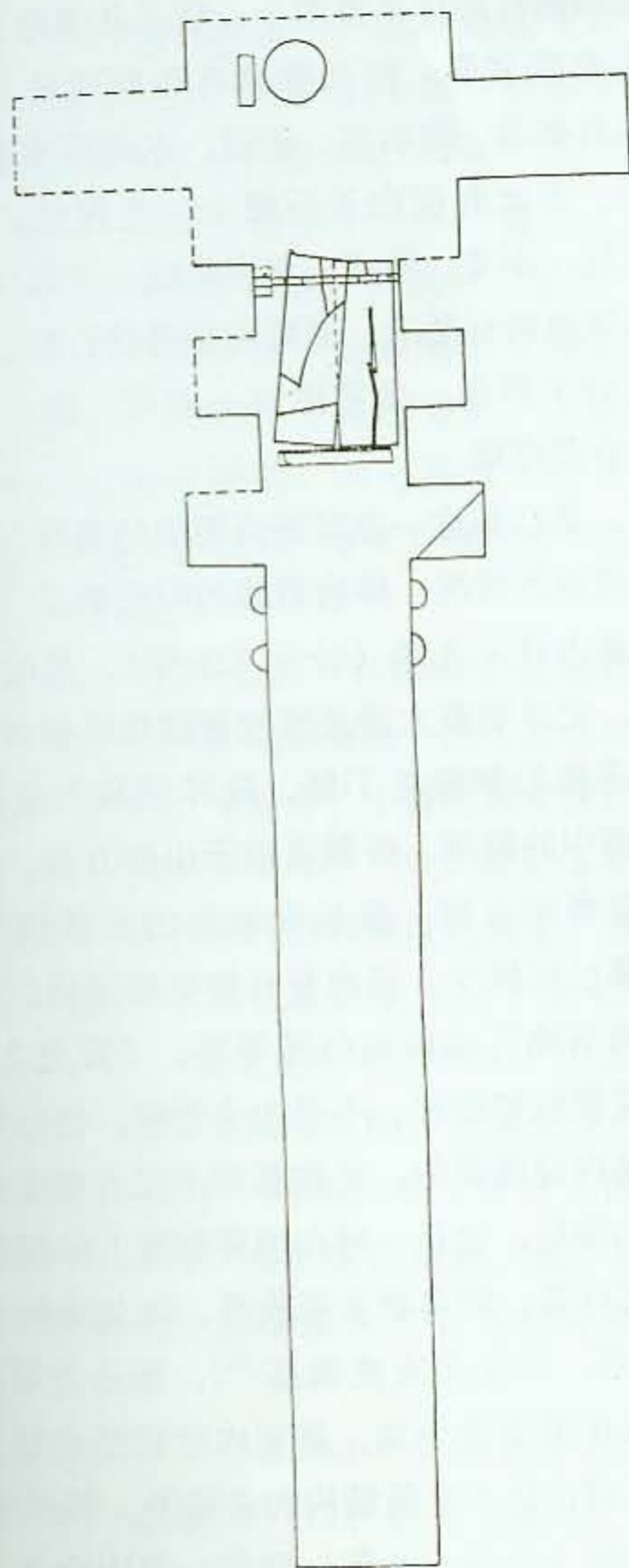
两京地区的墓葬也有一些特殊现象。陕西凤翔县城南郊清

理隋唐墓 332 座，155 座唐墓发表了综述简报<sup>[54]</sup>。这批墓葬有竖穴土坑墓、竖穴半洞墓、竖穴土洞墓、竖穴偏洞墓和斜坡墓道土洞墓，34 座墓殉葬人，共有 87 人，位于墓道、墓室、天井、墓主棺上，最多的一墓殉 12 人。殉葬人骨骼完整的 16 人。骨骼齐全但放置散乱的 4 人，是被砍杀和肢解的。无头骨而肢骨基本齐全的 8 人，是被砍头后埋入墓中的。还有头骨肢骨不全的 3 人，是被腰斩、刖足的。有部分骨骼的 23 人，也是被肢解造成的。这些殉葬人与墓主同时埋葬，多随意抛置，不见棺木，显然不属正常死亡。推测是异族战俘或奴婢一类的下层人。这批墓的时代被定在盛唐到中唐时期。

#### (四) 制度滞后的北方唐墓

唐代墓葬各地间的差异缩小，两京地区的墓葬模式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其他地区稍有滞后现象并保留一些当地葬俗。河套以东、黄河中下游以北的地区，虽然在统一的唐代墓葬制度方面与西安、洛阳有相似性，但由于两汉到北朝时与匈奴鲜卑等民族联系较多，隋唐时北面先后与突厥、契丹、奚、回纥、靺鞨杂处或相邻，“安史之乱”首先在这里爆发，以后又出现严重的藩镇割据，特殊的环境和历史背景，反映在墓葬上显现出传统的延续和特殊性，与西安、洛阳有相同之处也具有一定的滞后现象。而北方各地唐墓也有区别。

这一地区发现的大墓有“安史之乱”时自立为燕帝的史思明墓（图一五）、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墓、信州刺史薛府君墓、银青光禄大夫驸马都尉上柱国汾阴郡开国公薛倬墓<sup>[55]</sup>。史思明墓用汉白玉石条砌成，单室方形，两侧



图一五 唐史思明墓平面图

有耳室，甬道两侧有对称小龕四个，靠近墓道处又有对称的半圆形小龕。出有残哀册。何弘敬墓有石雕残块、石板、石柱等。王元逵墓由墓道、前后室、甬道、东西耳室组成。薛府君墓为双室砖墓，出土有汉白玉石雕十二生肖俑。薛徽墓由墓道、天井、过洞、小龕、甬道、墓室组成，全长46.85米，墓内设施有雕刻华丽的石墓门、庑殿顶建筑状石椁。此外的大墓还有天津刘家台子唐墓，墓室中有一石棺，由六块大理石合成，左右两边有浅浮雕。

以上各墓，是已知这一地区最高等级的墓葬，反映出地方有势力者死后埋葬的情况。薛府君墓的时代略早，相当于武则天时期，薛徽墓为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其他墓都在“安史之乱”以后。史思明墓大约是想按帝陵规格埋葬，或许因为埋葬仓促和对帝陵形制缺乏了解，故耳室和小龕都开在甬道边，是唐代墓葬中的特例。薛徽墓位于山西万荣，薛徽除了身居的官位，还是睿宗女婿。按长安地区的墓葬情况看，六天井、六小龕的墓已经极少，墓内有石椁更属罕见，墓葬的规模已超过同时期两京地区地位相似的等级。“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节度使权势膨胀，不受中央管辖，何弘敬墓、王元逵墓规模大、墓内设施豪华。这些墓葬不仅表现出相对于长安地区墓葬形制的滞后，也是一种在埋葬制度上的僭越。

河北南和郭祥墓、河南新乡张枚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墓、河北文安董满墓<sup>[56]</sup>，都是方形的砖室墓，有的墓有耳室或在甬道设小龕，墓室内常设平台放置随葬品，时代较晚的用砖砌出仿木建筑结构和桌椅等。郭祥生前官职为县令，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埋葬，墓中出土了39件器物，主要是陶俑。甬道东西两壁各有一个拱形龕，两件武士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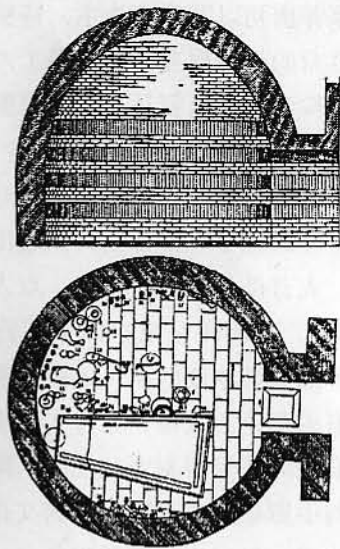
置于壁龕内，其他放在墓室中。彩绘陶俑与西安地区的区别是，武士俑头戴虎头盔，两件镇墓兽一为猪形吻，一为鸟形喙，还出土了一组包括一件跪伏俑、两件人面鸟身俑、一件人面鱼身俑的俑群。董满也是县令，墓中也出土这组“怪兽”，并多出人面蛇身兽和四件似虎、似猪的“怪兽”。墓葬圆形的较多，还有长方形的砖椁墓。北京地区发现的唐墓均破坏严重，但多出墓志，时代以中晚唐为多。主要是弧方形的墓葬，有的墓与河北唐墓相同，西南角有平台放置随葬品<sup>[57]</sup>，有的墓将器物放在墓室东部，没有发现陶俑。突出的特点是四壁用砖砌家具等器具。

自50年代起，山西太原、长治附近就陆续发现唐墓<sup>[58]</sup>，方形或弧方形砖墓是主要墓葬形制。出土墓志的品官墓中，山西长治的朝散大夫乐方与县令、上骑都尉王深的两座墓都葬于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乐方的官品是从五品，王深的官品是正七品。按照唐代埋葬制度的规定，五品和七品应是两个不同的埋葬等级。乐方墓的墓室尺寸是4.2×5.8米，王深墓是4.6×4.5米，乐方墓大于王深墓。乐方墓随葬品的数量也多于王深墓。同样官品在不同时期情况也不同。王深和张仁都是上骑都尉、县令，但张仁葬于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比王深晚了37年。他们的区别是，张仁墓没有发现仪仗俑，其他俑的数量也比王深墓少<sup>[59]</sup>。这种现象大约反映的是时代的差别。

长治唐文明元年（公元684年）骁骑尉（正六品）乐道仁墓，镇墓兽、武士俑放在门口，后面是墓志，墓志后面是牛车、马、骆驼、骑马俑，再后面是仪仗俑群。仪仗俑群的两边或一边放陶制的家畜、家禽、厨房明器、生活用品和“怪兽”。

这种摆放器物的方式盛行于高宗、武则天时期。太原金胜村唐墓相当于武则天时期，墓室内设有平台，平台一般在墓室的一角，与棺床相连。平台上面摆放器物，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陶缸之类。设有平台的墓，也有的把生活用品放在西南角，“怪兽”放在墓室中部。有墓志、俑、车、马等的墓，将它们放在墓室东部。个别墓有武士俑，放在墓门口<sup>[60]</sup>。长治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年）王休泰墓出现成组的陶院落模型，放在墓室中间，厨房、车、马等明器成了院落的附属，或在院内，或在院落附近。镇墓兽、武士俑置于墓门前，墓志在墓门附近，还出现一种鸟形兽和兽头嵌在墓壁上<sup>[61]</sup>。山西太原附近的墓葬，墓壁多绘壁画，壁画内容为彩绘木结构和门卫、仕女、女童，并以树下人物的屏风为特点。

辽宁朝阳发现的唐墓，时代多在开元、天宝以前，主要有中山营子唐墓、黄河路唐墓、张秀墓、八里堡唐墓、韩贞墓、左才墓<sup>[62]</sup>。最大的一座是中山营子唐墓，圆形墓室，直径达12.88米，有石门，墓内分割成十个小室。出土镇墓兽、武士俑和其他泥俑残片，还有石雕头像、白瓷人头、陶器和各种质料的装饰品、生产工具等。墓志残块上有“朝散大夫”的字样，这在朝阳地区应该是高官。另一座大墓是朝阳市黄河路唐墓，出土象牙笏板，表明墓主的地位较高<sup>[63]</sup>。砖筑的圆形墓室，直径7.1米，东、西、北三面各设一个灯龕。带甬道和斜坡墓道，墓门两侧有翼墙，甬道两边有壁龕。出土大量陶俑和泥俑，还有石俑、铜镜、象牙笏板。其中有跪伏俑、墓龙、观风鸟、仪鱼和似虎、似猪的一组“怪兽”。两件石俑的形体高大，辫发和服饰特殊。这两座墓代表着当地高官墓葬，圆形墓室是当地的传统，陶泥俑类属两京制度，“怪兽”则是北方唐



图一六 唐张秀墓平、剖面图

墓的较特殊的葬俗。

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张秀墓（图一六），出土了37件泥俑，有男女侍俑和仪仗俑，另有一个陶碗、一个陶砚。墓中有浮雕石棺，前面挡头浮雕一个门和两个守门者，石棺两边有青龙、白虎。张秀官职为下级武官“校尉”。保存最完整的是唐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左才墓，随葬遗物共77件，其中泥俑48件，俑的种类有镇墓兽、武士俑、仪仗俑、侍俑以及与河北郭祥墓、董满墓相似的“怪兽”。此外有厨房明器、家畜、家禽，还有陶、瓷、铜器。左才为六品的涪州司马。唐天宝三载（公元744年）韩贞墓也是砖筑圆形墓室，直径4.8米，东西各有一圆形的小室，出土的三彩器和一对石雕子母狮较少见。韩贞官职为“戍主”，为八至九品的武官。

朝阳地区的墓葬唐初以圆形墓为主，特别是较大的墓多为圆形墓。长方形墓有的是砖椁墓，还出现了六边形墓葬。武则天时出现了仿木结构建筑甚至家具，墓门两侧有翼墙，门上有额墙，构成了这一地区显著的特点。不少墓内砌平台放置随葬品，较大的墓用彩绘泥俑随葬，武士俑头戴绘出鱼鳞状甲叶的头盔，身穿长条甲叶的铠甲。仪仗俑头戴绘出甲叶的头盔，身穿右衽窄袖长袍。人首鸟身、人首鱼身、双人头蛇身、单人头蛇身和其他“怪兽”，在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左才墓就出现了。随葬品中其他地区少见的铜容器和铜、铁带饰在这里还很流行，有的墓还用家畜、家禽实物随葬。从这些特征可以看出，直到高宗时还保留着当地北朝、隋的特征，武则天到玄宗时才开始与中原地区唐墓接近。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比西安、洛阳地区晚，呈现出滞后的现象。

圆形墓大约是继承了北朝的做法。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地<sup>[64]</sup>大都是圆形墓。临淄紧靠北方，东魏、北齐时是一个行政区域。其他北朝墓多弧方形，有的墓弧度也很大，接近圆形，还有椭圆形墓葬，唐墓应是直接继承了这一地方性特征。随葬品中十分突出的是有一套“怪兽”，凡有陶俑随葬的墓中几乎都有出土。河套以东、黄河中下游以北的唐朝直接统治的区域内普遍流行。据晚些时候的金元时期成书的《大汉原陵秘葬经》所记载的各种明器，它们可能是“千秋”、“万岁”（人首鸟身俑），“仪鱼”（人首鱼身俑），“墓龙”（双头俑），大致也反映的是北方地区唐代的葬俗<sup>[65]</sup>。这类“怪兽”西安、洛阳发掘的大量唐墓中没有发现，可能不属于政府规定的埋葬明器和两京地区的习俗。其中“千秋”“万岁”早在南朝时的邓县画像砖墓出现，合肥隋墓中又最早出现了陶制的。双头俑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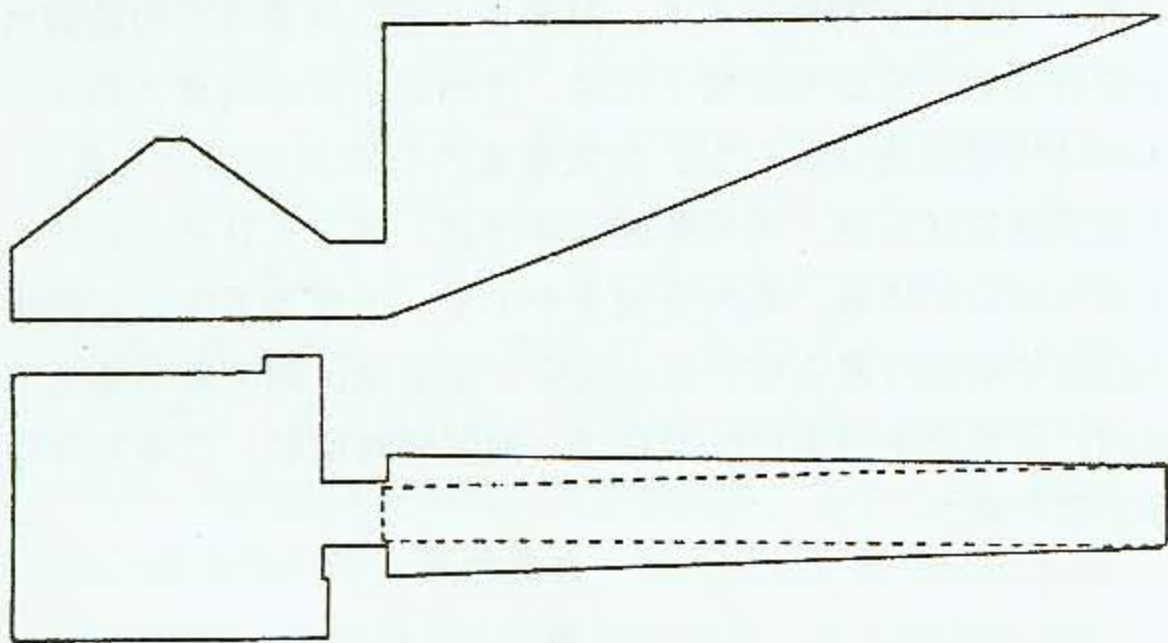
于北齐武平四年（公元573年）崔博墓，武昌地区高宗时期的唐墓也开始出现。看来北方地区有自己的葬俗，并一直延续到唐代甚至更晚，并影响到其他地区。陶俑和泥俑初期的造型更接近北朝俑风格，武则天到玄宗时虽与中原地区接近，仍然有独自特色，没有出现繁荣阶段便转入衰落。

唐朝北方地区墓葬的特殊现象，与历史传统和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唐朝开国初北方还处在战乱之中，李世民从武德初至贞观二年（公元618~628年）先后用了11年的时间击败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闥、梁师都等割据者，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又大破突厥，北方才真正控制在唐朝手中。幽州（北京）、定襄（山西平鲁）、云中（大同）等地有大量归降唐朝的突厥部落，并由突厥首领任当地都督府都督。在朝阳则设营州都督府统辖契丹。北方地区长期由边将节度使管辖，最终造成方镇强大、京师轻弱的后果，导致“安史之乱”首先在这里爆发，以后又出现藩镇割据。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宏大的石室墓，与他自立为燕帝有关，但名义上仍是唐朝命官的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信州刺史薛府君墓，墓室为砖石结构砌建或分前后室，薛傲墓墓内有雕刻华丽的石墓门、庑殿顶建筑状石椁，则是僭越埋葬现象。墓主人官品为朝散大夫的中山营子唐墓，墓内分成十个小室。而作为下级武官的张秀竟有华丽的浮雕石棺，这在长安、洛阳地区同类墓中是见不到的。可见唐中央集权统治在这一地区相对薄弱，当地丧葬制度不很严格。

### (五) 地区时尚与两京模式结合的西北唐墓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在吐鲁番设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当地人口开始激增，成为凉州以西最大的城市<sup>[66]</sup>。1915年斯坦因在这里发掘了40座墓葬。尽管对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和发掘过程的文字记录比较简单，28座墓的平面示意图也嫌草率，不过对墓地的时代、墓葬形制、葬俗和个别遗物进行了探讨，初步了解到当时墓葬的基本情况<sup>[67]</sup>。1959年开始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先后对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进行了十几次发掘，清理了包括麹氏高昌时期和唐代的400余座墓，出土了大量的文物<sup>[68]</sup>。

西州时期的唐墓主要是土洞墓，单室为主，少量双室，长斜坡墓道，墓室上有圆顶、盝顶和平顶（图一七）。砖墓砌法是一纵券一横券，有的墓室内还砌出仿木结构的擎天柱。尸体



图一七 吐鲁番阿斯塔那第28号唐墓平、剖面图

穿纸鞋、戴纸帽，陈放在生土台上，头部还普遍盖着织物覆面。随葬品中有黑陶器和火候较低以及未经烧制的器物，主要为罐、碗、盆、盘、灯等，有的陶器上绘莲花纹。有的墓内还出土有绘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当地还有招魂合葬的习俗，即用草人代替死者。有些死者口中常含钱币。木质明器较多，还有不少面点，如饺子、糕点、饅等。

相当于武则天时期以后，大型墓开始在墓道上凿天井，甬道两侧开小龕，个别墓有耳室。墓室内三面置台的增多。随葬品较多地出现泥制或木制的武士、文吏、女侍、镇墓兽等。陶器较少，丝织品增多。个别墓中还绘有屏风式壁画，稍早的以人物为主，较晚的偏重花鸟题材，还有舞乐、牧马、贵妇弈棋的绢画。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的墓葬采用聚族而葬的方式，茔区用砾石围筑出界限。著名的张氏茔地有墓葬65座，墓主清楚的包括左卫大将军、都管曹郎中张雄夫妇墓，张雄长子前庭府折冲都尉张定和墓，次子中散大夫、行茂州司马、上柱国张怀寂墓，张怀寂之子张礼臣墓。张雄夫妇墓比较特殊，张雄死于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高昌延寿十年），其妻死于唐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前后相距55年。这座墓始建于张雄死后，迹象表明墓葬曾经改建，原为斜坡墓道土洞墓，后来在墓道尽头用弧形土坯改建成甬道，两壁辟出对称的小龕。这一改变，恰好反映出吐鲁番地区墓葬形制的变化，以及中原唐墓对这里的影响。随葬品也分前后两次埋入，属于张雄的随葬品中有彩绘木俑和绢衣木俑70多件，还有残存的木马腿、木俑手脚200件。龕中放置木俑，造型为盛唐风格，应是其妻埋葬时放入。

唐朝在高昌设西州是在张雄死后七年，此时唐朝直接控制势力还未到达这里，作为魏氏高昌的官吏，张雄墓营建之初沿用当地古老的传统，不过是通常的斜坡墓道土洞墓，其妻子死后与之合葬，已是唐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这时唐朝不仅设立西州很久，而且张雄的长子张定和担任唐西州前庭折冲都尉，次子张怀寂任唐甘州张掖县令、朝请大夫、行叠州长史、右玉铃卫假郎将，他们是唐朝政府官吏，对唐朝制度熟悉，为母亲举办丧事自然依唐制而行事。特别是张怀寂，他九岁便进京，在长安接受教育，“雅善书剑，尤精草隶”，深受中原文化熏陶<sup>[69]</sup>。大概是将母亲与早已死去55年的父亲合葬时，发现了墓葬制度上的不同而做的改建，增筑了甬道和小龕，又放入一些随葬物品。到张怀寂死时葬于武周长寿三年（公元694年）的墓，就直接建造出甬道，并在长斜坡墓道上开凿天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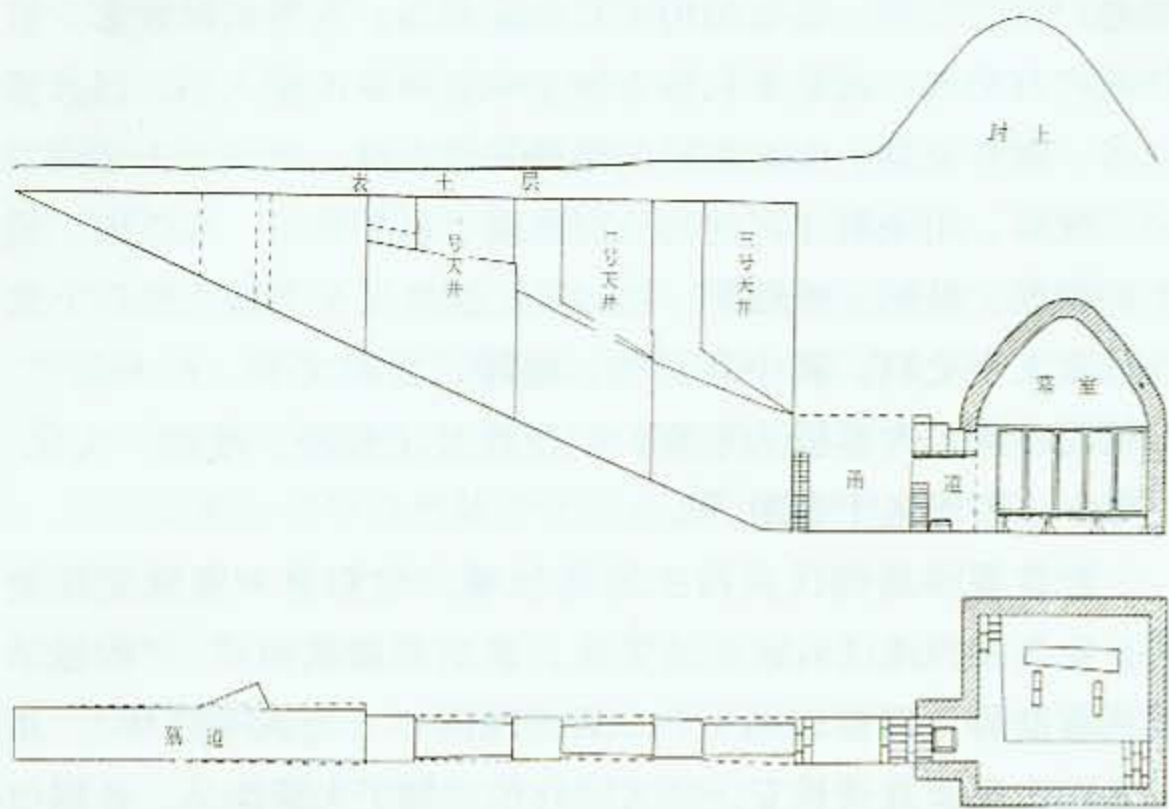
西北地区唐墓与两京地区墓葬趋向相似大约自武后时期起，但地区特色仍有保留。陈尸于席上是常见做法，席下多是生土台，少用木棺，却出现纸棺。俑类多泥制、木制彩绘，有的还穿上织物服装。内容除了镇墓兽、武士、文吏、女侍等唐墓常见的种类外，歌舞、劳作俑比中原地区的更为丰富、更为突出。张雄夫妇墓的舞乐戏弄俑，高约5厘米，小巧精致，反映出中原文化的习俗。唐代丧葬中用傀儡表演歌舞，象征死人在另一世界享乐，送葬时也要进行表演大肆炫耀。

绢画不见于其他地区。伏羲、女娲形象是作为葬仪放入墓中，妇女下棋、游乐内容的绢画反映现实生活。当地气候、地理环境特点和丧葬习俗传统使墓葬中大量的文书和织物得以完好保存，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墓葬出土遗物的重要特点。织物主

要是尸体的服装，也有的用作其他随葬品，花色品种繁多。织物或产自当地，或是来自各方甚至中亚西亚的输入品，以数量众多、制作复杂、绚丽多彩的锦最具代表性。纸文书大多因当时已废弃、用来制作其他物品而出现于墓葬之中，如纸棺、俑类的服装、鞋袜、纸腰带、纸冠等。这些纸文书成为保存下来的珍贵文字史料，其中有契约、籍账、官府文书、私人信件、经籍写本等，内容极为丰富，广泛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sup>[70]</sup>。

吐鲁番原是魏氏高昌王国的领域，他们曾和突厥交往最多，也与中原地区有密切的关系，多次到唐朝朝贡，“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奏以闻”<sup>[71]</sup>。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高昌王鞠文泰亲自到长安，唐太宗向他颁赐了大量物品，还赐他的妻子姓李，封常乐公主。唐朝与高昌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利益。过境贸易是丝绸之路沿途绿洲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关系到西域诸国兴衰。隋末大乱，大碛路关闭不通，西域各国朝贡使臣、商队都经过高昌前往内地，高昌与突厥联合起来垄断商路获取巨大利益。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焉耆请求唐朝主持重开大碛路，以方便商旅往来，损害了高昌的利益，于是高昌与西突厥联合攻破焉耆，公开与唐朝反目，劫掠商旅，阻塞商路，严重威胁唐朝的西部边疆。贞观十三年（公元640年），唐太宗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讨伐高昌，顺利地控制了西域东部的高昌这一沟通天山南北的战略要地，设立西州和安西都护府，每年调发一千多名士兵守卫，形成了唐朝牢牢地控制、经营西域的一个基地，唐朝制度开始在这里广泛推行。安西都护府所辖的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时起时落，唐朝对西域的控制就更倚重于西州地区





图一八 唐梁元珍墓平、剖面图

了。当地墓葬形制的变化，丝绸、文书等的发现，与这一背景正相吻合。直到8世纪后半被吐蕃占领，吐鲁番地区的唐墓仍多为汉人墓，只有少量其他民族的墓。

西北地区另一处重镇今宁夏固原也陆续发掘了一批唐墓<sup>[72]</sup>，年代都在盛唐以前。分为砖室和土洞墓两类，均为单室，有长斜坡墓道，多设天井。武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梁元珍墓（图一八）的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绘有壁画。中原地区不仅庶人墓无壁画，品位较低的品官墓也不饰壁画，梁元珍虽然出身名门，可本人没有做官，可见当地与两京地区墓葬等级的不同。此墓用百余枚“开元通宝”铜钱铺棺床是少见的葬俗。葬于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的史道德为唐给事郎兰池正监，是唐代的马政官，墓中出土完整的一套覆面。宁

夏盐池发现6座唐墓<sup>[73]</sup>，是依山开凿的石室墓。3号墓的墓室中部凿出两根八边形石柱，柱头有斗。后部有石棺床。墓室后壁正中、西壁和东壁开龛室。墓中出土武士、文吏、侍女、镇墓兽、马、骆驼等木俑，还出土了榫卯结构的木质房屋模型。其他墓葬中1号墓、4号墓、6号墓的墓室后壁和左右壁均开龛室。2号墓有五个龛室。龛室多少似乎无严格的规制，主要视葬人情况而定，它们也不是用于放置随葬品。六座墓有单人葬、双人葬和多人葬，4号墓尸骨四具，5号墓多达十几具。6号墓石墓门上雕刻胡旋舞图像。固原、盐池发现的唐墓都是中亚人的后裔，即“昭武九姓”的粟特人，但出土汉文墓志、随葬陶俑等，可见中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甘肃天水市发现一座竖井式单室砖墓，墓室内置一屏风式石棺床，棺床由两方画像石拼成，上雕男性乐伎和神兽。屏风由11方彩绘画像石组成，以精湛的雕刻技法雕出狩猎、宴饮、出行、泛舟、亭台楼阁、水榭花园等，有的地方还外施贴金，十分华丽。出土遗物不多，其中有5件石乐俑。屏风石棺床在目前考古发现中实属罕见，据屏风雕刻内容，该墓的年代约在隋至唐初<sup>[74]</sup>。甘肃平凉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刘自政墓<sup>[75]</sup>，方形砖砌，出土塔式魂瓶2件和铁券函。

### （六）旧传统与新制度渗透的南方唐墓

唐朝幅员辽阔，各地文化传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政治上大一统的唐朝，并未使地下的墓葬形制达到南北一致。大体以淮河为界，南北墓葬形制的区别仍旧很大。南方地区墓主人身份明确的纪年墓葬比北方少得多，少数皇室和高级贵族墓葬的

形制特点与北方同时期墓葬相同点较多，比较严格地按唐代丧礼等级埋葬，但是大量的中小型墓葬，虽然也依等级制度而不同，却带有浓厚的地方特征，原因主要是六朝以来的传统形制的延续，也与地理环境有关。

南方地区唐墓根据各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的差异，可以分为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赣江地区、福建、岭南等区域，每区又有若干个不同的发展时期。这些区域与唐代行政区划的“道”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吻合，一区有的可跨两三道，一道有的分两区，表明区域性特征的形成与唐代的行政区划并不等同，而与自然山脉、河流的分布和阻隔形成的区域接近，同时也与不同时期隋唐政治形势有关<sup>[76]</sup>。如果与北方地区相比，各区之间的一致性较强，但各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未必都十分密切。长江中游地区与中原直接接壤，受中原影响较大，又以此为中心间接影响其他区域，边远地区出现的滞后现象十分明显。

长江中游地区的唐墓发现较多，有长方形、梯形、“凸”字形和“中”字形墓。砖室墓主要是“凸”字形和“中”字形，墓的左、右、后部常砌出小壁龕，龕内置十二生肖俑。墓室正中有砖砌长方形棺床，棺床与墓壁间设排水道。土坑墓以梯形和长方形为多，有的墓带壁龕。

唐高祖、太宗时期，湖北安陆王子山唐贞观中期的吴王妃杨氏墓<sup>[77]</sup>，是大型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耳室及主室组成，略成“中”字形。棺床位于主室的西北部。主室出土壶、罐、碗等瓷器，还有金、银首饰、墓志及萨珊银币。甬道和耳室内出土陶俑、禽畜和模型器。主室、耳室、墓门附近还出土铜器及铜钱、铁器、珠玉器、玻璃器。中小型墓葬有长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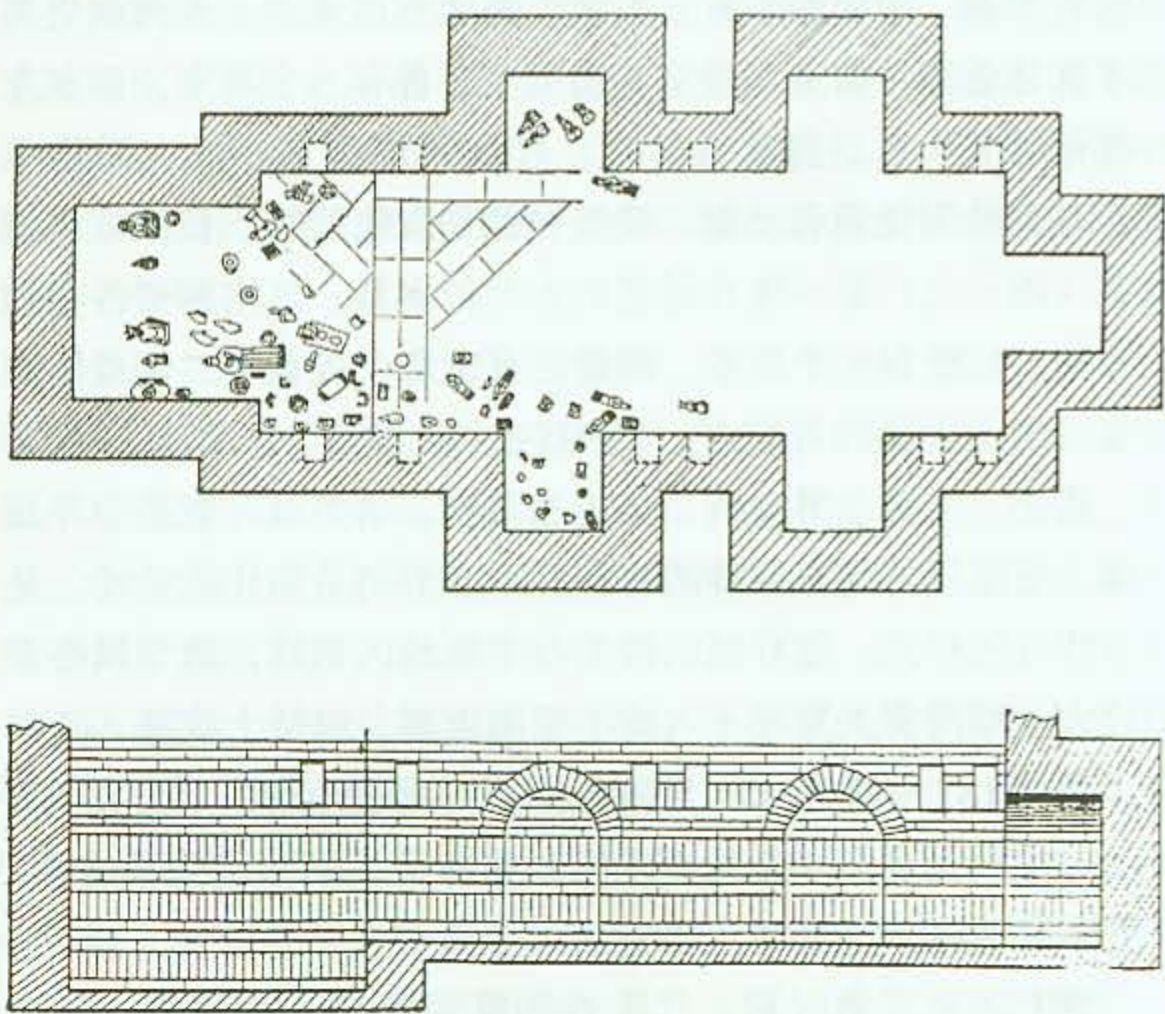
赤峰山 M3、M4 和武昌 M359<sup>[78]</sup>。砖室墓的墓壁砖上盛行模印花纹，内容为叶脉纹、花草纹、小花纹、忍冬纹、钱币纹、网格纹。有的墓还在墓壁上镶嵌画像砖。这些特征继承了南朝以来的传统。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大型墓是与北方两京地区相类似的方形砖室墓。湖北郧县李徽墓、四川万县冉仁才墓、长沙咸嘉湖唐墓、长沙黄土岭唐墓、长沙牛角塘唐墓是这一时期墓葬的代表<sup>[79]</sup>。唐嗣圣元年（公元 684 年）新安郡王李徽墓是带斜坡墓道的方形砖墓，四壁略内弧，甬道两侧有小龕。随葬品较丰富，有陶瓷器、金银饰件、玻璃、骨蚌、铁铜残件。墓葬是中原的形制，陶瓷器中有三彩器，是北方运来的。永州刺史冉仁才墓分甬道、前室、后室，前室左右各有一个耳室，后室左右各有两个耳室，前室很简化，仅比甬道稍宽。出土器物丰富，有大量陶瓷俑和动物、模型明器和陶瓷器物。长沙咸家湖唐墓（图一九）是一座有甬道的方形砖室墓，墓室两壁各有两个耳室，后壁有一个耳室，两壁还有十二个放置十二生肖俑的小龕。出土大量的青瓷器，其中包括镇墓兽、人首兽身双翼俑、武士、文吏、男女侍、伎乐和动物。这类墓可能是中等品官墓，更能反映南方墓葬的特点。墓葬形制是隋代的延续，是南方特有的样式。随葬俑的种类与中原地区相同，造型风格差距较大。湖南资兴发现十六座小型隋唐墓，包括土坑墓、砖室墓，其中 181 号墓和 456 号墓分别有“显庆五年”（公元 660 年）、“文明元年”（公元 684 年）铭文砖，两墓均为长方形，墓壁砌有砖柱<sup>[80]</sup>。

唐中宗至玄宗时期，代表性的墓葬有郧县李欣墓、阎婉墓、长沙丝茅冲唐墓、九江唐墓、武昌 M270<sup>[81]</sup>。嗣濮王李欣

墓和濮王妃阎婉墓都是由墓道、甬道、墓室、耳室组成。两墓都有天井，完全是中原墓葬的形制。

唐肃宗至唐末，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王清墓、益阳邓俊墓、武昌 M290、武昌 M342、武昌 M40、长沙 M56、黄石 M1、长沙上大垅 M31、武昌 M528<sup>[82]</sup>。唐大和六年（公元832年）王清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室正中有凸起的高台，出土碗、碟、罐等瓷器，为长沙窑的制品。益阳唐宝应二年（公元763年）邓俊墓是方形土坑墓，带墓道，出土委角方形卍字铜镜、铜铺首和青瓷、白瓷器。邓俊是“朝请郎试岳州长史上柱国”，应属中级官吏，但这座墓埋葬简单草率。小型



图一九 长沙成嘉湖唐墓平、剖面图

墓仍为土坑墓，以平面呈长方形的土坑墓为多。

长江中游地区唐墓的随葬品以生活用品为主，最多的是陶瓷器。唐高祖、太宗时期的墓葬中陶器较多，瓷器次之。器形多为五联罐、圆形五足炉、较瘦高的盘口壶、四耳罐、深腹碗、小口的唾盂、高足杯，部分墓葬出土俑类。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的墓中出土瓷器较多，有器形较粗胖的盘口壶、双耳罐、浅腹碗、大口的唾盂、长颈瓶、花口碗及较多的注子。三彩器来自北方，出现在南迁的高级贵族墓内。中晚唐墓葬出土瓷器更为普遍。

长江下游地区浙江江山发现一座墓有“上元三年”（公元676年）铭文砖，由前室、后室、甬道组成，后室外弧，还有壁龛<sup>[83]</sup>。徐州花马庄唐墓和邗江杨庙唐墓为“凸”字形砖墓，大约为高宗武则天时期。两墓均随葬大量的陶俑和动物。花马庄唐墓内壁由各种模印莲花、重环纹砖组成装饰图案，人首鸟身俑比较奇特，陶俑带有南朝以来的当地风格。杨庙唐墓有胡人骑马俑、一组伎乐舞蹈俑、十二生肖俑，文吏俑带长须比较特殊，其他均有浓厚的中原风格<sup>[84]</sup>。江苏无锡江溪陶典村唐墓时代约为7世纪中期，出土能看出形象的包括十二生肖在内的陶俑34件，十二生肖为人身兽首，颈部较长。

江苏吴县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张子文墓，是由主室、甬道和耳室组成的砖墓，出土男女侍俑、牵马胡人俑和生肖俑<sup>[85]</sup>。浙江江山的一座带“天宝三年”（公元744年）铭文砖的墓葬，长方形，甬道似为前室的简化。江苏仪征唐代砖墓平面呈船形，出土青瓷器、铜镜、漆器和银发簪等饰件。墓志磨损严重，但仍可见“安史肇乱”等字，说明时代在8世纪中期以后<sup>[86]</sup>。无锡西漳寺头沈巷唐咸通八年（公元867年）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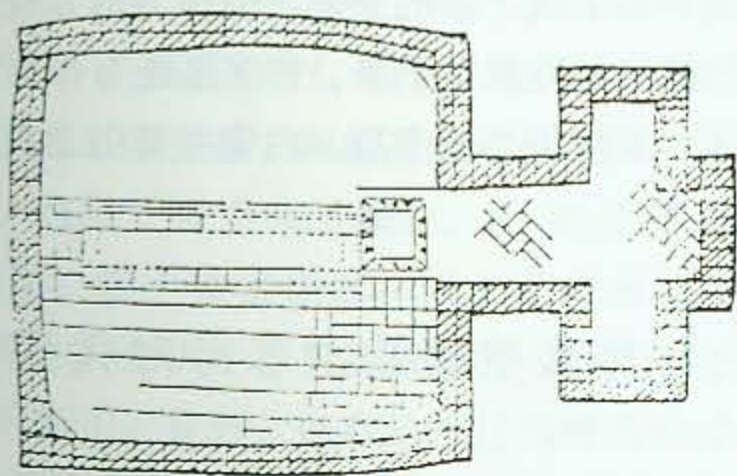
甫云卿墓，出土木俑 33 件、“怪兽” 8 件，其中“怪兽”为人面鱼身。还出土漆盆 1 件。皇甫云卿生前任乌江、昆山县尉，官品为从九品下<sup>[87]</sup>。唐光化二年（公元 899 年）钱宽墓，有前后室，前室平面呈长方形，左右有耳室，后室平面略呈船形，左右各有耳室两个，后壁有龕四个。出土较多的瓷器，包括 3 件青瓷和 19 件白瓷器，有的白瓷器上有“官”或“新官”款。还有铜钱四百余枚和其他器物的残片。唐天复元年（公元 901 年）水邱氏墓形制与钱宽墓略同，也出土精美的青瓷、白瓷，还有银器。两墓还绘有壁画<sup>[88]</sup>。钱宽和水邱氏是吴越王钱鏐的父母。长江下游地区的墓葬，较大的砖墓在中晚唐有不少平面呈船形。

赣江地区唐墓发现比较少。黎川唐墓平面呈窄“凸”字形，后壁设两个小龕。赣县唐墓平面呈长方形<sup>[89]</sup>。江西南昌唐大顺元年（公元 890 年）墓的做法特殊，在长方形土坑用青灰色的胶结物筑墓椁，椁内置木棺，棺椁之间塞石灰浆。出土木地券和用粗壮的实心竹兜雕刻而成的男侍俑、武士俑。还有木俑一件，帽涂黑，身穿长袍，背面墨书文字，内容与地券相同。还出土铜镜、瓷器、铁镢斗等<sup>[90]</sup>。

福建地区的闽侯杜武墓，平面呈“凸”字形，用花纹砖砌成，棺床砌于墓室后部，前部放随葬品。漳浦县刘坂乡唐墓，平面为“中”字形，主室左、右壁各砌五个壁龕，室内还砌出两个方形坑。出土 40 余件具有特色的俑，有男女俑、“千岁老人”俑及镇墓兽和人首蛇身、人首鱼身、马头鱼身、鳖形等“怪兽”<sup>[91]</sup>。福建泉州发掘的四座窄“凸”字形墓，M1、M2、M3 排列成品字形，M4 在其东侧，埋葬者可能同属一个大家族<sup>[92]</sup>。福建唐墓大致可分为唐初、初唐至盛唐、中晚唐三

期<sup>[93]</sup>。

广东电白县的唐龙朔元年（公元 661 年）埋葬的许夫人墓，是一座大型砖室墓，全长 9.1 米，有前、后室和耳室，墓的东西北三面封土中有半月形排水沟。由于破坏严重，只出土少量金饰件、铜镜残片和瓷器。许夫人为中书令许敬宗之女，嫁与蛮酋冯盎之子<sup>[94]</sup>。广东电白县霞洞墟唐神功元年（公元 697 年）墓，前室平面横长方形，后室平面近方形，中间有隔墙隔出两个棺室，墓志贴后壁摆放，出土青瓷器和素面方形铜镜等。据墓志残存文字推知，墓主人曾为潘州刺史和恩州刺史<sup>[95]</sup>。岭南地区的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 741 年）“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张九龄墓<sup>[96]</sup>，是一座由甬道、耳室和主室组成的砖墓，主室四角攒尖顶，墓内四角砖砌假柱，砖砌长方形棺床设于墓室中央（图二〇）。主室和甬道绘有壁画。墓虽被盗，仍出土 30 件器物。还有广东始兴县的唐墓，一座为长方形砖墓，两座是土坑墓，都是小型墓，仅出土几件瓷器<sup>[97]</sup>。广州皇帝岗晚唐墓是木椁墓，出土银钗等头饰 13 件、木俑 14 件，放在椁内<sup>[98]</sup>。



图二〇 唐张九龄墓平面图

南方地区唐墓，高级贵族墓较严格地按照丧葬制度埋葬，吴王妃杨氏墓、濮王李泰墓、新安郡王李徽墓、丞相张九龄墓，形制特点与北方同时期墓基本相同，应是按当时丧礼等级埋葬。李徽墓壁画有影作木结构、鞍马、男女侍，张九龄墓壁画有女侍、青龙，与北方题材相同。李泰墓志记其死后“赐东园秘器，葬事官给，务从优厚”。其墓中出土的俑、三彩等随葬品应来自京城。永州刺史冉仁才墓绘青龙、白虎，出土瓷俑动物俑共81件，基本符合三品以上“九十事”的规定，也是依等级埋葬。钱宽、水邱氏墓的形制、随葬品和壁画比较特殊，除了因时代最晚以外，两人原本是以田渔为业的平民，其子钱镠称雄江浙，在故里为之安葬时可能也未必遵循当时流行的贵族墓葬来建造。

除了大型墓葬，各区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风格统一性较强，区别是发生变化的时间不同。长江中游唐墓改变南朝隋墓的做法较早，而长江下游约在唐高宗时才表现出明显的改变。长江上游、赣江流域、福建、岭南地区则是在唐玄宗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上看，南方在8世纪中叶即唐玄宗末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出现了新的变化。但作为地方特色的砖券墓以及设小龕的做法始终保留下来，许多墓还有排水沟。出土瓷器较多，各区分别使用当地产品，白瓷主要出土在唐中后期墓葬之中。

### （七）唐墓壁画的内容与时代变化

20世纪50年代西安地区发现不少唐代壁画墓，许多墓葬没有发表图片，仅有文字叙述，但可以看出初唐到盛唐的变

化<sup>[99]</sup>。60年代发掘的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墓室、甬道、墓道满绘壁画。70年代又发掘了李寿墓、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等绘有大型仪仗、出行图的壁画墓。此后相继发掘的近百座壁画墓<sup>[100]</sup>，壁画内容表现了死者生前的地位和日常生活以及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场面。壁画布局、内容的演变的早晚关系逐渐清楚<sup>[101]</sup>。借助于壁画探讨唐代文化面貌、等级制度以及器用、服饰、发式沿革、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已经受到关注<sup>[102]</sup>。

唐代壁画墓墓主生前地位较高，因此墓葬规模较大，结构复杂。一般有墓室、甬道、过洞和墓道，有的墓还有前、后两个墓室，壁画分绘于各个部位。壁画题材以及所绘的部位大致如下：1. 四神图。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用以表示方位和避邪，多绘于墓道的东西壁及墓室的南北壁。2. 仪卫图。由步、骑或步、车、骑仪仗组成，仅见于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分布在墓道东西壁。3. 列戟图。唐代官吏的门第前列戟表现身份和荣耀，墓葬壁画所绘列戟的数量多少和官品高低有关，见于甬道和过洞中。4. 建筑图。是与墓主人生前宅第有关的写照，绘于墓门旁和甬道、过洞两壁。5. 内侍图。主要是贵妇、宫官、侍女，还有男性侍者和官吏，反映贵族日常生活，根据墓主地位不同，内容有别，多绘于墓室内，也见于甬道和过洞中。6. 游猎图。绘于墓道壁面。7. 星象图。绘于墓室顶部。以上是壁画墓常见的内容，但在不同的墓中场面大小、人物数量的多少甚至有无，与墓主人的地位差别有关。此外，还有绘于过洞壁面的经营庄园的场景和农牧生产图，绘于墓道壁面表现宫廷或军队娱乐的打球图，绘于墓道的东西壁表现迎接外国及其他民族使者的客使

图，绘于墓室的乐舞图和树下人物图。这些内容只发现在个别墓中。因为每座墓的时代早晚不同，壁画内容、布局、构图、艺术特征和绘画技法上有发展和演变。

高祖、太宗时期，西安地区的壁画墓主要有李寿墓、杨恭仁墓、长乐公主墓。李寿墓的墓道绘有飞天引导的出行游猎图。过洞绘步卫、属吏、农牧、厨事、列戟。甬道绘属吏、内侍、寺院和道观。墓室绘马厩、仓廩、宅院、女伎乐。李寿墓壁画上虽未发现四神图，但把四神刻在了石椁上。长乐公主墓稍有区别，墓道绘由青龙、白虎引导的云中车马、仪卫图。凡日常生活的内容，多以复杂的庭院为背景。四神、农牧、厨事、马厩、仓廩、寺院道观等题材，多渊源于十六国迄北朝墓葬壁画。布局有的采用分上下栏的作法。壁画人物的体态清瘦，稍显呆板。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壁画墓主要有段简壁、阿史那忠、李震、执失奉节、郑仁泰、苏定方、李爽、李勣、房陵公主、李凤、安元寿等人的墓。尽管各墓壁画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内容基本清楚。阿史那忠墓壁画保存较好，墓道绘青龙、白虎、鞍马、骆驼、牛车、步卫、属吏、武士。过洞在墙壁上绘出梁、柱等构件以表示实际建筑，称为影作木结构建筑，与壁画作品内的建筑图不同。影作木结构的柱间绘属吏、女侍、列戟。李凤墓的甬道绘影作木结构建筑、女侍，墓室绘影作木结构建筑、人物、花卉、星象。房陵公主墓室壁画完好，所有人物皆为侍女，以单人平列式出现。影作木结构建筑是这一阶段较普遍的现象，在过洞、甬道及墓室壁上绘粗线条的阑额、廊柱，廊柱既是建筑的象征，又兼作界格，将壁面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其间描绘男女侍等人物，使墓内如同宅院。人

物各自独立，大多无背景。造型略显丰腴，形象较为生动。

唐中宗至玄宗开元时期，主要有李重润、李贤、李仙蕙、韦洞、薛氏、契苾夫人、薛莫、韦氏、冯君衡等人的墓。李重润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山林、城阙、步骑仪卫、辎车、鞍马、官吏，过洞绘胡人牵豹、男侍牵犬驾鹰、女侍、影作木结构建筑、列戟、步卫、牛车，甬道皆绘女侍，间绘花草木石，墓室绘影作木结构建筑、捧物品及乐器的女侍、星象。李贤墓和李仙蕙墓的壁画内容和布局与李重润墓的基本相同，惟李仙蕙墓过洞顶部绘平棊、卷云、白鹤。李贤墓的墓道还绘出行狩猎、打球、客使图。过洞、甬道、墓室所绘的人物，大都以象征式廊柱建筑为背景，墓室的壁画生活气氛更为浓厚，游乐场画面增多，出现了云、鹤。一些墓的墓道壁画简化，车马、仪卫的场面缩小，有的省去。壁画人物多成群出现，构图错落有致，相互呼应，突出情节和趣味。人物形象丰满匀称，婀娜多姿。描绘技巧娴熟，线条流畅。人物造型准确，衣纹复杂多变。

唐玄宗天宝以后到唐末，主要有韦君夫人、苏思勗、宋氏、张去奢、张去逸、张仲晖、高元珪、韩氏、唐安公主、郾国大长公主、姚存古、梁元翰、高克从、杨玄略等人的墓。因墓葬形制发生变化，长斜坡墓道少见，壁画大都出现在墓室内，题材多为四神、男女侍者。新出现绘墓主人像的作法。唐安公主墓较特殊的是墓室西壁为花鸟画。有墓道的墓，墓道只绘青龙、白虎，出行、仪卫的内容不见了，影作木结构建筑也被淘汰。西安地区也开始流行折式屏风画，突出了云、鹤的题材。人物形体臃肿，描绘草率，艺术水平较低。

唐代的长安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包括壁画在内的

许多美术样式，都是从长安向各地传播的。各地在接受了长安的样式后，又或多或少地做了些改动，因此其他地区发现的唐墓壁画各具特色。长安以外的壁画墓以山西发现最多<sup>[103]</sup>。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墓顶正中为星象图，四面分绘四神。墓室绘仿木建筑，并由柱将墓壁分成界格，格内绘壁画。南壁是侍卫图。东西两壁的南部各有一侍女，之后各有三幅并与北壁的一幅相连组成八扇屏风画，北壁正中为一幅驼、马人物图。屏风画的内容是树下人物。山西地区的其他各墓壁画内容和布局与之基本相同。这些墓壁多绘壁画，内容为彩绘木结构和门卫、仕女、女童等，并以树下老翁的屏风画为特点。北京延庆发现的唐代壁画墓，门券上画四神，两侧绘武士、侍者，东壁绘太阳和十二生肖，北壁绘墓主宴饮。北京海淀八里庄唐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王公淑墓，北壁为通壁的牡丹芦雁图。陶然亭唐墓也发现有壁画<sup>[104]</sup>。

西北地区在宁夏固原发现的唐墓壁画，史索岩墓只在第五过洞上方保存朱雀图；唐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梁元珍墓的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绘有壁画，壁画的内容突出武士和牧马，天井东西两壁共画人物牧马图六幅，甬道两壁各画一幅牵马图，墓室东壁绘枯树、侍女，南壁为男侍，西壁和北壁各有五幅屏风画，均为树下人物，墓顶为星象图。人物牧马图不见于其他地区的墓葬壁画中<sup>[105]</sup>。表现树下人物的屏风画，曾流行于山西同时代的唐墓中，西安地区只在苏思勖墓中出现。

南方地区的唐墓壁画，因地下潮湿多已剥落。在杨氏、李泰、李徽、阎婉、李欣、张九龄、钱宽、水邱氏、冉仁才等人的墓中有些残存，墓主多为皇室成员，其他人中冉仁才之妻是县主，即亲王之女；张九龄是著名宰相，生前虽因事被贬，死

后仍以重臣身份埋葬；钱宽和水邱氏是夫妇，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吴越王钱镠的父母。可见南方壁画墓的墓主人地位显耀。南方地区现存墓葬壁画都在甬道和墓室中。李徽墓在墓室绘影作木结构、屏风、鞍马和控者、花卉。张九龄墓的甬道绘侍女，墓内为青龙、白虎和侍女。钱宽墓的墓室顶绘有天象图、墓壁绘盆花等。南方唐墓与西安唐墓壁画内容相似，只是所绘部位有所不同<sup>[106]</sup>。

## 注 释

- [1] 曹风权《毕沅及其对陕西文物的保护》，《文博》1989年第1期。
- [2] 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杨炼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 [3]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察记》，《文物》1960年第4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建陵探测工作简报》，《文物》1965年第7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桥陵调查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 [4] 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 [5] 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 [6] 巩启明《唐献陵踏查记》，《文博》1999年第1期。
- [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年第1期。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年第5期。
- [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物园林局《唐惠昭太子陵发掘报告》，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蒲城县文体广电局《唐惠庄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 [10] 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教育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教育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

- 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 [11] 李求是《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文物》1972年第7期；王仁波《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题材的分析》，《考古》1973年第6期；王仁波《懿德太子墓所表现的唐代皇室埋葬制度》，《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 [12] 昭陵文物管理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10期。
- [13]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上）》，1970年。
- [14] 宋伯胤《卜仁墓中的隋代青瓷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8期。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权奎山《中国南方隋唐墓的分期分区》，《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申秦雁《论中原地区隋墓的形制》，《文博》1993年第2期。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三原县双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
- [17]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郭家滩隋姬威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第8期；独孤罗墓见孙秉根《西安隋唐墓葬形制》，《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西安东郊隋李椿夫妇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
- [18] 刘玉杲《饶阳县王桥村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第10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隋唐研究室《陕西长安隋宋忻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1期；李域铮、关双喜《隋罗达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
- [19] 周到《河南安阳琪村发现隋墓》，《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
- [20] 安阳文教局《河南安阳隋墓清理简报》，《考古》1973年第4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郭家滩隋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冯淹墓见孙秉根《西安隋唐墓葬形制》，《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山西省博物馆、汾阳县博物馆：《山西汾阳北关隋梅渊墓清理简报》，《文

- 物》1992年第10期。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 [22] 《隋书》卷八礼仪志三。
- [23]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隋代墓室壁画的首次发现》，《文物》1981年第4期；嘉祥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嘉祥英山二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 [24]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罗丰《隋代史射勿墓》，《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 [25] 女性被葬者是隋文帝之孙女丰宁公主，死于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男性为公主之夫，袭封河南郡公韦圆照，卒于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时才正式合葬于长安城南栖凤原韦氏家族墓地，墓中出土物品却大都是隋代，显然是丰宁公主大业年间下葬时的物品。
- [2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
- [27] 戴应新《隋丰宁公主与韦圆照合葬墓》，《故宫文物月刊》第16卷第6期，1998年。
- [28] 安阳县文教局《河南安阳隋墓清理简记》，《考古》1973年第4期；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市两座隋墓发掘报告》，《考古》1992年第1期。
- [2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隋斛律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
- [30] 《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
- [31] 《隋书》卷六礼仪志一。
- [32] 武汉市文物管理处《武汉市东湖岳家嘴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湖北武昌马房山隋墓清理简报》，《考古》1994年第11期。
- [33] 李荆林《湖南郴州发现两座隋墓》，《考古》1985年第8期；武汉市文管处《武汉测绘学院隋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近郊隋唐墓清理》，《考古》1966年第4期。
- [34]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 [35] 周世荣《长沙容园两汉、六朝、隋唐、宋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



- 年第5期；熊传新《湖南湘阴隋大业六年墓》，《文物》1981年第4期。
- [36] 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县茅村隋墓》，《考古》1983年第2期；嵊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嵊县发现隋纪年墓文物》，《文物》1987年第11期；常州市博物馆、武进县博物馆《江苏武进县湖唐乡发现隋唐墓》，《考古》1990年第6期；衢州市文物馆《浙江衢州市隋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5期；江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江山隋唐墓清理简报》，《考古学集刊》第3集，1983年。
- [37]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牧马山灌溉渠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罗伟先《成都化工厂隋墓清理》，《四川文物》1986年第4期。
- [38] 清江博物馆《江西清江隋墓》，《考古》1977年第2期；《江西清江上阳水库隋墓》，《考古》1976年第1期；《江西清江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 [39] 徐恒彬《广东英德浚洗镇南朝隋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63年第9期；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韶关六朝隋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隋唐墓》，《考古》1984年第3期；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封开县江口汉墓及封川隋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 [40]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南安丰州东晋、南朝、唐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 [41] 这些名称是现代命名。按唐朝人的名称应该是羨道和隧道（墓道）、便房（小龕）、玄宫或玄堂（墓室）。
- [42] 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 [43] 李秀兰、卢桂兰《唐裴氏小娘子墓出土文物》，《文博》1993年第1期。
- [44] 夏鼐《敦煌考古漫记（二）》，《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
- [4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
-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 [47] 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孙秉根《西安隋唐墓的形制》，《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纪念北

- 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 [48] 《唐会要》卷三十八。
- [49] 齐东方《略论西安地区唐代的双室砖墓》，《考古》1990年第9期。
- [50] 三人勋官为上柱国，中晚唐此类勋位趋于泛滥，与实际地位关系不大。
- [51]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5年第8期。
- [52]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文物》1995年第11期。
- [53] 徐殿魁《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 [54] 尚志儒、赵丛苍《陕西凤翔县城南郊唐墓群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 [5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第9期；邯郸市文管所《河北大名县发现何弘敬墓志》，《考古》1984年第8期；刘友恒、樊子林、程纪中《唐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薛徽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 [56] 辛明伟、李振奇《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文物》1993年第6期；李振奇、辛明伟《河北南和东贾郭唐墓》，《文物》1993年第6期；廊坊市文物管理所、文安县文物管理所《河北文安麻各庄唐墓》，《文物》1994年第1期。
- [57]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发现的几座唐墓》，《考古》1980年第6期；洪欣《北京近年来发现的几座唐墓》，《文物》1990年第12期。
- [5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工作五十年》，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 [59]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长治唐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文物工作组《山西长治唐王休泰墓》，《考古》1965年第8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2年第2期。
- [60]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三号唐墓》，《考古》1960年第1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金胜村第六号唐代壁画墓》，《文物》

- 1959年第8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
- [61]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文物工作组《山西长治唐王休泰墓》，《考古》1965年第8期。
- [62] 金殿士《辽宁朝阳西大营子唐墓》，《文物》1959年第5期；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韩贞墓》，《考古》1973年第6期；高青山《朝阳新发现两座唐墓》，《辽宁文物》1980年第1期；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阳隋唐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阳左才墓》，《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8期。
- [63] 《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文武之官皆执笏，五品以上用象牙为之，六品以下用竹木”。
- [6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 [65] 徐莘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考古》1963年第2期。
- [66] 《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四。
- [67] 新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分期研究——斯坦因阿斯塔那墓葬资料的再整理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2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 [68]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新疆文物事业管理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五十年》，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 [6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新疆出土文物》图一八九；金维诺、李遇春《张雄夫妇墓俑与初唐傀儡戏》，《文物》1976年第12期；田进《唐戏弄俑》，《文物》1959年第8期。
- [70] 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期。
- [71]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
- [72]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 [73]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
- [74] 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
- [75] 刘玉林《唐刘自政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 [76] 权奎山《中国南方隋唐墓的分区分期》，《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林志干、林存琪、陈子文《福建六朝隋唐墓葬的分期问题》，《考古》1990年第2期。
- [77] 孝感地区博物馆等《安陆王子山唐吴王妃杨氏墓》，《文物》1985年第2期。
- [78] 参见权奎山《中国南方隋唐墓的分区分期》，《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
- [79] 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8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万县唐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6期；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黄土岭唐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3期；何介均、文道义《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考古》1964年第12期。
- [80]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隋唐五代宋墓》，《考古》1990年第3期。
- [81] 高仲达《唐嗣濮王李欣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北郊丝茅冲清理的唐代砖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2期；九江市博物馆《九江市郊发现唐墓》，《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1期。
- [82] 周世荣《略谈长沙唐王清墓与出土瓷器的窑口问题》，《考古》1985年第7期；益阳县文化馆《湖南益阳县赫山庙唐墓》，《考古》1981年第4期；权奎山《中国南方隋唐墓的分区分期》，《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
- [83] 江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江山隋唐墓清理简报》，《考古学集刊》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 [84] 徐州市博物馆《江苏徐州市花马庄唐墓》，《考古》1997年第3期；扬州市博物馆《扬州邗江县杨庙唐墓》，《考古》1983年第9期。
- [85] 江苏省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姚桥头唐墓》，《文物》1987年第8期。
- [86] 吴炜《江苏仪征胥浦发现唐墓》，《考古》1991年第2期。
- [87] 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发现唐墓》，《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 [88] 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管会《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

- 字款白瓷》，《文物》1979年第12期；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专刊》1981年。
- [89] 薛尧《江西南昌、赣州、黎川的唐墓》，《考古》1964年第5期；韩振飞等《赣县梅林发现唐墓》，张嗣介《赣州发现一座唐墓》，《江西历史文物》1984年第2期。
- [90]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唐墓》，《考古》1977年第6期。
- [91] 黄汉杰《福建闽侯荆山杜武南朝、唐墓清理记》，《考古》1959年第4期；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漳浦县刘坂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11期。
- [92]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福建泉州市西南郊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 [93] 林忠干、林存琪、陈子文《福建六朝隋唐墓葬的分期问题》，《考古》1990年第2期。
- [94] 广东省博物馆、茂名市博物馆、电白县博物馆《广东电白唐代许夫人墓》，《文物》1990年第7期。
- [95] 广东省博物馆、电白县文化局《广东电白县霞洞墟唐墓简报》，《考古》1986年第1期。
- [96]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6期。
- [97] 始兴县博物馆《广东始兴县晋、南朝、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90年第2期。
- [98]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皇帝岗唐木椁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12期。
- [99] 贺梓城《唐墓壁画》，《文物》1959年第8期。
- [100]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 [101] 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 [102]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壁画试探》，《文物》1974年第9期；王仁波《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题材的分析》，《考古》1973年第6期；齐东方、

- 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 [103]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金胜村第六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59年第8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三号唐墓》，《考古》1960年第1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金胜村337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
- [104] 北京海淀区文物管理所《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唐墓》，《文物》1995年第11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考古五十年》，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 [105] 同[72]。
- [106] 权奎山《试析南方发现的唐代壁画墓》，《南方文物》1992年第4期。

## 四 改变社会面貌的瓷器



唐人皮日休《茶瓿》诗云：“邢客与越人，皆能烧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sup>[1]</sup>。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说，大中年间乐师郭道源“用越瓿、邢瓿十二，旋加减水，以筋击之，其音妙于方响”<sup>[2]</sup>。“邢客”、“越人”显然指造瓷器的地区和高手，乐师击瓷瓿奏乐，分别选择邢瓿、越瓿混用，演奏出音色不同的美妙乐曲，也暗示出唐人心目中瓷器质料存在差异和名窑的出现。隋唐制瓷业发展迅速，的确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形成了诸窑抗衡争奇的局面和相互不能取代的结果。

高层贵族需要瓷器充实自己的生活，但使用瓷器的阶层并不限于使用金银器、铜器、漆器的高层贵族。瓷器质量提高和全面普及，日常用品中的很多材质的器物被瓷器取代，给整个社会生活面貌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迅速膨胀的需求，使南北朝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制瓷业在隋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产业，不同地区的专业化生产也为瓷器质量的提高提供了条件。精美瓷器的生产对原材料产地、产品的方便输出有较多的依赖，突破单一地区控制产品和销售的局面，又仰仗与商业的紧密联系。隋唐各地方瓷窑兴起以后，产品之间互相竞争，逐渐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特别在唐代中后期经济重心南移的社会大背景下，更掀起了中国瓷器生产和使用的新篇章。

有关隋唐瓷器的收藏的描述，至少从宋代笔记小说中就能见到，此后不断出现专门议论陶瓷器的著作。这些记录充满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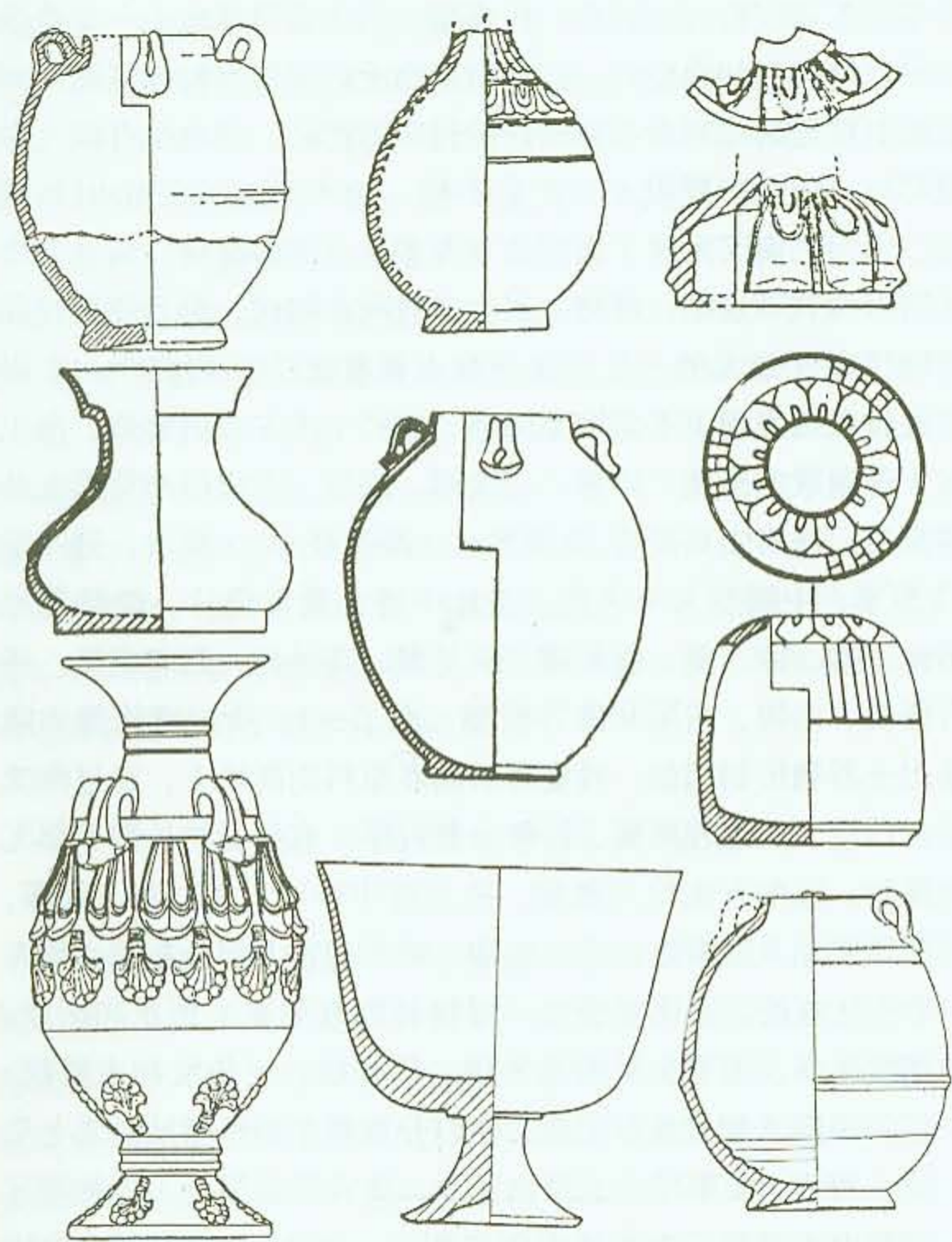
赏趣味，价值取向与商品经营和古董收藏相关。然而，收藏与鉴赏自然涉及瓷器的窑口问题，在不满足于对传世器物鉴定和购买交易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到野外调查，试图突破原有的范围，找到各种瓷器的产地。20世纪初现代考古学出现，又将生产地点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探索历史。50年代以后寻找瓷窑成为很多人的兴趣和主要的工作，开始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发掘，使瓷器研究从古董鉴赏中分离出来，标志着陶瓷考古学的出现。考古学认为，除了精美的瓷器，那些有明确出土地点、与其他遗迹遗物共存、反映器物组合和生产情况的零碎瓷片，也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并应得到格外的重视。由于持续不断的考古调查发掘，到20世纪末，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已经发现了数不清的隋唐瓷窑遗址，同时，墓葬中也出土了大批遗物，使得瓷器研究取得了根本性的进展。

### （一）充满创新的隋代瓷器

谈到瓷器，隋代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时期，因为传统的瓷器研究方法几乎无法把短暂的隋代的遗物与唐初遗物相区别。现代考古学不仅能准确断定出隋代遗物，而且发现了中国瓷器制造业的许多成就都是隋代发其端倪。隋代作为中国瓷器烧造发展中的转折时期，南北系统形成大体从这时开始明确，无论青瓷还是白瓷都得到长足发展，中国瓷器烧造成熟和真正的普及也从隋代开始。

最早明确隋瓷风貌是借助于墓葬中的遗物。安阳隋仁寿三年（公元603年）卜仁墓出土的青瓷四系罐、杯、高足盘<sup>[3]</sup>，是首次发现的有明确年代的隋代瓷器。50年代安阳又发现隋

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张盛墓，出人意料地出土一批烧造水平已经很高的白瓷器。这些隋墓出土的瓷器当初曾推测为河北磁县贾壁窑或河南巩县铁匠炉村窑的产品。两地虽有隋代青瓷窑址，但生产规模小，产品不精。70年代后在安阳旧城北、洹河之南又发现了面积达9万多平方米的窑场，窑址中出土隋五铢钱等遗物，可知主要生产时间在隋代，是目前所知北方隋代窑址最大的一处，这一地点被称之为安阳窑<sup>[4]</sup>。安阳窑经过试掘发现了平面略呈圆形、内径1米左右的窑炉，出土耐火土制成的柱状、环形、三叉形、圆形、多齿形和筒形支具等窑具。筒形支具高约10厘米，一端直径10.5厘米，另一端13厘米，中腰有三个火孔。遗址中的大量青瓷片，能够复原出碗、盆、钵、瓮、四系罐、高足盘、高足杯、瓶和壶等，还有俑类、动物、房屋和碓等模型（图二一）。所出遗物都和隋墓出土器物形制相似。残瓷器的胎坯原料用高岭土，经过淘洗呈灰白色，质地较细腻，胎壁一般较厚，有些器物外壁下部无釉露胎。施釉方法均为蘸釉，色彩青中带绿、黄、灰、褐等，有些坯胎先入窑素烧，然后施釉。碗类器物大部分在碗心留有三个支钉痕迹，说明是叠烧。器物装饰有刻花、划花和印花，莲花纹居多，还有少量的忍冬纹、草叶纹、三角纹和水波纹。卜仁、张盛两墓的墓志记载，他们分别葬在相州相城西北七里定延乡和相州安阳城北五里白素乡，离安阳窑很近，故推测这些墓葬出土瓷器应为当地安阳窑所产。90年代安阳市安阳桥发现的隋墓出土瓷器140件，其中瓷殿宇建筑模型内壁一侧刻划“相”字，为断定安阳隋墓中青瓷的产地又提供了证据<sup>[5]</sup>。此外，河南巩县、河北磁县也发现了隋代青瓷窑址<sup>[6]</sup>，但没有安阳窑规模大。



图二一 隋代安阳窑瓷器

为什么安阳能成为北方瓷器烧造的中心呢?《隋书·梁彦光传》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记载:“初,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惟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州郭”。北周大象二年(公

元580年)杨坚辅政,相州刺史尉迟迥举兵不顺,杨坚令韦孝宽讨灭,“焚烧邺城,徙其居人,南迁四十五里,以安阳城为相州理所”<sup>[7]</sup>。北周灭北齐和隋得天下时,都把后赵、燕、东魏、北齐的政治、经济中心首都邺城的人员大量向南迁移至今安阳一带,其中的“技巧”之家,应当包括了手工业者。安阳因此较早地发展了制瓷行业。从安阳出土的隋代莲花器座、器盖、房屋模型及青瓷武士等遗物来看,窑场的产品复杂,有高级用品,广泛采用叠烧技术,产量很大,应是北方青瓷烧造的中心之一。

隋代青瓷的造型、质地带有浓厚的北朝晚期风格,继承发扬了贴花和高浮雕装饰,其中最多的是莲花,许多器物如瓷座、瓷兽、博山炉甚至俑都有莲花雕塑式的底座,这些特点显然来自北朝传统和佛教艺术的影响。而张盛墓出土的象首壶、贴花兽环壶,李静训墓<sup>[8]</sup>出土的双系螭把鸡首壶、螭首双把双身壶以及中间带折棱的四系罐等,则代表了新器物群体的出现。

白瓷较成熟地烧造应是隋瓷发展的重要标志。虽然白瓷的出现可追溯到北朝晚期,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范粹墓出土的白瓷便是实例<sup>[9]</sup>,但同时期很少有其他白瓷出土。隋代张盛墓的白瓷俑、镇墓兽、象首壶、贴花兽环壶、围棋盘已经十分精美。白瓷俑和镇墓兽分别高达75厘米和50厘米,还出现了白瓷黑釉彩,令人大开眼界。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西安李静训墓出土瓷器17件,其中有白瓷双系螭把鸡首壶、螭首双把双身壶、罐、双耳扁瓶、瓶共6件。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西安李椿夫妇墓出土的四系罐、唾壶也是白瓷。隋大业六年西安姬威墓和大业七年西安田

德元墓、山西太原斛律彻墓也纷纷出土白瓷器<sup>[10]</sup>。

大量考古发现表明隋代白瓷已经形成群体，器类有俑、镇墓兽、高足杯、盅、辟雍砚、双系螭把鸡首壶、螭首双把双身壶、罐、双耳扁瓶、瓶、碗、四系罐、盂等，证明隋代白瓷的盛行，并可以看出白瓷有逐渐增多的趋势。烧造白瓷必须把胎釉中的铁成分排除，多一道工序，显然比烧青瓷复杂。张盛墓的白瓷的釉色有的泛青，有的闪黄，带有青瓷的特征，按白瓷的标准衡量，这些瓷器烧造并不很成功。时代稍晚的李静训墓出土的白瓷具有火候高、胎质白、釉色晶莹、开片均匀、器形多样等特征，已克服了釉色不稳定、胎质不细致的缺陷，表明隋代白瓷制造的不断成熟。但是总体说来隋代白瓷与青瓷相比数量仍然较少。从出土白瓷的墓葬的主人看，张盛为魏征虜将军、中散大夫，斛律彻为右车骑将军，李椿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河东郡开国公，姬威为隋使持节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右卫率、右备身将军、司农卿、龙泉敦煌二郡太守、汾源良公，田德元为豫章郡西曹掾。李静训虽为9岁小孩，却是皇室的亲属，地位更高。墓主人均为当时地位很高的人物。安阳发掘的一些小型隋墓，较普遍地出土了瓷器，但均为青瓷。可见在隋代白瓷十分珍贵，使用者主要为上层社会。西安、洛阳之外，安徽亳县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王干墓<sup>[11]</sup>出土瓷器中有隋白瓷大盅四件、白瓷小盅一件，白瓷辟雍砚一件。王干为太原人，曾当过隋亳州总管府参军，开皇二十年迁葬于今亳县，其墓中白瓷可能产于北方。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宁夏固原右领军骠骑将军史射勿墓<sup>[12]</sup>也出土白瓷碗，大约也来自中原地区。关于隋代白瓷的产地，由于张盛墓与安阳窑同在一地，出土瓷器的烧造地点有可能就在安阳窑<sup>[13]</sup>。而李静

训墓和郭家滩隋墓的白瓷，被推测产于邢窑。

邢窑是见于文献记录的著名窑场。直到1980年，邢窑窑址才在河北临城和内丘交界处找到，位置与唐人李肇《国史补》所载“内丘白瓷”在地点上相符。1982年又在临城的陈刘庄东大沟南北两坡发现窑址23座，其中有两座为隋代，均以生产白瓷为主<sup>[14]</sup>。陈刘庄窑址采集到隋代较完整的器物30多件，有青瓷和白瓷。主要产品是碗、钵、盆，其次是杯、罐和壶。窑具有圆形支柱、支钉、三叉形垫片、支柱。烧造方法为叠装、套装和单件装。内丘发现窑址28处，采集到的属于隋代的青瓷和白瓷器物有碗、杯、盘、盆、壶、罐、瓶等，可见已用桶式匣钵烧成了细白瓷。隋代邢窑遗迹现存两座窑膛底部，还发现储存瓷土原料的地窖。一座窑膛底部直径1.7米，断面呈馒头状。采集的器物残件分粗胎和细胎两类，成功烧出了薄胎透影白瓷。叠装的器物之间放三叉形垫片，故产品腹心留有三个钉痕。隋代邢窑生产的器物是民间常用器，瓷土采用低硅高铝原料，同时含铁量也不少，经高温焙烧后的胎色多呈浅灰或青灰。白釉属于石灰釉，一般把优良的瓷土经过精细的淘洗后再加适当的石灰即可制成，釉的呈色比较稳定。施釉方法是蘸和荡两种。窑具上还发现了字款和符号，有窑工姓氏、吉祥语，筒形匣钵上刻有“笼盖”字样，说明隋代人称匣钵为“笼”。

必须指出的是，窑址出土的遗物并非完全代表邢窑的烧造水平，因为窑址遗留的不过是残次的废品，真正合格精美的作品很少会出现在废弃的窑址中。西安、洛阳隋墓出土的白瓷，才是大体反映当时白瓷烧造成就的标本。

邢窑不是专门的白瓷窑，也烧青、黑釉瓷。青、黑釉属铁

质釉，是自然釉，储量很大。青、黑釉呈色不稳，依照烧造气氛会呈不同的如青、青黄、黄、黑、酱紫或紫红等色调，这些也是主要产品。但邢窑是目前所见北方地区隋和唐前期烧造白瓷窑场的代表，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烧白瓷的窑址。隋代邢窑的器物和制作工艺与后来的岗头村、祁村、西双井唐代邢窑一脉相承，是存在密切关系的同一系统的窑群。只有经过隋代白瓷烧制经验的积累、并经过一段时间生产后才会有唐代瓷器的提高和普及，文献记述的“内丘白瓷瓿，……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情况才会出现。

隋墓中白瓷和邢窑的发现，证明了白瓷的迅速发展，结束了中国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瓷器制造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白瓷广泛出现在河南、陕西、山西、安徽、宁夏等地，虽然来源有可能是中原地区，但邢窑未必是仅有的产白瓷的窑场。隋代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为瓷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邢窑位于陈刘庄东大沟南北两坡，大沟是古河道，安阳窑在洹河之南，都便于生产用水和产品外运。总体来看，北方地区瓷窑兴起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淄博、枣庄等地，以后逐渐扩大。

南方地区青瓷烧造历史悠久，南朝时期已经相当普及。江西的洪州窑隋代开始使用化妆土，即在器物成型后，于其上加涂一层颗粒较细、颜色较白的涂层掩盖胎的颜色，使釉面光滑，呈色淡青。装饰流行戳式模印技术，花纹为各种植物叶和小花，是当时中国各窑中最丰富的。这些技术措施使其产品深受喜爱，不仅江西隋墓多有出土，广西、广东、湖北、浙江隋墓也有发现，表明青瓷已迅速普及。湖南湘阴县发现规模很大的窑址，早至两晋，盛在南朝隋唐，称为湘阴窑<sup>[15]</sup>。这些窑

址烧造青瓷钵、盆、罐、盏、碗、盘、瓶、砚、炉、盂等器皿，还有俑和各种动物。装饰采用模印、贴花和绿褐等釉下彩绘。隋代开始使用匣钵，印纹减少，器物比较朴素。安徽淮南上窑镇上刘庄窑址为隋代寿州窑，标志着南方地区中心窑场的不断变化。

隋代大、中、小型墓葬中普遍出土瓷器，反映出普通瓷器不再是珍贵物品，已经广泛普及到民间。到了唐代，瓷器的南、北区别仍然比较清楚，但与前代不同之处在于，除了生活环境和历史传统造成的人们的审美意识差异所形成的区别外，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推动着制作者为迎合社会需求而创造出新产品。当然，不同地区瓷器产品的形制、纹样并非截然不同，唐代南北便利的交通和频繁的往来，区域性文化差别已经不似前代那样明显，只能从总体上看到北方与南方地区器物各自的群体特征。

## （二）唐代北方的名窑与窑系

大量窑址的发现，证明了唐代瓷器生产地区扩大，产品种类增加，工艺质量提高，而且成为当时比较普及的日常用具。由于各地原料、传统文化的不同，出现了著名的窑场窑系，也体现出考古学上的区域性文化特征。

对唐代瓷窑的定名方式有两种，一是根据文献，主要是根据陆羽的《茶经》，以当时的州为名，如邢窑、越窑等；另一类是有考古发现却找不到历史文字记录的窑场，这种情况一般以发现地点命名，如黄堡窑、长沙窑等。

唐代瓷器原料通常选择高岭土，烧造温度一般在 1200℃



以上，成品不渗水，釉色有青、白、黑、酱、褐、黄及绿彩、蓝彩等。烧造工具中比较普遍地使用了匣钵，装在匣钵内烧造的瓷器釉面光洁，色泽均匀，胎体变薄，精巧秀丽。匣钵多用耐火土制成，由于耐高温，可叠装很高，为加高窑室，增加窑内装烧空间创造了条件。装窑的方法和坯件的烧成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对增加产量和保证质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及唐代瓷器，人们经常引用唐人陆羽所著《茶经》<sup>[16]</sup>，因为书中提到越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鼎州窑。饮茶之风的确刺激了制瓷业的发展，但这些窑不能概括唐代制瓷业的全貌，也未必是仅有的名窑，而且《茶经》只是从饮茶的角度谈茶具的优劣，而不是品评瓷器的成就。现代考古发现的窑址，远远超出《茶经》提到的几个，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浙江、江苏、江西、安徽、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福建都发现唐代瓷窑遗址，无论产品水平如何，却是丰富多彩，唐代制瓷业的大致面貌也由此得到反映。

### 1. 邢窑的崛起和白瓷的普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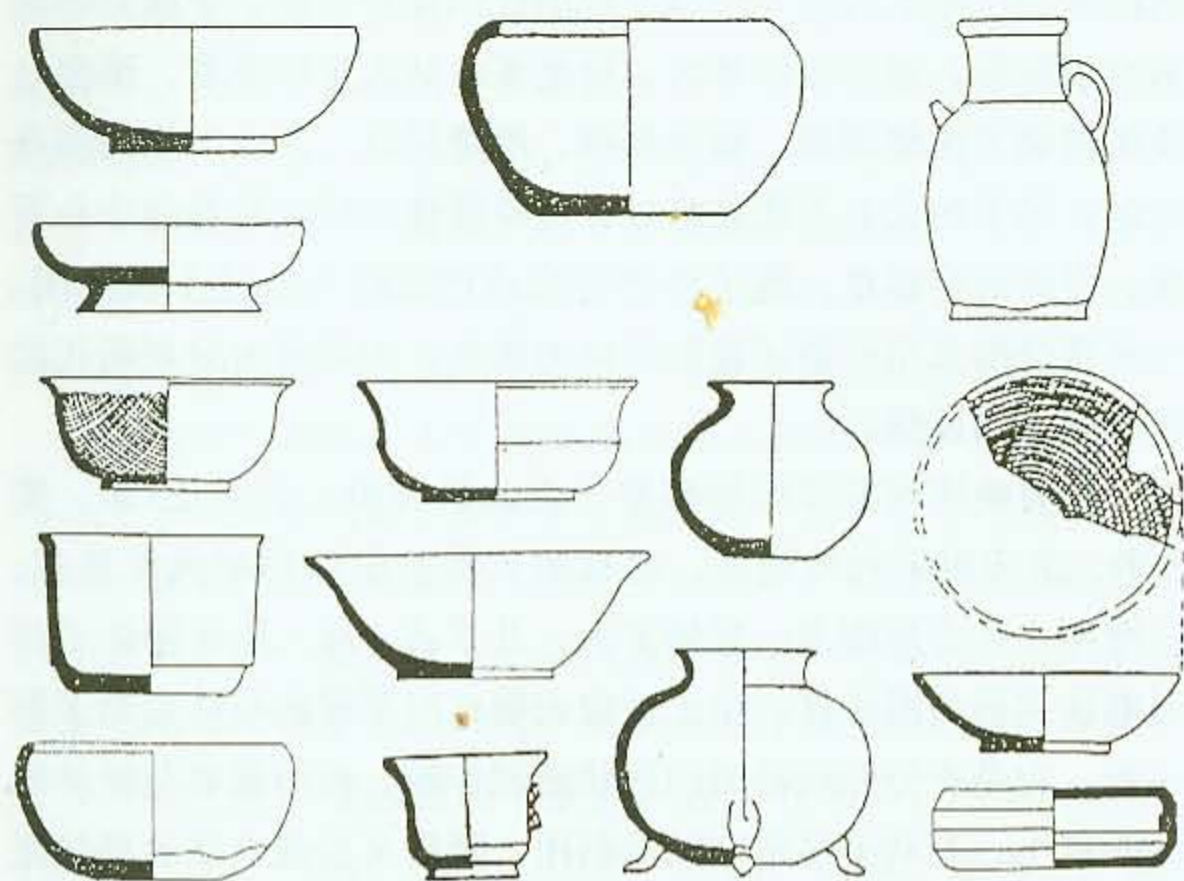
《茶经》中赞叹“邢瓷类银”、“类雪”，无非强调一个“白”字，指出邢窑以白瓷而著名。邢窑遗址尽管有隋代遗存，主要还是唐代遗迹。邢州人善烧瓷，“内丘白瓷瓿，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sup>[17]</sup>，所记是唐开元至贞元（公元713~805年）之间的事。既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那么必然有相当长的发展时期。

文献中讴歌邢瓷，长期却是以传世品和墓葬出土的某些白瓷为议论的对象，对生产邢瓷的窑场只有一些推测，直到1980年才在河北临城和内丘交界处确定了其中岗头村、祁村、西双井的四处窑为唐代邢窑遗址<sup>[18]</sup>，1982年又在同一大范围

内的陈刘庄东大沟南北两坡发现唐代白瓷窑窑址。中唐是邢窑的全盛阶段，细白瓷产量大，种类多。从大量标本看，邢窑已使用覆烧方法烧制碗、盘类器物。覆烧是以三角支钉作间隔叠烧的，最下的支具可能是窑柱，这样覆烧的特点是叠烧中心下移，可提高窑容量，到了晚唐邢窑这种装烧方法已不再使用。中唐覆烧的采用开创了瓷器覆烧的先河，为邢窑的分期断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祁村晚唐时期邢窑的窑室平面为长方形，长6.23米，宽2米，窑床用耐火砖铺成，再抹耐火泥，窑墙用耐火泥筑成。后壁两个长方形烟道。燃烧室大，几乎占1/2，从而保证了当时能达到的高温条件。出土遗物表明这时邢窑的匣钵创制了漏斗形，它是充分照顾器皿的形状而制作的，使得器皿与匣钵间的距离小，有利于窑室空间的利用。随后又出现盒状和杯状匣钵。器物种类有碗、盘、杯、钵、瓶、罐、壶、盏托、盒、枕、注、多足砚、炉及动物、骑马俑等（图二二）。器物多为宽底足，即玉璧底器物，仅有少量装饰有刻花和印花。瓷器原料是高岭土和长石，属低硅高铝成分，白釉属于石灰釉，釉中 $Fe_2O_3$ 和 $TiO_2$ 含量很低，是把优良的瓷土仔细淘洗后再加适当的石灰制成。白釉呈色稳定。施釉方法是蘸和荡两种。邢窑白釉瓷的技术成就是新原料的使用和胎釉配方的改进。烧成温度一般超过 $1300^{\circ}C$ 。器物残件洁白素面，分粗胎和细胎两类。

邢窑器物中发现了较多的字款和符号，不仅出现在瓷器上，还散见于一些窑具上。祁村遗址发现的最多，可分两种：一种是刻在碗、罐类器物底部以窑主或定货人的姓氏为主的刻铭，如“□弘”“季”“士”“田”“张”“王”“□楚□”“初”



图二二 唐代邢窑白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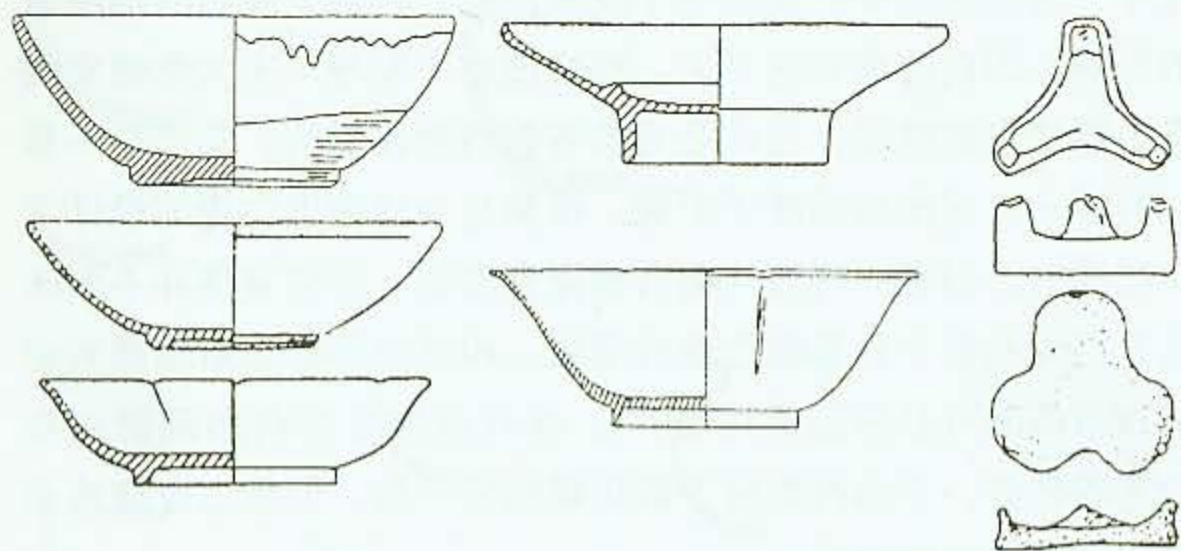
“佐”“口”“德”“交”“杨×”“荣终”等。一种是在窑具上，主要是盘形匣钵或盖上，随便刻划上“十”“|”“||”“||”“卅”“×”“井”等符号。另外在内丘城关窑址上发现了一定量的“盈”字款器物残片。这些字款符号应是窑工留下的印记，反映出古代窑工们对其产品的重视或拥有。这些字款与符号也可能是一种标记，反映着多家共用一窑，单做共烧的生产方式。内丘城关窑址上单一“盈”字款似乎说明了有的制瓷窑场可能是被某一个人或机构控制。

陈刘庄窑址群是邢窑较早的烧造地点，以后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一个在生产上存在密切关系的同一系统的窑群。但邢窑产地的中心因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采矿量无保证，唐大和

九年（公元835年）又发生了洪水泛滥，再加上晚唐时期战争的影响，因此逐渐衰落下去。邢窑遗址中发现一座大燃烧室内有小燃烧室的情况，也许是为节省燃料而改造的，是邢窑不景气的暗示。这座窑始建于中唐，推测是为烧精细白瓷而设计了大燃烧室，到晚唐时改烧粗白釉瓷和青瓷。邢窑衰落并不意味着北方白瓷和整个瓷器制造业的滑坡，相反继邢窑之后北部的定窑和南部的巩县窑迅速兴起<sup>[19]</sup>，而且很快在河南出现烧白瓷为主的窑群，并向西影响了铜川耀州窑产品。但就白瓷烧造而言，邢窑有开创之功。

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在晚唐五代已粗具规模，宋以后形成独特风格，成为名窑之一。定窑在20年代就有中外学者前往调查。早期定窑烧白瓷，釉料含铁和钛，以木材为原料，在还原气氛中以1300℃烧成，釉色白中闪青，白度高，还有一定的透明性。五代时的窑与晚唐邢窑基本相同。窑具和烧制方法继承了邢窑工艺技术，有漏斗形和桶状匣钵，不过是叠装多个坯件装烧，坯件之间放三叉支钉、支圈或垫饼。器物造型分两类，一类仿邢窑，即玉璧底圆唇口器物。器物种类也与邢窑相似。器物成型以拉坯为主，一般胎薄细腻，制作精巧。碗为平底或玉璧底无釉，采用一钵一件的支烧法，器体与窑具间有石英沙粒隔垫。晚唐五代定窑使用支圈等间隔装在匣钵内覆烧，有的器物口不挂釉，称芒口，同时器物外壁也产生了不美观的落灰。另一类是仿金银器的碗、盘、杯，制作出三角、四方、五方、八方、椭圆、折腰等形状的器物，除了圈足部分外，采用内模压印的方法。器物装饰比较简单，有花瓣、瓜棱、叶状等等（图二三）。

50年代末在河南巩县黄冶河和白冶河沿岸发现生产精细



图二三 唐代定窑白瓷

白瓷的窑，产品以碗、盘为主，碗形多达十几种。也有高足盘、豆、唾盂、粉盒、单柄杯、瓷枕。器物上未见装饰，只是有的碗口做成四花形，并于碗里有凸起的直线。巩县窑白瓷烧造规模小，时间短，影响不及邢窑和定窑，但烧瓷温度达 $1300\sim 1350^{\circ}\text{C}$ ，是当时最高的温度之一。河南在唐代以烧白瓷著名，产品向长安进贡<sup>[20]</sup>。目前已经在巩县、辉县、密县、登封、邙县、鹤壁发现多处烧白瓷的窑。河南密县窑接近巩县窑，但瓷质较粗。山西浑源和平定也发现白瓷窑，它们受邢窑和定窑的影响，甚至被看作是定窑系。此外，陕西铜川的黄堡窑也烧白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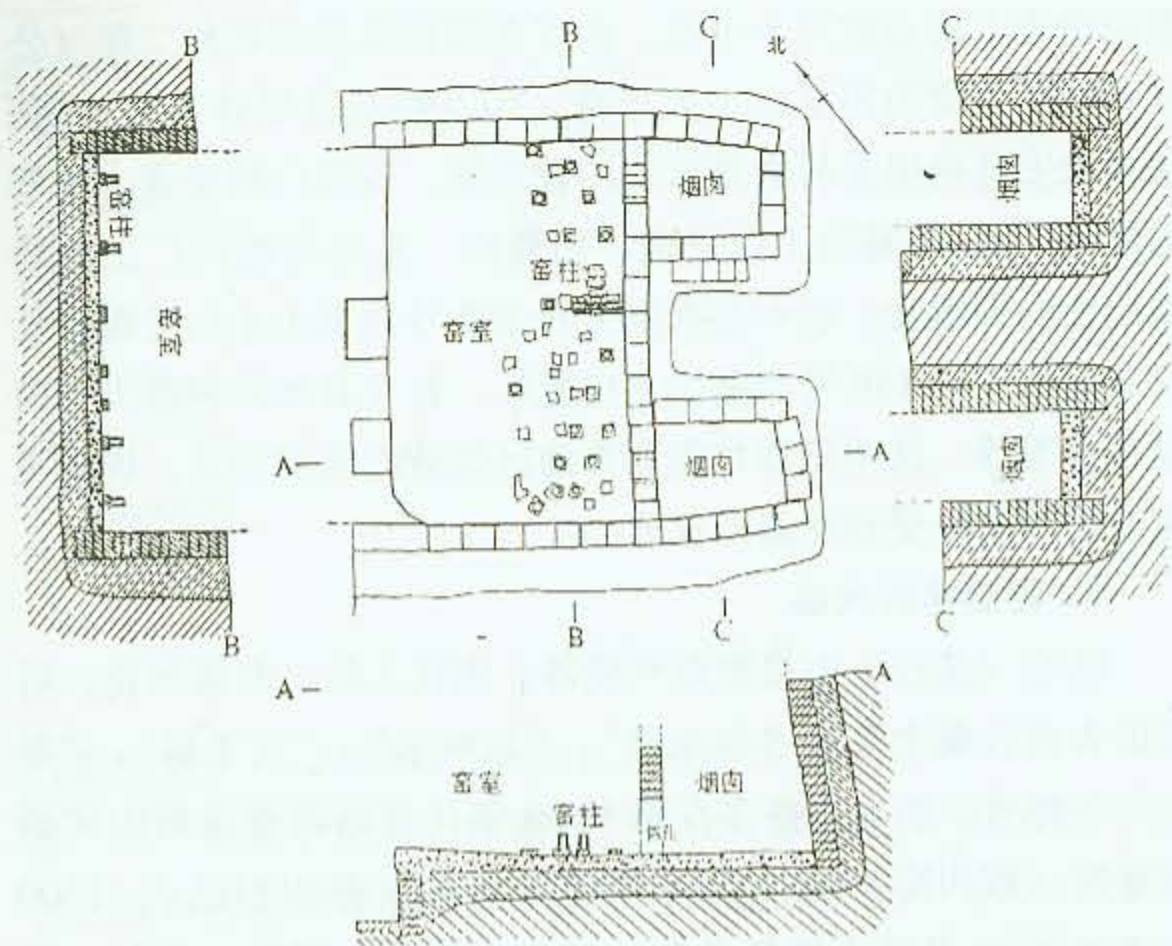
如果说白瓷发端于北朝，成熟于隋，那么唐代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峰。《茶经》说：“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磁类银，越磁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磁类雪，越磁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磁白而茶色丹，越磁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这种带有辩论情绪的“抑邢扬越”，证明的只是士大夫之间在用什么样的茶具问题上的争议，精美的邢窑白瓷在中国瓷

器制造史上的贡献功不可没。西安东郊韩森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段伯阳墓出土人形尊、印花贴花高足钵及小口罐。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唐墓出土白瓷香熏、短流白釉瓷壶。东郊国棉五厂65号墓出土白瓷碗、白瓷樽。东郊国棉四厂工地唐墓出土白瓷唾壶。长安县南里王村227号唐墓出土白瓷罐。长安县南里王村150号唐墓出土白瓷坛。长安县北原唐墓出土白瓷盖盒等等。这些瓷器均为北方地区烧造的精美制品，说明飞速发展的白瓷受到普遍的欢迎。

## 2. 黄堡窑的兴盛

陆羽《茶经》中提到鼎州瓷器，宋代文献记有耀州瓷，后来的古董收藏中又有“临汝窑”、“北丽水”、“北龙泉”、“秦窑”等称号。所有这些多少都和50年代开始调查发掘的陕西黄堡窑（耀州窑）有关。90年代黄堡窑发掘面积已达11500平方米<sup>[21]</sup>，发现了原料备制、成型、修坯、装饰、施釉、晾干、装烧和成品等制瓷工序的全过程。

黄堡窑中的6号窑和28号窑（图二四），平面为马蹄形，由窑门、燃烧室、窑室和烟囱组成。窑门至燃烧室、窑室呈扇状。两窑结构基本相同，为馒头形半倒焰窑，体积较大，6号窑面积为10.95平方米，窑容量可达21.90立方米。以木柴为燃料。两窑以烧黑釉瓷为主，兼烧青瓷和茶叶末釉瓷。6号窑出土罐、瓶、钵、盏。28号窑出土执壶坯、盏、碗等。12号窑平面为葫芦形，前窑室为圆形，直径0.9米，后窑室亦为圆形，直径0.84米，两室间有火道相连。烟囱在后窑室后部。此窑规模小，是一种横焰窑，只能小批量生产，或进行产品试烧。窑门前有一处四周用砖砌成的操作场地。窑具有匣钵、耐火架板、支烧具、垫烧具。器物烧造时都是正烧，分为叠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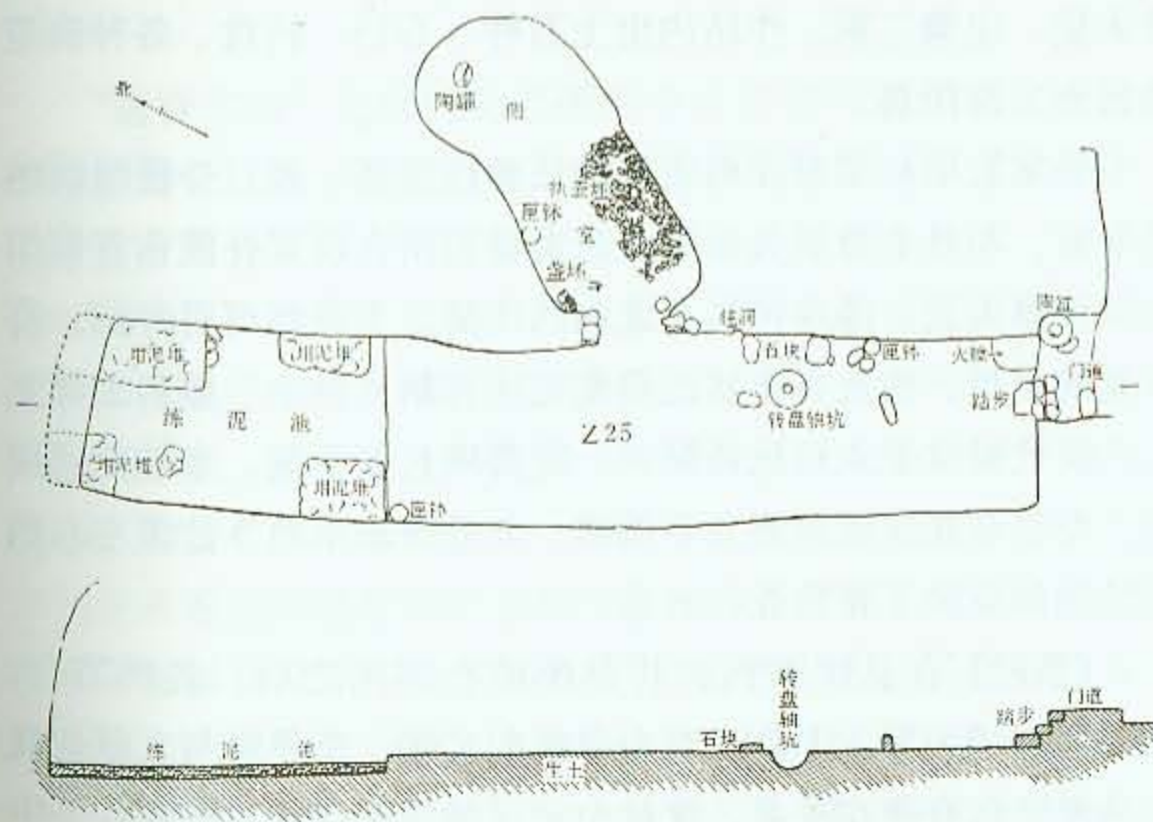
图二四 黄堡窑第28号窑址平、剖面图

套装和单件装。

黄堡窑产品以青瓷为主，也有白瓷、黑瓷，器物有食具、酒具、茶具、化妆具、照明具、文房用品、药具和净瓶等。器物多为宽底足，即玉璧底。青瓷胎较粗，呈灰色或灰白色，釉色泛白、泛灰、泛黄的较多。也有的青瓷透明度好，颜色较纯正，是当时名列前茅的产品。装饰有刻花、贴花和印花。白瓷的釉色纯白者少，泛灰、泛黄者多。黑瓷胎厚重，釉色漆黑闪亮。还烧造黄瓷、茶叶末釉瓷、黑釉刻花添白彩瓷、花釉瓷、白釉绿彩瓷、白釉褐彩瓷、青釉白彩瓷、青釉褐彩瓷、素胎黑花瓷，种类十分丰富。制法有轮制、模制和捏塑。瓷器上有许

多题刻文字，有姓名、器物编号、装窑时的火位标记、年款、吉祥语等。姓名近20个，如“张缙自造”等等，年款有“大中”、“元和”、“咸通七年三月”等。根据题记和器物特征，唐代的产物主要应属9世纪即中晚唐时期。

黄堡窑重要的发现是分布在漆水岸边依崖挖成的八座瓷器作坊，可以据以分析不同窑的产品分工情况和瓷器烧造组织、生产关系等。其中25号作坊（图二五）由主室和侧室组成。主室平面呈长方形，面积为38.14平方米。侧室面积为9.65平方米。主室内有储水缸、火膛、工作平台、转盘轴坑，后部为石头铺底的练泥池。侧室堆放约150件已经成形的执壶坯和约20件盏。这个作坊主室用于练泥和成形，侧室用于储存坯件和施釉，从事执壶和盏的生产。4号作坊呈长方形，南北残



图二五 黄堡窑第25号作坊平、剖面图

长 12.3 米，东西宽 2.6~2.9 米，残存面积 33.38 平方米。整个作坊分前后室，中间有墙相隔，有门相通。前室西南角有一堆已成型的执壶坯。后室西南角有一方形火塘，中部有圆形转盘轴坑，北部放两个大陶瓮和坭泥两堆。出土开元通宝钱币和大量白、黑瓷片。后室用于器物制造时的拉坯成型，前室晾坯。以生产白釉玉璧底碗和黑釉短流执壶为主，应属晚唐时期。8 号作坊残存面积 21 平方米，北壁偏西有烟囱一个，室内有许多罐、瓶坯件，有的挤压成团，据出土瓷片统计，此作坊以生产黑瓷为主。20 号作坊是露天场地，残存面积 69.75 平方米，保留有淘洗池、沉淀池、陶缸等遗迹，是专门备制泥料的场所。12 号作坊内有排列整齐的陶罐、瓷缸，是施釉的场所。7 号作坊以生产黑瓷为主。24 号作坊主要生产黑瓷和茶叶末瓷，也兼三彩。作坊内出土石杵、石臼、转盘、各种模范和修坯装饰用具。

瓷窑发展初期对原料资源的依赖性很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与社会背景关系很大。黄堡窑所在位置在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附近。漆水河自东北向西南流，至黄堡河谷开阔，有较宽的川道，附近有丰富的陶瓷粘土和耐火粘土，原料来源充足。唐代时这里人口比较稠密，距都城长安不远，水陆交通便利，瓷窑业在这里兴盛并不偶然，此处出现东西 3 公里左右的大窑场即反映了瓷窑业的兴盛。

《茶经》在品评茶具时将鼎州放在越州之后，名列第二，鼎州窑遂成为考古工作者着力寻找的窑场。黄堡窑与文献记载的鼎州窑似有密切关系。文献中记录的鼎州盛唐时设置在关中三原地区，仅存在 11 年<sup>[22]</sup>。黄堡镇距之较近，但其间亦有许多古窑址，黄堡窑是否为陆羽所说的鼎州窑虽不能肯定，但属

鼎州窑系诸窑之一应无问题。

黄堡窑主要烧造青瓷，还烧少量高水平的黑釉瓷，胎多呈深灰色，发现的黑釉塔式盖罐是代表作。除黄堡窑外，北方地区还有一些重要的瓷窑。山东淄博磁村窑唐代盛烧黑釉瓷，以碗为主，还有瓶、壶、罐、炉，釉质晶莹滋润，色黑如漆，产量较高。河南巩县窑、鹤壁窑、郟县窑和山西浑源窑也烧黑瓷，黑釉瓷所用原料含铁量多，容易找到，故在各窑中兼烧。但这类瓷的精美和发扬光大是在南方的建窑和吉州窑。河南郟县瓷窑还生产花瓷<sup>[23]</sup>。北方地区的窑炉多是大燃烧室、小窑室、多烟囱。

### （三）长盛不衰的南方青瓷窑

“南青北白”在唐代瓷器研究中已是过时的说法，因为北方也烧青瓷，南方也烧白瓷，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从总体上说，北方白瓷更盛，南方青瓷精美，也还是基本事实。南方青瓷的烧造历史悠久，南朝时已形成不同特色的窑址，唐代出现了窑系及生产中心。考古发掘表明，尽管许多窑场烧造瓷器延续时间很长，隋唐遗迹只是其中一段时间或众多窑址中的部分遗迹，但著名窑场和特色产品都是在这时逐渐明确。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普遍烧造瓷器的基础上，地理条件和运输条件自然地调节了窑场和窑系中心的转移<sup>[24]</sup>，自然灾害、战乱等突发事件也会引起窑场的兴衰。各窑间的产品对比，新技术的出现，交流和竞争，使优者兴旺、劣者衰落的法则得到体现。而一些窑场的产品相似，形成由许多窑组成的窑系和名窑。

50 年代，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些文献没有记载过的窑

被《茶经》指为“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的洪州窑产品，至多只是作为茶具得不到部分人的偏爱，事实上洪州窑产品很受时人欢迎。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韦坚献南方各郡特产时，特别提到豫章郡（洪州）名瓷茶碗等<sup>[28]</sup>。1979年在江西丰城赣江西岸罗湖地区发现一处窑场<sup>[29]</sup>，揭露面积439平方米，清理窑址两座，是依山而建的龙窑，出土窑具有匣钵、锯齿形支圈、三足支圈、垫圈、泥团支钉、托座。青瓷器有碗、杯、高足杯、盅、盏、盏托、高足盘、钵、壶、唾壶、碟、罐、砚、炉等。碗、杯、盏、钵一般为轮制，釉色分青绿、黄褐和酱褐，装饰手法有印花、堆贴、捏塑。采用较强烈还原焰烧成，先在胎坯上涂白色化妆土。匣钵普遍使用，碗和盘经常套烧。常见纹样有重圈纹、重圈间水波纹、莲瓣纹、梅花纹、篦纹、弦纹，还有月华纹、柏树纹、蔷薇、宝相花等。发掘表明这是一处始烧于南朝、晚唐终烧的窑场，并首次确定了这里就是文献记载的洪州窑<sup>[30]</sup>。其后多次调查发现三十多处窑址，是一个庞大的窑系。罗湖村的对门山、上坊、尚山、乌龟山窑场为隋至中唐时期，曲江村的孟家山和窑仔岗、丰城市区公安大楼建筑工地、石上村的黄金城、罗坊村的罗坊和窑里等窑场基本是晚唐五代时期。

90年代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sup>[31]</sup>，清理了三条龙窑窑炉，确定了该窑场东汉晚期就能烧造青瓷，东晋南朝兴盛并一直延续到中唐，晚唐五代衰落。洪州窑在东晋南朝扩大生产规模，烧造技术明显提高，东晋开始使用匣钵，还出现了瓷器焙烧时放在炉内验火、试验烧成情况的试火具。隋唐时期大量生产日常生活普遍使用的高足盘、平底钵、多足砚。器物几乎都在匣钵中烧造，纹样以重圈纹为主，而且多饰在侈口杯、敛口

深腹大盂的外侧。在提高产品质量方面出现化妆土。洪州窑原料含铁量高达5.93%，铁在胎料中直接影响釉的呈色效果，含铁量越高颜色越深。匣钵也广泛使用。产品形成自身特色，与当时的岳州窑、婺州窑展开了竞争。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洪州窑人改变了竞争手段，他们发现由于原料含铁量高，器物胎釉深是无法克服的，如果仅以青瓷为标准，即便施化妆土也难以与其他窑相比，而且要增加工序和成本，因此扬长避短，更加深釉色，追求釉色本身的装饰效果。为保证质量，胎面仍用化妆土，不过颜色为灰色，釉料含铁量高达4.49%，使产品呈青泛深黄、青泛褐黄，独具一格。中唐以后，洪州窑产品特色更为显著。

瓷器作为商品容易产生两个结果，一是有的产品因社会需求量突然增加而造成质量暂时下降，为了满足需要而大量生产，为提高效率而降低了质量。二是产品必须经受市场选择，面对竞争不得不采用新技术，创造特色产品。南朝以来南方地区几乎遍地开花的青瓷窑场出现了分化，窑场的建立、衰退和移动频繁。考古工作者对浙江瓷窑遗址做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发现三国至明代窑场400多处，继越窑之后在东汉末始烧，唐宋进入鼎盛的婺州窑场也得到了确定，属于唐代的主要有东阳歌山窑群、金华华南窑群、兰溪香溪窑群。产品胎色较深，呈深灰、紫色的青釉、青灰釉和青黄釉，兼烧褐瓷，有的外施大褐斑、褐色短线。主要行销江南沿海一带<sup>[32]</sup>。富有特色的寿州窑也在安徽淮南上窑镇发现，窑场遗址十几处，创烧于南北朝晚期，兴盛于隋代至唐中期，衰落于唐代晚期。其中管家嘴窑址在隋和唐初，大刘庄窑址在隋晚期到盛唐时期，余家沟窑址约在盛唐到晚唐，上窑镇窑址为中晚唐，外窑、泉山窑址约

为晚唐。唐代以生产黄釉瓷为主，晚唐时还烧黑瓷<sup>[33]</sup>，产品畅销淮河两岸。温州、永嘉、瑞安等地的瓯窑，特点是瓷胎呈灰白或淡灰，出现青釉褐彩瓷。瓷器的社会需求量增加，品种要求多样，而商业运作的结果，成就了一些有特色的产品生存和发展。

## 2. 别具一格的长沙窑

李群玉《石渚》诗云：“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sup>[34]</sup>夸张地表现了湘江岸边热闹的瓷器生产盛况。这里指的大概就是名不见经传、被考古工作者命名为长沙窑的地点。长沙窑以烧出著名的釉下彩瓷而闻名，并且是生产外销瓷的重要窑场。

长沙窑与陆羽《茶经》提到的岳州窑有密切关系。湖南湘阴县湘江西岸发现规模很大的窑址，年代从两晋到隋唐，称为湘阴窑，进入唐代的遗迹也被推测即唐岳州窑<sup>[35]</sup>。这些窑址烧造的青瓷器出现绿褐等釉下彩绘。岳州窑的一支以后向釉下彩发展，成为后来考古命名的长沙窑，并逐渐成为湘江流域的主要窑系。湘阴和长沙在历史行政建制上时有分合，归属同一州郡的时候较多，岳州窑和长沙窑分别在湘江西岸和东岸，长沙窑在岳州窑南 10 公里，它们被认为是同一窑系的不同发展阶段，就其陶瓷工艺的特点来说，岳州窑以烧青瓷为主，长沙窑以烧彩瓷为主。

对长沙窑的发掘和认识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湖南长沙唐墓中发现一些不同于唐三彩的釉下彩花瓷，引起关注。1956 年在湘江东岸石渚瓦渣坪找到一处窑址，确定了是这种釉下彩瓷器的发源地。1964、1978 年进行了两次调查和试掘，

得知窑址范围在石渚湖的北岸、南岸和铜官镇，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sup>[36]</sup>。由于窑址分布在长沙市西北约 25 公里的湘江东岸铜官镇附近的石渚瓦渣坪一带，故称之为“长沙窑”、“铜官窑”、“石渚窑”或“瓦渣坪窑”，目前比较通用的是“长沙窑”。1983 年再次发掘了面积 760 平方米的遗址<sup>[37]</sup>。

1983 年发掘的谭家坡 1 号窑是最完整的一座，长 41 米，最宽 3.5 米。窑床斜坡式，坡度 9~23 度，窑壁用青砖砌。整个窑分窑头、窑床、窑尾。窑头有火门、火膛、储火段、防雨棚、挡土墙。火膛长 2.9 米，宽 1.6 米。火膛北有一段长 7 米、宽 3 米、坡度为 15 度的窑床，可能是起到防止火燃烧不充分甚至熄灭作用的储火段。火门在火膛西侧近南壁处，宽 0.7 米，门外有一不规则的圆坑，火门外还有防雨棚、挡土墙。窑床从窑头 7 米处至窑尾 4 米处共长 30 米。东壁一个窑门，西壁三个窑门，窑门从外向内而下有二级台阶。窑尾长 4 米，宽 3.5 米，末端为矩形烟囱，与窑床等宽。窑址填土中有破碎匣钵和青砖，底层出土大量排列有序的匣钵，每行 1011 个，个体从下而上依次增大，个别的里面还有未取出的变形或废弃的青瓷器。

窑区附近有大量瓷土和古代开采瓷土的遗迹，规模较大的长达 40 多米。窑炉往往多次修补或改建，有的互相叠压，是集中和连续使用的迹象。出土遗物主要有壶、碗、盘和文房用具，以及俑和玩具。器物多用辘轳制作，罐耳、壶把、贴花等附件模制或手捏。长沙窑瓷器的胎质较粗，白度不高，所以器物成型后烧造前胎上涂一层化妆土，然后用铁和铜等作呈色剂，绘花草、书写文字，然后再用一层透明青釉将呈色剂覆盖，烧造时经过化学反应，色彩从釉下显现出来，耐摩擦，不

褪色，这便是所谓“釉下彩”。“湘瓷泛轻花”便是对这类产品特色的形象描述<sup>[38]</sup>。长沙窑釉下彩产品的烧成温度较低，为1150~1200℃之间。吸水率为1.82%~6.63%，显然高于越窑、耀州窑、定窑等<sup>[39]</sup>，即长沙窑大部分产品是一种瓷化不高的半瓷半陶制品。作为一种工艺技术，釉下彩的渊源似乎可追溯到西晋，当时的个别瓷器上出现釉下斑点装饰，也有制作较华丽的作品，但釉下彩装饰技术上的重大的进步，直至盛唐以后才在长沙窑中兴起。长沙窑彩绘的内容主要有人物、动物、花草、云气山水和几何图案。不少器物还带有墨书题记，内容最多的是诗歌和谚语，据不完全统计，仅诗歌就有70余首，其中有一部分见于《全唐诗》的作品。如：“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不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去岁无田种，今春泛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诗句之外，还有“酒盏”、“茶碗”（茶碗）、“陈家美春酒”等题记，表明了器物用途，也表明某些产品是专门订做的。书有“茶碗”（茶碗）两字的器物是一件圆足碗，而同类的碗出土数量极多，可见长沙窑的碗类有许多是用于饮茶。

长沙窑位置选择的是依山傍水的地形，有许多相隔离的窑区，每个窑区的产品不同，也许是竞争造成的，每区都有独到的产品。发掘的1号窑出土遗物以壶、洗为主。壶的形制多为圆管长流壶。2号窑出土碗、枕为多，出土的壶以多棱壶为主。产品不同的两窑说明瓷器烧造技术发展到的水平，必然引起专门化分工，各自发挥所长，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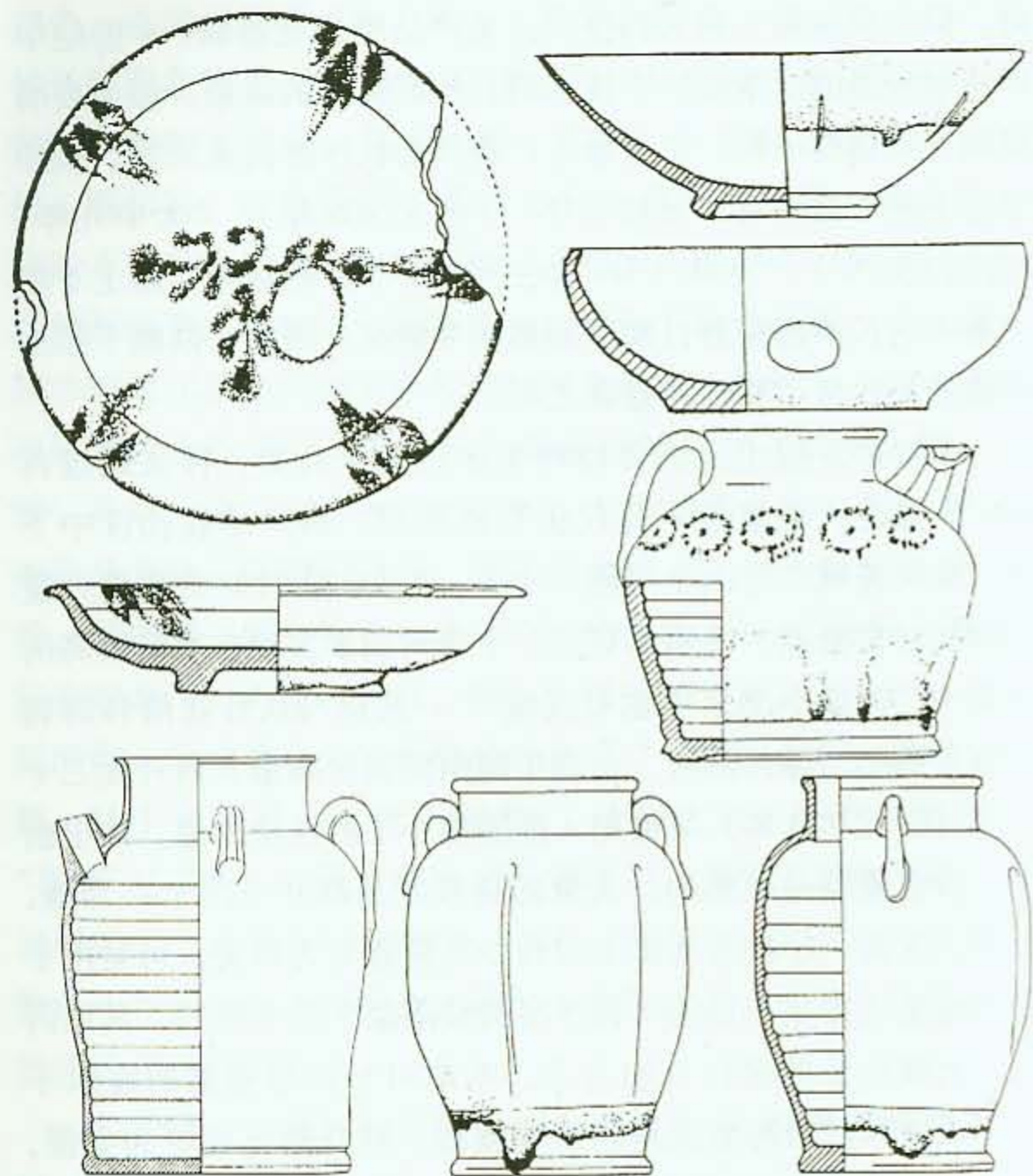
关于长沙窑的开创年代有唐初、盛唐、中唐三种说法<sup>[40]</sup>。根据目前资料和青瓷的特征，长沙窑遗物年代有的可能早到唐

初，但如果以釉下彩为特征，这类产品出现在盛唐。8世纪中叶陆羽所著的《茶经》中找不到长沙窑瓷器的迹象，似乎表明以釉下彩独树一帜、又大量生产茶具的长沙窑尚未兴盛。长沙窑出土题字器物有“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大中九年”（公元855年）、“大中十年”（公元856年）的纪年，出土于纪年墓中的长沙窑瓷器目前所知都在9世纪。因此，以釉下彩为特征的长沙窑主要是在盛唐之后。

长沙窑发掘出土的器物种类多达四十几类，样式超过百种，产量之大也显然不是仅供当地使用，其产品在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广泛出土（图二七）。武昌中唐时期的墓就大量随葬长沙窑瓷器，晚唐墓更多。中唐时期多发现在规格较高的墓葬中，晚唐小型墓中也有发现<sup>[41]</sup>。武昌与长沙在隋和唐初分别是鄂州、潭州治所，贞观年间则同属江南道，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又被划入范围缩小了的江南西道，这里出土长沙窑瓷器是必然的，大量的高级制品却并不出土在当地，扬州、无锡、宁波等地出土的长沙窑瓷器更为精美，可见用于外销也是主要生产目的。长沙窑的衰落似乎是突然的，其原因之一大概是长沙窑以外销为主，本地对长沙窑瓷器的需求不多，入宋以后沿海地区新的窑场崛起，对外输出也更为方便，因此取代了长沙窑产品的销路。

唐代南方的瓷窑始烧时间一般都很早，各地普遍掌握了一般烧瓷技术后，精品原料得天独厚，容易延续发展。另外瓷器烧造技术通常靠家庭世代相传，经过竞争淘汰，唐代发展出一些独具特色的窑址或窑系。《茶经》提到的唐代越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目前均在田野调查发掘中发现或找到线索，更重要的是还发现了一些不见于记载的窑址。湖





图二七 唐代长沙窑瓷器

南长沙窑之外，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青瓷也进一步普及，许多在当地烧造<sup>[42]</sup>。

总体上南方窑址在唐代以烧青瓷为主，但个别窑兼烧白瓷。江西景德镇在唐代是否能烧白瓷目前尚不明确，但五代时已能烧制则没有问题。宋以后的青白瓷的制作和元代后彩瓷制

作影响深远。江西婺源、四川大邑发现了唐代瓷窑<sup>[43]</sup>，至少兼烧白瓷。杜甫诗“大邑烧瓷轻且坚，叩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sup>[44]</sup>，反映出大邑窑白瓷质量很高。目前仅长沙地区出土白瓷的唐墓就约有 50 座，而且有一些纪年墓葬，年代可早到中唐，这些白瓷与北方的邢窑白瓷不同，器物的成型工艺和施釉方法接近长沙窑。

#### (四) 唐三彩——陶瓷史上的奇葩

“唐三彩”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唐代文物，它是一种低温、着釉、精细陶质的器物，表面上主要有绿色、黄色和红褐色三种颜色，因而得名“三彩”。绿色来自铜，红黄色则来自铁。釉的釉基是石英，呈色原料拌在釉里，助熔剂是铅。其实唐三彩不仅这三种颜色，还有白、蓝、黑等。除了基本色素，亦采用各种温和的颜色。颜色的多寡不同，多种釉色一齐施用，施用后很快就会流动，在窑内交融在一起，造成极繁复的色彩感。制造时先用陶土做出器物，在窑中约以 $1000^{\circ}\text{C}$ 的温度素烧，然后取出挂釉，再用 $800^{\circ}\text{C}$ 的火焰复烧。与釉陶的区别是除了多彩外，陶土经过细致的淘洗，胎色较白及略带淡红色。唐三彩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成就，可在唐代文献中却没有记载，唐三彩之名是在近现代古董收藏者中叫开的。作为一种工艺品，也不仅在唐代烧造。

搞清楚唐三彩的来龙去脉是现代考古学的贡献。考古发掘表明，低温、单色釉器物的发明渊源于汉魏六朝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北朝和隋又已经出现青瓷。这些工艺是唐三彩出现的基本条件，釉陶和瓷器的成熟，使艺匠们得到启迪，终于在唐

代创造出多彩变幻、别具艺术魅力的唐三彩。根据目前资料，真正的、别具一格的三彩是在唐高宗以后形成的。发现于纪年墓葬的最早的唐三彩是唐麟德元年（公元664年）郑仁泰墓的一件蓝釉三彩盖纽<sup>[45]</sup>，还有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李凤墓的三彩双联盘、三彩榻<sup>[46]</sup>。其后三彩突然兴盛，出现了大型器物，许多都是作为明器在墓葬中出土，在随葬品中大量取代陶瓷器。最好的三彩作品主要集中在8世纪前半，地域分布在洛阳和长安地区。如永泰公主墓出土瓷器皿仅5件，而三彩器皿多达104件。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安菩墓、神功二年（公元698年）独孤思贞墓、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鲜于庭海墓都出土了精美的三彩俑。说明既容易烧造又十分漂亮的三彩多用于随葬。8世纪中叶三彩器的烧成温度较高，吸水性小，有些可能是实用器物。以色彩取胜、富丽堂皇的三彩的特殊工艺给图案构想创造了新天地，唐朝人在三彩创作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巨大的俑、骆驼、马在造型丰富的基础上，又加上多彩表现细部和神态。其他器物如鸭杯、双鱼壶、鸳鸯盂、胡瓶、角杯、双耳扁壶等，奇异的造型外又有了色彩上的生动。

唐三彩发源于长安、洛阳地区，它的烧成温度低，对陶土原料的要求不高，一旦发明便容易掌握，传播很快。8世纪以后，北到辽宁，西到甘肃，南到南京、武汉、长沙都有烧造。中晚唐时三彩器在中原地区减少，但其他地方仍有流行，北方的渤海国也能烧造三彩。唐朝之后还出现过辽三彩、宋三彩。三彩烧造技术还传到国外，朝鲜半岛有新罗三彩，日本有奈良三彩。

三彩器在唐代大中型墓葬中经常出土，但找到制造场所较

晚。50年代在河南巩县大、小黄冶村发现窑址<sup>[47]</sup>，采集到不少三彩的残片，当时没引起关注。1975年以后进行了反复调查，发现分布在黄冶河东岸有南北长约3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的窑场，试掘20平方米，出土三彩炉、盂、壶、注子、罐、碗、瓶、盒、杯、豆、盘、枕、俑，还有一些动物玩具、建筑材料。遗址发现三个叠压层，出土遗物有隋代青瓷，可知隋代已经建窑烧瓷，唐代有大量三彩器，宋代继续烧造，为洛阳发现的大批三彩随葬品找到了烧造地点。窑址还采集到一片素烧绞胎花枕残片。绞胎是唐代出现的一种新工艺，是将两种颜色的胎泥有意识地混在一起成型，形成颜色相间、变化多样类似木纹的效果。懿德太子墓曾出土一件纹胎骑马仰射俑，十分精美。

西安地区出土三彩更多，表明唐长安城及周围应有大规模三彩作坊。西安西郊唐长安城的醴泉坊出土了经过素烧而不合格的陶坯、施釉而烧结的次品，种类有天王、文吏、仕女、动物和生活用品，还发现陶范和支烧架，还有“天宝四载……祖明”字样的陶片。推测此处可能为唐长安城烧造唐三彩的作坊<sup>[48]</sup>，它可能受官府控制或为官府服务，兼烧随葬用的明器。

经过大规模发掘并清理出作坊、窑炉和大量器物的三彩窑位于陕西铜川黄堡。发现3座窑炉，一座呈马蹄形，由窑门、燃烧室、窑床、烟囱组成，窑门残宽0.8米，燃烧室为扇形，长1.06米，宽0.8~1.4米，深0.33~0.5米，用耐火砖砌成。窑床长方形，长2.1米，宽1.5~1.75米，两壁残高0.05米，烟囱在窑床后面，原应有两个烟囱。燃烧室堆满炭灰，里面夹杂三彩残片、支烧具，窑床上也有三彩残片。

保存完整的作坊位于漆水河西岸。作坊内有水淹痕迹，堆

满淤沙，因突遭洪水使正在使用中的窑场突然废弃，是难得的重要发现。揭露作坊面积达 636 平方米，由七个相对独立的遗址组成，东西依次排列。紧密相连的各个工作间性质不同，显然是有计划地安排的，分别用于管理和作业。而每个作坊内生产遗迹的配置还表明生产环节之间的细致分工。

1 号遗址较小，面积仅 10.32 平方米。室内有火炕和灶，是住人或用作管理的房间。2 号遗址东西宽 1.85~2.3 米，南北长 6.5 米，面积 13.52 平方米。室内北部有土平台。中部有一件木盒、三件灯坯，这是一处工作间，由于室内有土平台及室外仅 0.6 米处有一火塘，可能是晾坯或施釉的场所。3 号作坊以生产碗为主，也有施釉工序。4 号作坊生产动物玩具、装饰陈列品等，并在此间施釉。5 号作坊主要生产灯具。6、7 号作坊出土遗物是大量的壶坯，许多尚未安上流口，这两个作坊负责完成整个烧造过程中初期拉坯成形的阶段，而且专门制造壶类产品。

整个窑场遗迹可分为三组，即管理、制坯和施釉的场所，场地大小各有不同，视工作性质和生产需要而定。生产碗的 3 号作坊和生产灯具的 5 号作坊，由于产品数量多，作坊的面积较大。2 号作坊是流水线的最后阶段，即施釉和晾干的场所，在这里停放烧造前的“成品”，然后入窑烧造，不需堆放原料，产品停留时间不长，故面积较小。各作坊之间相距仅 2 米左右，便于各工序的配合，提高工作效率。

各个相对独立的作坊，本身就说明了当时生产过程中分工的专业化倾向，也可以据以推测当时的劳动组织。作坊内适当的人员配置，才能完成明确细致的各环节分工工作。3 号作坊平面为长方形，长 17 米，宽不足 3 米，在这个面积约 45 平方

米的狭长工作间里，按工作性质、内容和作业方式，安置了火塘、辘轳等设备，此外还需要放置工具如范模等，堆放原料如泥条、坩子泥等，摆放产品如碗、烛台、盒、蹲狮等的坯件。那么这里的工作情况大约是：(1) 门内墙角长 0.8 米、宽 0.9 米、深 0.08~0.17 米的半圆形火塘旁，仅能容一人工作。(2) 前部东墙壁下长 1.2 米、宽 0.45~0.55 米的由四块石头构成的方形台子前，可容一人工作。(3) 在西墙下所设辘轳处，旋轮两边放两块磨得很光的石头，为拉坯工匠的座位，应为二人。(4) 窑中部放一卷泥条和三件盆坯，盆就是用旁边的带状泥条制作的，应有一人作业。(5) 窑后部东边有一用耐火砖砌成的长 1.2 米、宽 0.4 米、高 0.07 米的平台，与之相连是耐火砖和石块砌成的火塘，长 0.6 米，宽 0.25~0.4 米，深 0.13~0.2 米，台上有试釉形成的红、黄、绿三彩釉滴，可容一或二人工作。根据固定岗位的分析，整个作坊内需要并可容纳六七个人工作。如果考虑到一个人可使用多种设备，不排除每个设备前有多人轮流工作的可能，这样在一个面积约 45 平方米的工作间内，有六七人同时工作是可能的。3 号作坊发现的遗物以碗为主，制作施釉都在此间，生产形制较小的器件，属于设备类的遗迹占地不大，一般情况下人们是蹲坐工作，走动性较小。运送原料和产品时，应在固定岗位外增添人手。整个工作间宽 2.35~2.95 米，往返之人若是手中执物，只容二人相对而过，故实际在室内的人员不会太多。

3 号作坊是最大的一处，其他作坊除 1 号不属于工作作坊外，面积分别是：2 号作坊约 15 平方米，4 号作坊约 26.18 平方米，5 号作坊约 28.75 平方米，6 号作坊约 18.4 平方米，7 号作坊约 18.12 平方米。各作坊内的遗迹与 3 号大同小异，因

此，其他五个作坊内实际需要工作人数各约为5人。整个作坊区内约有30人左右在同时工作。而作为整个窑场还必须采集原料、淘洗瓷土、准备燃料、负责销售等，尽管这些工作可能由同样的人在不同时间去做，但窑场的人员可能更多。因此此处窑场不可能由一家一户单干，至少是集体合作性质的作坊。专业工艺程序分工和流水半流水作业的生产方式，也证明是社会化的组织生产。出土遗物对研究这里的生产组织也提供了帮助，属于制作工具的范模和其他遗物如覆状瓷盘上，刻有“孟”“王”“思审”“张镇自造”“赵少琮”等字，这些姓名可以包括作坊主、领班、工匠等，表明一些工具为窑场或个人专用，这也说明了产品生产的责任制度。另一种可能是，大家共同在一个窑炉烧造，但产品分别属于不同的人，故工具标明姓氏。与作坊相连的窑炉少于工作间，而工作间制造不同产品，或许也反映着窑炉共享、坯件分制的现象。由于这些人名不出现在器物上，就排除了是订烧产品的用户的可能。

黄堡唐三彩窑的发掘也为探讨产品内容和产量提供了可能。窑址的产品大量是日常生活用的壶、碗等，由于突然被洪水淹没，遗物原封不动放置在那里。3号作坊后部堆放坯件，碗坯成摞，约650件，烛台坯5件，盒坯1件，蹲狮坯6件。5号作坊内有一堆三彩灯坯，约300件。这些批量产品的存在，只能理解为是商品生产。出土的一些室内陈设品、各种动物、玩具和建筑构件也引人注目。如长24厘米、宽13.5厘米、高17.5厘米的龙头构件，长14.5厘米的兽面构件，长38厘米、宽21.5~23厘米、厚1.7厘米的板瓦，直径11厘米、高5.5厘米、残长13厘米的筒瓦等，绝非一般民房所用，应是为宫廷或寺庙生产。可见整个窑场是综合性产业，既有官

廷寺庙所用建筑材料，也有贵族家庭陈设用品，还生产一般人用的生活用具，是一个生产规模大、分工细、产品应用广泛的窑场。

唐代大量窑址附近没发现城镇遗迹，不排除烧瓷业作为农民的副业的可能，他们一家一户或几家合伙地烧造瓷器，除了自己所用，也用于出售或换取其他物品。但是三彩发明之初属于新颖且比较贵重的产品，不可能大范围地普及，生产也是由专业技术人员掌握，从业人员属脱离农业的专业手工业者的可能性更大。他们即使不由官府管理，至少会承担官府或社会上如寺庙、贵族的订货。遗址中发现的瓦类等建筑材料与生活器皿不同，不仅体积、数量大，坯件也不能在室内存放和制作，一般需要在室外露天搭简易篷架存放、晾晒坯料。因此，包括多个窑炉、作坊的黄堡唐三彩窑的所有者应是长年固定的生产组织。

#### (五) 青花、“秘色瓷”与“官”字款

以氧化钴为呈色剂，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彩瓷器青花瓷，在中国瓷器中独具一格，真正兴盛是在元代以后。关于它的起源有各种推测，讨论不限于青花瓷工艺本身，烧制蓝彩的原料来源、烧造地点等更涉及中外关系的问题。

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发现一片青花瓷残片，其后在1983年又发现一批<sup>[49]</sup>，引起众多学者的讨论。有人认为产地是河南巩县窑，理由是巩县窑烧白瓷又烧三彩，三彩中有蓝彩和白釉蓝彩，经化验青花瓷胎与巩县窑白瓷胎化学成分极为接近。呈色剂是氧化钴，正是青花瓷的原料，是从唐三彩中的钴料彩

发展来的，而且是外国进口的<sup>[50]</sup>。还有人认为唐青花瓷纹饰中有伊斯兰风格，这种异域风格是为满足国外市场需求而烧制的<sup>[51]</sup>。也有人根据新疆出土的二十余片唐代白地蓝花瓷片，引征中国出土唐青花的扬州也出土波斯釉陶，从而推测唐代既然能输入波斯釉陶，自然也可能输入白地蓝花器；而那时西亚也有仿唐的风尚，伊拉克及北非撒哈拉地区“唐青花”与波斯釉陶共出，基于这些理由，提出了扬州出土的“唐青花”可能来自西亚<sup>[52]</sup>。

“秘色瓷”也是千年争议、众说纷纭的瓷器。文献记载晚唐时有进贡的秘色瓷，宋代人认为是唐五代钱氏烧造的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之，故曰秘色<sup>[53]</sup>。还有“耀州秘色”，“高丽秘色”，“南越秘色”等等，相互抄录，臆测猜谜，过分渲染，使得“秘色瓷”的面目愈加扑朔迷离。现在人们倾向于认为秘色是形容釉色的效果，应该是指上乘的青瓷器，将之归为越窑青瓷中的精品。钱宽和夫人水邱氏墓出土的部分瓷器便是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sup>[54]</sup>。问题的最终解决，归功于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的发现。地宫出土了13件精美的青瓷器，器物釉面晶莹润泽，色彩如宁静湖面一样清澈碧绿，正如陆龟蒙《秘色越器》所形容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同时出土唐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镌刻的《应从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账》碑记录：“瓷秘色碗七口……，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实物与当时人的记录互证，可以肯定无疑是秘色瓷。文献记载晚唐时进贡的秘色瓷的实物摆到了世人面前，同时也表明当时高级的瓷器与金银等贵重物品同样是奢侈品。秘色瓷的确是上乘之作，但并无神秘可言，是用匣钵在几乎密封的情

况下烧成，坯件受到严格保护，火焰灰尘不会直接碰到器体，使器物更加光润，质量大大提高。越州窑生产的这类高级瓷器上贡皇室，流传海外，在当时就成为珍贵的实用兼观赏性的艺术品。

唐代瓷器中还有一种底部刻“官”和“新官”的器物，主要是白瓷，以碗为多，也有洗、盘、瓶、罐，辽宁、河北、湖南、浙江等地和海外都出土过，总数约70件左右，多出土于纪年墓和塔基中。其中河北定县两座塔基、赤峰辽驸马墓、北京辽赵德钧墓、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和唐光化三年（公元900年）水邱氏墓是重要发现。带“官”和“新官”的白瓷器50年代就开始讨论，产地有河北、湖南和浙江等几种说法<sup>[55]</sup>。“官”字款白瓷在窑址中出土，仅见于河北定窑，是定窑中的精品。釉色白或白中闪青，一般胎薄而细腻，制作精巧。定县北宋塔基中的“官”字款白瓷一般都认为是定窑的作品。定窑产品是商品，销往各地。因此这类瓷器是北方定窑早期作品的可能性较大。青瓷只出土过一件瓶，字刻在肩部，属五代越窑产品。

#### 注 释

- [1] 皮日休《茶中杂咏·茶瓯》，《全唐诗》卷六百一十一。
- [2] 段安节《乐府杂录》。
- [3] 宋伯胤《卜仁墓中的隋代青瓷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8期。
- [4] 河南省博物馆、安阳地区文化局《河南安阳隋代瓷窑址的试掘》，《文物》1977年第2期。
- [5]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市两座隋墓发掘报告》，《考古》1992年第1期。

- [6] 冯先铭《河北磁县贾壁村隋青瓷窑址初探》，《考古》1959年第10期。
- [7]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四。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 [9]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 [10] 桑绍华《西安东郊隋李椿夫妇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郭家滩隋姬威墓发掘简报》，《文物》1959年第8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郭家滩隋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隋斛律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
- [11] 亳县博物馆《安徽亳县隋墓》，《考古》1977年第1期。
- [12]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
- [13] 马世之《关于隋代张盛墓出土文物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
- [14] 杨文山《隋代邢窑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分析》，《文物》1984年第12期。
- [15] 周世荣《从湘阴古窑址的发掘看岳州窑的发展变化》，《文物》1978年第1期。
- [16] 《茶经》作者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卒于唐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
- [17] 李肇《国史补》。
- [18] 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省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9期；河北临城邢窑研制小组《唐代邢窑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81年第9期。
- [19]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第8期。
- [20] 崔沔：《代河南裴尹谢墨敕赐衣物表》，《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 [2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 [22] 《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以云阳、泾阳、醴泉、三原置鼎州，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州废。”
- [23] 《中国陶瓷史》第五章，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 [24] 权奎山《试论南方古代名窑中心区域移动》，《考古学集刊》第1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 [25] 金祖明《浙江余姚古瓷窑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 [26] 陆龟蒙《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全唐诗》卷六百二十九。
- [27] 周燕儿《越窑青瓷款识初析》，《江汉考古》1996年第3期。
- [28] 《旧唐书》卷一百五韦坚传。
- [29] 余家栋《试析洪州窑》，《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 [30]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丰城县文物陈列室《江西丰城罗湖窑发掘简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 [31]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丰城洪州窑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 [32] 贡昌《谈婺州窑》，《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 [33] 胡悦谦《寿州窑窑址调查记略》，《文物》1961年第12期；胡悦谦《谈寿州瓷窑》，《考古》1988年第8期；安徽省文物局《五十年来的安徽省文物考古工作》，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 [34] 李群玉《石渚》，《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九。
- [35] 同[15]。
- [36] 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周世荣《长沙古窑纵横谈》，《文物天地》1990年第6期。
- [37] 长沙窑课题组《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
- [38] 刘言使《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全唐诗》卷四百六十八。
- [39] 越窑瓷器烧成温度在1240°C，吸水率为1.82%~0.21%。耀州窑瓷器烧成温度在1230°C，吸水率为1.82%~5.19%。定窑瓷器烧成温度在1300°C±20°C。
- [40] 长沙窑课题组《长沙窑》第237页注22~24，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
- [41] 全锦云《武昌唐墓所见铜官窑瓷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86年第12期。
- [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古代瓷窑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 [4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
- [44] 杜甫《由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全唐诗》卷二百二十六。
- [45] 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 [46] 富平县文化馆、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凤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5期。
- [47] 刘建洲《巩县三彩窑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傅永魁《河南巩县大、小黄冶村唐三彩窑址的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
- [48] 张国柱《西安发现唐三彩窑址》，《文博》1999年第3期。
- [49] 文化部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扬州新发现的唐代青花瓷片概述》，扬州博物馆《扬州三元路工地考古调查》，顾风、徐良玉《扬州新出土两件唐代青花瓷碗残片》，均见《文物》1985年第10期。
- [50] 罗宗真、张志刚、郭演仪《扬州唐城出土青花瓷的重要意义》，《中国古陶瓷研究》，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 [51] 马文宽《唐代青花瓷研究——兼谈我国青花瓷所用钴料的某些问题》，《考古》1997年第1期。
- [52] 尚刚《唐代工艺美术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 [53] 宋赵令畤《侯鯖录》：“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曰秘色。”宋周辉《清波杂志》：“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曰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明代嘉靖年间《余姚县志》：“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
- [54] 李辉柄《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文物》1984年第12期。
- [55] 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第12期；李辉柄《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文物》1984年第12期。

# 五 开一代新风的 丝绸印染



织物不易保存，在比较潮湿的南方较少出土，因此主要发现于西北地区的新疆和甘肃等地。20世纪初出土的织物多流失海外。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墓群1959年发掘出土了一些隋唐时期的织物，此后的历次发掘都有织物出土<sup>[1]</sup>。乌鲁木齐南郊唐代墓葬和巴楚晚唐遗址也曾发现唐代织物。隋唐织物的不断出土推动了相关研究逐渐展开，主要涉及了织物的分类、制造技术以及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等问题<sup>[2]</sup>。80年代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发现织物<sup>[3]</sup>，尽管保存状态不佳，但属于皇室贵族的供奉品，仍然可以透露出内地织物的精美程度。

织物在隋唐时总称为帛或缙，材料质地有丝、麻、毛和棉，进一步分类还有布、绢、纱、绫、罗、锦、绮、绋、纨、縠、縠、縠等多种，品种丰富前所未有。每个品种还有不少工艺纹样上的具体名目，加之刺绣、印染等工艺的运用，种类无法枚举。隋唐织物的色彩、纹样、织造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尤以数量众多、制作复杂、绚丽多彩的锦最具代表性。

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织物使用最多、最普遍，制作服装之外，还广泛用于居室内外装饰以及其他用途，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此外，织物还具有展示观赏作用，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也沟通着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隋唐时期织物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它涉及当时的赋税制度、对外贸易和文

化交流。

### （一）制造机构、产量和产地

纺织手工业的发达，可以从当时的赋税制度中得出判断。由于织物具有的价值尺度的职能，因而在隋唐用于交纳赋税，有些州县的土贡特产也包含有织物。黄河中下游几乎所有州县的贡赋中均有绵绢，仅亳州每年就交纳绢一千五百匹。开元年间，国家税收得到的绢七百四十万匹、绵一百八十余万屯、布三十五万端。天宝末，收上的绢布等达一亿一千丈<sup>[4]</sup>。唐代最精美的织物产品当然出自长安，原因是中央官府中专门设有织染署，织纴按品种不同分为布、绢、縠、纱、绫、罗、锦、绮、縠、縠等十作。组纴有组、纴、绦、绳、纴五作，练染有青、绛、黄、白、皂、紫六作<sup>[5]</sup>。庞大的生产组织和精细的生产环节分工，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武则天时“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配京都诸司诸使杂匠百二十五人”<sup>[6]</sup>。“巧儿”、“绫匠”即身怀绝技的工匠，绫锦坊人数也反映出组织机构的庞大和严密。

长安之外也有其他一些生产中心。唐朝初年织物的著名产地有益州，这里的蜀锦历史悠久，产品独特新颖，曾有窦师纶创制出章彩奇丽的“瑞锦宫绫”，被用作宫廷作坊的样式，誉为“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sup>[7]</sup>。故有人推测吐鲁番出土的一些遗物产自四川<sup>[8]</sup>。河北定州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产地，开元、天宝年间定州土贡八种织物，其中有罗、縠、细



绫、瑞绫、两窠绫、独窠绫、二包绫、熟线绫等高级产品<sup>[9]</sup>。当地的产品数量和质量闻名于世，甚至出现“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的大户<sup>[10]</sup>。

8世纪中期南方经济发展起来，纺织行业尤为兴盛。深得玄宗器重的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曾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南方船队进京，船上满载各地特产，其中特别提到“若广陵郡船，即于楸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吴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绫”<sup>[11]</sup>。广陵、丹阳、晋陵、会稽、吴郡都出产著名织物。白居易也称赞吴越地区缭绫的精美高超<sup>[12]</sup>。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诏浙西织造可幅盘绛缭绫一千匹”，而制造这种缭绫极费工时，成品自然异常精致<sup>[13]</sup>。大历年间浙江东道“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sup>[14]</sup>。润州贡物有“绣叶花纹绫”，越州贡物有“宝花罗”，表明了风格不同的产品在江南地区相继出现。

大约在5世纪，位于今新疆地区的古代高昌纺织业兴起，并能生产织锦<sup>[15]</sup>。7世纪以后，内地织物大量西传，当地自产的织物无法与之抗衡而逐渐衰落。目前考古发现的织物多在新疆，但从一些带文字的庸调布透露的信息来看却多不是产自新疆，例如1972~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清理的墓葬中所见带墨书的织物，即来自河南、山南东、山南西、江南东、江南西和剑南诸道。《旧唐书·吐蕃传》载贞观中“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这些织物是通过军资、赏赐及财物等形式流入新疆<sup>[16]</sup>，说明织物的生产主要是在黄河、长江流域，至少唐

前期新疆的织物来源是如此。天宝时“其度支岁计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则二千七百余万端屯匹”，这些布绢绵“千三百万入西京，一百万入东京，千三百万诸道兵赐及和余，并远小州便充官料邮驿等费”<sup>[17]</sup>。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也记载来自四川地区的“益州半臂”、“梓州小练”等<sup>[18]</sup>。

## （二）织物纹样及其演变

受原料和制作技术的限制，织物纹样一般不能随意为之，工匠只能在完成雇主意图或满足社会需求时有限地展示才能，难以表现个人的艺术风格，内容也无法摆脱社会风尚，因此显示出不同时期的特征。隋唐织物图案的构成有以下几种形式：1. 由各种花卉连续排列，之间以卷叶衔接。2. 以菱形、龟背、棋局等几何形格子为基础，其间用散点组成花点。3. 联珠圈中间纳以祥鸟瑞兽或花卉的图案。4. 各种彩色条文相间排列。不同图案花纹的织物其用途也不同，从壁画、陶俑等遗物观察，连续排列的图案多用于衣服的边缘，格式图案则用于衣裙的主体。

与前代织物上盛行的云气、变形云龙纹相比，隋和唐前期纹样内容突变，天王、狮、象、牛和佛教艺术中的化生、莲花等图案增多。吐鲁番高昌延昌二十九年（公元589年）唐绍伯墓出土“胡王锦”，主题花纹是在黄色地上以红、绿等色经线显花，内容是一人执鞭牵驼，间以“胡王”二字，反复倒置，四周绕以联珠圈，然后以同样单位循环。与高昌延寿八年（公元631年）文书同出的方格兽纹锦，有狮、象、牛各一，象颈上有骑者。出土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契约的墓同时出

土香色绫地红色菱纹锦、朱红色绫地规矩纹锦，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墓出土小团花纹锦、对马纹锦<sup>[19]</sup>。8世纪中叶以前绿、黄、白、蓝各种颜色彩条纹锦、提花晕绸也很兴盛。各种几何纹、小团花纹以及芝草、莲花、忍冬纹等多为辅助花纹。

北朝已经出现的在联珠圈内饰禽兽为纹样的锦，从7世纪后半期到8世纪初更为盛行。不同之处是联珠圈的联珠数量减少，个体变大，圈内有鸟、狮、马、孔雀、鹿等。新疆吐鲁番发现有与高昌延昌三十六年（公元596年）、高昌义和四年（公元617年）衣物疏同出的联珠圈“贵”字孔雀纹锦，与高昌延寿十六年（公元639年）和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墓志同出的联珠对鸭纹锦<sup>[20]</sup>。另外，出土高昌重光元年（公元620年）衣物疏的墓葬有对鸟“吉”字纹锦，在白或绿色地上以绿、浅蓝或白、深蓝经线显花，图案为对鸟花树间以“吉”字。阿斯塔那北区第92号墓出土高昌延寿十六年、唐总章元年墓志的墓中有对鸟、对狮“同”字纹锦。出土唐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墓志的134号墓有对鸟纹锦<sup>[21]</sup>。阿斯塔那出土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卜天寿抄写《论语郑氏注》的墓葬中有“联珠对鸭纹锦”，用橘黄、蓝、绿、白、浅黄几种颜色组成，是以经线显花的斜纹锦，文献记录唐代服饰中有“织成紫瑞兽袄子”“瑞牛文”“瑞马文”“异文袍”，应是指这类禽兽题材的纹样。

7世纪末出现宝相花纹，一直流行到代宗大历年间。吐鲁番出土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文书的墓葬有“红地宝相花纹锦”，在红色地上以绿、褐、黄色等纬线显花，呈三晕色<sup>[22]</sup>。盐湖唐墓出土“银红地宝相花纹锦”，是在银红色地上以黄、蓝、白等纬线显出宝相花<sup>[23]</sup>。唐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墓出土“海蓝地

宝相花纹锦”<sup>[24]</sup>，有海蓝、果绿、浅驼、深棕、烟色、白色六彩，宝相花多方连续，辅助花纹是四瓣小团花。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墓出土的宝相花纹锦云头鞋，鞋尖用红地花鸟纹锦，里衬为六色条纹花鸟流云纹锦，蓝、绿、浅红三色晕绸，异常华美。这类宝相花庄重严谨，正是8世纪前半期的特征<sup>[25]</sup>。

8世纪中期及稍晚，开始流行写实性花鸟纹锦，新疆吐鲁番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墓出土“真红穿花风锦”两件，由五种色彩组成纹样，主题是俯视的小团花环绕其他花朵组成的大朵团花，外周有四只凤鸟，再外有四簇写实的花束，其间为折枝花和飞鸟。层层环绕的布局，与多方连续和分区排列的构图不同<sup>[26]</sup>。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各类织物700余件，主要是皇室贵族施予法门寺的供奉品和其他遗物的包装、附属品<sup>[27]</sup>。以平纹绢、纱、绫为多，其次为罗、锦，还有大量的刺绣。重要的遗物有捧真身菩萨绣袂残件、棕红色大花罗地绣袂、莲花纹绣袂、紫红素罗地蹙金绣残件、绛红罗蹙金绣随捧真身菩萨衣物模型、蹙金绣夹半臂、蹙金绣夹裙、蹙金绣袷袂、蹙金绣坐垫等。工艺上采用印花贴金、描金、捻金、织金等。构图随意的阔叶写实性花纹流行。白居易诗云：“裙腰银线压，梳掌金筐蹙”<sup>[28]</sup>，大约就是指这类高级织物。

织物主要是实用性的物品，物品的材质、设计、做工和装饰与拥有者的身份有关，设计要符合礼仪制度，高级物品常常由政府规定或钦定，政治控制必然会使织物及其图案发生改变。有时帝王以节俭为名，为维护纲纪礼仪，禁止精致华丽的产品流行。武则天禁锦，并杖杀因私蓄锦的官吏。唐玄宗禁织成等品种和锦、绮、罗上的龙凤、禽兽纹样。唐代宗禁止十几种高档织物的织造和十几种纹样装饰。这些都直接导致纹样的

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织物风格的时代变化。但是帝王、政府实际并非限制使用高超的技术,法门寺精美的作品说明只要服从于纲纪礼仪,工艺精美的织物仍得到扶植而发展,当然主要是满足皇室宫廷需要。

### (三) 新产品与新织造技术

织物上显现纹样的方法主要是绣、绘、织、印、染。绣、绘虽然使产品更为华丽,但从工艺制作的角度来看比较简单,容易在织物上比较随意地表现各种效果。织花是利用经、纬线之间的组织结构和色彩的交错变换来表现纹样,印花是用色浆或染料通过印、染工艺表现纹样,这些在汉代都已经出现。隋唐不过是使这些传统工艺变得更为复杂和进步,产品更加精美。

对普通的唐代麻布的研究表明,布幅的宽窄、质地疏密相差很大,宽50~60厘米的较多,40~48厘米的较少。最细密的每平方厘米经线15根,纬线13根,最稀疏的经线8根,纬线6根,大多数经线10~12根,纬线10根。所以唐代织物分等级,庸调时“好恶须准,故遣作样以颁诸州”,要求织物“阔尺八寸,长四丈,同文共轨”<sup>[29]</sup>。

唐代丰富多彩的织物中,组织细密、设色精良的锦最为突出。如在一座唐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墓中发现的红地锦条花边,以果绿、墨绿、黄、棕、白等颜色的丝线组成花纹,并以白色联珠和黄色晕饰于其间,极为富丽。锦的织造分为平纹组织和斜纹组织、经线显花和纬线显花。汉代是以平纹组织、经线显花的经锦为主,唐代则以斜纹组织、纬线显花的纬锦多见。由于纬线无须固定在织机上,可根据需要随意改换彩线,

故织出的色彩更为繁杂,斜纹组织也更能显现质地和光泽,使纺织品生产出现重要改进,高级的锦盛行起来。对称的花纹应与织造方法有关。

开元时期的墓葬中出现彩条斜纹经锦和晕绸提花锦,被认为是唐代的创新产品。其中蓝、绿、浅红三色施晕绸,是具有代表性的晕绸锦,但也有以黄、白、绿、红、褐五色线为经,织成晕色彩条纹的斜纹经锦,其上又以黄色纬线织出蒂形小花。阿斯塔那出有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文书的墓葬中发现的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以蓝、绿、浅红、青、褐、白六色丝线织成,色彩非常鲜艳,相互间又不失调和。

阿斯塔那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张雄夫妇墓出土了双面锦和缣丝<sup>[30]</sup>,证明唐代已经出现这种工艺。双面锦是女舞俑的短衫,为两层平纹组织。缣丝是女舞俑的束腰带,用八种颜色织成,工艺特点是“通经断纬”,以经线包围纬线,使经纬不显露织物表面。这原本是西方工艺,传入中国先有缣毛,后有缣丝。新疆也发现过汉、北魏和唐的缣毛产品,缣毛与缣丝技法相同,缣丝是中国的发明<sup>[31]</sup>。斯坦因在新疆获得的唐代缣丝残片以及日本正仓院保存的缣丝残片,说明缣丝在唐代已经成熟。

唐代织物染色技术精湛,施染均匀,至今色泽鲜艳。对这些织物进行的色谱分析表明,光是吐鲁番出土的丝织品就有二十多种颜色,其中红色有水红、银红、猩红、绛红、绛紫,黄色有鹅黄、菊黄、杏黄、土黄、金黄、茶褐,青色有天青、蛋青、赤青(绀色)、藏青,蓝色有翠蓝、宝蓝,绿色有湖绿、豆绿、叶绿、墨绿、果绿等等。富有特色的蜡缣、夹缣、绞缣的染色方法在唐代广泛使用。蜡缣是在设计好的纹样上施蜡后

将织物浸入染料中，然后脱掉蜡显现出纹样。与唐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调布同出的树下鸳鸯纹蜡缬纱，淡黄地显白色花纹，纹样主题是树下一对鸳鸯，另外点缀折枝花。夹缬是用两块雕有相同纹样的木板将织物夹于其中进行染色，只有镂空处染上色彩。绞缬是在织物上按纹样设计加以针缝绑扎、打结等，染色时使局部得不到染色而形成纹样。

阿斯塔那唐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墓中出土一种复杂的绞缬绢，为绞缬而缝缀的线还没有拆开。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染成具有晕绸效果的棕色菱花纹样，堪称精品。敦煌莫高窟130窟第一层壁画下发现大约在开元年间废弃的残幡，大部分是由绞缬和蜡缬绢制成<sup>[32]</sup>。

#### （四）织物与社会生活

有些织物上发现一些墨书文字，标志着它们曾是交纳赋税的庸调布。吐鲁番唐墓出土的一件绢边麻布褥上楷体墨书“□州西乡县云□乡庸调布一端”，一双麻布袜上墨书“庸调布一端”，还有一件墨书“鄯县光同乡贺思敬庸调布一端，开元九年八月”，鄯县二字上钤朱色篆文“鄯县之印”。唐代赋税交纳织物成为制度，使之具有一定的货币职能，因此会出现这类墨书文字庸调布<sup>[33]</sup>。织物在唐代被分成八等分布在各个州县，通过纳贡、赏赐、进奉、贸易，沟通了各地联系。各民族对丝绸的需求，使之成了军事、政治上的最佳礼品。唐初就采用赠帛三万段于东突厥，又以帛巨万赠西突厥的方式，暂时平息了双方的敌对冲突。当甲兵休息，互市交通时，丝绸贸易又起到互通有无、各取所需的经济作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频繁的

“绢马贸易”。8世纪后半叶，绢与马的比价是“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巨额绢马贸易成为常规的直接互市，唐朝用于“赐回纥马价”的绢常常是五万匹、七万匹、甚至二十几万匹。绢布等直接在商品交换中充当货币职能，开元二十年九月二十九日敕“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通理。至今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sup>[34]</sup>。

金银、铜镜、石刻上的纹样虽然丰富，但缺乏色彩表现，有的壁画描绘精细，也毕竟是间接反映。而织物展示的实用功能和艺术效果，直接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纱、罗等的织造技术特点和由此产生的轻薄、纤细特征，适合于制作夏服和内衣，这种被赞叹为“举之若无”、“真若烟雾”的轻柔精妙衣物，烘托了女性体态的娇柔婀娜。质地厚实的织锦更适合于外衣制造，通过千变万化的花纹来展示对美的追求。织物的各种质料和纹样产生的艺术效果，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生活，故被诗人们反复吟诵。而武则天、唐玄宗、唐代宗曾以崇俭抑奢、整肃世风为名，禁止制造精致美丽的产品，使织物的社会功能涉及政治行为。

隋唐时期织物产量高得惊人，有“缯帛积如山，丝絮似云屯”之称，不仅用以满足自身的消费，大量数额还远销西方。虽然曾有“关市令”规定，“锦、绫、罗、浣、绸、绵、绢、丝、布、犛牛尾、珍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sup>[35]</sup>，但并非限制织物出口，而是强调要由政府来严加控制。织物通过出口到达海外，自然充当了传播文化的角色。获得中国丝绸成为各国使者和商人远来中国的直接动力。罗马人把中国丝绸当作无价之宝，促使他们谋求与中国的贸易，当西亚的萨珊波斯人企图独霸丝绸贸易时，他们

不堪忍受购买转手丝绸蒙受的经济损失，便与粟特、西突厥结为盟友，以图绕过波斯直接获取中国丝绸。由此爆发了公元571~591年东罗马与波斯间长达20年的“丝绸战争”。这反映了对中国丝绸的渴求而引发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也揭示了丝绸之路长久不衰的原因。

## 注 释

- [1] 新疆文物事业管理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五十年》，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 [2]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
- [3] 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
- [4] 《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
- [5] 《唐六典》卷二十二少府监。
- [6] 《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
- [7] 《历代名画记》卷十：“窦师纶……敕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
- [8] 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 [9] 《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
- [10] 张鷟《朝野僉载》：“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三。
- [11] 《旧唐书》卷一百五韦坚传。
- [12] 白居易《缭绫》：“缭纱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缙与帛”。《全唐诗》卷四百一十九。
- [13] 《旧唐书》卷十七敬宗本纪。《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传记载，“所织千匹，费用至多”，“文彩珍奇，只合圣躬自服”。
- [14] 李肇《国史补》卷下。
- [15] 武敏《从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地区的蚕丝与纺织》，《新疆社会科学》1985

- 年第4期。
- [16] 王炳华《吐鲁番出土唐代租庸调布研究》，《文物》1981年第1期。
- [17] 《通典》卷六食货六。
- [18] 同[8]。
- [1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
- [20] 竺敏《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
- [2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图二八、三五，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
- [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
- [23] 王炳华《盐湖古墓》，《文物》1973年第10期。
- [24] 同[8]。
- [25]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器物纹样分析·宝相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 [26] 同[8]。
- [27] 法门寺博物馆《法门寺》，陕西旅游出版社1994年版。
- [28] 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全唐诗》卷四百一十九。
- [29] 《通典》卷六食货·赋税下。
- [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 [31] 尚刚《唐代工艺美术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 [32] 贾应逸《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考古》1985年第2期；武敏《吐鲁番出土丝织物中的唐代印染》，《文物》1973年第10期；武敏《唐代的夹板印花—夹缬——吐鲁番出土丝织物的再研究》，《文物》1979年第8期；竺敏《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王珩《中国古代绞缬工艺》，《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 [33] 唐代每丁纳粟为“租”，随乡土所产纳物为“调”，每丁如不服役而缴纳绢布代替为“庸”。
- [34] 《唐会要》卷八十八杂录。
- [35] 《唐律疏议》卷八卫禁。

# 六 丰富多彩的金属工艺



唐代皇室和中央政府统属的手工业，集结了万人以上庞大的艺匠群体。各地州府也设有官府作坊，至于民间作坊和个人手工业者也比前代有了长足发展。中央和地方官府手工业主要分为木工、金属工、织造等部门，唐玄宗时“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sup>[1]</sup>。官方艺匠在政府的支持下磨炼技术，而民间艺匠则必须投豪门富绅之所好，结果带来了工艺技术在各方面惊人的进步。

唐代“凡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sup>[2]</sup>。所谓官户即包括工商业者，他们可以得到官给田产，有基本生活保证，容易专心经营手工业，使产品不断提高质量。商业迅速发展为手工业进步推波助澜，官吏经商和官商勾结，也逐渐提高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身份地位<sup>[3]</sup>。地方官府及个体工匠进入精美手工业工艺品制造的舞台，构成了中央、地方、民间和个体手工业齐头并进的产业结构。

## （一）金碧辉煌的金银器

金的熔点为 $1064.43^{\circ}\text{C}$ ，银的熔点为 $961.93^{\circ}\text{C}$ ，都比铜的熔点 $1083^{\circ}\text{C}$ 低，冶炼、加工比较容易。拥有悠久而且高超的冶铜技术的中国，在金银冶炼方面不会有太复杂的技术难题。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的唐代金银器窖藏中，出土了一块直径

40厘米、最大厚度3厘米、重约8公斤的圆形灰白色金属渣块，经化验分析，含铅、镓、铟、铊、铋、铜、铟等三十多种元素，判断为唐代炼银渣块<sup>[4]</sup>。类似的渣块在章怀太子李贤墓内也发现6块<sup>[5]</sup>。何家村出土的10件银器的测定结果，其纯度均在98%以上，表明唐代银的冶炼技术十分高超。

金银器除实用性外，还体现货币职能，有很高的财富价值，精美的器物还可用于陈列观赏。在古人眼中，金银除了具有昂贵的价值和华美的外观之外，以金银为食器还具有延年益寿的神秘功效，因而皇室贵族对金银器有一种近于狂热的追求，拥有金银器也成为财富和等级的象征<sup>[6]</sup>。价值崇拜和等级观念等复杂的结合，使金银器更为神圣，对生产制造也产生影响。中国早期金银器与中亚、西亚和欧洲许多古代国家相比不算发达，直到隋唐时代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考古发现和收藏的金银器数量，超过以前各代的总和，独立制作器物成为主流，彻底摆脱了为其他器物作附属装饰的地位，金银器皿类的大型器物大量增加。

20世纪20年代末，相传出土于洛阳北邙而被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15件唐代金银器和日本收藏的一些唐代金银器最先公布<sup>[7]</sup>。1957年瑞典学者搜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各国收藏的唐代金银器以及相关的石刻、壁画、织物、陶瓷和西方金银器，全面地、综合地研究了唐代金银器，首次将唐代金银器分作初唐（公元618~650年）、盛唐（公元650~755年，又分前、后两段，前段为公元650~712年，后段为公元712~755年）、中唐（公元755~820年）、晚唐（公元820~907年）。并论证了唐代金银器的中国传统风格、波斯萨珊风格、印度风格、中国唐代创新风格<sup>[8]</sup>。

50年代起开始发现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金银器，西安东北郊八府庄、长安城平康坊、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窖藏、李静训墓等是重要发现<sup>[9]</sup>。其后西安地区不断有新的发现，其他地区也有少量出土。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唐代金银器1000余件，其中容器近300件，超过以往所知金银器数量的总和，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何家村窖藏发现之后，研究论述逐渐增多，并由研究传世品转为以研究出土品为主<sup>[10]</sup>。在对唐代金银器的探讨中，中西文化交流问题格外引起注意，过去笼统归入萨珊银器的中亚粟特制品被区分出来，而粟特器物与唐代金银器关系更为密切，对唐代金银器研究的深入起到推动作用<sup>[11]</sup>。

除了西安地区外，70年代以来辽宁昭盟（今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哈达沟门、河南洛阳伊川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齐国太夫人墓、浙江临安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水邱氏墓、山西繁峙金山铺窖藏也出土成批的器物<sup>[12]</sup>。特别是1982年江苏省丹徒丁卯桥又出土窖藏金银器956件<sup>[13]</sup>，更加丰富了唐代金银器的资料。著录唐代金银器的书籍出版也为研究提供了方便<sup>[14]</sup>。80年代陕西扶风法门寺又一次发现大量唐代金银器<sup>[15]</sup>。唐代金银器的研究是在新的考古发现基础上开展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以往。

隋唐金银器研究的基础是分期，目前可以大致分为三期。

8世纪中叶以前，盘、盒类的器物以圆形为主，也有一些呈菱形，少量为葵花形。壶类多带三足。还有中国传统器形中少见的高足杯、带把杯、多曲长杯。纹样盛行忍冬纹、缠枝纹、葡萄纹、联珠纹、宝相花、卷云纹、云曲纹等。花纹纤细茂密，多用满地装饰的手法。流行珍珠地纹。这一期既是唐代

金银器的飞速发展时期，也是外来文化影响最为强烈的时期。

8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高足杯、带把杯及多曲长杯极少见到。新出现了各式壶，葵花形的盘、盒流行，各种器皿的平面多做成四五曲花形。宝相花纹仍可以见到，折枝纹、团花纹兴起。纹样更为写实，分单元布局，留出较多的空白，显得疏朗大方。器物的形制和纹样多是既不见于西方器物、也少见于中国传统器物的创新作品。本期是唐代金银器制造的成熟时期，摆脱了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完成了金银器的中国化进程。

9世纪器物种类大增，茶具、香宝子、羹碗子、波罗子、蒲蓝、温器、筹筒、龟盒、支架等器类均属这一时期的产品。碗、盒、盘的形制发生了大的变化，流行花口浅腹斜壁碗、四五曲花形带足的盒、葵花形的盘等。折枝纹、团花纹继续流行，并更加丰富多彩，以阔叶大花为特点。鸳鸯、鸚鵡、鸿雁、双鱼等成为人们喜爱的动物题材，出现荷叶纹、绶带纹、叶瓣纹、小花纹、半花纹为主要边饰纹样。纹样风格自由随意，具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本期是唐代金银器的普及和多样化时期。

从总体上说，金银器在隋和唐初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8世纪中叶基本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开始独立发展。8世纪中叶以前主要由北方的中央官府和皇室的作坊生产，8世纪中叶以后，地方官府和民间私营的作坊兴起。南方的作品尽管继承和模仿了一些长安、洛阳艺匠的手法，但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金银稀有珍贵，制作的器物基本都属高级用品。由于原料开采、冶炼受到限制，器物制作工艺复杂，决定了金银手工业只能由少量专业工匠承担，在特定的地区发展。由于南北文化

传统不同，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间工匠群体不同等原因，必然出现地区性差别。唐代前期金银器制作中心在北方，主要由官府控制生产，优秀的工匠为中央和皇室所录用，金银器制品的统一性很强。中晚唐时期金银器的制造出现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和以江浙为中心的南北两大生产地。从目前出土遗物来看，8世纪中叶以前的制品几乎都在北方中原地区，能够确定的南方地区的遗物很少，8世纪中叶以后南方的制品大增。

可以肯定的北方金银器产品，在陕西有大量发现，其中最主要的是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刻有“文思院”字样的器物，包括银盐台、银茶碾子、银茶罗子、五足银炉、银如意、银手炉、素面圜底金碗、银锡杖。根据法门寺地宫内出土的《衣物账》，与手炉配套附带提到的银香宝子也是北方产品<sup>[16]</sup>。素面方形银宝函是长安城兴善寺高僧“智慧轮于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闰八月造”，他还施舍“银阙伽瓶四只”，这些都能肯定是制作于北方地区。陕西蓝田杨家沟出土双凤纹花瓣形银盒，其外底部刻：“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两五钱一字”。西安西郊未央区鱼化寨出土有银注壶，器物圈足内的器底刻：“宣徽酒坊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六月二十日别敕造”。上述器物组成了9世纪北方中原地区器物群。

江苏镇江丹徒丁卯桥出土的950余件银器、浙江长兴县下莘桥出土的100余件银器、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出土的38件银器，是目前南方地区主要的三批遗物。江苏省镇江甘露寺塔基内出土的金棺、银椁也是南方的制品。此外，北方地区出土的一些遗物中也包含着南方的产品。器物上所刻文字中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将产地情况叙述得更为清楚，其中有陕西西安



南郊西北工业大学窖藏出土，标明由曾任洪州刺史充江南道观察使的李勉进奉的圆形银盘；辽宁昭乌达盟（今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出土，标明由曾任宣州刺史、宣歙州观察使的刘赞进奉的葵花形银盘；陕西西安北郊坑底村出土，标明由曾任越州刺史、浙东道观察使的裴肃进奉的葵花形银盘；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标明由曾任盐铁使、浙西观察使的敬晦进奉的葵花形银盘；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刻“桂管臣李杆进”铭文的法门寺银笼子；陕西蓝田杨家沟出土的刻“李杆”文字的葵花形银盘；还有法门寺出土刻“浙西”的银盆等。这些器物都是制作于南方，然后进奉到皇室或中央政府的。

将两组器物群相比较，就会发现南方器物中曲瓣装饰十分醒目，丁卯桥出土的素面多曲银碗、素面菱花形银盘、葵花形银茶托等，刻意强调器物的弧曲变化，使口沿凸凹突出，整体造型如盛开的花朵，与北方造型中花瓣处只是微微内凹的含蓄表现不同。莲瓣纹是北方中晚唐比较普遍流行的艺术题材，花瓣由对卷叶构成，与早期同类纹样装饰一脉相承，区别是花瓣内不是各种缠枝花草，不再构成所谓“宝相花”，多为放射状的细线刻纹，表示叶类植物的筋脉，对卷叶变得比较简单、草率。南方金银器皿上的纹样种类繁多，盛于北方，但莲瓣纹比较罕见，主要流行各种各样的折枝纹，自由奔放，不拘一格。肥阔、流畅的折枝花叶、折枝串花和一些非花非叶的纹样均不见于北方“文思院”的作品中，突出叶花的缠枝纹也与北方突出藤蔓的缠枝纹不同。中晚唐流行圈足器物，南方地区的碗或杯类的圈足大多较高，显得十分粗壮，大型带圈足的盒似乎也主要为南方地区制作。

北方地区中晚唐金银器大都不再追求满地装饰的华丽，在器体上布置纹样时常留出一些空白，分单元设计花纹，在花纹部分鎏金，用鎏金的黄色和银的洁白形成的强烈对比来表现艺术情趣，即唐代文献中常提到的“金花银器”。但是当满地装饰花纹金银器在中晚唐北方地区衰落时，南方地区仍然盛行。

纹样种类的多样化和世俗化是南方金银器的总体风貌，纹样装饰极少受宗教艺术的影响，莲花、摩羯纹远不如北方盛行，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如鸳鸯、凤鸟、鹦鹉较为流行，并追求逼真的效果。法门寺“浙西”银盆饰精美的鸳鸯石榴纹，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世俗情趣，通体鎏金，是目前所知唐代最大的银器皿之一。南方地区喜爱真实动物胜过虚构的动物，似乎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江西新干出土的商代铜器用人面代替饕餮，湖南出土的青铜尊将栩栩如生的四只羊装饰在器腹，四川广汉三星堆也出土令人惊奇的带动物装饰的青铜器。直到东晋南朝时期的陶瓷鸡首壶、蛙形水注、羊形插器等等，历代南方器物的动物造型和图像所表现的真实感几乎要掩盖过器物本身的形式，无可置疑地显示出地方艺术特色和相对独立性。在这一传统下，唐代南方金银艺匠的创新，非中原艺匠所能做到，表明南、北两方在传统习俗和艺术品味上的不同。

北方地区中央政府的“金银作坊院”和皇室的“文思院”的产品，原则上是满足皇室和宫廷需求而不销售，只是因为赏赐等渠道才会流出宫廷。南方地区金银器的某些器类生产量大，制作手法比较一致，简洁轻薄，品种丰富，器物纹样具有多样化、世俗化等特点，商品化的生产目的明显。丁卯桥的一件素面圆盒经过实测，腹径11厘米，高8.3厘米，重203克。其他十几件素面圆银盒和四件鹦鹉纹圆形银盒也大致如此。而

北方的法门寺素面圆形银盒，高 9.8 厘米，直径 18.4 厘米，重量却达 816.5 克，与其他北方地区中晚唐金银器一样比较厚重。中央和皇室作坊生产的金银器因供宫廷所需，制作时一般不考虑成本。南方生产的金银器主要用作商品，在迎合人们的喜好的同时，对珍贵的金银材料尽可能缩减，因此影响到南方金银器的制作和风格，艺匠必须投富绅所好以求发展，致使工艺技术和器物种类日趋多样化。已发现的 8 世纪中叶以后的南方金银器产品数量超过北方中原地区，形成一个庞大的展示南方金银器地区风格的群体，也反映了中晚唐南方金银制造业的繁荣。

中晚唐南方金银器制作行业的崛起，也得益于自然条件的优越。唐代的岭南道、江南道是金银的主要产区。《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出产和进贡金银的州府大都在南方地区，中晚唐中央政府对地方和私人开采金银已无法有效控制，因为采矿和冶炼都需要专门的技术，并依赖地方政府。此外中央政府欲让金银业发展，也不得不让利于地方，因而南方金银手工业形成很大的规模，开采、冶炼、制作俱全，形成各种专门化手工业行业。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南方地区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充分地利用当地资源，减少生产成本，自行生产金银器开始兴盛，并迅速成为成熟的手工业门类。

进奉之风的兴起，也促使地方的金银器皿制造水平迅速提高。带有南方产地刻铭的器皿表明，供奉金银器物绝大多数都来自南方，有些器物的制作水平甚至超过中央政府和皇室的作坊。时代越晚南方进奉的金银制品越多，中央朝廷的金银器更依赖于南方地区。《旧唐书·李德裕传》载：“（宝历元年）七月，诏浙西造银盃子妆具二十事进内。”李德裕曾奏曰：“金银

不出当州，皆须外处回市”，并云“去（年）二月中奉宣令进盃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其时贮备，都无二三百两，乃诸头收市，方获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今进妆具二十件，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寻令并合四节进奉金银，造成两具进纳讫。今差人于淮南收买，旋到旋造”<sup>[17]</sup>。皇帝两次宣索，所需银竟达二万二千四百余两、金一百三十两。浙西虽不产金银原料，却是著名的金银器制作之地，聚集着大批能工巧匠，也可以随时到市场上购得金银。9 世纪王播任淮南节度使期间，三次进献的金银器皿达 5900 多件<sup>[18]</sup>。南方金银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使金银器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地方官府及个体工匠的制作品进入市场，也供应朝廷，唐代前期政府垄断金银产业的局面被打破。9 世纪中央朝廷的金银器更依赖于淮南地区，中晚唐南方金银器制作行业的迅速兴起，也为宋以后南方金银器的发展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唐金银器物生产的繁荣昌盛，需要充足的原材料做保证，原料的来源又依赖于金银采矿、冶炼技术的提高和普及。唐代金、银采矿的经营有两大系统，即官府开采和私人开采，在不同地区采用不同政策，两种方式互为补充。金银手工业作坊分别隶属于皇室、中央官府、地方官府、寺院和私人，还有一些个体流动的工匠。皇室和中央官府制作金银器的场所有三个，即中央政府管辖的少府监掌冶署、府监中尚署所属的金银作坊院、直接隶属皇室的文思院。掌冶署和金银作坊院唐初已置，以后延续。文思院兴盛于晚唐。

西安西郊出土一件银壶，其上刻：“宣徽酒坊，咸通十三年六月廿日别敕造七升地字号酒注壹枚，重壹佰两。匠臣杨存实等造，监造番头品官臣冯金泰，都知高品臣张景谦，使高品

臣宋师贞。”“宣徽”指唐代的宣徽院，由宦官管理，负责郊祀、宴飨、供帐等。“地字号”应是整套器物中的编号，为宫廷宴飨所用的器物。“监造番头”当为负责监造的工官，“都知”和“使”是更高一层的管理者，杨存实为具体制作器物的工匠。器物的生产有严格的流程，各负其责，有一套完整的生产管理系统。只有在官府作坊中，才会有带官职的人参与产品的制作过程。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刻“宣徽酒坊字字号”银碗，流传到日本的正仓院鹿纹葵花形银盘上刻“字字号二尺盘一面重一百五两四钱半”的文字。这些器物可基本肯定是金银作坊院的作品。

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一批“文思院”的产品。西安东郊还出土一件唐代银铤，其上刻：“乾符六年内库别铸……。文思副使臣刘可濡，文思使臣王彦珪，内库使臣王翱”。文思副使、文思使后面的“内库使”，明确了文思院是归属皇室的机构<sup>[19]</sup>。大约在8世纪中期以后，少府所属的作坊逐渐由政府官吏管理转移到宦官手中，直接隶属皇室宫廷的文思院。《唐会要》少府监条云：“开元已来，别置中尚使，以检校进奉杂作，多以少府监及诸司高品为之”<sup>[20]</sup>。诸司高品即宦官，从法门寺金银器上反复出现的“高品臣”等得知，文思院更是由宦官操纵。

无论是金银作坊院还是文思院，每件金银器物的最后完成都要经过复杂的手续，参与金银器物制造的人地位不同，所负责任也不同。法门寺出土了十几件带文思院题记的器物，题记表明最低一级的匠、打造匠，稍高一些的作官、打造作官、打造小都知等，都属于器物的直接制作者，即工匠。第二个等级是监造番头、判官、判官高品、判官赐紫金鱼袋等，是直接检

验产品质量的监督。副使、副使小供奉官、使、使左监门卫将军，为更高一层的监督者。产品制成后，参与者的人名按不同身份由低到高排列刻在器物上，表示产品逐级检验的程序。

地方官府作坊的产品也有发现。江苏镇江丹徒丁卯桥银器窖藏共出土银器950余件，其中银钗类多达760件，银盒多达28件，其中有造型、尺寸完全一样者，同类器物的重复率极高，绝大多数未经使用，器皿上多有“力士”刻铭，有许多残次品和半成品，表现出这处遗迹不同于其他唐代以金银器为主的窖藏，很可能是唐代浙西官府金银器制作作坊的遗存。附近出土银铤20件，有捶打的痕迹，十分整齐，只标重量，而且文字为墨书而不是篆刻，说明与发现的唐代其他银铤不同，是制造器物的原料。

唐代私人经营的金银作坊的遗迹，也有线索可寻。浙江长兴县下莘桥银器窖藏，出土金银器约100件。与丁卯桥窖藏的情况相似，同类遗物大量重复，如银钗就有45件，显然也不是个人用物。25件素面银钗很简单，只是双股银条而已。也有16件比较华美的凤钗，钗的顶端饰镂空凤凰缠枝花。这些银钗似乎是为不同订户分别制造的用物。勺、匙29件，银筷15双，也不像是一般家庭生活用物。下莘桥银器窖藏遗迹未经扰乱，但出土器物重复又不配套，应是出卖的商品。更明显的是，下莘桥窖藏与银器同时出土的3件银铤，形制很不规则，有明显的截取痕迹。这种“银铤”应是银器制作的原料。在为数不多的器皿中，除1件“羽觞”稍显华丽外，其他器物制作简单，与产量大、器物精美的丁卯桥官府金银作坊相比，下莘桥没有高级豪华的器物，也许这正是官营、私营作坊的区别。个体金银匠是技艺较高、专业化极强的工匠，他们以赢利

为目的进行生产。《太平广记》王珍条引《广古今五行记》载：“唐定州安嘉县人王珍，能金银作。曾与寺家造功德，得绢五百疋”<sup>[21]</sup>。可见定州人王珍显然是位个体金银工匠，靠为寺院等做金银器为生。私营作坊和个体工匠发展成熟的标志，是形成了有组织的民间私人作坊联盟，即行会。唐代中晚期金银手工业者的行会也已出现<sup>[22]</sup>，这些行业组织不仅为官府认可，还协助官府处理事务<sup>[23]</sup>。私人金银手工业作坊和个体工匠出现后，政府通过行会加以控制，同时私人手工业作坊也是政府的财源之一，因此在中晚唐兴盛发展。隋唐的金银制作先是由中央政府和皇室垄断，其后逐渐允许地方官府甚至私人生产，出现了皇室、中央官府、地方官府和私人的作坊及个体流动的工匠齐头并进、百花齐放式的繁荣局面。

金银器物制作需要具有高超的技艺，工匠必须经过长期培养。唐代成年男子要纳税服役，或可交纳钱物来代替。但“技能工巧者”，不许纳资代役，必须按规定亲身服役，州府亦不得隐巧补拙。此外，在中央监控下还制定了教授、培养后备人才的制度。包括制造金银器的工匠在内的“钿镂之工”，要学习四年后通过严格考核方能成为正式工匠，当官府工匠短缺时，工匠的后代优先被选择继承父业<sup>[24]</sup>。官府将各地从事金银制造的能工巧匠，几乎是强制性地征调到中央官府，集中在一起进行各种精美器物的制造，客观上提供了工匠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机会，也保证了特殊技术的传授和提高。在原材料充足、生产条件优良、产品不计成本的情况下，工匠可全心全意地进行创作，使产品质量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中晚唐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条件下兴盛起来的地方官府作坊和私人作坊，手工业者身份发生变化，家传技艺和自由创作更丰富了金

银产品。因此，金银器制造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金银器制造业得到发展还有社会原因。金银及其器物具有体积小、价值高的优势，成为广泛用于馈赠、供奉、赏赐、交纳赋税的最佳物品。地方官员将金银加工成精美器物，使之兼财富、实用和艺术为一体来进奉，以取悦帝王而取得宠幸，进奉之风愈演愈烈<sup>[25]</sup>。目前所见带文字刻铭的器物多是地方官进奉到皇室或中央政府的。洪州刺史李勉、宣州刺史刘赞、越州刺史裴肃、盐铁使敬晦、盐铁转运使李福、桂管臣李杆进奉的银器都已发现。中央官府和宫廷之中拥有大量的金银铤、板和饼，既不在市面流通，又无实际使用价值，大都成为皇室和官府制作器物的原料，而这些器物及地方进奉的器物又通过赏赐等再回流于社会。赏赐金银作为收买手段在宫廷内部权力斗争中用以笼络权臣司空见惯，当然也用于表彰有功于朝廷的将军、权臣，有时皇帝一时兴起也把金银器物赐予身边的侍臣。文献记载中赏赐金银器最多的，是唐玄宗对安禄山的赏赐<sup>[26]</sup>。唐代用于赠赏的金银器时代越晚数量越多，赠赏的范围也逐步扩大。金银及其器物的特别作用，在于它成了社会运转的润滑剂，在宫廷内部斗争、对外交往、军事战争等更广泛的层面发挥出特殊的作用，而所有这些又为唐代金银器物的制造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 （二）铜器制造与铜镜的谱系

隋唐铜器出土较少，原因并非铜的产量下降，很可能因为铜可以反复熔化再铸，当不流行用铜来制造纪念、膜拜性物品时，铜器便不易传世，也较少随葬在墓中。但是出土不多的遗

物和传世品仍然反映出唐代铜器使用范围的扩大。

唐代政府对铜的开采和使用十分关注，“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sup>[27]</sup>，将铜作为政府重要的经济来源。南京江宁汤山镇东北的九华山发现唐代铜矿<sup>[28]</sup>，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 12 处、古采场 4 个。采场是分层采掘同一矿体后留存的空间，工作面还有开凿时搭设的木结构工作台及残存的框架结构，顶部及壁面共发现 10 个天井和 28 个巷道口，遗物有木钩、木框架提升器、竹篓、瓷碗等。还清理了一处冶炼遗迹。从地表陷落区的范围及其他遗迹现象分析，地下的古采场应具有相当的规模。铜矿中出土的瓷器特征与唐代宜兴窑的产品相似，时代大体为唐代中晚期。安徽铜陵也有秦汉至宋代的采矿遗址 9 处、冶铜遗址 20 处<sup>[29]</sup>。

文献记载唐代铜器主要出自扬州、润州、宣州、桂州和代州等地。扬州是铜器集散地，鉴真东渡前在扬州购买了瓶、盂、盘等大批铜器<sup>[30]</sup>，扬州亦为青铜铸造盛地<sup>[31]</sup>。1975 年在扬州师范学院和江苏农学院工地发掘了唐代遗址，出土了炉灶和简易铸造设置，铸造铜器用的坩埚口沿上有“流”，内壁附有铜绿，附近土层中还发现许多炼铜渣<sup>[32]</sup>。

隋唐墓铜器随葬的情况并不兴盛，远比陶瓷甚至金银器为少。唐麟德元年（公元 664 年）郑仁泰墓出土六瓣形铜盘、鎏金铜马镫、鎏金铜豆。西安东郊唐开元二十年（公元 732 年）韦美美墓出土了提梁铜壶、铜兔、铜洗、铜钵<sup>[33]</sup>。这两座墓出土器物精美，但铜器不多，反映出唐代铜器并不流行，铜器种类均为日常普通用品。河南偃师的一些唐墓出土一些铜器，有洗、灯、壶、钵、罐、手炉、刀剪之类。偃师李景由墓出土 5 件铜洗，直径多在 10~25 厘米之间，造型简单，别无装饰。

西安郊区中小型唐墓中出土了铜钗、簪等发饰。长沙赤峰山 2 号唐墓出土有铜香手炉、熏炉、铜碗<sup>[34]</sup>。这些墓葬出土的器物大体能反映出当时人们使用铜器的情况。总体特征是大多为小件器物，器皿类素面者占绝大多数，少见复杂装饰，造型简洁，轻薄实用。主要器类有铜钵、铜洗、铜盘和铜镢斗，造型雷同。即便如此，使用这些铜器的人多为地位较高的官吏和贵族。洛阳的宋禎为庆州刺史，李景由为蒲州猗氏县令，西安的郑仁泰官至一品，韦美美为长安韦氏家族成员。

两京地区以外稍有差别。北京丰台史思明墓出土较多铜饰件，其中有铜龙、铜牛、铜铺首<sup>[35]</sup>，辽宁朝阳唐咸亨四年（公元 673 年）左才墓出土铜镢斗、铜钵、铜镢壶和铜盘<sup>[36]</sup>。这些器物雕镂精美，反映出边远地区还盛行用铜来制造器物。

尽管隋唐铜器出土不多，可以肯定当时铜器制作技术仍维持相当水准。精美而较大的铜器采用圆雕手法制造，史思明墓出土的铜龙为蹲坐状，高 16.4 厘米，造型极为生动。湖北安陆县文化馆征集到一件唐代双耳葡萄纹铜壶，肩部双耳作葡萄根状，腹部四周浮雕藤蔓，藤上有 36 片叶和 12 串葡萄，重 11 公斤，高 34 厘米<sup>[37]</sup>。另外，日本奈良兴福寺收藏有中国 8 世纪制作的青铜“华原磬”<sup>[38]</sup>，是以一个坐卧的狮子为底座，上立六角棱柱，最上部是四条龙头，龙体构成的圆弧内悬挂金鼓，显示了造型艺术和纹样装饰的高度成就。

隋唐时期铜料很多用于铸造佛教用具，文献记载了不少寺院铸钟和造像。陕西富县宝室寺铜钟铸于唐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sup>[39]</sup>，重 180 公斤，通高 1.55 米，口径 1.5 米，肩部饰莲花，钟体上部饰飞天，中部饰朱雀，下部饰青龙，并铸 318 字铭文，是传世最早的唐代铜钟。西安现存的景龙观钟，铸于

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六角弧形，高2.74米，口径1.65米，重6000公斤<sup>[40]</sup>。山西平陆还出土25件佛教、道教铜造像<sup>[41]</sup>。可见宗教用具耗费了大量铜料。

大约在开元中期以前，私铸铜器合法，以后屡加禁止，原因是铜材日少，铸钱都受到影响<sup>[42]</sup>。由于“每销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杂物器物，则斤直六千余，其利既厚，销铸遂多”<sup>[43]</sup>。已发现的唐代铜器多简朴无华，有明显商品化特征。商品经济发展，铜作为铸钱的原料开始短缺，对民间使用铜器如不控制，就会直接扰乱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转。铜可用来制造钱币，关系到国计民生，唐代禁止铜器，主要是围绕着铸造器物与钱荒之间的矛盾展开的。佛教兴盛，铜用于铸像，耗量很大。武宗时“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sup>[44]</sup>。唐代对制造普通铜器加以限制，“铜之为兵不如铁，为器不如漆”只是比喻，暗示出唐代铜器作为实用器物可以用其他质料的器物取代，成本低、制造精致、使用方便的瓷器、漆器等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唐代也很少用铜来制作要永久保存的礼器，故唐代考古发现铜器较少，并非因为铜器制造业的衰落，而是政府严加控制的结果。

作为特殊的例外，隋唐对于铜镜的制造并不限制。隋唐铜镜不仅发达，而且达到新的高峰。“刻画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善备焉者，莫镜若也”<sup>[45]</sup>。历代对铜镜高度重视，宋代以来出版了许多著录专著，并逐渐形成所谓“镜鉴学”。但真正对铜镜深入了解要到50年代地下发掘的铜镜陆续出土以后。60年代初陕西、湖南、浙江等都分别出版了发掘出土和博物馆藏铜镜的专门图录，还有专门讨论唐宋铜

镜的著作<sup>[46]</sup>，除了对铜镜形制纹样的描述、铭文考订外，也进行了年代判断和艺术风格的分析。70年代以后逐步解决了唐代铜镜的类型与分期问题<sup>[47]</sup>，陆续出版的一些关于铜镜发掘出土物、博物馆藏品的介绍和图录<sup>[48]</sup>，也都强调器物的年代和出土地点，极大地丰富和修正了对隋唐铜镜的认识。

铜镜在手工业遗物中较早得到关注，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经常出现在纪年墓葬之中，而铜镜主要由官府及少数作坊制作，造型、纹样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时代变化也较清楚，唐代墓葬中铜镜与其他遗物共存，铜镜往往可以作为同出遗迹与遗物断代的参考。

中国早期铜镜演变因循规矩，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到唐代才有了新的气象。重要标志是形制多样化，由以前单一的圆形发展出菱花形、葵花形、方形、委角方形等。铜镜背面的纹样也十分丰富新颖，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葡萄镜、花鸟镜、瑞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盘龙镜、八卦镜、万字镜等几乎都不见于前代。唐镜通常含锡较多，呈银白色，据扬州博物馆藏唐代四神镜和双鸾镜的测试，四神镜的合金成分分别是铜68.6%、锡23.6%、铅6.04%，双鸾镜的合金成分分别是铜69.3%、锡21.6%、铅5.45%，都有微量的铁、锌等金属杂质成分。其他铜镜经化验的结果也大致相同<sup>[49]</sup>，这也是与前代明显的差别。

隋唐铜镜镜纽以外分为内区、外区和边缘三大部分的做法更加清楚，各区分别装饰不同的花纹，外加形制多样，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仔细排比，就会发现它们所流行的年代。隋唐铜镜大约可以分为五个发展时期。

隋代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

587年)宋忻墓出土一枚四神镜,直径16.2厘米。三角形边缘,从缘至纽逐渐变薄,分为五个部分,依次为素面、锯齿纹、卷草纹、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乳钉纹。整体纹样浮雕感很强。1958年陕西西安出土四神十二生肖镜<sup>[50]</sup>,内区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外区分十二格,格内依次置十二生肖,其外有锯齿纹一周。山西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刘伟墓、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墓、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墓都出土十二生肖镜<sup>[51]</sup>。四神有时和十二生肖相结合,还配以三角锯齿纹、水波纹等边饰。这类铜镜隋代广泛流行。

唐高祖至高宗时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类中的十二生肖镜、四神镜、四神十二生肖镜、十二生肖规矩镜,瑞兽镜类中的瑞兽铭带镜、瑞兽花草镜,还有宝相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样突出灵异瑞兽,铜镜多带有铭文。这期的铜镜不少仍继承了前代的厚胎圆镜。四神镜显然为汉镜纹样的延续,纹样及铭文的配置则是从南朝的画纹带神兽镜发展而来,铭文主要为四字铭的句式,与前代流行的记录日期和吉祥话的铭文不同,主要是颂扬铜镜功能、闺阁梳妆的内容。纹样中卷草、忍冬、葡萄枝蔓纹逐渐兴起,分布明显出现内区、外区和边缘的划分。大约在高宗时期出现的葡萄镜,主题纹样突出瑞兽。

丰宁公主与韦圆照墓出土一枚双鸾纹葵花形铜镜,应是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合葬时的随葬品。可知葵花形此时已经出现。唐初瑞兽镜较多的是四兽,兽的形态似虎、豹、狮、羊、马、狼等,很难确指是哪类动物,唐人大概将之称为“瑞兽”<sup>[52]</sup>。镜纽四周的内区瑞兽环绕配置,外区多卷草、葡萄。宝相花镜有时被称作团花镜、瑞花镜,宝相花是一种平面多层

次表现花朵的花纹,经过艺术处理已经图案化,有的也含有强烈的西方艺术色彩,是唐代独具特色的纹样。外区通常有铭文带。葡萄镜是以葡萄枝串为主要纹样的铜镜。

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时期,铜镜彻底摆脱了汉以来纹样的拘谨和对铭文的重视,一般不再有铭文。有的纹样布局常常不分内、外区。形制上特色鲜明的菱花镜在高宗以后兴盛起来。洛阳关林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墓出土的菱花形镜,镜钮周围有“长寿二年(公元693年)腊月头七日造初样”十二个字<sup>[53]</sup>,表明菱花形镜出现可能较早。麟德元年(公元664年)郑仁泰墓出土的菱花形铜盘,进一步证明菱花形作为器物造型的选择不仅体现在铜镜上。不过这类铜镜主要在七八世纪之交开始流行,8世纪前半几乎成了主要的镜形,其后菱花镜不多见。盘龙镜主题纹样是一盘曲腾飞于云气中的龙,也有双龙衔珠,有的还在边缘铸“千秋”二字,目前所知主要出现在唐玄宗时期。年代明确的出土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河南偃师杏园李景由墓、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张九龄墓、河南陕县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墓中。盘龙纹样并非皇室专用,也流传在民间<sup>[54]</sup>。上海博物馆藏一枚月宫镜,其铭文“开元十年五月五日铸成”<sup>[55]</sup>。属于花鸟镜的雀绕花枝镜出现,其他如双凤与双狮对置的双鸾镜更为流行,以故事或神话为装饰题材的镜,形制及图案变得更为复杂,同时镶嵌螺钿宝石的各种装饰风格亦十分普遍。葡萄镜最流行是武则天时期,唐玄宗以后虽有发现,已经不是盛期。

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德宗以前,葵花形镜十分流行。纹样以花鸟镜类为主。前期出现的雀绕花枝镜、对鸟镜以及神仙人物故事镜类中的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开始盛行。

镜背多不分内、外区，有的边缘也很窄，纹样仿佛绘画，通常表达一个主题。雀绕花枝镜在唐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洛阳偃师杏园郑琇墓中有出土，镜背为四个禽鸟围绕镜钮同向排列，其间为独立的花枝边缘配以飞禽、花草，是由瑞兽、鸾鸟、葡萄镜类演变而来，摆脱了图案式的构图，像一幅花鸟小景画。对鸟镜出土于河南偃师杏园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郑洵墓、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李郃墓、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穆棕墓。这种镜始于盛唐，以后一直流行，图像基本上两鸟左右相对，上下再配其他纹样。对鸟镜中禽鸟图案展翅翘尾、口衔飘带的很多，被称为“双鸾衔绶”镜，成为唐代反复被歌咏的极具代表性的镜类<sup>[56]</sup>。

反映当时流行习尚的狩猎题材的镜也有出土。河南偃师杏园502号唐墓出土了一枚菱花形镜，主题纹样是两个骑马猎者，其中一个手中执长矛刺猎一只怪兽，怪兽张牙舞爪似人形与猎者对抗，另一猎者正弯弓射箭追逐一只鹿。人与兽之间上部有一对枝叶。狩猎图整体围绕镜钮展开。西安东郊王家坟90号唐墓出土了一件圆形铜镜，主题纹样是四猎手骑马奔跑，手执长矛、弓及绳索，猎物被追逐得慌不择路<sup>[57]</sup>。从镜形和纹样看其时代应为8世纪中叶。

唐德宗至唐末花枝镜是主要镜类，花纹分内外区，其间由一周凸弦纹相隔，内区纹样一般为四枚折枝花，相同的两枝对称。折枝花丰厚肥硕、简洁明快，花枝间留出大量空白。外区多为流云纹。还流行八卦镜类、卍字镜类以及人物镜类中的“三乐”镜，并出现一种与初唐的四兽镜完全不同的四兽镜。广东电白县霞洞墟唐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墓出土素面方形铜镜<sup>[58]</sup>，表明方形镜出现的时间较早，但委角方形、方形镜

在中晚唐时期较多，江西南昌唐大顺元年（公元890年）墓出土一枚鸚鵡花草纹方形铜镜<sup>[59]</sup>。镜身渐薄，胎面由银白色变成红黄色，质量不如以前，是这一时期的总体特征。

唐代还有一些特殊镜类，采用平脱、螺钿、金、银装饰镜背，大约出现在武则天时期，开元年间最多。李景由墓出土的六瓣菱花镜，镜背贴银箔，然后篆刻纹样、鎏金。卢夫人墓出土的铜镜，圆钮外布满金银平脱团花、折枝花及鸾凤<sup>[60]</sup>。平脱是镶嵌工艺的一种形式。金银平脱是将金银作为镶嵌物，其工艺是把捶打成很薄的金银箔片修剪成各种需要的花纹图形，其上有时再篆刻纹样，然后用漆粘合在器物上，打磨光滑（图二八）。郑洵墓的平脱镜是银箔构成的衔花对鸟，中间点缀金箔构成的石榴。日本正仓院北仓藏唐代“金银平脱八花镜”，即在镜背涂漆，然后贴饰金银剪出的花草、飞鸟、蝴蝶等，使器物黑红白相间，十分华丽<sup>[61]</sup>。正仓院南仓藏“黄金琉璃钿背十二棱镜”，背面为双层莲花纹，用各色彩釉装饰，各莲瓣



图二八 唐代金银平脱铜镜  
左：郑洵墓出土 右：卢夫人墓出土



间的三角形处贴有金箔<sup>[62]</sup>。

螺钿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然后打磨刻划纹样。还有错金镶嵌镜、铅丝镶嵌镜、鎏金镜、贴金银箔镜等。这类与特种工艺相结合的铜镜是唐代制作技术上的创新。陕西西安红旗电机厂唐墓出土螺钿铜镜一件，钮顶镶六曲形螺钿饰片，钮外围镶八瓣形花，主体花纹为花株、双飞鸟及飞鸟云朵，三种纹饰对称布局，花纹空间嵌有绿、蓝、红色宝石颗粒，制作精美<sup>[63]</sup>。

扬州在唐代是铜镜的重要制造地点，有官府作坊制造铜镜，并向皇室进献。扬州辖江都、江阳、六合、海陵、高邮、扬子、天长等七县，江都、六合、天长三县有铜，《博古图录》著录一件带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铭文的铜镜，窄铭纹带内楷书铭文：“武德五年岁次壬午八月十五日扬州总官府造青铜镜一面，癸未年元正朝贡，其铭曰上元启祚，灵鉴飞天，一登仁寿，子万斯年”<sup>[64]</sup>。明确记录了这件青铜镜是由扬州“总官府”所造。扬州的工艺制作技术高超，还为皇室制造特殊的铜镜，《朝野僉载》卷三载：“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又《国史补》卷下：“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一李守泰条引《异闻录》：“唐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可见扬州长期贡铜镜。唐德宗刚继位时提倡节俭，将费工费时难以制成的“江心镜”罢去<sup>[65]</sup>。文献记载太原府、桂州也贡镜<sup>[66]</sup>，既然贡镜，也当造镜。

出土铜镜作为考古遗迹断代的标准器物，其年代有时与遗迹的年代有差距。如墓葬中出土的铜镜，多是墓主人生前的用

物，有时墓主人生前已经用过很长时间。王建《老妇叹镜》诗云：“嫁时明镜老犹在，黄金镂画双凤背。忆昔咸阳初买来，灯前自绣芙蓉带。十年不开一片铁，长向暗中梳白发。今日后床重照看，生死终当此长别。”<sup>[67]</sup>如果按人可活40~60年计算，新婚时的铜镜到死亡时随葬到墓中，则铜镜的制造年代与墓葬的年代可能相差几十年，而且铜镜亦可传世使用。因此，要充分考虑到铜镜制造年代与遗迹年代上的差异。

铜镜还具有其他多种功能，作为珍贵的艺术品经常用于赏赐和进贡，还可作为宝器和信物<sup>[68]</sup>。墓葬中铜镜有时悬于墓顶，有时放在墓室四角，属于避邪免灾之物<sup>[69]</sup>。有些铜镜可能不是照人之用的日常生活用品，而是道教活动中的法器<sup>[70]</sup>。唐代车辂、宫殿、寺院也要张挂铜镜，史载长安城大明宫清思殿使用大量铜镜做装饰，发掘遗址时果然出土不少铜镜残片<sup>[71]</sup>。

### （三）特殊的器物——钱币

对古钱币的收藏和鉴赏由来已久，形成了钱币学。隋唐钱币用铜制造，但借此探讨铜的生产、器物制造工艺意义不大，利用出土钱币研究社会经济也未必有太大价值，因为文献记录更为清楚。对考古学来说，由于隋唐钱币经常随葬于纪年墓葬之中，搞清不同时期钱币形制的特征和演变情况，便可成为考古遗迹的断代参考，同时货币的出土状况也涉及了丧葬习俗、墓主人身份及经济状况。

就钱币学而言，出版的著作颇多，虽然主要是供收藏家鉴赏之用，其中也不乏对各种钱币的制造和使用年代的考证。考

古学通过科学发掘获得的大量的实物，给古老的钱币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分期研究是新的突破<sup>[72]</sup>。隋唐货币以铜钱为主，金银、绢帛有时作为税收、交易、军费等实际上充当了货币的职能<sup>[73]</sup>，但一般很少在市场上流通。

隋代立国后，“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隋文帝“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是时钱既新出，百姓或私有熔铸。三年四月，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堪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诏行新钱已后，前代旧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齐常平，所在用以贸易不止。四年，诏仍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然百姓习用既久，尚犹不绝。五年正月，诏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sup>[74]</sup>。可见，直到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新的“五铢”钱才彻底取代旧币而通行全国。这种圆廓、方孔的五铢形制上与汉以来的各种五铢都比较容易区别，特点是宽边、“五”字交叉两笔较直，特别是“五”字的左边与方孔相接近处有一竖，是前所未有的。“铢”字的金字旁上面作三角形。标准的隋五铢钱，直径25毫米，重3.4克，每千枚重四斤二两。小型的直径23毫米，重2.5克。隋五铢的发行在经济制度上结束了南北朝货币的混乱，而对于现代考古则提供了较为准确的断代标本。

唐代钱币的重大改变，是废弃了中国古代钱币主要以重量命名的做法，但也不同于后代流行的年号钱。使用时间最长的“开元通宝”不是年号钱，颁布流通是在唐初的武德四年（公元621年）<sup>[75]</sup>，而后尽管有其他货币少量、短期发行，开元通宝却在一直使用。

古代铜币的重量始终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铜钱币也是一种消耗品，长期使用的磨损会降低它的价值。钱币生产由中央政府严格控制，成立常设机构，按照规定的样式制造。《新唐书·地理志五》载：铸钱“有丹杨监、广陵监钱官二”。天宝时，全国有九十九个铸钱炉，其中扬州有十个。因此《旧唐书·食货志一》说“扬州租、调以钱”。扬州槐子桥发现一个唐代窖藏，出土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145000多枚<sup>[76]</sup>。由于制造时间、地点的不同，“开元通宝”钱币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差异。认识了这些差别，就可以作为考古断代的依据。

“开元通宝”的基本样式是圆廓、方孔。“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右后读之”。该钱发行了280余年，流通时间较长，种类繁多不下数十种。根据大量纪年墓出土的开元通宝，可总结出不同时期铸造的开元通宝的差异，其重要的特点反映在字体的变化上。开元通宝钱的演变轨迹大致可分为三个大阶段。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至玄宗开元时期，即7世纪前期至8世纪中期为第一阶段。

主要流通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开始铸造的“开元通宝”样式。这是一种优质钱币，每枚重一钱，十枚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每斤以十六两计算）。主要特征是：钱文深峻清晰，轮廓十分规整，铜质纯净，铸造精良。钱径2.4~2.5厘米，孔径0.7厘米，郭宽0.2厘米，重4.5克左右。这种铸造考究、模范一致的开元通宝钱，其铸造时期均在初唐时期。“开”字间架结构均呈三撇状。“宝”字内部为两断横，不与左

右两竖笔相连接。“通”字的走字边不是断开的四点，而是连在一起似水波，收笔的时候向左上勾。“甬”的字头偏，上笔开口较大，字也较瘦。“宝”字瘦小。高宗武则天时期，个别钱币在字上发生细微变化，如“通”字的走部前三笔略显顿折。

还有一种“开元通宝”，钱背有一直画隆起。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陕西礼泉郑仁泰墓内出土一枚。故这种直画痕的始铸期不晚于高宗时期，流行时期则很长。高宗时期经济发展，出现一种钱径仅2.3厘米，郭宽0.15~0.2厘米，重量不到3克的“开元通宝”。此种开元小钱，很可能是高宗、武则天时期民间私铸的一种小径开元钱，数量不多。

唐玄宗天宝至唐文宗开成年间，即8世纪中期至9世纪中期为第二阶段。

本阶段流通月痕开元，即钱背有一画半月形隆起，形似指甲痕。唐玄宗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偃师杏园崔悦墓出土10枚，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偃师杏园郑夫人墓出土1枚。月痕开元的“元”字首横加长；“通”字的走部前三笔呈似连非连的顿折状，甬部上笔开口较扁，整个字体显得比前期瘦长；繁体“宝”字下半的贝部内中间两横加长，与左右两竖笔相衔接，“贝”上的“尔”下部呈三竖道。月痕开元在字体风格上已失去端庄、匀称。钱径2.4~2.5厘米，穿径0.7厘米，郭宽0.2厘米，重4克左右。月痕开元的始铸年代，依据目前考古提供的出土品推断，显然在天宝初期。《唐会要》卷八九引郑虔《会粹》云：“（欧阳）询初进蜡样，自文德皇后掐一甲迹，故钱上有掐纹”。此说早已被大量的考古材料所否定。还有一种小径月痕开元，钱径2.3~2.35厘米，穿径0.65厘

米，郭宽0.15~0.25厘米，应是民间模仿官铸产品的一种私铸开元钱币<sup>[77]</sup>。

这一阶段在经济窘迫的形势下，几度发行新币。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铸“乾元重宝”，以一当十，径2.7厘米，重约10.2克，但也有小型的。乾元二年又铸重轮乾元钱，即背面的外廓是双圈的钱。重轮乾元钱以一当五十，径3.5厘米，重12.3克。唐代宗改变这些钱与开元通宝的比值为以一当一之后，民间将它们销铸为铜器，故发现的不多。

新钱出现的结果是“新钱与乾元、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长安城中，竞为盗铸，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绝”。充斥市场的小径开元、合背开元、花孔开元等私铸小钱，便是当时的产物。凡冠以开元通宝文字的新钱，钱文“通”字的走部前几笔从似连非连的顿折状向左右连续转折状演变。钱币质量也下降。

唐武宗会昌六年始（公元846年）至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为第三阶段。

这一阶段出现会昌开元。武宗会昌年间下令各州郡自行铸币，钱背加铸州名及钱监名。这类钱币多有发现，背铸地名及钱监名目前已有“益”（四川）、“京”（京兆府）、“洛”（洛阳）、“昌”（扬州）、“蓝”（蓝田）、“襄”（襄州）、“荆”（江陵）、“越”（越州）、“宣”（宣州）、“洪”（江西）、“潭”（湖南）、“兖”（兖州）、“润”（浙西）、“鄂”（鄂州）、“平”（平州）、“兴”（兴元府）、“梁”（梁州）、“广”（广州）、“梓”（东川）、“福”（福州）、“丹”（丹州）、“桂”（郴州桂杨监）、“淮”（淮南道扬州）、“永”（江南道永州）、“并”（并州）等。总体上说会昌开元在唐代保存下来并不很多，因为宣宗即位后“新

钱以字可变辨，复铸为像”。

这一阶段民间私铸现象屡禁不绝。一种开元通宝钱背的穿之上下或左右各有一月纹，唐懿宗咸通五年（公元864年）河北孙少矩墓和僖宗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偃师杏园李杼墓之中均有出土。钱径2.3厘米，穿径0.6厘米，郭宽0.2厘米，字迹十分模糊，双月痕在背部略有隆起，钱文风格接近会昌开元。可能属于晚唐民间私铸的。除一小部分会昌开元铸造尚称工整外，其余铸币做工低劣，官铸与私铸之间已不存在什么本质的区别。

开元通宝的影响深远，五代周、十国闽、南唐也制造过，甚至延及北宋。唐代对外交流繁荣，开元通宝流传到粟特、朝鲜半岛和日本，甚至有当地仿制的现象。开元通宝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种类，即金质、银质、鍍金和玳瑁开元等。金质开元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30枚，银质开元出土421枚。银质开元在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偃师杏园村李景由墓也出土2枚，洛阳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唐墓中则出土20枚鍍金开元。法门寺唐代地宫还出土玳瑁开元。这类钱币并非流通于市场，应是特别制造的吉祥钱，有时还用在宫廷嬉戏之中<sup>[78]</sup>。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中曾发现合背开元，即面、背俱铸钱文的开元通宝钱，也属特例。

此外，史思明据东都时又铸“得壹元宝”，以一当十。后史思明恶“得壹”二字非吉祥之兆，于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改铸“顺天元宝”大钱，钱背也铸月痕。唐末刘仁恭铸“永安一百”、“永安一千”。唐末还有“咸和通宝”。这些钱币流行的时间都很短。

## 注 释

- [1] 《旧唐书》卷五十一杨贵妃传。
- [2]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
- [3]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太平公主传记载，太平公主不仅“田园遍于近甸膏腴”，还“市易造作货物”，“殖货流于江、剑”。
- [4] 韩伟《唐代冶银术初探》，《唐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 [5] 陕西博物馆等《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 [6] 《唐会要》卷三十一杂录云：“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九月，仪制令诸一品已下，食器不得用浑金玉，六品已下，不得用浑银。”
- [7] B. L. Hobson, A Tang Silver Hoard. B. M. Quard Volume I, 1926~1927, London; 东京审美学院《东瀛珠光》，1926~1927年；日本皇室博物馆《正仓院御物图录》，1928年；梅原末治《支那唐代银器の三四に就て》，《美术研究》第一三〇号，1937年。
- [8] Bo. Gyllensvard, Tang Gold and Silver,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29, 1957.
- [9] 李问渠《弥足珍贵的天宝遗物——西安市郊发现杨国忠进贡银铤》，《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马得志《唐长安城平康坊出土的鍍金茶托子》，《考古》1959年第12期；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6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 [10] 陕西省博物馆等《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桑山正进《一九五六年以来出土の唐代金银器とその编年》，《史林》六〇卷第六号，1977年；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期；段鹏琦《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小议》，《考古》1980年第6期；韩伟《唐代社会生活中的金银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卢兆荫《试论唐代的金花银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Magaret Medley, Tang Gold and Silver, 1971.
- [11] Б.И. Маршак, Согди ское серебро Москва, 1971.
- [12] 喀喇沁旗文化馆《辽宁昭盟喀喇沁旗发现唐代鍍金银器》，《考古》1977年第5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文物》1995年第11期；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刊》1981年；李有成《繁峙县发现唐代窖藏银器》，《文物季刊》1996年第1期。

- [13] 丹徒文教局、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
- [14] 韩伟等《唐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 [15] 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报告》，《文物》1988年第10期。
- [16] 各器物的刻铭文字内容，参见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唐代金银器制作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 [17]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传。
- [18] 《册府元龟》卷一六帝王部贡献门记载，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淮南节度使王播宣索银状仗二”；《册府元龟》卷五一〇邦计部部希旨门记载，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王播“又进银碗二百枚，银盖碗一百枚，散碗二千枚”；《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王播传记载，太和元年（公元827年）王播“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
- [19] 《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一记载，内库“以供天子燕私”。
- [20] 《唐会要》卷六十六少府监。
- [21] 《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四。
- [22] 《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刘景复条引《纂异记》云：“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礼，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绢画美人，捧胡琴以从。”
- [23] 《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元和四年条：“自今已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
- [24] 《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条载：“少府监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匠一万五千人，散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其驱役不尽及别有和雇者，征资市轻货纳于少府、将作监。其巧手内供者，不得纳资。有阙则先补工巧业子弟，一人工匠后，不得别人诸色”。
- [25] 卢兆荫《从考古发现看唐代的金银进奉之风》，《考古》1983年第2期。
- [26]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 [27] 《唐六典》卷二十二掌冶署。
- [28] 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91年第5期。
- [29]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陵市文物管理所《安徽铜陵古代铜矿遗址调查》，

- 《考古》1993年第6期。
- [30] 《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鉴真第二次自扬州东渡，带有“铜瓶廿口……，大铜盂四口，竹叶盂卅口，大铜盘廿面，中铜盘廿面，小铜盘四十四面，一尺铜叠八十面，小铜叠三百面”。
- [31] 《旧唐书》卷一百五韦坚传记载，“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
- [32] 南京博物院、扬州博物馆等《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文物》1977年第9期。
- [33] 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呼林贵、侯宁彬、李恭《西安东郊唐韦美美墓发掘记》，《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
-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唐墓》，《考古》1984年第10期；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赤峰山2号唐墓简介》，《文物》1960年第3期。
- [3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第9期。
- [36]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阳左才墓》，《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 [37] 余从新《湖北安陆发现唐代双耳葡萄铜壶》，《文物》1983年第6期。
- [38] 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国宝展》，读卖新闻社1990年版。
- [39] 王永亮《富县宝室寺铜钟》，《文博》1990年第3期。
- [40] 马骥《唐景龙观钟》，《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 [41] 平陆县博物馆：《山西平陆县出土一批隋唐佛道铜造像》，《考古》1987年第1期。
- [42]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六杨嗣复传：“今江淮已南，铜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销钱一缗可为数器，售利三四倍，远民不知法令，率以为常。纵国家加炉铸钱，何以供销铸之弊？所以禁铜之令，不得不严。”
- [43] 《唐会要》卷八十九泉货。
- [44] 《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
- [45] 罗振玉《古镜图录》，上虞罗氏楚雨楼丛书初集本，1916年。
- [46]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出土铜镜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选集》，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版；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四川省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沈从文《唐宋铜镜》，中国古典

- 艺术出版社 1958 年版。
- [47] 孔祥星《隋唐铜镜的类型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 年第 3 期。
- [48] 洛阳博物馆《洛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孔祥星《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 1992 年版；旅顺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藏铜镜》，文物出版社 1997 年版。
- [49]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 [50] 陕西省博物馆《隋唐文化》，学林出版社 1990 年版。
- [5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一九五六年河南陕县刘家渠唐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 年第 4 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出土铜镜》图 81，文物出版社 1959 年版。
- [52] 《唐会要》卷三十二异纹袍条。
- [53] 洛阳博物馆《洛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
- [54] 李白《代美人愁镜二首》：“美人赠此盘龙之宝镜，烛我金缕之罗衣。”张说《咏镜》：“宝镜如明月，出自秦官样，隐起双盘龙，衔珠俨相向。”
- [55] 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7 年版。
- [56] 李贺《美人梳头歌》：“双鸾开镜秋水光，解鬟临镜立象床。”戴叔伦《宫词》：“春风鸾镜愁中影，明月羊车梦里声。”李群玉《伤柘枝妓》：“曾见双鸾舞镜中，联飞接影对春风。”李商隐《饮席代官妓赠两从事》：“愿得化为红绶带，许教双凤一时衔。”
- [57] 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 年第 3 期。
- [58] 广东省博物馆、电白县文化局《广东电白县霞洞墟唐墓简报》，《考古》1986 年第 1 期。
- [59]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唐墓》，《考古》1977 年第 6 期。
- [60] 洛阳博物馆《洛阳关林唐墓》，《考古》1980 年第 4 期。
- [61] 平成元年《正仓院展》，便利堂，1989 年。
- [62] 昭和 57 年《正仓院展》，便利堂，1982 年。
- [63] 王九刚《西安东郊红旗电机厂唐墓》，《文物》1992 年第 9 期。
- [64] 同 [57]。
- [65] 《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上：“己未，扬州每年贡端午日江心所铸镜，幽州贡麝香，皆罢之。”

- [66] 《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三；《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七岭南道四记载桂州“开元贡铜镜四十四面”。
- [67] 《全唐诗》第五函第五册，第 74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 [68] 王建《镜听词》：“重重摩挲嫁时镜，夫婿远行凭镜听。回身比遣别人知，人意丁宁镜神圣。怀中收拾双锦袋，恐为街头见惊怪。嗒嗒嚒嚒下堂街，独自窗前来跪拜。出门愿不闻悲哀，身在任郎回未回。明月地上人过尽，好语多同皆道来。卷帷上床喜不定，与郎裁衣失翻正。可中三日得相见，重锈锦囊磨镜面。”《全唐诗》第五函第五册，第 75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 [69] 《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引《异闻集》叙述隋汾阴侯生临终前赠王度古镜一枚，“曰：‘持此则百邪远人。’度受而宝之，镜横径八寸，鼻坐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鬼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求，点画无缺”。可见铜镜为辟邪之物。
- [70] 王育成《唐代道教镜实物研究》，《唐研究》第 6 卷第 27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71]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三薛存诚传：“敬宗荒恣，宫中造清思院新殿，用铜镜三千片，黄、白金薄十万番。”清思殿已发掘，获铜镜残片 17 片。参见马得志《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考古》1987 年第 4 期。
- [72] 同 [57]。
- [73] 《册府元龟》邦达部济军条：“元和十一年（公元 816 年），淮南节度使李（庸）进金五百两，银三千两，绢三万匹；十四年（公元 819 年）五月泾原节度使王潜进银三千两，熟绢绫五千匹，作助军之用。”
- [74]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 [75] 《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
- [76] 卞孝萱《唐代扬州手工业与出土文物》，《文物》1977 年第 9 期。
- [77] 《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粟丰贱。数载之后，渐又滥恶，府县不许好者加价回博，好恶通用。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之南，每钱货得私铸恶者五文，假托官钱，将入京私用。京城钱日加碎恶”。
- [78] 《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记载，先天二年（公元 713 年）九月，“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许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官及诸司三品以上官争拾之”。

# 七 异域珍宝的输入与文化交融



源于关陇胡汉、文武混合的李氏贵族集团，起兵灭隋时就曾与突厥人联合。李氏种族被认为“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华夷之际了无芥蒂”<sup>[1]</sup>。贞观年间平定北方诸民族，太上皇李渊兴奋的是“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sup>[2]</sup>。李世民因“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伏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而得意的原因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sup>[3]</sup>。李氏创立唐朝，经略周边地域与民族，并无多少种族文化上的歧视，主要看重于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追溯隋代，文帝立胡人血统的独孤氏为皇后，亦不排斥外族。因此，隋唐伊始，注入中原的塞外各族文化便得到容纳吸收，使超越两汉而一统的帝国充满发展生机，多种文化的混合互动，滋生出巨大的活力，外来文明的涌入更推波助澜，沉淀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明的冲击碰撞出盛世的辉煌。

前所未有的对外贸易，往来频繁的交通和人员流动，使得外国物品源源进入隋唐国门。地下出土的西方物品，反映了东西往来的交通路线和历史背景的真实<sup>[4]</sup>，其他遗迹遗物更表现出汉唐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如果说汉代开拓中西交通之路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引发各国之间向往接触的强烈愿望，那么隋唐时代这一理想得到极大的实现，并成功地由外部的互动转化为内在的交融。

### (一) 丝绸之路的通畅与“胡人”驼马

获取外来物品的前提必须是道路通畅。隋唐两代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大业初年，隋炀帝选择知晓边事的裴矩“监知关市”，使“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在积极交好“诸胡商至者”的同时，裴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细心纂录各国的章服物产，还丹青摹写，配有图绘，准确描述了可通西方的道路，即越过戈壁沙漠，沿水草肥美的天山北麓西行的草原路，经玉门关后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边缘点点绿洲西进，翻越帕米尔高原的两条绿洲路<sup>[5]</sup>。三条路最终都到达波斯、东罗马，其间经过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诸国。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以君王的身份亲自巡幸河右，再次谱写了中西交通史上的新篇章，往返历时半年，征服路途的自然险阻时死伤惨重<sup>[6]</sup>，终于成功地与西域二十七国的使者在张掖交会<sup>[7]</sup>。

为了使“隋之三道”更加通畅，继往开来的唐代又努力做出了贡献。唐朝在河西走廊设凉、甘、肃、瓜、沙五州，又于天山南北置安西、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兼统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北庭都护府辖庭州、轮台、伊吾、张堡守捉、弓月城等。唐朝政府控制了天山南北，从行政、军事上保证了交通安全。不仅如此，还使“隋之三道”的主线西移，又形成众多支线，即便发生意外时，也有了新的选择。横贯东西、川流不息的交通路线犹如一个巨大的网络铺撒在欧亚版图上。这些为世界文化交流作出极大贡献的通道，在19世纪末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称为

“丝绸之路”，取意于源源不断流向西方的美丽织物。但“丝绸之路”内涵丰富，涵盖的时空广泛复杂，既是地理概念，更是文化概念。“丝绸之路”突破了国家、民族、地域的限制，极大地改变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诸文化的相互渗透，加速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

如果对汉代和隋唐时期墓葬中的随葬品进行宏观对比，隋唐墓中频频出现的胡人、骏马和骆驼的组合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些新崛起的器物群是历史变迁的写照。“胡人”在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这一中性的词汇很少意味着对其他民族的贬抑。雕塑、绘画中那些头戴圆顶、翻沿或尖顶帽，身着圆领或翻领窄袖袍的胡人，甚至还带有明显的赞美意味。大量胡人形象中，“深目高鼻”、“虬发髯须”的一般特征之外，变化千姿百态。西安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段伯阳墓和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永泰公主墓的胡人俑头像，都刻画得十分精彩。虽然都是浓眉深目大眼，络腮胡须，但看上去绝不相同。永泰公主墓的陶质胡人戴汉人的幞头，段伯阳墓的白瓷胡人头像戴折沿高平顶帽，西安鲜于庭海墓、山西长治王深墓的骑骆驼胡人戴尖顶帽。将在草原戈壁、雪山绝域之间艰苦往返的各民族精妙地塑造出来，似乎极力提醒着他们的特殊身份和来自不同的国度。开放的隋唐，各国商人、僧侣、使节、学者、工匠、士兵乃至难民涌入，增加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形形色色的胡俑显然在刻画时各有依据，只有对来自各国的人有了深刻的认识，才能在艺术表现时细腻入微，明确地加以区分（图二九，据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

骆驼塑像出现虽然很早，但隋和唐前期最盛，是随葬品中比较特殊的现象。大中型墓葬几乎都有出土，少则一件，多则





图二九 唐墓出土的胡人俑

1. 杨氏墓 2. 韩森寨高氏墓 3. 咸阳边防村唐墓 4. 李楨墓  
5. 郑州唐墓 6. 裴氏墓僧祇俑 7. 郑仁泰墓昆仑俑

十几件。骆驼耐高温，抗严寒，能负重，可多日不饮不食，有“沙漠之舟”的美称。出土的骆驼俑周身裸露的不多，常常背负着一捆捆的丝绸，细节的刻画中有时出现野雉、兔子、刀箭之类，应为商队的给养和防护武器，甚至还有趴在货物上的机灵调皮的猴子，而在沙漠戈壁中旅行至关重要的水壶更为常

见。章怀太子李贤墓、虢王李凤墓壁画中还出现了属阿拉伯种的单峰骆驼<sup>[8]</sup>，更提示了丝绸之路的遥远延伸。能在荒凉的戈壁沙漠走出令人望而生畏的道路，在隋唐人看来无疑是奇迹，极力刻画的骆驼正是要讴歌对外开拓的精神。这些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骆驼，隋唐以前的文物中不多见，宋以后几乎绝迹。

马在隋唐动物明器数量中更是独占鳌头，用各种造型、颜色和饰件来表现的马匹，自然表达了当时人的崇尚。马的象征意义与军功、地位、喜好、生活相联系。著名的“昭陵六骏”是唐太宗对自己生前喜爱的战马的精美再现。一般墓葬中那些鞍饰华丽、披戴齐全的马，可能象征主人出行时的坐骑，有时随葬数量众多的马匹也有显示财富的意义。更重要的还是与丝绸之路相关。

“马者，兵之用也，……出师之要，全资马力”<sup>[9]</sup>。健壮的骏马在隋唐时期的战争、交通中极为重要，引进良马、发展养马事业便成为国策之一。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陪葬昭陵的唐太宗贵妃韦氏墓，有两幅“献马图”壁画，各绘两名胡人控夫和一匹骏马，应是西域向唐朝贡献良马的真实历史的艺术反映。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与西域之间在经济上逐渐形成了互补性，中原需要的良马和西域渴望的丝绸，是中西商业交换的主要物品。频繁的“绢马贸易”打破了传统的“赏赐馈赠”与“供奉进献”的商贸方式。8世纪后期绢与马的比价是“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巨额绢马贸易成为常规的互市，唐朝用于易换骏马的绢常常是五万匹、七万匹、甚至二十几万匹。而获得大量丝绸的西北民族，显然也不光是用作自己消费，必会将富余者再转手输向西方。骏马与丝绸交换，满足了西方贵

族的奢侈，也带来了东方马政的兴旺。从唐初至8世纪中叶，马匹不断增加，唐玄宗亲理马政之后，不仅使官马由二十四万匹增至四十三万匹，还大力号召民间养马<sup>[10]</sup>。马匹之盛改善了军队的装备，许多步兵成了骑兵，增强了战斗力。马在军事战争、丝绸之路上如此重要，自然会在隋唐墓葬中出土大量骏马塑像。

胡人与驼、马共存的随葬品组合，恰似杜甫“胡儿制骆驼”诗句的形容，“无数驼铃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sup>[11]</sup>，也是对载物骆驼的绝好诠释。胡人与驼马塑像（图三〇）不仅出现在西北地区，长安和洛阳更为流行，甚至出现在长江流域的隋唐墓之中。驼马塑造上的粗壮高大、俊美华丽，以至忍辱负重、引颈长嘶等形象显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寄托着人们的理念和情感，是丝绸之路兴盛时隋唐独有的崇尚。正因为如



图三〇 西安西郊唐墓出土的三彩骆驼与胡人俑

此，8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胡人驼马塑像逐渐消失。

## （二）源源涌入的外来物品

相互得到对方的珍品，是开辟丝绸之路最初的动因。隋代“将通西域，四夷经略”的直接目的是“引致西蕃”前来贸易。文献记录中的外来物品已经十分丰富<sup>[12]</sup>，考古发现还证明不止于此。隋唐时期对外贸易规模空前，大量的外来物品仍遗留至今，并不断地从地下出土。

最引人注意的是自20世纪初陆续在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和阿拉伯金币等。外国政府发行的钱币出现在隋唐疆域内，是十分重要的历史现象，背后隐含着复杂的历史原因。隋朝初年，“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sup>[13]</sup>，道出了外来货币曾流通的事实。

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6~642年）的银币出土共计有四十多批，总数达两千枚以上，分属于十几位王制造<sup>[14]</sup>。钱币正面图案以王者胸像为主，多是右侧像，少数向左，极少数为正面像，头戴王冠，冠后有飘带。发髻和胡子多呈球形，像外为圆点连成的圈。每位王发行的货币其正面图案中的王冠形制都不同。萨珊银币出土在墓葬、窖藏和塔基中，时代跨度很大。4世纪末到5世纪初制造的萨珊钱币，出土地区多在新疆吐鲁番，5世纪末到8世纪中的萨珊钱币扩大到中原，其他地区也有少量发现。

西安隋李静训墓的萨珊银币与银指甲套等放在尸体足部附近的铜钵内，银币被穿孔，做成坠饰。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的

萨珊银币出土于棺床东端墓主人头部位置，可能原置于死者口中。山西太原金胜村5号唐墓在女尸骨架前放圆漆盒，内盛装饰品及萨珊银币。湖北安陆王子山唐吴王妃杨氏墓的15枚萨珊银币出在棺床上<sup>[15]</sup>。吐鲁番墓葬通常每座墓出土一两枚萨珊银币，多放置在尸体的口中，少数放在尸体的眼皮上。西安何家村窖藏珍宝中也有一枚萨珊银币。可见萨珊银币在隋唐时主要用于葬仪、装饰宝物。所有出土萨珊银币的墓几乎都是贵族墓葬，而且其中一些人是中亚粟特人的后裔。

萨珊银币出土最多的地点是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政权不仅与突厥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中原地区交往较多。当隋末战乱大碛路关闭不通时，西域各国朝贡使臣、商队都经过高昌前往内地，高昌保持对唐朝贡之外，还担负着“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奏以闻”<sup>[16]</sup>的职责。唐朝后来与高昌关系恶化，导源于争夺丝绸之路贸易的经济冲突。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焉耆请求唐朝主持重开大碛路，以方便商旅往来。这损害了高昌的利益，高昌公开与唐朝反目。贞观十三年（公元640年），唐太宗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击败高昌，设立西州及安西都护府，直到公元670~692年唐朝的“安西四镇”被吐蕃攻陷。吐鲁番墓葬出土的萨珊银币，以库思老二世（Chosroes II，公元589~628年在位）的最多，其他为伊斯提泽德三世（Yazdegerd III，公元632~661年在位）、卑路斯（Peroz，公元459~484年在位）、荷米斯德四世及布伦女王（Buran，公元630~631年在位）的银币，主要属于萨珊后期的几位王，出土墓葬的时代多为7世纪的初唐和盛唐时期，表明这时唐朝与西域诸邦之间的贸易交流呈现了一种兴旺发达的繁荣景象。

青海、甘肃和宁夏等地处于丝绸之路上的前站，是萨珊银币由西向东传入时路过之处，虽是零星发现，但埋藏时间相对较早，反映了银币由西向东传播的大致方向。萨珊银币出土的另一个集中地在长安、洛阳，埋藏银币的时间集中在6世纪末到8世纪，银币种类以卑路斯的占绝大多数，其次为库思老二世，另外伊斯提泽德二世、沙普尔二世、卡瓦德一世、库思老一世的也有少量发现，还有一枚布伦女王的钱币，另有仿萨珊货币一枚。萨珊晚期的几位王在位时间都很短，制造的银币数量有限，一般很少见到，特别是布伦女王银币在全世界也少见。南方地区萨珊银币出土在唐初吴王妃的墓葬中，吴王李恪是唐太宗的第三子，可能在长安时就得到了这些珍贵的萨珊银币，并在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授安州（今湖北安陆）都督时将之带到湖北，在他的爱妃去世时随葬。

卑路斯银币发现多主要是因为萨珊与中亚吠哒之间的战争关系所致。吠哒帝国5世纪中叶兴起于中亚后，向萨珊发起了进攻，接连不断的战争互有胜负，卑路斯时与吠哒之战的结果是卑路斯兵败被俘，被迫缴纳巨额赔款，战争中大量财宝也被吠哒获得。吠哒最为强盛时还击灭了贵霜残余势力，南侵印度，积极向塔里木盆地发展，北道势力抵达焉耆以东，南道则抵达于阗，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公元520年以后<sup>[17]</sup>。中国所发现的卑路斯银币多是在这个时候传入的。库思老一世即位后萨珊王朝重新兴盛，库思老二世即《隋书》中的库萨和，他于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即位，发动对东罗马帝国和埃及的战争，使萨珊王朝达到最后的辉煌。库思老二世银币制币的鼎盛时期，在萨珊的制币厂有120多个，当时对外贸易发达，大量钱币流传到各地的可能性最大，中国出土数量较多的

库思老二世银币也不足为奇。

萨珊银币在隋唐境内出土证明了它们之间关系的密切。波斯萨珊王朝末代帝王伊嗣侯即伊斯提泽德三世<sup>[18]</sup>与大食人争战，兵败逃到吐火罗斯坦被杀。其子卑路斯居疾陵城，唐以其地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后来卑路斯于唐高宗咸亨年间（公元670~673年）干脆入唐避难，直到公元677年去世。其子尼涅师被唐朝军队护送回国，他在吐火罗客居二十年后便又回到中国，最后客死长安。

东罗马金币也是出土的隋唐时期外国钱币中的主要种类。1953年陕西咸阳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罗达墓中出土一枚，是东罗马皇帝查士丁二世（Justin II，公元565~578年在位）时期的金币<sup>[19]</sup>。以后在隋唐墓葬中又陆续发现了几十枚<sup>[20]</sup>。从6世纪开始，东罗马金币一面是在位皇帝的正面像，带王冠或头饰，还有名字和其他文字，另一面为女神像，手执十字架和金球。阿拉伯帝国兴起，为了维持新征服地区的经济制度，大约从公元635年起在中亚仿造罗马金币<sup>[21]</sup>。中国发现的东罗马金币中有一部分是仿制品，图案不清，字迹模糊，有的只有单面纹样。

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吐鲁番、西安等地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大都是作为首饰、珍宝或葬仪来随葬入墓的，有的穿孔，作为装饰品悬挂，吐鲁番墓葬中也发现放在被葬者的口中。这些墓有不少是粟特等民族的墓葬。东罗马金币远少于萨珊银币，其原因大概是查士丁二世在位期间正值萨珊强盛，两国交战东罗马败，萨珊王朝控制着丝绸之路贸易，对东罗马帝国进行封锁。东罗马人于公元568年派使臣到西突厥，企图打通新的道路，但这种间接贸易规模不大，次数也较少。

萨珊银币和东罗马金币有些出土时磨损严重，有明显的使用痕迹，似乎表明埋葬前是一种经常被转手使用的物件。同时吐鲁番地区墓葬出土的文书中，经常提到当地曾以金、银钱为通货。这并不是一个巧合，恰恰反映了它们当时在西北地区曾流通的事实，即充当了货币的职能<sup>[22]</sup>。4~7世纪波斯以东至河西走廊流通金银币，高昌及唐墓中出土的衣物疏、契约上也有记录。高昌国“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sup>[23]</sup>，这种情况大约持续到隋代铸“五铢”钱统一货币、并严令禁止旧钱的开皇五年（公元585年）时。但商胡在河西交市，带来了外国钱币，似乎没有完全禁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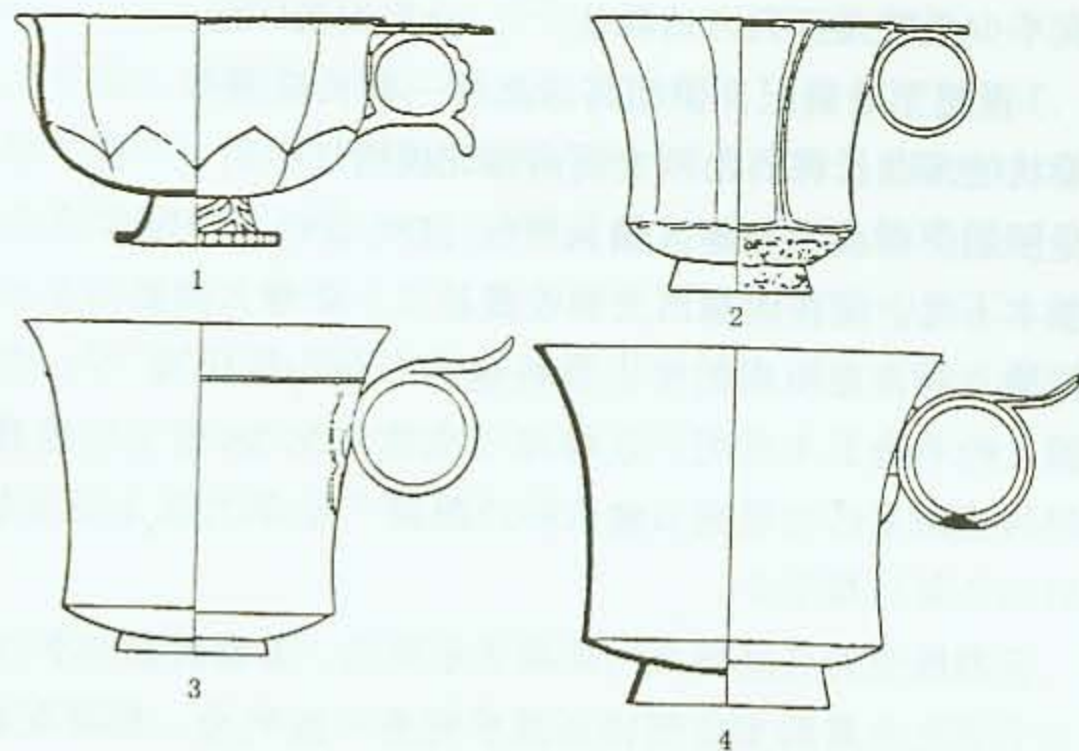
阿拉伯金币也陆续有发现。阿拉伯兴起后，最初采用征服地区流通的萨珊银币和东罗马金币，不久自己仿造，金币沿袭东罗马金币的样式，正面有人像，铭文是希腊文或拉丁文，有时加上阿拉伯文。公元679年后奥梅雅王朝改革钱币形式，因为伊斯兰教义不准人像出现在货币上，故只有阿拉伯文字，西安地区中晚唐墓出土的3枚即改革后的铸币<sup>[24]</sup>。中国所出外国钱币中，萨珊银币最多，罗马金币次之，阿拉伯金币最少，总体上也依次为早晚关系，虽然这与发现的偶然性有关，但也并非完全是巧合。西方人与东方的贸易经常要依靠或借助中亚粟特人，5世纪初粟特人就仿制萨珊钱，还制造了中国式的方孔圆钱。塔吉克斯坦的片吉肯特（Penjikent）城发现大批康国7~8世纪的铜钱，其上有粟特文，为方孔圆钱，这种钱在中国西北地区也有出土。西安何家村窖藏中还出土5枚日本银币。无论这些钱币的用途如何，都表明隋唐对外交往的广泛。

长期混淆在唐代金银器中的外来物品也被逐渐分辨出来。1963年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窖藏出土15件银器，其中有1件

内底刻花角鹿的银碗和 2 件素面银带把杯，当时没有引起关注，被作为唐代银器来叙述<sup>[25]</sup>。1972 年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又出土金银带把杯 6 件<sup>[26]</sup>，报道时也和其他器物一起被统称为唐代金银器。几年以后才发现唐代金银器中的一些器物具有“萨珊式的特征”，同时隋大业四年（公元 608 年）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银高足杯也被怀疑是外来的<sup>[27]</sup>。当意识到唐代金银器受西方影响时，最容易与波斯萨珊王朝相联系，因为文献中波斯商人在中国的活动为人们熟知，而且萨珊与大食人争战兵败后，王子卑路斯率众逃到唐朝的事件，也容易使人产生萨珊器物随之东来的联想。但许多可能是外来或外来风格的金银器有的在萨珊朝银器中几乎不存在，也许来自中亚粟特等其他地区<sup>[28]</sup>。

70 年代末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发现造型、纹样奇特的带把壶、素面罐形银带把杯、银长杯、獐狴纹银盘和银勺。从器物组合及出土的情况看，像是旅行者随身携带的一套餐具，因此人突然死亡而被草草掩埋。这套餐具被考定为中亚粟特制造的器物。西安沙坡村出土的鹿纹银碗、西安市文管会藏葵花形银碗、河北宽城出土的银壶也被鉴别为粟特银器。引人注意的是何家村等地出土的一批金银带把杯（图三一），与中亚粟特银器极为相似或相同，显然不属于唐朝自产的器物风格<sup>[29]</sup>。

这些粟特银器中，带把壶器身平面呈扁圆形，口部略似鸟头形，有扁状的流口，口部至中腹有弧形的把，把的上端还有一个胡人半身像，圈足的底沿有联珠围绕。金银带把杯的器身呈八棱形、筒形和圈底碗形，有的器身还呈扁圆形，口两端上翘，绝大部分杯体下部有横向内折棱，底部带圈足，口部至腹部有环形把手，把手上部有指垫，指垫上面多饰浮雕状胡人头



图三一 唐代金银带把杯

1. 何家村出土银带把杯 2. 西安电车二厂出土银带把杯  
3. 沙坡村出土银带把杯 4. 何家村出土金带把杯

像。银碗的碗壁上捶揲出凸凹起伏的瓣状，或在内底刻出一只花角鹿，或在外壁装饰中亚地区流行的植物纹样。银盘的盘心饰一獐狴或虎状动物，是以单独的动物为纹样并醒目地占据器物的主要部分。所有这些造型、纹样和制作技法，唐代金银器中没有完全相同的，有的即便不是输入品，也应是在粟特器物影响下的仿制品。

粟特银器在唐朝与移民活动有关。被称作“昭武九姓”的粟特人移居西北地区至少可上溯到 4 世纪，到唐代时沙州敦煌县从化乡成为粟特人聚集的中心，此外效谷乡、悬泉乡、高昌县崇化乡也居住着大量粟特人<sup>[30]</sup>。宁夏固原发掘了粟特人的墓群<sup>[31]</sup>。西安、洛阳等地也出土昭武九姓粟特人墓志，说明

还有不少粟特人迁到内地居住<sup>[32]</sup>，分布相当广泛。

3世纪至8世纪，伊朗高原流行一种长椭圆形、器身呈多曲瓣状的多曲长杯。山西大同南郊北魏遗址中出土一件，经研究是伊朗萨珊或中亚地区输入<sup>[33]</sup>。这类器物在中国传统器皿中基本不见，而在伊朗出土和收藏甚多。萨珊多曲长杯逐步向外传播，塔吉克斯坦的片吉肯特建筑壁画中曾出现<sup>[34]</sup>，传入中国大约不晚于4世纪，新疆库车克孜尔第38窟主室窟顶4世纪的壁画上已经见到多曲长杯的图像<sup>[35]</sup>。唐代虽未见实物，类似的仿制品却不少。

金银器中的高足杯大约来源于东罗马。隋唐时期的李静训墓、丰宁公主墓出土造型特征几乎完全一致的金、银高足杯。杯体为圆底碗状，喇叭形高足中间常有一算盘珠式的节，与黑海沿岸出土的东罗马系统的金、银高足杯造型接近，不见于中国传统器物形制，应是东罗马的输入品<sup>[36]</sup>。当然，由于萨珊控制着中国通往东罗马的要道，不排除这些地区制作的类似器物传来。内蒙古呼和浩特毕克镇隋或唐初的墓中出土2件银高足杯<sup>[37]</sup>，伴出有东罗马金币、金戒指及金饰片等。东罗马金币是列奥一世（Leo I，公元457~474年在位）时所铸。金戒指一枚镶紫色宝石，一枚镶黑色宝石，并刻长发人头像。金饰片呈飞鸟展翅形，正中有一个卷眉、圆目、吐舌的怪兽，两边为蜥蜴或鳄鱼形兽。它们显然都是外来物品。这些遗物是在修水渠工程中发现的，当时掘得人骨架一具，据介绍尸骨旁没有发现棺槨等葬具的痕迹，或许是一个暴死于路途而被匆匆掩埋的商人。

西方的史料中提到东罗马蔡马库斯（Zemarchus）出使西突厥，希望能同中国建立贸易联系，又有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

丁尼一世（Justinianus I，公元527~565年在位）从中国向东罗马走私蚕种的故事。中国史书把东罗马称作“拂菻”，始见于《隋书》，似乎只知道东罗马位于“西海”，即地中海地区。唐代正史中出现了专门的拂菻传，对东罗马的了解逐步加深。从贞观到天宝年间，东罗马九次派遣使节来中国。8世纪中叶以后，有关东罗马的记录从史书中消失。这一背景和高足杯在中国出现的时代相吻合。此外，陕西临潼庆山寺出土凤头人面铜壶，棱形壶腹上铸出六个人面，则被认为是印度人的形象<sup>[38]</sup>。

玻璃在隋唐时代受到特别珍视，多出土于高级贵族墓、塔基或窖藏中，其中器皿类外来物品占了主要部分，分别来自萨珊、大食。外来玻璃与国产玻璃的区别主要是外来玻璃以钠钙玻璃为主，造型和装饰手法也截然不同。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静训墓出土了24件玻璃器，包括罐、扁瓶、无颈瓶、小杯、管状器、杵形器、卵形器、珠形器等。其中绿扁瓶、无颈瓶的成分经X荧光分析是钠钙玻璃，无模吹制成型，在底部有使用铁棒技术留下的疤痕。这类玻璃是外国输入的。陕西西安东郊清禅寺塔基出土凸起磨花玻璃瓶，应是确定无疑的萨珊器物<sup>[39]</sup>。

唐代外来玻璃更多，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的直壁玻璃杯，腹部饰八组呈凸起的圈纹，陕西临潼庆山寺的一件束颈圆球玻璃瓶，器肩有一周弦纹，腹外壁粘贴不规则的凸起网状纹。何家村窖藏和庆山寺遗址的时代下限约在8世纪中叶，也是这两件器物制作年代的下限。在器物表面粘贴玻璃条为装饰，曾是罗马玻璃经常采用的手法，萨珊玻璃兴盛后继承发展了这一技术。何家村和庆山寺的玻璃似乎应是西亚输入的萨珊器物。还

有一件制作技术相似、纹样不同的贴花玻璃瓶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中，肩部、腹部贴缠条形、圆形、星形、水滴形、花蕊形饰件。这件器物在唐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物账碑》中没有记载，时代可能略早。此瓶的造型特征与萨珊时期其他材质的器物相同，应是萨珊玻璃。

伊斯兰玻璃数量在唐代玻璃中的比例最高。法门寺出土的玻璃器共有20件，主要是伊斯兰玻璃器<sup>[40]</sup>。地宫中的《物账碑》提到“瑠璃钵子一枚，瑠璃茶碗柘子一副，瑠璃叠子十一枚”。出土的刻纹蓝色玻璃盘、素面蓝玻璃盘即所谓瑠璃叠子，刻纹蓝玻璃盘呈深蓝色，透明。分别以十字花、八叶花、团花、“枫叶”等为主题，花蕊、花叶中多刻出细密的斜平行线、网格纹，周围再刻水波纹、绳索纹、花草等辅助纹样，有的还在刻纹后描金。这些蓝玻璃盘都是无模自由吹制成型。刻纹是伊斯兰玻璃装饰特点之一，主题纹样以植物的枝叶和几何图案为主，风格细密繁缛，为伊斯兰玻璃器中的精品。釉彩玻璃盘即《物账碑》中的“瑠璃钵子”，呈淡黄绿色，内壁用黑、黄两色釉料绘图案，属伊斯兰玻璃特殊装饰工艺，早到9世纪的这类产品不多。

唐朝人对东罗马了解较多，记录拂菻国“其宫宇柱栊，多以水精瑠璃为之”，贞观年间拂菻国王派遣的使者向唐太宗献上自产的玻璃。在记录波斯国时，也特别提到当地出产玻璃和琉璃<sup>[41]</sup>。唐高宗时“支汗郡王献碧玻璃”<sup>[42]</sup>。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吐火罗遣使献玻璃<sup>[43]</sup>。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康国遣使献锁子甲、水精杯、琉璃瓶、驼鸟卵。唐代史书记载不绝的玻璃总是与西方诸国相联系，并明确指出输入的情况和地区，但所记的多是伊斯兰时代以前情况。伊斯兰玻璃是以罗

马玻璃和萨珊玻璃为基础飞速发展起来的，9世纪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唐高宗时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唐与中亚、西亚的交往减少，公元751年中国唐朝军队与阿拉伯人在中亚怛逻斯之战后，交往陷入低谷。伊斯兰玻璃器出土在唐代晚期的遗址中，标志着尽管丝绸之路衰落，唐代中晚期仍与西方保持着联系。这些弥足珍贵的伊斯兰玻璃器皿保存完整无损，与世界各地博物馆中的传世品相比也堪称精品。

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和文献记载唐代和早些时候有一种“波斯锦”<sup>[44]</sup>，20世纪初开始在新疆等地出土的大量纺织品，经研究有的是外来织物。通过分析织法和花纹，并且与外国织物反复对比，考古工作者指出从汉代到隋代，中国一直是以经锦为主，唐代以后高级的纬锦才盛行起来<sup>[45]</sup>。锦是以经线起花还是以纬线起花的讨论，隐含的问题是要弄清那些奇妙的“唐锦”究竟产在哪里，直接涉及的遗物是那些联珠纹锦，即由一个个圆圈排列成联珠，再由联珠组成大圆环，圆环内饰各种各样的主题纹样的锦。这种极富特色的织物是汉代没有的。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7世纪开始出现用斜纹重组织、纬线起花、拈线较紧、夹经用双线的织锦，纹样以联珠分隔成独立的图案。盛唐时期联珠纹织物的一部分可能产自中亚<sup>[46]</sup>。吐鲁番阿斯塔那唐龙朔元年（公元661年）325号墓出土的猪头纹锦、唐麟德二年（公元665年）332号墓出土的颈佩绶带的立鸟纹锦，被认为可能便是“波斯锦”<sup>[47]</sup>。但也有人认为，这类锦不过是基于外销的需要，采用了流行的萨珊纹样，或应胡商要求而生产，不可能是西方的丝织品输入中国<sup>[48]</sup>。联珠圈内只取一个动物头部的如獠牙上翘、舌部外伸的野猪头纹锦，还有那种颈部戴垂珠项链或口衔垂珠项链站立的鸟纹锦，

中国传统纹样中从未出现，萨珊王朝及中亚织物、银器、石刻、壁画中常有这种装饰。阿富汗石窟壁画中也出现联珠圈内以立鸟、翼马和猪头为主题纹样的图案<sup>[49]</sup>。这种纹样的锦无论产地如何，图案渊源于波斯和中亚似乎没有问题，即便不是外来产品，也是刻意的模仿。萨珊遗物上的图案还流行鸟的颈部系飘带，口衔下垂三珠的项链，或把下垂三珠的项链套在鸟的颈部，外周饰联珠等，这种代表性的装饰，显然在当地富有特别含义，故频频出现在各种遗物上<sup>[50]</sup>，并很快传到新疆。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库车克孜尔千佛洞时代为6~7世纪的“最大窟”发现的壁画边缘纹样，就是鸟嘴上衔项链的样式，与萨珊遗物上的完全一致。因此，至少可以把这类立鸟纹看作是外来纹样。

陶瓷器中也有外来物品。扬州城出土一件色彩鲜艳的翠绿釉大陶壶，肩与颈部连接着弯曲的对称双系，腹部为横向波浪浅纹。唐扬州城内还发现数以百计的这类绿釉陶片，被考证为波斯陶。绿釉陶片经科学检测，胎体成分与中国汉代釉陶有别，釉的化学成分差别更大，属于钠钙釉系统，吸水率达30%，釉与胎的烧成温度接近，是一次烧成的<sup>[51]</sup>。这类遗物在伊朗多有发现，断定是外来物品无疑。与绿釉陶片同出的越窑、长沙窑、巩县窑瓷器，年代当属唐代中晚期，绿釉陶输入的时间大概与此相同。不过通常所谓波斯陶，似乎改叫伊斯兰陶更准确。波斯等国人到唐朝受到特殊的优待，不仅带来自己的产品，还在中国大量制作精美的物品<sup>[52]</sup>。《旧唐书·田神功传》载，因刘展反叛，邓景山引神功助讨，“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扬州出土的伊斯兰陶器、外来玻璃，当然与经商的波斯、大食

人有关。中国瓷器中独具一格的青花瓷在唐代烧制成功，也自然与伊斯兰陶器、进口釉料联系在一起<sup>[53]</sup>。

### （三）仿制物品与文化的融合

人们往往通过交往和商品了解到外部世界，同时激发出对未知事物的渴求。隋唐时代无论是基于贸易、猎奇、宗教或其他原因而来的外国人，都给繁荣昌盛的帝国带来了生机。长安城内专门设置了接待胡商的邸店，定居的外国人也开办了酒馆、店铺，双方都在实现自己目的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融合着异样的文化。

以南北朝民族融合和外来文化渗透为基础形成的隋唐文化，展示出了多元性和包容性。各国文化，甚至相互冲突的信仰在隋唐得到容纳，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之间和睦相处在世界史上也属罕见。隋唐佛教兴盛达到高峰，长安城内包括玄奘主持翻译印度佛经的慈恩寺大雁塔等遗迹至今犹存，敦煌、龙门等地遗留下石窟造像更多。山西太原市晋源区发掘的隋代虞弘墓<sup>[54]</sup>，墓室内有罕见的仿木结构建筑的汉白玉石椁，上面有带彩绘的雕刻，共有五十多个单体图案，有宴饮、乐舞、家居、行旅和骑马、骑骆驼、骑象搏杀狮子的狩猎图像。人物、服饰、器皿及花鸟带有极为强烈的中亚风格，是前所未有的发现。西安西郊土门村发现唐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祆教徒波斯人苏谅妻马氏墓志，志文汉文和中古波斯文合璧，说明晚唐时仍有懂得中古波斯文的人<sup>[55]</sup>。长安西市南大街中部街南出土大量骨制装饰品、珍珠、玛瑙、水晶装饰品及金饰品，似为附有加工作坊的珠宝商行遗址，反映当时跋涉兴贩的



“胡客”店铺真实的存在。乾县唐章怀太子墓有两幅“客使图”壁画（图三二），每幅绘六个人，其中服饰相同、举止稳重的三人是迎接外国来宾的鸿胪寺外交官，另外着装各异、面目有别的是客使，分别表现着东罗马、高丽、靺鞨、高昌、吐蕃、



图三二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

大食等各国使者，更进一步证实了对外交往的兴盛。

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出土遗物中得到生动体现。文献中记载波斯马球运动在长安风靡一时，对应的遗物有唐章怀太子墓打马球的壁画场景，而打马球的陶俑更在墓葬随葬品中多次发现，长安城禁苑遗址中还出土方形奠基石碑一块，上刻“含光殿及球场”。大量的陶俑和壁画人物盛行胡服也明显地反映与西方世界的交往。

当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和现实时，风格突变、创新的器物就会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粟特银器的传入，使唐代产生出一批新颖的器类。何家村出土的人物纹金带把杯、乐伎纹银带把杯，就是与粟特银器最为接近的器物。突出的特征是杯把部分做得很精致，环形把的上面带宽指垫，下面有指鬃，连粟特带把杯指垫上的胡人头像，甚至两个相背的胡人头像的做法，均精细地表现出来。环把的外侧还做出联珠装饰。这种由大联珠装饰的环形把曾是中亚各民族较普遍采用的做法。但是唐代的金银带把杯有的采用中国传统铸造方法制作。这些器物如不是粟特工匠在唐朝的制品，至少也是唐朝工匠直接的仿造。同类的带把杯在形制上模仿粟特银器的同时，纹样却是中国特色的缠枝、花鸟等。唐代的手工业者仍属工乐杂户，大都是被动应役，少有创作自由，如果不是供求双方的认可，不会出现大量仿制品。仿制行为不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终结，通过模仿在工艺技巧和艺术形式上获得启示，伴随着输入品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器物。唐代陶瓷器中大量的被称为胡瓶的带把壶，就是直接借鉴西方而成为唐朝流行器物的。但似乎唐朝人仍把胡瓶看作是外来器物，因此在与人物或某些场景相结合出现时，总与胡人、商旅有关，壁画和塑像上的胡人执胡瓶、骆驼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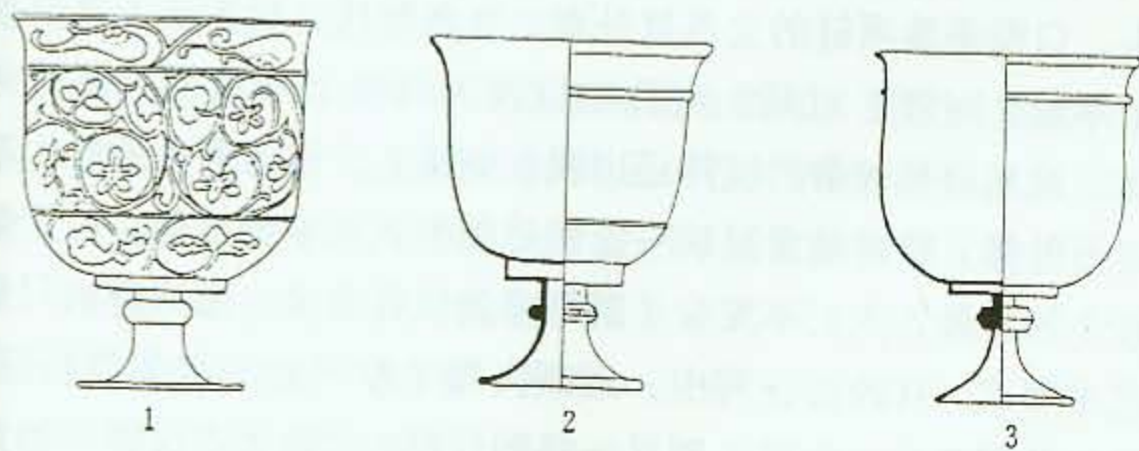
悬挂胡瓶是唐代常见的形象。

仿造的器物取材于各个不同地区。唐代器物中一些称为洗、盏、碟、盘、船形杯、椭圆形杯、花口形杯、羽觞类的长形多曲杯等，显然是渊源于萨珊的器物。特点是器身为长形多曲，杯体较浅，对称的曲瓣使器内出现凸棱，外表为凹线，有椭圆形矮圈足。由于长杯的数量较多，可以按时代早晚将之依次排列发现渐变的过程。唐代前期的长杯，形制上忠实地模仿萨珊多曲长杯的造型，两侧曲瓣不及底，为横向分层式，几乎是萨珊式器物的翻版。但由于信仰和审美的原因，萨珊长杯上与信奉拜火教有关的阿那希塔裸体或半裸体女神、圣树和水中鱼怪等题材，遭到唐代工匠们的摒弃，而代之以唐代繁缛细密的植物纹样。

萨珊多曲长杯宛如开放花朵式的造型给人以美感，却因分曲形成凸起的条棱使内部失去光滑。如果只追求艺术效果而不关心实用性，这样的仿造很难坚持长久，因此要寻求解决两者之间矛盾的办法，就是进行改造调整。唐代后期这类器物向两个方向发展，一种曲瓣从口到底成为纵向式，分曲减少并趋于平滑；还有一种基本保持着横向分层式的多曲，却淡化了凸鼓的曲瓣，加深了杯体，增高了圈足。这一演变表明唐后期萨珊特征只能说是一种痕迹，实际上已经与其母体分道扬镳，异域风格服从了实用安排，外来文化因素与中国传统进行了重新搭配组合，最终演变为创新器物<sup>[56]</sup>。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符合大众的共同喜好并有实用性的器物，就会具有流行于社会生命力。萨珊式多曲长杯对中国器物造型的影响，不仅局限在金银器上，滑石、白瓷、玉、玻璃器上也普遍出现，越是精心模仿的，一般时代越早而且可能是非实用性器物。宁夏固原

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史诃耽墓和西安唐总章元年李爽墓出土的多曲玻璃杯<sup>[57]</sup>，无法准确肯定产地，可能是对西方玻璃造型、装饰和原料都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的仿制品。日本正仓院藏有一件十二曲绿玻璃长杯，底部没有足，呈圈底，采用吹制手法成型，器物外壁刻花草和动物，造型与日本自身的容器毫无关系，原料成分中含铅极高，达55%，与中亚、西亚玻璃不同，却与中国制造的玻璃成分相类，被推测为中国仿西亚器物的制品<sup>[58]</sup>。

高足杯不是中国传统器形，呼和浩特毕克镇和西安城郊隋李静训墓出土金银高足杯，已基本肯定是西方输入的产品<sup>[59]</sup>。这种器物上部为圆形或多曲圆形的杯体，下部是器足，足的顶部较细，中部一般有算盘珠式的节，下部向外撇呈喇叭状（图三三）。陶瓷高足杯的出现可上溯到东晋，但数量极少，大都出于南方的湖南、湖北、江西地区。这一特别现象似乎与跟东罗马的交往有关。中国通过南海与罗马—拜占庭交往的历史悠久。隋唐时陆路交通兴起，《隋书·裴矩传》记载了通往东罗马的三条商路中，“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



图三三 唐代银高足杯

1. 庆山寺出土 2、3. 何家村出土

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sup>[60]</sup>。此路须绕道黑海，这一区域正是高足杯流行的地区。唐代是一个善于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时代，高足杯这种西方特征的器物传入中国以后，出现了许多仿制品，但与仿制萨珊多曲长杯一样，纹样采用唐代的缠枝花卉、狩猎、各种动物。高足杯似乎一度成为当时器物作品的典范，金、银、铜、锡、石、玻璃、陶瓷的材质都用来制造。这些器物大都出土于墓葬之中，年代比较明确，证明外来样式的仿制高足杯流行的时代是在隋和唐代前期。由于中、小型墓葬和瓷窑遗址都出土较多的高足杯<sup>[61]</sup>，说明渊源于西方的高足杯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成为较常见的日常生活器皿。唐代后期高足杯的形制也逐渐变化，形成粗筒状的喇叭圈足，杯身流行花口浅瓣式，整体已改造成为一种新的器物，并流行到宋代以后。

对外来装饰纹样的吸收融合更是隋唐时期的普遍现象。金银器、石刻、丝织品中的周围环绕圆框的“徽章式纹样”，本是萨珊艺术特征，却在唐代得到广泛的应用。但这些意趣相同的构图细部并不相同，萨珊纹饰中环绕圆框联珠圈内的野猪头、口衔垂珠项链的立鸟被卧鹿、立鸟取代，丝织品上又发展出单鹿、对鹿、对马、对孔雀以及天马骑士等纹样。那些朱雀、凤凰口衔丝带的纹饰还出现在铜镜上，称为鸾鸟衔胜、双鸾衔胜等。纹样通常反映一定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由于观念上的差异，人们不完全了解外来的纹样含义，感兴趣的只是艺术形式。在改造过程中，逐渐失却了原产地的大多数特征，兼收并蓄之后，出现了别具一格的纹样。“徽章式纹样”的圆框多是联珠纹，突然兴盛在北朝末至唐代前期并非偶然，敦煌壁画的边饰、彩塑服饰以及石刻和木质家具等遗物上常常见

到。尽管如此，人们心目中仍把这类纹样看作是异域风格。在传世的《步辇图》上，晋见唐太宗的吐蕃使节禄东赞，身着联珠圈纹样的窄袖胡服为异域标识。北朝至唐代前期一度涌现的葡萄纹也与西方艺术的影响有关，最为明显的是唐代极富特色的葡萄纹铜镜大量出现，它们绝大多数出土在7世纪中叶到8世纪前半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墓葬中。较早的葡萄纹铜镜内外区之间和边缘饰锯齿纹和突出瑞兽，继承了南北朝时期的做法，这些纹饰与葡萄纹相结合，这是葡萄纹镜产生初期的特点。但葡萄纹很快变为铜镜的主体而兴盛起来，有瑞兽葡萄镜、葡萄蔓枝镜、瑞兽鸾鸟葡萄镜。葡萄纹柔长的枝条、舒展的花叶、丰硕的果实与生动的瑞兽、活泼的飞禽构成了新颖的图案，十分符合盛唐时期追求华丽的审美取向。在古代世界堪称精湛独特的中国瓷器，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启迪，主要不是体现在瓷器工艺上而是在造型和纹样方面。北朝至唐陶瓷器上浮雕式的贴花增多，如隋代斛律彻墓中的青瓷壶、青瓷砚，都饰有下垂花朵，其装饰特点与萨珊银器上的捶揲花纹十分接近，段伯阳墓出土的贴花瓷器也属于这种风格，是接受了西方器物的装饰手法。

崇尚外来事物在隋和唐朝前期成为潮流，甚至引发起居生活方式的变化。隋代粟特人何稠是一位“博览古图，多识旧物”的名士，他不仅帮助隋炀帝改创了国家的章服文物流传后世，还成功地仿制出波斯锦袍、绿色琉璃等。何氏家族本为富商大贾，何妥也以“技巧”著称，逐渐进入官府上层<sup>[62]</sup>。唐代灭突厥后，大批突厥人入居内地，带来了他们的生活与文化方式<sup>[63]</sup>，产生了广泛影响。甚至行为举止有礼仪制度约束的太子李承乾，日常生活中也极力模仿突厥语言、服饰并喜欢居

住帐篷,欣赏其习俗<sup>[64]</sup>。说明唐朝对异种文化的接纳并不受多少限制。大诗人白居易也喜欢住毡帐,并写了大量毡帐诗<sup>[65]</sup>。对外来物品的使用也反映在考古发现的遗物上。陕西房陵公主墓壁画表现的进食场景中,侍女手持的高足杯、带把执壶等是外来器物的样式,甚至连用手指掐住杯足那种不自然的执物方式也模仿着异域情调。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兽首玛瑙角杯是流行在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器类,与中国生活习俗无关,却在西安、洛阳、湖北唐墓出现三彩仿制品,体现了置传统而不顾、对器物实用性要求远不如追求新奇奢华重要的时代风尚。

文化交流馈赠是双向的,中亚、西亚也出土了隋唐铜镜、钱币、丝绸和瓷器。日本、朝鲜和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出土了唐代越窑青瓷,埃及、伊拉克、印度、日本发现有邢窑白瓷<sup>[66]</sup>。大量的长沙窑产品中最精美的器物并不出土在当地,而是发现在扬州、宁波等地和朝鲜半岛的龙媒岛、日本的福冈和冲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甚至转输到非洲等地。可见长沙窑产品先到扬州等港口,再向海外输出。长沙窑出土的那些模印贴花西域骑士、卷发女郎、大胡子男人和用阿拉伯文书写“真主伟大”的题记的器物,明显是适应异国情调而专门设计生产的外销产品。此外,日本出土唐三彩的地点亦甚多,集中在福冈、奈良和京都的寺院中。

## 注 释

[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1956年版。

[2]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唐太宗贞观七年。

[3]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4] 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

[5]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

[6] 《隋书》卷三炀帝纪记载,大业五年六月“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蔽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大半”。

[7]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

[8] 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富平县文化馆、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凤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5期。

[9]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高宗仪凤三年。

[10]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11] 张籍《凉州词》。

[12] 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3]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14]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15] 孝感地区博物馆、安陆县博物馆《安陆王子山唐吴王妃杨氏墓》,《文物》1985年第2期。

[16]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

[17] 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8] 伊斯提泽德(Yazdegerd)三世,《旧唐书》中称“伊嗣候”,《新唐书》中称“伊嗣俟”。

[19] 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20]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21] 夏鼐《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庭式金币》,《考古》1961年第8期。

- [22]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郭媛《试论隋唐之际吐鲁番地区的银钱》，《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卢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23] 《北史》卷九十七高昌传。
- [24] 夏鼐《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年第8期。
- [25]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4年第6期。
- [26] 陕西省博物馆等《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 [27] 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期。
- [28] 桑山正进《一九五六年来出土の唐代金银器とその编年》，《史林》六十卷六号，1977年。
- [29]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第三编《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 [30]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とシルケロード上のソゲド人》，《季刊东西交涉》第一号，井草出版社1986年版；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
- [31] 同[20]。
- [32]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 [33] 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孙机《唐李寿石棺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34] M. 梯亚阔诺夫《边吉坎特的壁画和中亚的绘画》，《美术研究》1958年第2期。
- [35] 《中国石窟·キシル石窟》卷1，图版119，平凡社、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 [36] 齐东方《唐代银高足杯研究》，《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 [37]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古》1975年第3期。
- [38] 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 [39] 齐东方、张静《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凸出圆纹切子装饰玻璃器》，《创大アジア研究》第十六号，创价大学アジア研究所，1995年。
- [40] 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考古》1990年第12期。

- [41]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
- [42]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
- [43]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下记载吐火罗在开元、天宝年间多次献“红碧玻璃”，“劫者，居葱岭中，……武德二年，遣使者献宝带、玻璃、水精杯。”
- [44] 《北史》卷九十何稠传载：“波斯尝献金丝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成，逾所献者”。《梁书》卷五十四滑国传记载，南朝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波斯遣使献黄狮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
- [45]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 [46] 薄小莹《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联珠纹织物》，《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 [47] 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期。
- [48] 武敏《吐鲁番古墓出土丝织品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49] 樋口隆康编《バーシャーン》第1卷，同期舍1983年版。
- [50] 东京国立博物馆等《シルケロードの遗宝》，日本经济新闻社1985年版。
- [51] 周长源、张浦生、张福康《扬州出土的古代波斯釉陶研究》，《文物》1988年第12期。
- [52]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
- [53] 马文宽《唐代青花瓷研究——兼谈我国青花瓷所用钴料的某些问题》，《考古》1997年第1期；尚刚《唐代工艺美术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 [5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
- [55]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发现晚唐袄教徒的汉、婆罗钵文合璧墓志——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考古》1964年第9期；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的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 [56] 齐东方、张静《唐代萨珊式金银器研究》，《考古》1998年第6期。
- [57]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235~239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羊头镇唐李爽墓的发掘》，《文物》1959年第3期。
- [58] 松本保《正仓院とシルケロード》，平凡社1981年版。
- [59] 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期；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

- [60] 《隋书》卷六十七。
- [61] 桂林博物馆《广西桂州窑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4期。
- [62] 《北史》卷九十何稠传；《隋书》卷七十五何妥传。
- [63]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突厥传记载，“颉利不室处，常设穹庐庭中，久郁郁不自憊，与家人悲歌相泣下，状貌羸省”。
- [64]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贞观十七年：“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斫面。良久，太子歎起，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
- [65] 吴玉贵《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66] 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版。

## 参考书目

1. (唐) 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版。
2. (唐) 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版。
3. (唐) 康骞《剧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4. (唐)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5. (唐) 李匡义《资暇集》，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
6. (唐) 李林甫《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
7. (唐) 李肇《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8. (唐) 刘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64年版。
9. (唐) 陆羽《茶经》，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
10. (唐) 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11. (唐) 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
12. (唐)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3. (唐)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 (唐)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15. (五代) 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16. (五代) 王定保《唐摭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7. (宋) 李昉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
18. (宋) 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
19. (宋) 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20.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82年版。
21. (宋) 宋敏求《长安志》，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

1991年版。

22. (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
23.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
24. (清)董诰等《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5. (清)徐松辑《河南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
26.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1956年版。
2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2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
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30. (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
31.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32. 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33. 洛阳博物馆《洛阳唐三彩》，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35.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36.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7.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38. 文物编辑委员会《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40. 《中国考古学研究》编委会《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

- 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41.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42. 洛阳博物馆《洛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43. 《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44. 陕西省博物馆《隋唐文化》，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
45. 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46. (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47. 《中国の金银ガラス展》，NHK大阪放送局1992年版。
4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物园林局《唐惠昭太子陵发掘报告》，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
4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50. 《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40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51.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52. 法门寺博物馆《法门寺》，陕西旅游出版社1994年版。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54. (美国)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55. (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遣唐使が見た中国文化》，明新印刷株式会社1995年版。
56. 《唐研究》第1卷至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至2000年版。
57. 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58. 长沙窑课题组《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
5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十世纪前的

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 1996 年版。

60.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

61. 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6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出版社 1998 年版。

63. 尚刚《唐代工艺美术史》，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64.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

65.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66. 《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 后 记

这本书冠以《隋唐考古》之名，实在承受不起。书的本意是介绍 20 世纪隋唐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并略作评述，还是把它作为了解目前隋唐考古的基本状况和初步知识的书为好。

即便如此，十多万字只能是概括。然而越是概括，与具体资料间产生的矛盾会越多。资料没有详细展开分析，结论自然会令人感到突兀。宏观的介绍最好从宏观的角度来理解。至于有的方面点到为止，有的如玻璃漆木器整章割舍，那是因字数限制的原因。

水平和仓促都不是我要解释这本书粗糙的理由。我常想，历史考古在人们心中总有沉甸甸的分量，如今是繁忙的社会、消费的时代，为用而学、有用无用不再是读书的惟一的选择，如果能以娱乐为切入点，引导人们进入一个灿烂的世界中进行精神消费，无疑符合人文文化普及的需要。目前考古书也不算少，甚至有些滥，人们少有时间也未必都有能力去啃大部头著作，到头来琳琅满目的书有时竟满足不了读者简单的需要。当无书可读的时代过去后，有书难选的时代又到来了。基于这一想法，我始终徘徊在学术论述和通俗趣味的矛盾之中。作为《20 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中的一本，催稿声声



中，我终于下了狠心，采用较为规范的语言，重新统了一次稿。尽管还有点不伦不类，但对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尺度把握做到了基本准确，还是可以向读者做出承诺的。

最后要说的是，考古发现的每一个充满趣味的细节，都会勾起人的怀古情思，令人流连在一个已经远逝的热闹的世界，发现有森严的等级、快乐的生活、绝妙的发明，惊叹原来中国古代生活竟如此精妙。但愿本书枯燥而沉重的叙述，没有过多地增加读者的负担。

作者

2001年10月

封面设计 / 张希广

责任印制 / 陆 联

责任编辑 / 窦旭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隋唐考古 / 齐东方著.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10

(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

ISBN 7-5010-1320-9

I. 隋… II. 齐… III. 隋唐考古 IV. K87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4343 号

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

隋唐考古

齐东方 /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 //www. wenwu. com

E-mail: web@wenwu. 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印张: 8.25

2002年10月第一版 200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320-9/K·570 定价: 28元